

延安

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937—1947

朱鸿召 著

- ★ 再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 ★ 展示一个你不知道的延安



YAN'AN
RICHANG
SHENGHUOZHONGDE
LISHI



本书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就延安时期的某些历史关键问题或趣味敏感话题，作溯流探源与疏浚河道的工作，描述延安生活中的历史真实，借以考察改造塑造我们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革命集体生活规则，探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革命精神。作者用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在查阅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多方采访延安革命老人，深入延安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展开对延安历史生活的研究。题材新颖，资料丰富，文情并茂，既是大众话题，又是学术研究，堪称近年来该学科领域的翹楚之作。



上海贝贝特

推荐上架类别：学术类

ISBN 978-7-5633-6603-3



9 787563 366033 >

定价：3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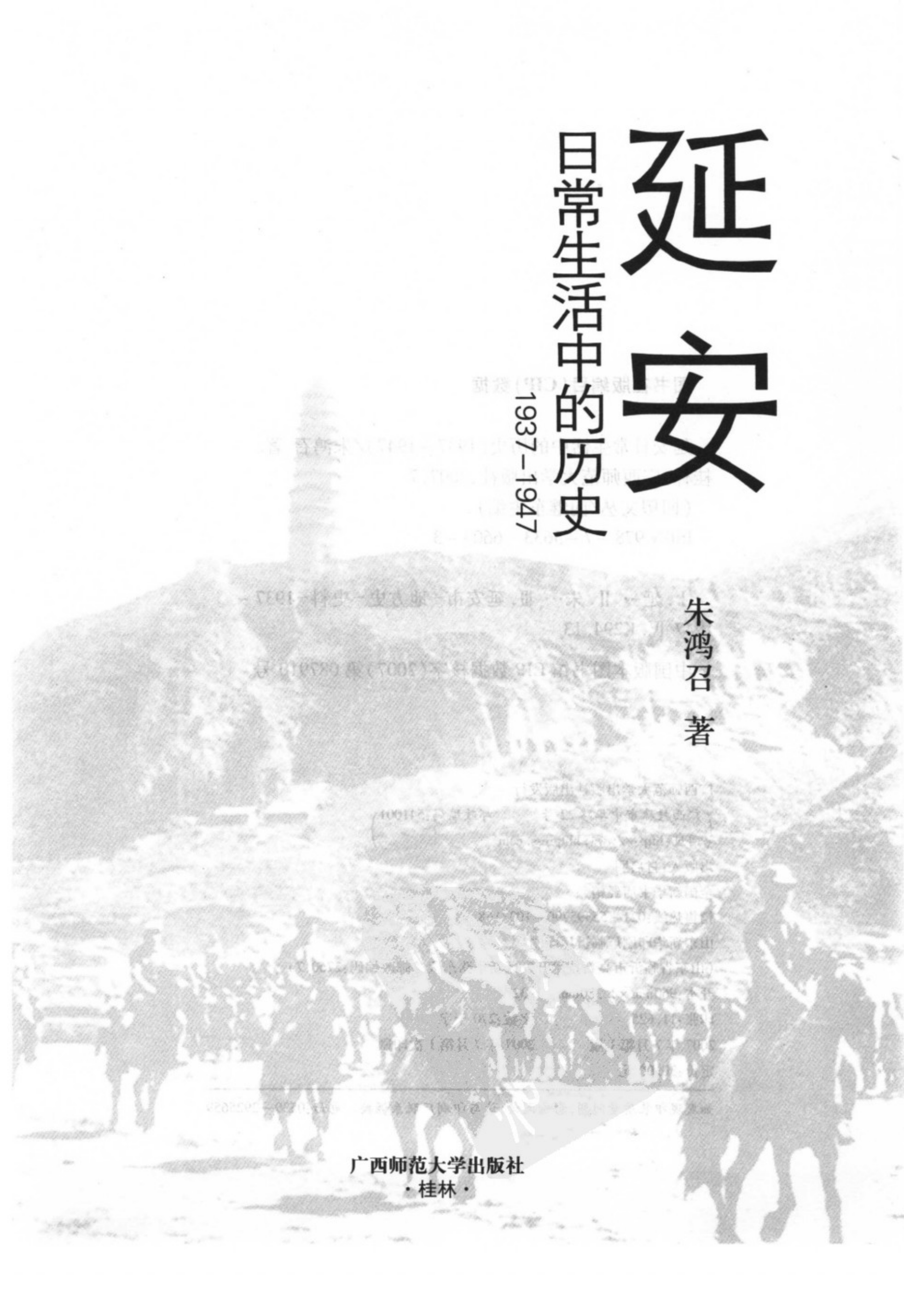
延安

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937-1947

朱鸿召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回望文丛/向继东主编)
ISBN 978-7-5633-6603-3

I. 延… II. 朱… III. 延安市-地方史-史料-1937~1947 IV. K29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791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80mm 1/32

印张:11.625 字数:270千字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659

自序：“五四”过后是延安

朱鸿召

我们早已关注“五四”，我们刚开始关注延安。

从“五四”到延安，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河流拐了一个弯。

十年延安时期(1937—1947)，不仅规范制约了此后半个多世纪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死浮沉与歌哭，而且重新阐释了此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重新规划了中国古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还重新描述了世界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

立于又一个新世纪之初，回顾刚刚成为过去，还带着我们父辈、祖父辈体温的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具有思想文化史价值意义的时代，只有“五四”和延安。“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20世纪中国的历史因此而溶入我们的血脉，凝结着我们父辈、祖父辈的泪水、汗水和血水，吸纳了我们几代人发自心灵深处的风声、雨声、咆哮声、厮杀声、欢笑声……

这种人，就是近现代中国读书人，现在通称的知识分子。

发现人，是寻找历史遗嘱的执行人。经历过19世纪后半叶中西方商贸、炮火和文化的交流来往，中华民族危亡日渐加重，历史的遗嘱在等待执行。清末一系列新政运动，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但被一再拖延，最后胎死腹中的政治变革，导致一而再，再而三的武装斗争、军阀政治。旧秩序已经破坏，新秩序还没有形成，科举制度废除，斩断了中国读书人与原有社会政治体制的必然联系，他们成为一群飘忽不定的自由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进化论旗帜下，寻找到已经接受或正在接受西方新文化思想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作为引领时代发展方向，担当思想解放、文化解放，创造新人生、创造新社会的

历史遗嘱执行人。

尽管脐带斩断,血脉相通,这些新式知识分子骨子里流淌着浓厚的传统中国文化习性。但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已经具备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铮铮傲骨,“大胆地设想,小心地求证”的科学态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浩然情怀。他们在“五四”之后,担当道义,抗争强权,呵护天下良知和黎民百姓。

改造人,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经历过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进入革命队伍里的新知识分子,率先接受洗心革面的人生改造。在阶级论思想指引下,无论你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必须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是此后几代中国读书人唯一可走的人生道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发现了人而创造了 20 世纪前半叶历史,延安时期因为改造了人而创造了 20 世纪后半叶历史。并且,因为改造人,重新塑造人,延安改写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这是怎样一段惊涛拍岸、波浪滔天的河湾呀!

本书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就延安时期的某些历史关键问题或趣味敏感话题,作溯流探源与疏浚流程的工作,借以考察改造、塑造我们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集体生活规则,探讨制约、规范我们几代人思维言说习惯的集体记忆法则。

延安十年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当代性,远远超出了“五四”。我相信,清理 20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遗产绕不过延安,建设 21 世纪中国社会文明进程同样绕不过延安。我希望,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人都关注延安、思索延安,以此作为我们今天选择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的逻辑起点。

盼望呼应,期待批评。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E-mail: zhuhongzhao@vip.sina.com

2007 年 5 月改定

目 录

自序：“五四”过后是延安	1
--------------------	---

饮食篇

考察延安生活的物质方面,基本人口构成、工厂、农村、
军营等,贯穿着一个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主题

延安生活指数	3
工人有什么才来劲	33
改造“二流子”	57
把日本战俘变成革命战友	66

人文篇

考察延安生活的文化方面,医生、文艺工作者等,探讨文
化人在革命阵营里的精神思想特征及变迁,探讨改造
人、重新塑造人的实现途径

延安医生“告御状”	89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	106
秧歌是这样开发的	123
晴朗的七月十五日	154
黑色的七月十五日	185

男女篇

考察延安生活的情感方面,女同志、恋爱、婚姻等,探讨
改造人、重新塑造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 飒爽英姿是怎样炼成的 213
- 飒爽英姿炼成之后 235
- 延安交际舞始末 259
- 恋爱中的枪声 277
- 附录:《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事判决书》 291
- 补记:刘茜的家庭与出身 294

风物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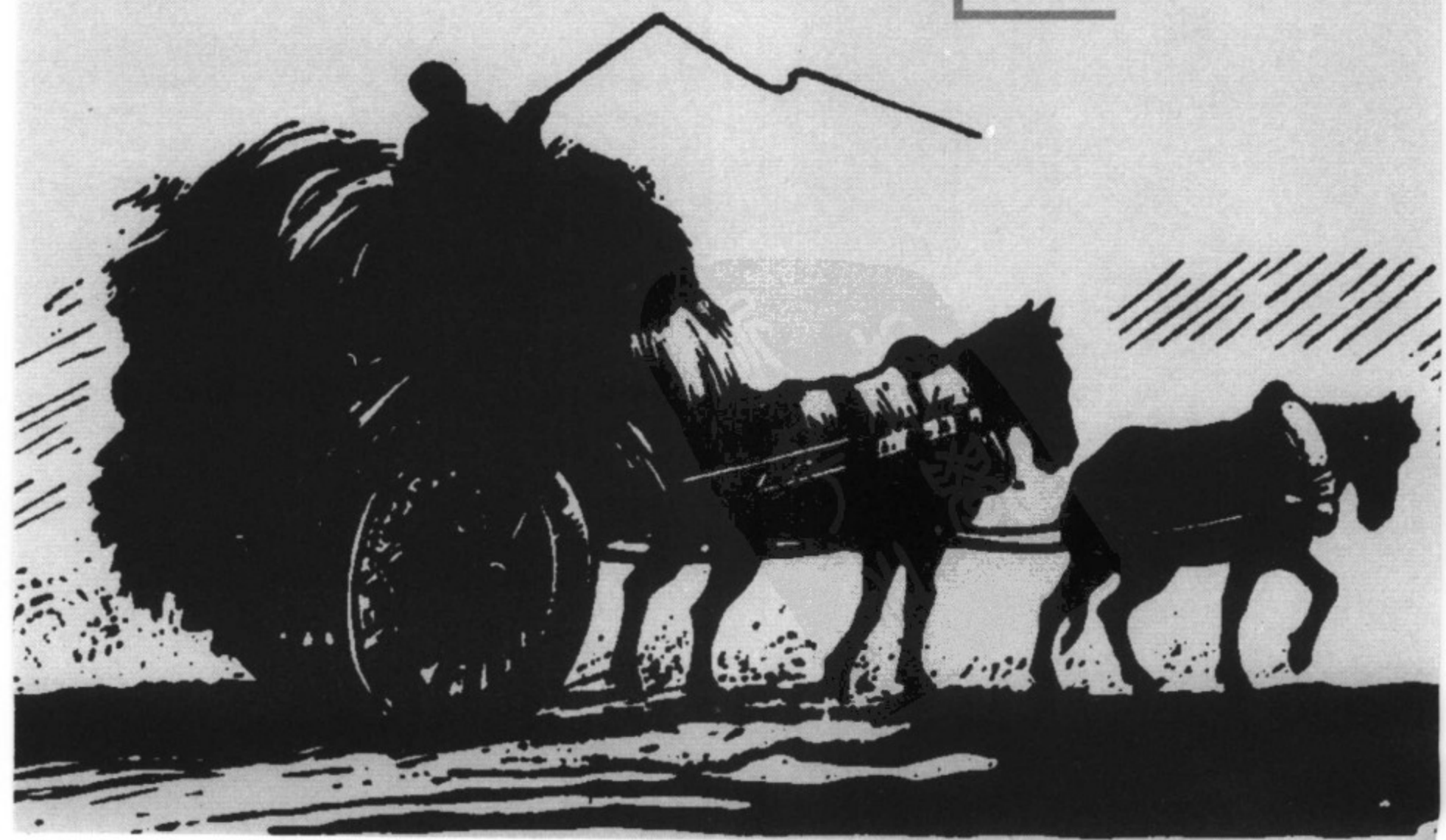
考察延安生活的环境地理,审视这些被改造、被重新塑
造的人生记忆法则,探讨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主题延
伸

- 关于宝塔山延河水的万千说法 301
- 狼与虱子的生死浮沉 337
- 后记:缘于南京路上的思考 356



饮食篇

考察延安生活的物质方面，基本人口构成、工厂、农村、军营等，贯穿着一个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主题。



蘇
子
君
知
尊

延安生活指数

延安十年(1937—1947),将一个陕北小镇打造成革命圣地,并因此而规范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改写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篇章。走进历史的生活是崇高的,但融入生活里的历史却往往是繁杂琐碎的。

一 人口与性别

人,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同样是人,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战争年代和医疗卫生条件极不发达的地区,人是一切资源中最可利用的因素,也是最可宝贵的因素。延安,自古就是边陲要塞,位于汉族与匈奴



宝塔山下,延安曾让世界为之瞩目

等北方少数民族交流杂处的前沿地带。清末以后,这里战争频仍,十室九空。1935年10月,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到达陕北后,当务之急就是“扩红”——招募青壮年人口参加红军,补充长途跋涉而锐减了的部队编制和战斗力。此后的十余年间,陕北延安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大量吸引人才,更大

量地招募移民人口。革命圣地延安的历史,就是由他们直接参与打造的。

1937年1月,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随红军主力部队进驻延安。当时,延安城本地居民大约3000人。“在露天集市上,农民和商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还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几座有名气的饭馆,仍旧照常营业。总之,延安呈现着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而此时部署在延安的共产党守备部队实有兵力总计4000—5000人,共分为5个团。1938—1939年边区与国民党军队开始发生摩擦,从前线撤下3个团来加强守备部队,使其兵力增加到6000—9000人。^①



1937年的肤施古城,依山傍水,气势巍峨,依然保存着作为古代军事要塞的庄严气象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的实有人数是7.5—8.1万人,战斗部队编制为5个军团。所有参加长征的人,身边带有大约可以用两个星期的给养,主要是大米和食盐。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剩下7000—8000人,其中正规部队战士约5000—6000人。

1937年8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将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陕

^①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39、254页。

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共4.6万人,开赴华北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抗日。在延安的各师留守部队组成“八路军留守兵团”,总人数是1.6—1.9万人。同年9月,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八路军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集团军”。稍后,八路军留守兵团与第一二〇师等部队组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1942年5月,在延安的党政干部有1.2万人,陕甘宁边区民众人口约160万,军队约10万人。^①

1943年8月,在延安的党政军人数有3万人,老百姓约1万人。^②这相当于1937年延安市区人口的16.67倍。

1943年12月22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就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问题发言,其中介绍: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占19%,高中占21%,初中占31%,初中以下约30%。这些知识分子到延安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就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或其他根据地工作,部分人留在延安工作。

1946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提供的确切统计资料显示,延安市区老百姓人口总数为1.237万人,陕甘宁边区人口总数为159.395万人。这是不包括党政军学等“公家人”的。同时,据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统计,1937—1945年间,边区共接受移民6.385万户,人口26.662万。外加5000多人的还乡难民,人口总迁移量达到31.662万人。安定县(今子长县)四个行政村原来只有173户,到1941年短短几年时间就增加到288户。^③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先进模范村的延川县刘家河村,1937年只有5户人家,62口人,到1943年就增加到12户人家,105口人。^④在这十年里,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持续在5‰—20‰之间,属于典型的非自然增长状况。在1946年的边区农村总人口中,全劳力就高达33.876万人。这种以移民为主

① 参见唯木:《当前的剧运方向和戏剧界的团结》,《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5月19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中央档案馆存。

③ 《边区人民生活日趋改善》,《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9月22日。

④ 《刘家河村被誉为丰衣足食模范村》,《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9月23日。

体的人口迅速增长,为农业生产和兵力补充提供了可靠有力的保障。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延安,其边区人口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发展生产,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反对堕胎,加速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力吸收各类人才,大量招揽各种移民,增加人口。1943年2月22日的《解放日报》载文说:“我们不怕来的人多,愈多愈好,我们只怪历史上给延安县遗留的人口太少,给我们发展生产许多困难。假如在二三年后,延安人口达到十万以上,那我们的工作将是另一番现象。”

上述边区人口中,农村老百姓无论是原有农民,还是招揽来的移民,其男女性别比例大体上是平衡的。1945年10月边区选举委员会统计的边区人口总数中,男性8.440万人,女性7.500万人,男女性别比为1.13:1,属于正常状态。可是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中,男女比例却严重失调。

1938年前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男女比例为30:1。几年过后,到1941年前后,男女比例稍有缓解,为18:1。再过几年,情况更向好的方向发展,1944年4月,男女比例为8:1。^①这个比例关系基本维持到1946年开始逐渐撤离延安。

形成这种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关系的原因,是长征到陕北延安的革命队伍,绝大部分都是男人。一大批青年学生为了抗战,从沦陷区、国统区和大后方奔赴延安,献身革命,才缓解了革命队伍里严重倾斜着的男女性别比例关系。“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②

1938年9月,时年19岁的孙承勋(何满子)经武汉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高级班第六队学习。此前在武汉抗日救亡活动中,他认识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学生郭维琼,同样也到延安,进入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他们之间保持着亲密的通信联系。大约半年后,他忽然接到她

^① 参见朱鸿召:《延安文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88页。

^② 梅剑主编:《延安秘事》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445—446页。

的告别信,说组织安排要她陪同一位老干部到晋察冀边区前线。“‘陕公’与安吴堡青训班常有人来往,我得知一些情况,知道我们的关系完了。”^①此事对他打击很大,他感到再也不能待下去了,随即离开延安。半个多世纪过去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和这件事,以为自己“由此而学懂了一点人生的、社会的内核性的东西”,“看到了一个胚胎,一个雏形,由此而领悟了社会的结构和运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虽然“这点获得极难用文字表述”,但对他自己人生的影响却是至深至远的。“我真切地自我审察到,从此就添加了一些虚无气,对生活的执著也添上了虽然是轻度的怀疑和渺茫的色调。这对我以后的生涯影响极大。我常为克服附在我身上的这个消极性幽灵而付出精力,到底没能尽根制服庄生式的对人生的玩赏态度。”^②幸许怀疑与玩赏的人生中会伴生出几分旷达与超脱,毕竟有违公正,暗影出没,让人耿耿于怀。

二 时间与食谱

7

时间是人类文明的坐标,人们用不同的态度对待时间构成了这个世界不同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时间指纹。认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其实就是去认识它如何使用时间。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时间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统一的过程。

长征过来的革命队伍里,计时的钟表是非常珍贵的稀罕物件,只有战斗指挥员才配有。集体生活作息时间,起床、熄灯、一日三餐都是以号角为指令的。令行禁止,个人无须计时。只有担任首长警卫任务的战士们,需要计时轮换岗位,便以焚香为准,大约一炷香一个小时。而一些学校的作息时间,干脆以领导者或值勤者观测太阳高低,日暮晨昏为标准,随意性很大。遇到集体活动、庆祝盛典、群众集会,就并无定时,什么时候主持其事的领导人到场,便什么时候宣布开始。这在革命队伍里一般战士或工作人员并不觉得有什么妨碍,相反,领导人没有到场前的时间里正可以互相“拉歌”,热闹一阵子呢。

^① 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6页。

^② 何满子:《鸠栖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37—138页。

但因为有了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便感觉到了落后和不习惯。曾经留学法国近十年的陈学昭就公开批评延安,“开一次会,要是有几个人的话,等待开会的时间往往可以和开会本身的时间占得差不多,就是说:两小时的会,要等待两小时。听报告也是如此。我的经验是听报告两小时的话,等待了一小时半到两小时,就已经感到疲乏,而不能集中精神去听报告了。”^①也有领导同志偶尔号召大家遵守时间,但大家已经相习成风,没有时间概念,或时间概念淡薄,彼此遵守的只有革命队伍里的号角和领导者的指令。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把自己所有活着的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事业的革命者,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分子,其一切行动都听指挥。只有那些将自己生命当作个人财富,或者是更广阔的人类财富的知识分子们,才觉得“不重视时间,不遵守时间,不抓紧时间,也就是浪费时间”。

8



位于南门外新市场附近的南区合作社门市部,是公有制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两种对待时间的不同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便产生了心理矛盾和思想冲突。随着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以及医学、通讯等现代科学事业的出现,他们对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时间浪费现象也就意见越大。“在延安我们缺乏足够的钟表。即使有钟表,亦无标准时间,往

^① 陈学昭:《时间》,《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11月16日。

往相差到一、二小时,以致开会或听报告总不能按时到齐,前后浪费很多时间。”^①钟表不能普及,那么,最可行的办法是制作沙漏和日晷。

1939年11月7日成立的中央医院,采用的是与李鼎铭先生所擅长的中医完全不同的西方医学,诊断、治疗、化验等操作过程都需要精确的时间计量。医院筹办之初,他们在延安城南门外的新市场买到一个旧闹钟,如获至宝。他们在化验室窑顶上悬挂一个大铁圈,由办公室专人负责看着闹钟按时敲点。“于是仿效外洋轮船报时的方法,从晨五时到晚十时,每小时报一次时间,以四小时为一组,一、五、九同样报法,二、四、十也同样报法,使大家心中有数,听者不会误会。”^②不久,宋庆龄托人带来几只手表给中央领导,毛泽东得知医院需要,就全部给了医院,戴在各科室主任手上。但一来僧多粥少,二来坏了没有人维修,所以刘允中医生便制作了沙漏。

从延河边找来细白均匀的沙子,放在细长的中间束身一次只能流通过一粒沙子的玻璃管中,计算出一秒钟流通过的沙子数,装置一定的沙子后,再将玻璃管封闭即可。有15秒与30秒两种,使用时可以来回倒两次或四次,便是一分钟的时间。开始在医院里使用,用以计算呼吸,数脉搏。后来大生产运动中,在1943年6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予以介绍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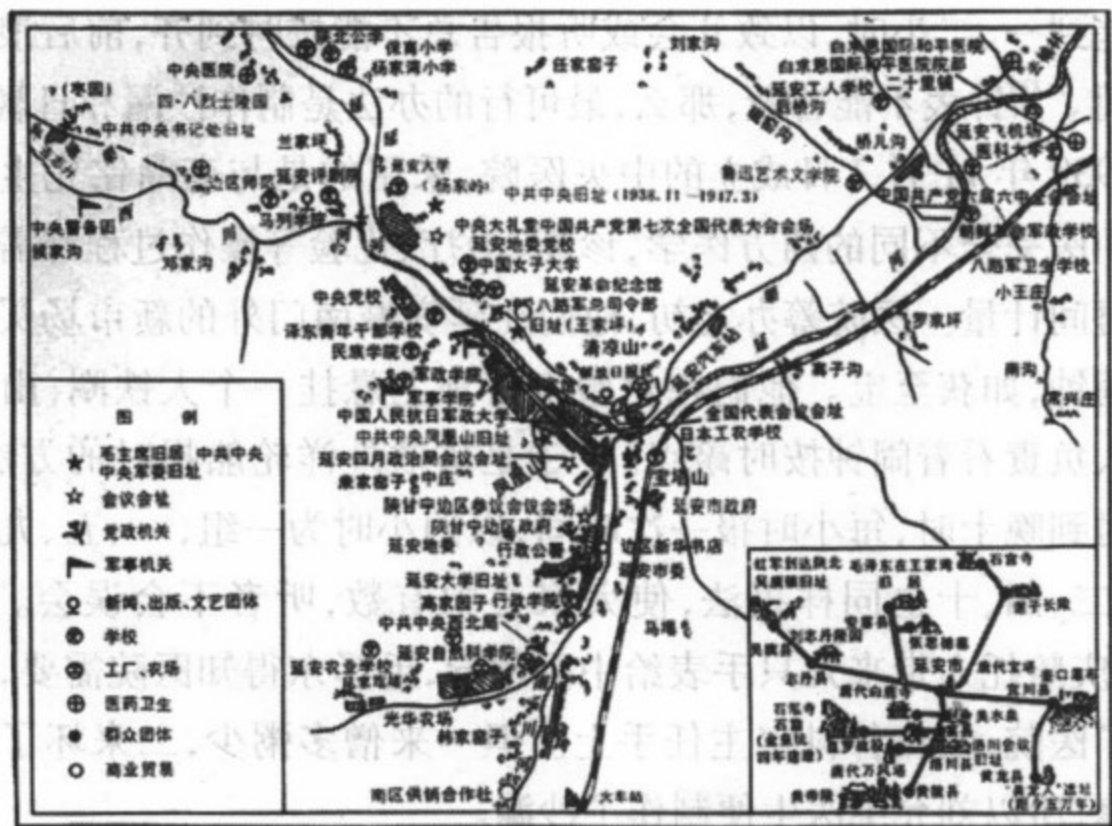
沙漏适宜于室内精确细小刻度计时,室外大刻度计时是日晷。1942年8月28日《解放日报》报道,边区数理学会的孙桐计算太阳与时间的对数,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物理系江天成校审并设计出石质日晷。然后,由自然科学学院、边区政府和延安市政府资助,翻刻制作出两个大的石质日晷,分别安置在自然科学学院内和市南门外新市场沟口。^③在当时条件下,此举堪称是对两种不同时间态度的最佳调和办法。随即,延安的很多单位,如杨家岭、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也都陆续安装了这种形式的计时工具——日晷。

其实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中,尤其是先后从苏联回来的领导

^① 江天成:《延安日晷与地方时》,《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9月30日。

^② 何穆:《延安中央医院是怎样创办起来的》,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5页。

^③ 当年安置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日晷,1947年3月为躲避国民党进攻,曾经被埋藏在地下。1953年被重新挖掘起来,并被征集为革命文物,至今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延安主要革命旧址示意图

人,不是没有钟表,而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准。1944年5月,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帮助建立广播电台的英国人林迈克(Michael Lindsay)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初到延安时,那里还没有标准时间。有些单位使用中国东部的华东标准时间,有些单位则使用华中时间,而延安地方政府则在他们的院子里安上一个日晷,时间是以太阳移动而决定的。这样多的不同标准时间当然会引起混乱。”由于他的工作是建立电台,并负责接受并联系外地电台,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于是,他致信毛泽东。“结果毛泽东先生让他的一位秘书给在延安的各机构打电话,询问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时间最好。过了几天《解放日报》登出了一条新通知,规定延安就使用所处时区的时间,即中国中部标准时间。”^①

延安当时不多的钟表都在中央领导人手上,他们分别从南京、武汉、重庆、莫斯科等地来到延安,然后各自主持某个部门的工作,便使得不同的单位使用不同的标准时间。而毛泽东本人,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整个地将白天与夜晚颠倒过来,特立独行地按照自己的生活习

^① [英]林迈克:《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6月版,第101页。

惯和方式使用着时间。

用行政的办法统一了标准的时间,林迈克在与外界交往的过程中感觉到方便多了。对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一般战士,以及奔赴延安后在整风运动中接受革命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关于时间的概念依然是模糊的。天有阴晴雨雪,石质的日晷岂能承受过多的苛求?在延安革命队伍里,过着供给制集体生活的人们,最严格的时间作息标准,其实是食堂一日三餐或两餐的开饭吆喝声,或梆声,或哨声。

1938年秋,陈学昭以《国讯》旬刊(黄炎培主编)特约记者身份从重庆到延安,刚开始她被安排住在中央交际处招待所。吃饭时间是:

早饭:8:00左右,干饭;

午饭:11:00左右,稀饭;

晚饭:15:00左右,干饭。

11

“三顿饭在六七小时内吃完,只觉得一天工夫吃饭的时间占去大部分,因为饭与饭之间的距离太近,常常把工作打断。三顿饭都是小米,菜呢,都是南瓜。……自从我到后,他们为优待外来的参观者,为了外来的人一下子不能习惯于吃小米、素菜,每次都特地给我烧大米饭,另加一只葱炒蛋。”她写回的报道中记述着:“说到吃,一般人都吃小米,那是外边大家都知道了。在冬天,蔬菜只有白菜、豆腐、豆芽菜、红萝卜、白萝卜、洋芋、粉条,荤菜只有猪肉,及猪身上的一切,羊肉,与鸡、牛肉呢,难得有出售,那是死了的牛的肉。鸡蛋绝对没有,因为天太冷,鸡不下蛋。现在,初春的美丽季候,只有菠菜,白菜绝对没有了,其他菜类与冬季的一样,不过荤菜增加了鸡蛋而已。”^①近代陕北灾荒连年,几万人的革命队伍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了。

延安马列学院坐落在蓝家坪的半山坡上,名曰学院,其实只是几排窑洞,周围没有围墙。每排窑洞前面有一块平坦的空地,可供学员读书、吃饭。四五个学员住一个窑洞,洞内放一条桌,供晚上点灯照明

^①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1940年7月版,第81—82、216页。

读书用,没有椅子。“学院的生活很有规律,读书、上课、讨论、就餐、睡觉均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以哨为号。学员吃饭一般都到最下面一排窑洞伙房去打饭,一个小组一脸盆菜,大家蜷着腿围坐在地上吃。”^①一位学员于1938年12月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他回忆当时学员生活待遇是:每人每天1.3斤小米,1斤青菜,3钱油,3钱盐。每年发单棉制服各一套,生活是有保证的。每月还发一点津贴。^②另一位学员于1939年3月进马列学院学习,他回忆当时的学员生活待遇和伙食情况与上有些出入:“当时的生活很艰苦,每日小米(糠不少)1斤,蔬菜1.5斤,油3钱,盐5钱。每周一顿二米饭(小米掺杂大米——引者注)或馒头,菜汤上漂几片肉,节日可吃到一顿大米饭。每月零用费1元。”^③

马列学院是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学员们都是将来的干部候选人,言行举止也都比较中规中矩。而另外一所学校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们,年龄上较马列学院普遍年轻,资历也浅,有的甚至还是十几岁的大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伙食单调,油水不多,遇到每周一次的伙食改善,就会出现很多热闹。

山下的哨子声盖过了乐器声,要开饭了,今天又逢改善生活,同学们放下学习工具,雀跃着跑下山来。炊事员已经把一大饭桶面条抬到广场上,“掐饭,掐饭,吸烟,吸烟”,操着各种强调的语言,身着各种服装的学生,顿时把饭桶围严实了。有一个调皮鬼打着快板,敲着餐具,“‘武’餐呵!”一个鹌鹑翻身挤在最前边,三下两下就捞起一碗面条。后来的不甘示弱,手伸过他的头顶,两条胳膊已经探到饭桶边沿上了,“加油呀!莫后退。”人们拥挤起来,终于把盛起来的那碗面条挤翻,洒在更下边人的头部及肩膀上。这时候四周响起了喝彩声、笑声,尽情的欢腾着。这是独特的景观,没有导演的

^① 段苏权:《一生奋进总思源——忆延安马列学院》,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17—218页。

^② 郭敬:《马列学院的生产劳动》,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同前引第182页。

^③ 同^②。

节目。^①

此情此景当时热烈紧张,事后令人难忘,思之有趣。据另一位鲁艺同学回忆,平时伙食就是小米干饭,菜是熬萝卜条,偶尔有个菠菜汤。“每星期吃一顿面条,里面掺的猪肉,味道怪鲜的;用大木桶盛的,打饭各人围着木桶去盛,都是青年学生,人挤人抢面条,怕迟了吃不到了。”华君武就此还画过一张漫画,夸张地“只见面条落在有的人的背上、肩上、头发上、耳朵上”^②。漫画张贴出来后,引人捧腹大笑。

1940年大生产运动后,改善了学员的伙食,能够吃上馒头,菜里的肉片也多了。

大生产运动中,各单位多种经营,养猪、种菜,并创收,改善生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原来每天伙食的主食是小米,此时变成面食,并且逐渐地每周还可以吃上一餐大米饭。这是他们一周的食谱:

星期一:

早饭:羊肉炒萝卜、炖牛肉、豆腐、白菜、粉条、西红柿汤;

午饭:面条;

晚饭:素炒青菜、炖白菜、猪肉丸子汤。

星期二:

早饭:羊肉炒土豆、炒菠菜、豆腐汤;

午饭:疙瘩汤;

晚饭:油炸丸子、汤。

星期三:

早饭:猪肉炒白菜、卷心菜汤;

午饭:面条;

晚饭:煎肉丸子、炖南瓜、西红柿汤。

星期四:

早饭:羊肉炒土豆、炒菠菜、豆腐汤;

^① 司竹:《古元——我在延安鲁艺的同学》,见《古元纪念文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88页。

^② 刘蒙天:《回忆古元同志点点滴滴》,见《古元纪念文集》,同前引第51页。

午饭:疙瘩汤;

晚饭:色拉、裹面油炸茄子、卷心菜汤。

星期五:

早饭:牛肉炒白菜、西红柿汤;

午饭:面条;

晚饭:蒸鸡蛋羹、南瓜甘薯泥栗子、萝卜汤。

星期六:

早饭:猪肉炒白菜、白菜豆腐汤;

午饭:疙瘩汤;

晚饭:炖菜、蒸南瓜、醋拌凉菜。^①

该校学员都是日本俘虏,为了体现优待政策,伙食是上乘的。但毕竟大生产运动解决了革命队伍的温饱问题。不久,当地老乡的生活也改善了,街上的饭馆里可以买到大米饭、馒头和面条,以及肉食菜,各机关学校食堂虽然还是以小米为主,但副食品花样多了,一天可以吃上一顿肉。

三 货币与物价

延安革命队伍里实行供给制,作为一个“公家人”,一般吃住用全部由公家按照不同的级别等差无偿供给,个人需要购买的东西很少,除非私自给自己或邀几个朋友下馆子加餐开荤。但作为一个国家的雏形,延安时期仍然发行货币。市面流通的钱先后有“苏票”、“法币”、“光华券”、“边币”、“流通券”等几种形式。由于有了这些不同的钱币,便带来人们生活中物价的涨与落,以及生活水平的好与孳。

最初红军带到延安的钱是“苏票”,即“苏维埃国币”,又称苏币。早在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便创立,7月7日开始发行统一的新纸币“苏维埃国币”,面额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

^① [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中的日本兵》,北京:长征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54—55页。

共5种。苏票一元与法币一元相等值。“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毛泽民(时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引者注)奉命携带苏维埃国家银行的160多担黄金、白银和苏币,组成特别大队,保证红军给养;同时还兼负管理沿途运输、接收打土豪的财物、筹粮筹款等工作……”^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以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办事处的名义,继续发行过一些苏票,但流通有限。

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随之,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办事处也相应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承认并流通法币,逐步收回苏票。

“法币”,是指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制度,“废两改元”,改用统一的纸币流通,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大银行(1936年2月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共四大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即“法币”。1938年6月,边区银行发行了小面额的“光华商店代价券”,简称“光华券”。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银行开业典礼

一年后,国民政府得到报告,大为光火,责令严查。1939年4月7日先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查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惟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经当地商会、农会等向边区政府环请,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

^① 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435页。



1938年光华商店发行的光华券(二分)

16

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部队强迫行使情事。尊座听得报告，完全与事实不符。”^①

次日，再由边区政府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呈文，重申上述缘由。4月10日，边区政府又一次致函国民党西安行营：“查边区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惟于开始推行之期，流通市面之法币，多系五元十元者，而零星辅币，

万分缺乏……农民则因需用品之不易购到，宁愿物物交换，不肯接受法币。”边区银行经托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有关方面交涉，结果由中央银行兑换少量辅币，同时由国民政府支付给八路军的军饷，同意辅币占十分之一。这样，市面上仍然小票太缺，多用邮票找零。于是，便有了“光华券”。

光华商店是由原边区政府贸易局改制而成，归属于边区银行经营管理的当时延安最大的一家商店。“光华券”票面为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共5种，作为法币的辅币，开始只发行10万元，持券者可以随时到光华商店如数兑换法币，信誉甚好。1939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受到破坏，国共两党关系大不如前。入冬以后，延安物价猛涨，法币狂跌，陕甘宁边区财政供给出现困难，于是在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同时，为了调剂金融，周转财政，遂扩大光华券的发行，至1939年12月共计发行31万元，至1940年12月共计发行311万元。1941年1

^① 参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230页。



1941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五元)

月,开始试发行“边币”,并增加发行票面为七角五分的代价券,连同前面发行的五种,光华券共计六种。到1941年12月,共计发行430.725万元,其中边币4.16万元。

“边币”是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正式货币。与光华券一样,票面上都标以“中华民国”纪年,但大红着色,妇女纺纱、羊群等图案已经具有鲜明的解放区文化特色。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28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独立发行边区自己的货币,1月30日颁布法令禁止法币在边区范围内流通。2月18日,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边币,票面为一元、五元、十元,与光华代价券辅币配合使用,以后逐渐以边币收回光华代价券。

据时任边区银行行长的南汉宸在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的报告《财政工作报告》介绍,“政府为了在边区维持法币价格,调剂金融流通,同时为了防止法币对敌占区的流出,今年春天在以现金与法币作基金的情况下,发行了1200万元的边币,在边区市场以内流通。以边区200万人口计算,1200万元的边币,平均每人流通量只有6元(据估计大后方平均在40—50元),这在百物昂贵的今日,绝对不会超过市场的需要,换句话说就是绝对不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现象。然而我们毋庸讳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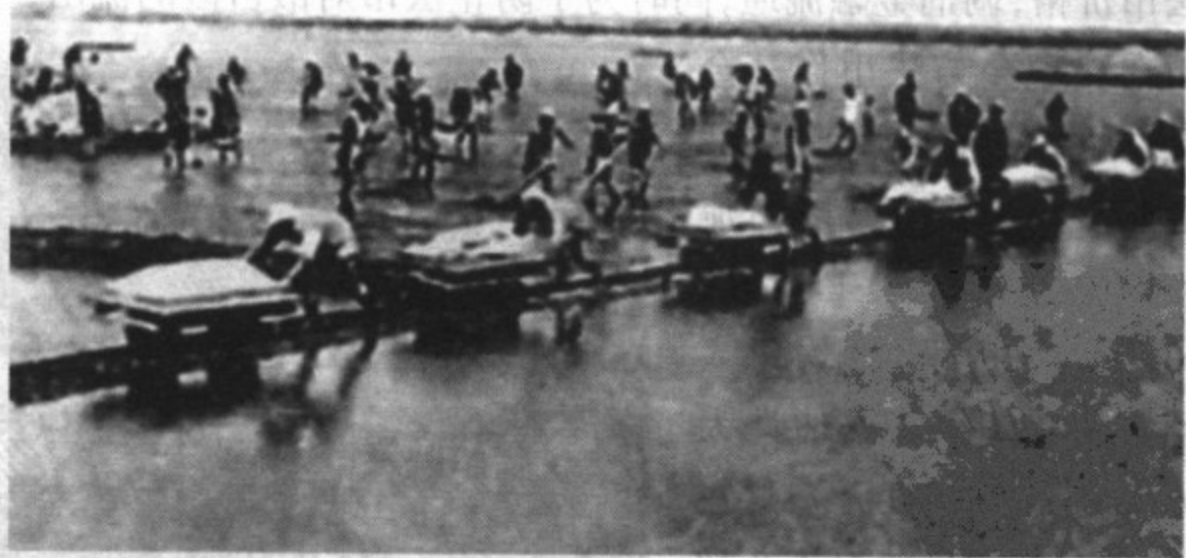


1943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五千元)

边币的贬值与边币在金融市场上的波动之大,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另据边区银行的一份工作总结材料介绍:“边币发行之初,边、法币的比价是一元当一元的。不久,边币的比价便开始下降,同时,物价也在上涨,不过在1941年5月以前边币下跌与物价上涨的速度比较和缓,边币在边区各处都能使用。5月间发生了金融波动,边币跌到1.5元换法币1元,绥德、关中、陇东、三边等地都拒用边币,物价上涨尤甚。5月份延安市的物价比4月份就涨了30%,6月份又比5月份涨了26%。五六月间物价猛涨,边币由各地逐渐向延安中心区域退回,到7月间延安边币就跌到2元,延安市亦公开使用法币交换,这时政府内部对发行问题有了争论。”^①

争论的结果是,对内发展生产,特别是边区农业的发展;对外运盐,以求进出口贸易的平衡。1941年10月17日,南汉宸在边区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作关于财政工作的报告谈到:“货币要巩固,一定要有一种物质作保障,我们边币的物质保障是盐,只有用大批的盐当作外汇,去换回法币和必需品来,才能使边币达到巩固。”他估计这个必需品的一年消费在7000万元,如果一年能运40万驮盐出去,按当时价格可得1亿元,除消费外还余3000万元,用之收购市场上“非法”流通的法币,就可以降低边币对法币的比价。



三边地区盐场采盐,统购统销,曾作为边币发行的价格保证

^① 边区银行:《关于金融工作总结》,1944年2月。

当时关中地区的食盐,主要有两个产地:山西运城的潞盐、陕北三边(定边、安边、靖边)的花马池盐。前者受阎锡山的严格控制,如果陕北的盐再受控制,那么就只有用青海的盐或淮盐,长途运输成本是本地盐的许多倍。所以,边区食盐出



延安运输合作社运输队承担食盐专运工作

口对于调节金融危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到1941年底,边区金融比较稳定。但是,1942年初,边区银行又增加发行1000万元边币,其中发放农业贷款500万元。5月,边币继续下跌到2.9元换法币1元,6月达到3.2元换法币1元,绥德等个别地区黑市竟达到边币4.5元换法币1元。同时,4月份物价比3月份上涨38%。

1942年7月以后,由于华中汪伪政权宣布通货统一令,贬低并禁止法币,大量法币自沦陷区流向大后方,大后方出现用法币抢购物资的现象。法币市场的大环境有利于边区金融市场的进一步调整,7月间边币3.2元换法币1元,到10月间便变成边币2.1元换法币1元。

“流通券”全称为“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是1944年5月名义上为贸易公司,实际上仍由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代用券。票面额为五十元、十元两种,规定每元当边币15元,实际发行后比价为每元当边币20元。发行商业流通券的目的,一是“目前由于发展生产,即[既]无法回笼边币,又不能以法币投资……其次法币日益下降,边币日趋提高,流通范围日益扩大,加以物价变动,边币筹码颇感不足,没有这个发行,不仅市场停滞,而且必然法币侵占边区市场。再次我们现在不但有大量的物质基础(法币和物资),而且各方面有充分准备,发行是有保证的。”^①

1945年5月1日,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发出通知:

^① 西北局常委会:《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致各地委电》,1944年7月29日,第3号。

1. 自6月1日起,实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为陕甘宁边区本位币,并责成边区银行尽可能迅速收回边币。按所有未收回的边币,仍照边币20元等于流通券1元比价,一律通用。

2. 凡财政厅、建设厅及其所属机关、工厂、银行总分支行、贸易公司所属企业,以及其他一切财政供给部门和国营企业,一律改用流通券为记账本位币。

3. 各公营商业在交易中的挂牌、定价、契约、单据以及口头讲价等,均一律改用流通券为本位(币)。

4. 一切税收及预算,均改用流通券计算。

在此货币频繁变更的背后,是物价的起伏波动。据西北财经办事处1949年2月18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各种统计表》中,1937—1945年期间延安市物价总指数显示:(以1937年上半年平均物价指数为100计算)

1938年7月为153.3,12月为161.4,全年为143.1;

1939年6月为201.6,12月为377.3,全年为237.3;

1940年6月为420.8,12月为716.9,全年为500.6;

1941年6月为1914.5,12月为4421.0,全年为2228.9;

1942年6月为10180.0,12月为13773.0,全年为9904.0;

1943年6月为64757.8,12月为343059.8,全年为124078.4;

1944年6月为556980.0,12月为768807.8,全年为616487.4;

1945年6月为1995825.0,12月为1825918.5,全年为1591495.4。

也就是说,1945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初的18259倍。

专业统计数字是枯燥乏味的,但其背后所揭示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生活内容。陈学昭曾经记载下1938年秋延安的物价情况:

猪肉每斤 0.5 元、猪油每斤 0.8—0.9 元、山羊肉每斤 0.35 元、绵羊肉每斤 0.4 元。

“人家对我说，在八路军未到之前，猪肉比菜还不值钱，1 元可以买到十二三斤，而且陕北人的脾气很特别，猪肚里的东西是不吃的，猪肝呀、猪肠呀……都抛了的。但现在，猪肝卖五角一个。……有一次，我走进菜场，看见两只鸡，我问价。“一元，”鸡主人说。“九角两只卖不卖？”“不卖，差一钱也不卖！”我正在想“一元买了也好”，可是正沉思着还没有决定的这顷刻，他说：“你不买，走开罢，立在这里看什么？”^①

白糖在延安一直很紧俏，价格不菲。1938 年秋，白糖每斤 1 元，而同时期在重庆售价为 0.25 元。

队伍里的公家人日常住宿是全部免费的，但有一种情况却要收费。那是星期六的晚上，一般普通夫妻一周团圆一次，没有单独的住处，就要事先申请，再交费，住由临时腾出来的十几孔窑洞组成的“青年宿舍”，近乎后来的青年公寓。“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交 5 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装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②

1938 年 12 月 10 日开始至年底，延安《新中华报》开设“五日延安”专栏，公布延安市场上主要生活物资价格，该日价格为：

麦子每斗 4 元 1 角、黄豆每斗 3 元、绿豆每斗 3 元 5 角、猪肉每斤 5 角、羊肉每斤 3 角 5 分、食盐每斗 5 角 8 分、青油每斤 6 角 5 分、萝卜每斤 3 分、市布每尺 3 角、土布每尺 3 角、斜布每尺 3 角、有光纸每刀 3 元 5 角、工资每天 5 角 5 分。

此间公布的物价，个别物品略有波动，但总的来说物价平稳。其中所列的工资额是指临时雇工的工资。而同时期（1939 年 1 月）重

①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同前引第 91—93 页。

②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6 年 7 月版，第 353 页。

庆、成都的基本生活物资指数分别是：

重庆大米每斗3元5角、食盐每斤1角4分、猪肉每斤2角3分、机器工人工资每月30元、纺织工人工资每月18元（自给伙食）；（按每斗37斤，每斤14两计算。）

成都大米每斗2元、食盐每斤2角、猪肉每斤2角、机器工人工资每月30元、纺织工人工资每月6元（厂方提供伙食）。（按每斗32斤，每斤14两计算。）^①



从1937年初至1940年底，通往延安的小路上，经常能看到这样历经千辛万苦徒步数百里，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

由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原来生活基础不厚的陕北小城，生活指数比同时期重庆、成都偏高，但实行供给制条件下的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们，其生活都是有保障的。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加强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延安物价飞涨，特别是轻工制品。原来零售价0.1元一盒的香烟，变成100—300元一盒；原来零售价0.05元一盒的火柴，涨至50—100元。与此同时，边区的流通券也接连不断地发行面值100元、500元、1000元、2500元、5000元、7500元、1万元的票子。八路军连长的津贴，也由原来的每月3元，增至300元、500元。

随着物价的飞涨，文化人的稿酬标准也在变动。延安早期油印刊物基本上没有稿酬，以奉赠当期刊物一份为酬。铅印报刊一般都支付

^① 白戈：《平抑物价与平抑工资》，《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2月13日。

稿酬,1941年物价飞涨之前的稿酬标准大体上是每千字1元。许多报刊征稿启事称“薄酬”者,基本上都是这个标准。如《大众习作》第2、3期合刊(1940年11月15日)《稿约》载明:“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千字送稿酬1元。”也有铅印刊物不支付稿酬的,如《文艺突击》。



1947年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发行的流通券(一千元、二千元、五千元)

1939年初,毛泽东委托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的周扬参与《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编纂修订工作,“备有稿酬(每千字1元5角)”^①,明显高于一般报刊支付标准。1941年9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谈到稿酬问题时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酬。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②这是用政治倾向调节稿酬标准。

到1944年,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解放日报》支付稿酬以小米为标准。“每千字可得两升小米。”^③这里的“小米”是用作稿酬计量单

^① 毛泽东致周扬信,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38页。

^②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4页。

^③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版,第166页。

位,可以凭此交换其他商品,并非实物。

与这些统计数字有关的另外两个生活指数是,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度量衡单位与惩治贪污腐败的标准。

1938年初,1斗为50斤。1942年3月22日,边区政府建设厅就统一度量衡问题发布命令,规定自5月1日起,在边区使用度量衡的标准为:尺用2尺正裁尺;斗用30斤斗;秤用16两制秤。

当时边区政府为取信于民,惩治腐败的力度很大。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凡边区工作人员贪污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处罚。

其实,无论物价如何涨落,对于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单位工作的“公家人”,影响是不大的。当时在解放区,八路军、政府机关和学校,全部实行“供给制”,除了衣食住方面满足最低限度的需要,发些烟、肥皂、毛巾、牙刷,甚至妇女特殊时期所使用的卫生纸等日用品外,还有一点津贴。政府在采取各种手段,使得大家在革命的圣地,温饱着,并感受着平等。

四 大小灶与保健费

作为一种战时社会分配制度,延安生活供给制曾经给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们带来了基本生活满足,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想像。它具有战时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从而赢得了以接受西方近现代社会思潮为时尚的中国现代小知识分子们的青睐;同时,它具备中国兵法社会的根本属性,从而随着革命胜利带来对一切社会资源的充分占有,平均主义逐步让位给了等级供给制,公开透明也逐渐变为组织决定。

“有饭大家吃,有吃大家饱。”^①这是延安早期流行的一句话,也是那些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对延安最初最新鲜的感受。在延安革命队

^① 奈尔:《“吃”在延安》,《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1日。

伍里,一个革命同志的衣食住行悉数皆由公家集体全套安排供给,再按月发给少量的津贴和生活必需品。1942年1月,西北局机关工作人员的供给标准为:

1. 全年发给夹鞋2双(或夹鞋1双、草鞋1双)、棉鞋1双。
2. 全年发给毛袜1双(或半斤羊毛线)。
3. 全年发给衬衣1件、短裤1条。
4. 全年发给帽2顶(1个夹的、1个棉的)。
5. 全年发给手巾2条(毛巾1条、粗布2尺)。
6. 全年发给肥皂2条(4块)。
7. 全年发给精盐1磅。
8. 全年给每人帮助做牙刷1把。
9. 吸烟的人每月发给旱烟6两。
10. 缝补衣服的线和布要酌量供给。

此外,还规定根据当时现有的物质供给条件,力求改善做到:

1. 每天要有随时喝的开水。
2. 小米饭要做熟,小米要去掉糠后细碾。
3. 每月每人吃猪肉2斤。^①

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最有肌肤之感的是吃饭的伙食问题。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是分大小灶吃饭的。1940年5月,任弼时担任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着手制订党内干部待遇等级,按大、中、小灶来区分。1941年11月,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设立中央办公厅,在李富春的协助下,整理并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正式建立干部供给制。1942年7月29日,西北局党委会议讨论决定该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供给分大、中、小灶三个标准。其中参加小灶的条件规定:

^① 奈尔:《“吃”在延安》,《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1日。

A. 部长以上的干部及相当部长者。

B. 年老而身体有病者。

C. 有十年以上的党龄者。

以上三个条件以职务为主。参加人：高岗、陈正人、张邦英、贾拓夫、李卓然、杨清、崔田夫、谢华、李铁轮(考虑)。

参加中灶的条件规定：

A. 主要科长以上及相[当]主要科长之干部(过去负过县委以上责任者)。

B. 年老身体有病者。

C. 有七年以上党龄者。

D. 为技术人员者(如医生、刻钢板的)。

以上四条,应以现在职务为主。参加人：

组织部：白治民、马定邦、张光天、刘泽西、郝志西(新增)、鲁直、胡西光、黄先河、白栋材、陈阜、赵冬垠、金少英；

直属党委：白耀明、姚昕、王子谟(新增)；

宣传部：彭飞、赵林、吴文林、王宏达(新增)、秦川(新增)、石俊(新增)；

民运部：刘庚、杨一木、吴志渊、谷敬、赵通儒、刘瑞生、刘景平(新增)；

四局：刘文蔚、李涉、黄崴(新增)、金生华(新增)、陈煦(考虑,1937年党员)、柴树藩(考虑,1938年党员)；

秘书处：范子文、袁福清、杜绍西、阮泊生、宋炳祥、乔凤山、韩宝善、丁祝华(新增)、高峰、杨玉林(新增技术人员)、铁军(同上)、郑志锐(同上)、张若谷；

特别优待者：

白治民、白栋材、赵通儒、彭飞、刘文蔚、胡西光、范子文、袁福清、韩宝善。

大、中、小灶不同的伙食标准,在当时的供应情况如下：

大灶规定:a. 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b. 馒头每月须吃4次;c. 菜内应增加油4钱到5钱;d. 米要碾细,米汤中加豆子。

中灶规定:a. 饭以现在水平为标准;b. 每人每天须有3两肉吃。

小灶规定:a. 每日米、面各占一半,在一半中,大、小米又各占一半(若大米有时以大米为主);b. 伙食(菜)维持现在水平;c. 饭菜应注意调剂及变换。

关于来客吃饭问题,此次会议规定:

1. 凡来之特委、省委书记、省委部长须在小灶吃饭;
2. 凡来之县委书记、特委部长、特委秘书长须在中灶吃饭;
3. 各部处局同志的客,因工作关系而来者,应和自己吃同样饭。

27

如果有人生病,则按临时病员享受特殊待遇:

凡各部处局临时染病者,由各部处局秘[书]同志提出具体意见(发面1斤或给钱或吃小灶),交部长签字,由秘书处负责办理。^①

大生产运动后,物质资料相对丰富,延安生活供给条件也随之改善。1944年度各机关部队学校每人每月的一般生活供给标准为:

大灶:肉2斤、油15两、菜30斤、盐1斤、石炭45斤(如烧木柴则为90斤)。

小灶:肉4斤、油1斤半、菜30斤、盐1斤、石炭70斤(如

^① 《西北局工作人员待遇的规定》(1942年7月29日),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甲第2卷,第168—171页。

烧木柴则为140斤)。

其中政府与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三七分或四六分的比例具体落实执行。对于特殊人员都有相应的照顾政策:

医院病员、休养所休养员,照小灶待遇,其中由机关送病员由各机关自带伙食,政府则另补助肉2斤、油9两、炭25斤,无机关、学校的由政府照小灶标准发给,但医院、休养所工作人员,仍照一般机关规定。

儿童奶费一个月至十二个月,每月肉6斤,政府发给。十二个月以上儿童,另发粮食,照粮食局规定。

保育院及托儿所儿童照小灶待遇,由政府发给,工作人员照政府标准。干部子弟学校及保育小学生照政府发给标准,另加肉1斤,菜自给,其余政府发给,工作人员照机关标准由政府发给。

产妇生产费肉8斤,产前产后按小灶发两个月,政府发给(吃小灶者不发)。^①

伙食标准除大、中、小之外,还有特灶,主要供给中央主要领导、革命元老和外籍专家。1938年3月随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来到中国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同年6月抵达晋察冀前线,毛泽东特意致电聂荣臻,每月发给他生活津贴100元。白求恩谢绝了,他表示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住行等一切均已供给。1940年1月,曾经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参加过德国共产党,并作为国际纵队队员到西班牙参加马德里保卫战医疗救护工作的印度尼西亚籍华人医生毕道文,经宋庆龄介绍到延安。组织安排他担任中央医院内科主任,给予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20斤、肉10斤、白糖2斤、津贴费20元,配勤务员1名、翻译1名、马1匹。^②

^① 《1944年度各机关部队学校一般的生活及财政供给和节约标准》,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77、78页。

^② 郭戈奇:《缅怀国际主义战士毕道文大夫》,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同前引第85页。

大小灶等级划分是普遍的,在具体单位食堂里执行的标准是不尽相同的。1941年初,艾青作为一个知名文化人经周恩来介绍从重庆到延安,住蓝家坪“文抗”,享受中灶待遇。“中灶的标准是每个月3斤肉,一半是细粮,一半为粗粮,每天则按1斤粮食、1斤蔬菜的量配给。”夫妻之间执行严格的分灶制度,艾青当时的妻子韦茨和孩子吃大灶。“中灶由小鬼(年轻的勤务兵——引者注)每顿送到窑洞门口,吃完后再把饭碗交给他拿回去。如果你不想吃,就原封不动地拿走,家人是不能吃的。”^①

中灶、小灶、特灶都可以由小鬼送到家里吃,大灶则必须统一安排吃食堂。机关食堂管理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完善。1942年中直机关食堂的《饭厅规则》有下列十条内容:

(1)吃饭时间:早饭8点半,下午饭4点(冬季一日两餐),以打钟为号,除特殊情形外,过时不候。

(2)每桌大灶8人,中灶6人,按编桌名单就餐,不得随意变动。每桌选组长一人,负责检查清点人数、留菜、分菜。

(3)如未打钟,任何人不得先吃。

(4)如桌上人未到齐,由桌长负责留菜,不得再到厨房打菜。因公外出,须事先通知灶上留饭菜。

(5)按照总务科通知的增减人数开饭,如不通知,一概拒绝开饭。

(6)如有临时客人,由单位行政负责人填写客饭证,书明灶别,饭前通知伙食管理员,否则拒绝开饭。

(7)凡编入饭桌人员,一律不准打饭。如有特殊情形,须在饭前半点钟向桌长声明。

(8)没有特殊事故,一律不准进入厨房。

(9)洗碗水倒入缸内(喂猪用),不准随意倒在地上。

^① 黎辛接受程光炜采访记录,1997年4月17日。转引自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32页。

(10) 打菜盆子和用具放在原位,不准随意拿到别处去。^①

革命队伍里工作人员的分灶就餐制,物质资料分配的供给等级制,是在有了剩余产品后出现的问题,是随着权利向市场转化过程中滋生的现象。红军长征前的中央苏区时期,“当时级别是有的,但只有两件事分级别的:一个是开会;一个是看文件。除此之外,生活待遇等都是是一样的。”^②这是1933年《红色中华》报社的情况。严格的等级供给制是长征到达陕北,进驻延安后逐步发展完备起来的。

从管理的角度上说,严格规范的供给制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严格规范的供给制又必然导向等级制,从物质生活资料的供给,再到思想文化资源的分配。在严格的等级供给制中,只有上级知道下级的情况,而下级则不知道上级的情况。新鲜牛奶在延安就是极少为人所知的特殊供应物,只有高级首长、个别婴幼儿和特殊伤病员才可享受。所以,尽管供给制建立之初的动机很可能是善良美好的,但一经制度化、体制化,那种善良美好的意愿就有可能被其他某种政治权术所代替或利用,最后的结果便走向与人们意愿相反的方向。

为了给一些老弱病伤同志提供必要的营养补助,1941年9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议,给予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周恩来等26位在延安的革命元老和中央领导同志干部保健费。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并强调:“接到中央所发营养物品的同志,不论物品或现款,不得推辞不受,不得作为别用,且须依照中央规定物品单的原则使用,否则即系违犯中央规定。”^③其中,新鲜牛奶在当时就属于极少为人所知的特殊供应物,作为保健物品供给。

1939年底,边区政府受命在位于延安城南三公里处的马家湾村筹

^① 《饭厅规则》,见陈俊岐编著:《延安轶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55—256页。

^② 《回忆沙可夫同志——访韩进同志》,见《沙可夫诗文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35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8页。赵海编著:《毛泽东延安纪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119页。

办保健牧场,次年3月牧场正式开办,归属边区政府建设厅管理,陈凌风任场长、达时任党支部书记。牧场有川地200多亩、山地100多亩,以喂养奶牛、奶羊,供给牛奶、羊奶为主,兼植农作物。1941年3月,牧场更名为光华农场,1944年在周家湾(今延安市李渠镇)、高桥(今安塞县高桥乡)成立两个分场。^①曾在中国女子大学学习过的赵施光,1940年12月被分配到该农场工作,每天登记牛奶产量和分配数量,也给农场总务处的同志们上文化课。这个时候农场有“国际友人赠送40头荷兰奶牛,产奶供应首长、伤病员和缺奶婴儿”^②。

1943年3月西北局规定的保健费标准为:

1. 参加西北局常委会的同志每人每月300元;经常委批准受特别保健者每月450元。

2. 政府厅长、西北局处长、科长以及各分区书记、专员或相当于此级之老干部每人每月给100元至250元(内分100元、150元、200元、250元四类)。吃小灶饭的同志可减少30元至60元。

3. 县书、县长至分区一级科长或等于县书、分区科长一级干部每人每月60元至100元(内分60元、80元、100元三类)。

4. 以上三条,须依照西北局1941年10月25日的决定分历史、职务[务]、身体等分别给予保健。^③

由于通货膨胀严重,半年后该保健费标准重新规定,以猪肉为计量单位:

1. 西北局党委同志每人每月5斤猪肉,特别保健者经常委批准每月8斤猪肉。

2. 政府厅长、西北局处长、科长以及各分区书记、专员每

^① 参见姬乃军:《延安革命旧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77页。

^② 赵施光:《梦回六十年》,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362页。

^③ 西北局保健委员会《保健工作暂行条例》(1943年3月21日),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甲第3卷,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印,1994年11月,第144—145页。

人每月2斤至3斤猪肉。

3. 县书、县长以及分区一级的科长每人每月1斤至1斤半猪肉。

4. 相当于二、三两条之老干部以及学校校长、群众团体主任亦按照二、三两条标准发给。^①

此时,延安的物价不可以数字而语,都是按照实物计算。李继华是边区难民工厂的打铁工人,作为一个边区国营工厂的普通工人,1943年他的收入情况是:工资收入15石小米。一年支出:1套棉衣1石2斗、换被子布4斗、1双棉鞋2斗、2条毛巾5升、灯油2斗、1件皮大衣2石、1条绒毡和背毡5斗、3双单鞋5斗5升、12条肥皂1斗、吃饭3石2斗、捐助拥军和帮助难民1石3斗,共支出9石7斗。结余5石3斗。

苏春田,是难民工厂织布工人,有老婆和两个娃娃。1943年除全家四口丰衣足食外,还存了5斗麦子和一些布匹,买了3头猪,换了被面。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他老婆每月可交120斤纱,得工资6斗;他自己每月织25匹布,得工资1石1斗2升5合。^②

目前我们难以知道这个时候同样是作为实物的猪肉与小米之间,是按照怎样一个比率相互换算的。仅从字面上看,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们和边区群众都在大生产运动中得到了实惠,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这些残缺不全的数字背后,是社会分配制度带来的等级差异。

然而,分配制度,毕竟是对一个执政者的最大挑战。

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推翻一个政权,获得对一切社会资源的占有,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层含义;当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后,如何分配、管理、经营社会资源,这应当是中国革命另一层题中应有的含义。如果说,前者需要勇气胆识和不惜牺牲的精神;那么,后者则更需要胸怀智慧和无限创造的精神。

^① 《西北局保健委员会关于增加保健费的决定》(1943年9月2日),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甲第4卷,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印,1994年12月,第1页。

^② 张蓓:《边区国营工厂历年来工资及工人生活概况》,《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5月8日。

工人有什么才来劲

在延安,先后有两个时期工人们感到很体面,很光荣。一是整风运动前,工人们,尤其是国营工厂里的技术工人们,享受着很高的工资待遇和精神自由;二是整风运动后,国营工厂普遍开展生产劳动竞赛,劳动英雄们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和一定的生活保障。前者是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工人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从物质到精神,体面而自豪。后者是在高度集中的军政一统环境下,工人作为一个革命者,从政治到物质,光荣而自豪。这两种情况都使当时的工人们干劲倍增,但其背后却存在着对于工人,对于人的不同理解和管理,其长时期的社会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劳动竞赛是延安革命队伍用以调动劳动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手工纺织的纱可以代替大生产运动中每个人应上缴的公粮

一 生活体面的工人

1938年初春时节,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技术工人杨长春,参加集体植树活动。他特意带上米达尺,向党支部书记李□□建议,应当先用米达尺量一量行距再种,整齐好看。没想到这位农民出身,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不但不接受,反而嫌其啰嗦:“哪里有那么多的啰嗦,挖了坑把树苗栽上不就得了!”

年轻气盛的杨长春回敬道:“共产党是讲民主的,你怎么这样不讲道理?”两人当场争吵起来。这位李支书指着衣冠整齐的小杨说:“你穿着皮鞋、戴着礼帽上党校,洋里洋气,像什么样子!不愿干就靠边站着去!”

杨长春不依不饶,再回道:“你原来不过是个挑大粪的,有什么了不起!”

这下子,李支书更生气了,放下手里的活,直指着杨长春叫:“你们这些从外面(国统区)来的人,洋里洋气得讨厌!”^①

在延安初期的革命队伍里,穿皮鞋、戴礼帽的技术工人,是被穿草鞋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视同资产阶级作风的,样子上就被看不惯。所以,不仅新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争吵,而且技术工人与农民革命干部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技术工人们享受着很高的待遇,过着体面的生活。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军阀连年征战。为了赢得胜利,军阀们不惜重金从国外购置先进的设备,筹办兵工厂。当时全国有奉天、上海、汉阳、巩县四大兵工厂,不仅装备精良,而且人才济济。其工程师多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高材生,技术工人也都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为了能熟练地操作先进的机器,他们一般都粗通外文,业余组织读书会,学习数学、绘图、读报、议论时事。这些熟练的技术工人每月工资,以1933年为例,通常都是大洋20元以上,而一般普通工人工资只有8

^① 杨长春:《一个联络员的自述:杨长春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17、41页。

元,同时期的生活费用约 10 元。这些产业工人与农村手工作坊工人相比,其文化程度和言谈举止完全不一样。他们平时就穿皮鞋,戴礼帽。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千百万产业工人流离失所,先后逃难到南京、武汉、西安等城市。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汪精卫伪政权、阎锡山地方政权等都纷纷抢夺其中的熟练技术工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延安共产党政权也公开地参与到这一人才争夺战中。

1940 年在延安创刊不久的《中国工人》杂志,连续刊登《陕甘宁边区各工厂招聘技术工人启事》:

我们为了增强抗战力量,促进经济建设,提高技术,发展生产,招聘棉毛纺织、制革、采矿、冶金、化学工艺、造纸、畜牧、园艺、机器修造、印刷等等技术工人,待遇从优,愿应聘者,请函延安信箱十号接洽。

35

此前,1937 年零星招募的工人,或直接进入延安,或被安排在安吴堡“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受训^①,尔后再安排进入延安。随着招募来的工人越来越多,1938 年 3 月特设安吴堡职工训练大队。从这里开始,“对于工友特予优待,除供食宿外,并发给文具讲义。本班虽受物质条件所限制,但对于工友的生活,无不尽力改善。在饮食上,因他们多来自北方,不惯米食,所以有时增加他们常食的面条、馒头等;在居住方面,亦选较好的房屋为宿舍。此外,关于医药费,亦往往由校垫付。即因故离开本班者,也常资助旅费。对于无衣服鞋袜被褥者,则由队部发起阶级友爱捐,将所得的现金,购置鞋袜,连同募得的衣服,分发给他们。所以全体工友在生活上都极感满足。”训练班课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目标“在于短期内,授与[予]工友各种最低限度的战时军事政治教育,使能在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依据三民主

^① “安吴堡青训班”,是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组织,由“西北青年救国委员会”出面,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一处战时青年干部训练机构,主要负责对准备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进行短期训练和甄别。1937 年 9 月创办,1940 年 4 月全部撤回延安。

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在前后方进行各种抗敌救亡工作”^①。工人来自全国15个省份的大中城市和东南亚地区华侨,34%已经结婚养子,但极少数带家属在一起,大多留在沦陷区。这里就有后来被树立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边区和中国工人旗帜的赵占魁。

到延安以后,他们被安排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职工大队学习,或进入公营工厂工作,其利益由独立于党支部和行政厂长的工会维护。他们的工资待遇,高于边区供给制条件下任何一级政府工作人员,也略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在1942年以前的延安,就账面工资标准比较,最高的是技术工人,其次是知识分子,再次是拿津贴的政府工作人员。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月工资是18—38元,“当时在全国是很少有这样高的工资的”。^②据当时在抗大任教的徐懋庸介绍,“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过4—5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这样的人,津贴费每月10元。1938—1939年间,延安的物价很便宜,猪肉每斤只值二角,鸡蛋一角钱可买十来个。所以,这10元津贴费,是很受用的。”^③可以想像,高出于徐懋庸津贴费三四倍的技术工人们,怎么不过着体面的生活呢。

另据两份当时公开的宣传材料称:

他们有充分娱乐运动的机会,厂方购置各种乐器和体育用具,他们在工作之余,一样能够像普通学校中游戏运动,经常可以看到活泼的晚会和运动会,恢复工作的疲劳。工人生活也逐渐改善,一般的工资比抗战以前增加了两倍,工人待遇,高过任何政府工作人员。工作彻底实行八小时,青工六小时,童工禁止,男女同工同酬。每逢工人出席各种工会及政府会议,不算缺时不扣工资。每月休息四天,纪念日例假,以及疾病、妇女生产前后两个月休养、工人每年两星期的休

^① 陈希文:《安吴堡职工大队概况》(1938年8月),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57、256页。

^② 《抗战以来边区工运总结材料》(草稿),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第457页。参见朱鸿召:《公营工厂的工人工资》,《上海文学》1999年第8期。

^③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121页。

养,这一切工资全照给。国营工厂有医务所、托儿所、澡堂、膳食,和政府工作人员同样待遇,□□得出该机关证明请政府救济,或得社会保障基金救济。工人子弟入学,政府供给一切学膳宿费用。这样,工人自身及家属的生活问题,都有了保障。^①

边区工人现在没有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有完全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他们有顺利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的条件,并且还得到边区抗战的民主政府的积极的援助。边区工人的生活也得到了适当的改善,没有失业的恐慌。^②

陕北地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除生活必需的手工业,原来基本没有什么现代工业。红军长征到达后,带来了一个军事修械所,稍后,建立起小规模的被服厂、印刷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1938年2月,上海工人沈鸿带来10部机器和7名工人,参与建立边区机器厂。同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下属赈济委员会派出以曹仲植为首的五名赈济委员,携款10万元到陕北放赈,救济难民,经双方协商同意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此项专款作为基金,设立难民工厂(纺织)、难民农具工厂、振华纸厂、兴华皮革厂等四个工厂,救助避难民众,也奠定了边区工业发展的基础。

另外,处于抗战初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要财政来源于外援,其最大部分是国民政府划拨给八路军的经费,每月拿出一部分用作财政收入。1939年全边区全年收入共计880余万元,其中国民党政府拨给的协议款有790万元,约占全部收入的90%。此项专款始于1937年,到1940年同比下降到占50%,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便全部断源了,延安财政供应进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便有了后来的大生产运动。

这种资本来源的外援性特征,以及多方政权对人才的争夺态势,

^① 夏江:《进步中的陕甘宁边区工人》(1940年5月),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同前引第437页。

^② 齐华:《抗战动员中的陕甘宁边区职工运动》,《解放》(延安)第39期(1938年5月22日)。

边区对外来人才实行一定程度的来去自由的边境管理环境等,都从外部条件方面制约了边区技术工人的丰厚待遇。而边区内部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存在权利,积极创办抗日、民主的模范社会特区,在团结抗日、政治民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先进模范的理想高姿态状况。1937年7月,边区党委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指出:“在目前转变与创造边区为全国抗日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地区的总任务下,更加需要提高边区工会的任务与作用。目前边区工会的中心任务就在发扬工人在过去土地革命中的积极性与工会的组织力量,而能在政治生活中、经济建设中起坚强的先锋的作用,并使工会成为教育工人的学校与改善工人生活的工具——以达到工会真正成为边区民主的人民政权之有力支柱,工人群众成为抗日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公民。”^①建设抗日民主的模范社会特区,这成了延安初期响亮的口号,以此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争取国民政府和海外华侨等其他一切社会经济物质与精神道义援助,招引吸纳不同社会层次的人才资源与人口资源。

在这样的工作方针指引下,边区工会一方面加入全国总工会,响应全国工人抗敌总会号召,在延安组织边区总工会临时委员会、西北青年救国委员会、边区妇女联合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共延安市委等群众团体,共同发起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面向全国邀请各地工会代表到延安旁听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1938年4月17—23日);另一方面致力工会民主建设,国营工厂和县乡工会组织都通过直接选举产生。1937年6月在边区颁布执行的《国家工厂工人须知》中就明文规定:“国家工厂中的工会组织以一个工厂为单位,以工厂委员会称之。委员会是由全厂工人大会直接选举出来,委员人数不规定,由三人至七人组织之。并且选出来的委员要分工,委员长必须要在工人大会上单独说明其职责通过。”时任边区总工会筹委会委员、文化教育部部长的郑义撰文阐述工会选举的意义是:“边区工会的选举运动就是为着发展工会的民主,健全工会的领导,坚强工会的组织,使边区工会真正成为领导全边区工人参加抗战,推动全国职工

^① 《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1937年7月17日),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同前引第119页。

运动的统一的组织。”^①直接选举产生工会委员及其委员会,不从上级部门委派,这样的工会组织在工人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社会上也有很高的威信。为了取信于民,在边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都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作为自己工作努力的目标。

边区建立了人民的革命政权,我们党是有政权的党。我们要向群众要东西,如果不要,就没有饭吃。但是,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关于这一点,不论党、政、军、民各团体都应该注意,把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做好。^②

这是陈云在1939年12月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的讲话,字里行间表达了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刚刚开始执掌政权的谨慎与实在。准此,一个时期里边区工会坚决地把改善工人生活,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之一。“我们要为改善工人生活而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在抗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仍须要他起更大作用,因此不改善工人生活是不行的。”^③大约到1940年底,边区工人工资水平达到延安时期的最高。1940年11月由边区总工会通过的在国营工厂执行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时准则》规定,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除星期日休息外,每逢下列日期为例假日:1月1日(新年元旦)、2月7日(京汉工人惨案纪念日)、5月1日(国际劳动节)、7月7日(抗战纪念日)、10月10日(国民政府国庆节)各休息一天,农历新年休息三天。“工人继[连]续工作满一年,事假未超过十四天,病假不过十四者,得休息两星期;继[连]续工作半年,事假未超过一星期,病假未超过一星期者,得休息一星期。有旷工者不得享受此项权利。例假期间,因工作

① 正义(郑义):《边区工会选举运动的意义》,《新中华报》(延安)1938年1月20日。

② 陈云:《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1939年12月10日),见《陈云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107页。

③ 邓发:《纪念“二七”与中国职工运动的任务》(1940年2月9日),《解放》(延安)第100期(1940年2月29日)。

急需而加工者,工资加倍。”同时,规定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为16元,最高40元,“有特殊技术者,可另行估价”。“工资之大小,根据技术之高低与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热忱由估价委员会估定,经厂务会议议决公布。”“估价委员会由工务科长及技师、工会生产委员、工会组织委员、工会主任等组织之”,除临时估价外,估价委员会正常工作是每六个月估价一次。^①这个工资估价组织和程序,排除了党支部和行政厂长的参与可能,基本完全由工会掌握着执行的标准。

“我们的生活好似一株鲜花,在民主政府的滋润下……我们要发展全国的民主,让鲜花开遍了中华。……生活好像一支奔流,在全国抗战的浪潮里……我们要坚持全国的抗战到胜利的明天……”^②这是这个时期生活体面的边区工人们经常在嘴里哼唱着的一首歌曲,流露着他们对生活富足的喜悦和积极情绪。

二 工人干活的劲头

1942年以前的延安,有两种工人:产业技术工人与手工业工人。在公营工厂里工作的产业技术工人,他们生活体面,政治觉悟好,劳动热情高;以打工仔形式出现的手工业工人,则刁滑偷懒,只认金钱,不讲信义。而边区工会组织却要同时维护这两种工人的利益,于是,在革命队伍里就隐藏着对于工人的激烈矛盾和斗争。

生活体面的工人,在抗日民主的旗帜下,他们或从个人文化教养、人性尊严,或从今昔生活对比、知恩图报的本分人生出发,从富足的生活中焕发出积极的工作热情和强烈的生产干劲来。“工人参加生产都是自觉的,而且过着和前线作战的弟兄同样的战斗的生活,所以劳动的热忱非常高。在这些[公营]工厂中,节省经济,反对浪费等事,厂长和管理员一点也不要关心,工友大家互相监督等[着]。……工友们的学习兴趣也是很高的,有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各种工余的功课,虽

^① 《陕甘宁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行准则》(1940年11月1日),《中国工人》(延安)第11期(1940年12月1日)。

^② 《边区工人吟》,见《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开幕》通讯报道,《新中华报》(延安)1938年4月20日。

然白天做了一天工,但到了晚上受课起来,大家一点也不觉疲倦。这些产业中,工友们都认为这工厂是自己的家庭一样。”^①出身贫苦的农具厂工人赵占魁,就是今昔对比、知恩图报的典型。

他到延安,先后进安吴堡训练班、抗大职工大队和工人学校学习。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去活了40年,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下,而今竟一个钱不要花,管吃管住,还进学校学文化。他常拿过去的苦难与现在的幸福作对照,情真意切地说:“我的血快要被人挤干了,而今四十二岁,才找到了自己的家!”特别使他感动的是,上级首长经常找他们工人学员谈话,问寒嘘暖,并且,有点小病就有医生看。“什么人待咱这么亲热过?这共产党的首长,真像俺的亲娘一样呀!”^②被分配在边区农具厂(原难民农具工厂)后,他总是在起床钟敲响之前就起来了,上工比别人都早。下工后,别人都走了,他要在厂子里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人把工具乱丢乱放,要有,就一件一件地收起来,摆放好。遇到下雨或下雪,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一定把大家叫起来,带头把院里的工具、成品等器件都搬移到避雨的地方,或者拿油布遮盖严实,以免受到损坏。他从来不计较工资,不要加班费,很少请假,有了病也不肯休息。他说:“在外边做活,费死了劲还时常饿肚子,咱们这里就是自由痛快,遇事大家商量,工人可以随便找厂长谈问题,有吃有穿,还要那么多的钱干啥呢?”

主要承担党报、党刊和马列著作印刷任务的中央印刷厂,1940年5月1日举办过一次问卷调查,参加测试的127人中,工作安心者78人,占61.42%,理由分别是:因革命工作而安心的18人,为学习技术而安心的7人,因出身印刷而安心的4人,工作需要而安心的5人,无理由而安心的40人,不是工人是职员而安心的4人;工作不安心者49人,占38.58%,理由分别是:不能长久做下去的3人,因介绍来厂时没有说明的3人,因领导而不安心的11人,因学不到技术的1人,要学习的10人,无理由而不安心的3人。^③在这些不安心工作的原因里,

① 齐华:《抗日战争与中国职工运动》,《新中华报》(延安)1938年4月19日。

② 《边区工人的旗帜赵占魁》,《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3月26日。

③ 吴克真:《我们的生活——中央印刷厂职工会》,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同前引第444页。

与领导有意见、人事矛盾是最主要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因为生活待遇问题而对工作不安心的。

这样高的生活满意度,这一时期的延安产业工人无论是学技术、讲政治,都表现出高昂的精神风格。他们为支援抗战,主动增加工时,削减工资。1938年“二七”罢工纪念日,边区印刷厂工人自动提出每人减少工资1—4元。^①由难民农具厂改制更名的第一兵工厂,年均减少工资10%,并在其他国营工厂相继推广开来。1940年9月,八路军印刷所全体职工向边区工人发出倡议,“为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自动要求政府每天增加一小时的义务工(内包括加工六小时,改为七小时),星期六工作六小时,改为八小时。自9月16日起实行,一直到抗战胜利,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建立为止!”为此,《中国工人》杂志予以充分肯定地说:“由于边区工人生活于最进步的真正为伟大民众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获得了民主自由,获得了生活改善,才能够发挥抗战力量与劳动热忱,才能够自发自觉的[地]积极参加各部门的生产劳动,才能够对于政府的经济建设更加关心与爱护,才能够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②这是生活体面的工人对于民族尊严、政治尊严、道德尊严的自觉体现。一个通过诚实劳动获得生活体面的人,是具备人格尊严的人。而一个允许人们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获得生活体面和人格尊严的社会,是健康的、人性的、文明的人类发展时期。

问题在于1942年前的延安,工会组织是把每一个苏区工人、雇农都当作自己工作的对象,以至于1938年4月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时的工会会员统计表上,总共2.24万名会员中,农村雇工占65%,店员手工业者占28%,工厂工人只占到7%。这样的工会成员构成,隐藏着革命队伍里诸多矛盾冲突的可能。

延安本来是个只有3000人左右的边塞小镇,1937年初中共中央和红军指挥机构进驻后,当时就出现住房紧张的情况。加之1938年11月20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飞机连续轰炸,延安城里几乎被毁坏一空。随着奔向延安的青年学生和招募来的各类人才日渐增多,迅

① 《“多做工作少拿东西”》，《新中华报》（延安）1938年3月1日。

② 《边区工人劳动热忱的高度发扬》，《中国工人》（延安）第9期（1940年10月1日）。

速开挖窑洞,修缮住处,就成了当务之急。而整个延安市工会可以调动的固定手工业工人人数1939年3月为:木工34人,铁匠44人,理发13人,成衣10人,店员67人,泥水工88人,鞋匠17人,共计273人。4月为:木工100人,铁匠62人,理发9人,成衣25人,店员67人,泥水工245人,鞋匠31人,西北旅社工人20人,共计559人。另外大约有1350余名未经组织的手工业打工仔,其中木工30余人,铁匠20余人,泥水工500余人。^①这些手工业者大多是延安周围地区农闲时节进城的打工仔,不乏流氓、地痞和贩毒者。当他们发现延安城里急于用工,工资价钱远远高于附近农村时,便自发地来打工。

这些手工业打工仔,属于无恒产因而无恒心之辈,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刁滑懒散,唯利是图。1938年以《国讯》旬刊特约记者身份到延安的陈学昭,就真实地记录了这种工人的做派。

在这里的劳动力是这样缺乏,他们可说是八路军的独养子。就木匠和打窑洞的工人来说,每天工钱4角,饭食每天3角,7角钱一天。这些工人,他们不愿领3角钱饭钱,常常一定要雇主供给饭食,他们的食量那么大,一个工人每天要吃30两小米(小米每30斤4元)。工人们架子是很大的,技能呢,并不高,可是他们的工作,却还是很俏。

早上,他们在早饭之前,是不动工的,因为没有吃饭。吃过早饭,又得抽几筒烟。抽过烟,才慢慢地动手。一个人挖泥土,一个人倒泥土,两个人站在旁边看,说是帮忙做,这时候是9时过了。到10时,休息,等吃午饭,乘着暖和的太阳,在太阳光下,脱下短袄来捉白虱,一个又一个,出神地夹在两手指板间弄死。午饭后,又要休息,有的还要去“打个火”。到3时,吃晚饭,吃过晚饭,更没有做工作的理由了。总算起来,他们每天工作的时间不过3小时,而这3小时的工作,又未曾用出气力来好好地做的。^②

^① 《延安市工会给边区总工会的报告》(1939年4月29日),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同前引第346—347页。

^②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82—83页。

他们的工钱标准,是由延安市工会提议,经边区总工会批准的,大工4角,小工3角。但各部门都急于事功,便暗地里竞相加价。当时一般开窑深每尺1—1.4元,边区政府开窑10孔,工钱按深每尺1.6元计算,使得窑工工资猛涨起来。边区银行开窑洞,给出的价钱更大。铁匠打造锄头的规定价格是,重二斤八两的大锄头2.2元,但各机关抢购竞相出价2.5元、3元。而工匠们为了多赚钱,要数量不要质量,偷工减料,便出现问题和纠纷。

马列学院花大价钱买来的锄头不好使,没有声张,是文人处事。而抗大是军人的天下,对这些刁滑的打工仔就一点也不客气了。1938年8月,抗大合作社包工建房子,雨天墙被冲倒了,管理员把打工仔万秀芳打了一顿,并扣工资2元。12月,抗大管理科包工先建造6间房子,价钱26元。房子建好后也是出现倒墙的事,扣工钱10元。后又增加建造3间房子,价钱25元,再次出现倒墙的事,扣工钱7元,再把包工者打了一顿,并从身上搜去2元钱。后经工会出面多次交涉,出具担保才算了结。另有苗占海承包抗大合作社院内平台工程,挑土方20余天未完,估计赚头不多,就毁约不干了,被管理人员捉拿住,用绳子捆绑着吊起来。

这些打工仔都算手工业工人,这些矛盾纠纷都要拉扯到工会去解决。久而久之,工会就成了革命队伍里发泄对工人不满的众矢之的,蒙受不白的往往是体面的产业工人。而那些受到工会袒护的打工仔们,竟然有恃无恐,更加刁滑无赖。在抗大职工大队,经过长征的农村出身的红军干部,有的本来就对生活体面的工人们看不惯,现在有了这些手工业打工仔的恶劣表现,就更激发了他们的不满。

1938年10月,职工大队三队学员张铁生,原来是个铁路工人,平时纪律性不强。一天轮到他帮助炊事班挑水,又迟到了,队长让他出列并对其加以训斥,并声言要开除。张回敬:“你像国民党的官一样地欺压工人,你要和我过不去,我就要揍你!”队长当即下令把他捆起来送交大队部。大队部马上将其开除,解送出延安。此事在职工大队引起轩然大波,百余名工人学员聚集在俱乐部里,情绪激烈,议论纷纷,晚饭也不吃了。后来边区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朱宝庭将这事汇报给

了毛泽东，毛当即电话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要求马上派人找回张铁生。十几天后，张被找了回来。

稍后，作为对策，毛泽东指示将抗大职工大队一分为三：年轻力壮的到中央警卫团工作，另外成立工人学校，小部分留在抗大学习。这样在一定范围内暂且避免了革命队伍里长征干部与产业工人的直接矛盾冲突。

生活体面的产业技术工人，穿皮鞋，戴礼帽，哪里还有什么革命者的样子呢？^① 革命者的样子应当是贫穷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工作不计报酬，革命不惜生命。整风运动中，正是以此对技术工人们进行着革命的人生改造。

三 危难中的斗争

革命队伍里潜藏着的产业技术工人与红军干部的矛盾，到1942年全部暴露出来，并导致公营工厂里激烈的斗争。

事情肇始于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政府完全断绝了原来拨给八路军的军饷经费，从而直接导致边区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毛泽东后来公开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②大生产运动是因此而普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此前只有为着改善伙食而种菜、养猪、打柴等零星的生产

^① 1943年3月，一个盐商牵着一匹骆驼经过陕北葭芦镇借宿，夜里被砍杀扔到一眼枯井里。“掌柜对我和赶车的老乡说，这个人很有钱，绫罗绸缎不说，屁股后面还别着一把枪。如今兵荒马乱的，谁能穿得起绫罗绸缎？怎么看都不像好人，反正不是汉奸就是逃兵，干脆砍死去球。”见李洱：《花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1页。此地就紧挨着第一个唱出《东方红》的李有源的家。

^②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91、892页。

活动,不足以抗拒经济封锁带来的财政困难。

受经济封锁的影响,边区一些公营工厂同样陷于困顿之中。赵占魁所在的边区农具厂,由于生产设备简陋,熟练技术工人少,合格产品不多,加之周转资金短缺,“常使工作发生障碍,甚至工人工资生活费用难以维持,更谈不上赚钱”^①。此前,1940年9月,朱德巡视边区各工厂,就已经发现农具厂等多个公营工厂存在基础薄弱,设备简陋,原料缺乏等较严重问题,并提议将若干工厂合并,移交军委工业局管理,强化军工生产。1942年初,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下文,将边区农具厂与军委工业局机器二厂合并,并将军工局三厂的手榴弹和复装子弹部分与河庄坪修械所一起合并起来,形成以生产手榴弹和复装子弹为主的兵工生产基地。厂址在距离延安西北30余里的温家沟村,对外仍称边区农具厂,隶属于八路军留守兵团,同年9月留守兵团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合并,该厂隶属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军工局。

46

与财政困难相伴而生的,是物价飞涨。1938年一盒香烟0.1元,到1941年就是2—4元。如果以1937年上半年延安的平均物价指数为100计算,那么,到1941年6月为1914.5,到12月为4421,全年为2228.9。也就是说1941年底的物价,是1937年初的物价的44.2倍。^②

为了保障工人生活不受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1941年9月,公营工厂采取“货币与物品工资制”,就是除工人的衣食住由工厂供给外,再依其技术熟练程度酌发货币工资,以为日常生活费用。工人们普遍接受,一切正常。但到1942年5月,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并酿成工潮斗争。

1942年5月5—9日,边区总工会召开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简称“五五会议”),讨论工人教育工作和工会整风问题,并自上而下地对工人工资标准和劳动合同作出修改。修改后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公营工厂集体合同准则》规定,工人每天劳动时间10小时,比此前增加2小时,夜班工作时间与日班相同;星期天和例假日休息与此前不变,但

^① 《关于农具工厂与军委工业局机器二厂合并问题建议书》(1941年10月),陕西省档案馆存,全宗号6第850卷。

^② 参见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指数》,《上海文学》2002年第1期。

下达命令,将其交由军法处处办。

再次,继之以对工人的教育改造,重新塑造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的新工人。

这些措施,尤其是后两者,在1942—1943年整风运动中的延安公营工厂里实施,是非常有成效的。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固然给陕甘宁边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时也使得进出边区的道路不再通畅,此前延安对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不复存在。据曾任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局局长的李强介绍,“抗战以前,边区也曾来了几个专家和技术人员,想在这里参加工业技术工作,由于关系没有搞好,不久他们又走了。”^①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以前如此进而出,出而进的人多的是,但现在都不可能。

四 劳动英雄的工人

49

在平息公营工厂工潮的过程中,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感觉到,严惩了反革命坏分子,还要树立公营工厂模范工人的劳动英雄典型,像边区农业生产方面的吴满有、苏联工业战线的斯塔哈诺夫。赵占魁就是在边区农具厂被发现并推广的劳动英雄,是公营工厂模范工人的典型。

赵占魁,山西定襄县农民出身,因为家境贫寒而四处打工。1938年初,日寇侵占同蒲铁路,他和其他铁路工人一道流亡到西安。5月他进安吴堡青训班,随后到延安。年过不惑的他没有文化,口不善言,手不能写,带着北方农民的淳朴本分,为人忠厚老实,从来不会调皮捣蛋。他靠自己的力气吃饭,勤奋诚恳,不偷懒,不油滑。与人交往,宁愿自己吃苦,不让别人吃亏。他是一个烂熟的大好人,没有了火气,没有了脾气,也没有什么精神文化上的自由主张或要求,偶尔能看个演出听个戏文,那就是莫大的享受。从山西逃难途中,老婆走散了,现在他单身汉一个。衣食不愁,小病都可以免费看医生,领导还经常地到工人中拉拉话,他感觉自己在延安的生活已经是天堂,很满足,也很知

^① 李强:《略谈边区军事工业的发展情况》,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同前引第657页。

足。当狄建德鼓动工友们闹事的时候,他没有跟着起哄瞎掺和,而是依然本分地去做自己那一份活计,因为他知道自己现在就依靠着这工厂吃饭过日子呢。



劳动英雄赵占魁(左)接受记者采访

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就是由一个圣人、无数个好人,再加一小撮上传下达、上蹿下跳的清官们共同构成的。赵占魁首先是这样一个人,大好人,烂熟的大好人。当《解放日报》记者张铁夫、穆青受命第一次去采访他的时候,他的不善言辞差点让初出茅庐的记者完不成任务,幸亏年轻人机灵,转而采访赵占魁周围的人,发现工厂内外没有一个人说这老赵一个不字。经过中央党报《解放日报》连续不断的宣传报道后,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边区总工会迅速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从赵占魁所在的边区农具厂开始,组织赵占魁率先发起劳动竞赛,让工人之间、班组之间、工厂之间,比劳动贡献,比产量质量,不计经济报酬,讲究的是政治觉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风格,奖赏的是政治名誉和政治待遇。^① 还有宣传舆论为他喝彩,文学艺术为他歌唱。作

^① 1941年3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关于迎接五一生产大竞赛的各项办法》中就规定：“凡被选为模范劳动者,得享受如下的优待:(一)参加五一大会时受总工会之招待,在五一晚会上坐在最前排;(二)给予物质之奖励;(三)参加模范劳动者大会;(四)参观延安各工厂;(五)在《新中华报》及五一大会上公布其姓名。”见《新中华报》(延安)1941年3月23日。

为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赵占魁和赵占魁们享受到的不是由物质而精神的体面人生,而是由政治而精神的荣誉人生。

崔锁贵是和赵占魁一起从山西流亡到延安来的老伙计,现在仍然和赵占魁一起在边区农具厂烘炉股当工人。他被率先发动起来,在赵占魁运动委员会的帮助下制订出个人生产劳动竞赛的计划是:

(一)生产上保证生产超过计划 20%,多开 2 个炉子,完成 4 部弹孔机零件,锄头 25 个,外有工具修理。现在要完成:

1. 5 部弹花机零件, 2. 保证本厂各股工具照常修理,外加做临时杂货。

(二)股务管理: 1. 保证按时填写生产工作单,写生产日记,挂名牌(点到)。股务会议(每月一次)等制度在本股切实执行。 2. 根据生产上的缓急与难易,具体分配本股工作。 3. 保证本股不发生人事问题,两个不安心工作的工人,争取其完全安心工作(全股连股长 11 人)。 4. 保证本股没有违反厂规的现象。 5. 提高本股技术,使现在半熟练的两名工人成为熟练能够单独工作,三个下手变为能掌钳子。 6. 注意尺寸标准,提高全股工徒的尺寸标准观念。

(三)本人的意识及态度: 1. 能服从领导,并能积极提出意见,克服过去背后发牢骚。 2. 维持工会纪律,使现在少数不到会的,或中途退会的现象完全克服,不摆老师傅架子,凡工会劳动动员工作,每次都积极参加到底,并能督促别人。

D 调 2/4 赵占魁运动歌

小快板(强拍) 贺敬之、庄映

1. 1. 6 | 5 5 | 5. 6. 5 | 2 — | 1 2 1 2 | 4 3 6 4 | 5 — |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2. 1. 6 | 5 5 | 5. 6. 5 | 2 — | 1 1. 6 | 1 2 | 1 3 |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3. 1. 6 5 | 5 6 | 1 7 1 | 2 1 | 1 2 1 6 | 5 6 5 |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4. 1. 6 5 | 5 6 5 | 2 7 | 1 — | 1 6 5 | 4 3 6 |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5. 1. 6 | 5 5 4 3 | 1 1. 6 | 5 5 4 3 | 2 1 | 2 1 | 2 1 2 1 |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6. 5 — | 5 6 5 | 4 2 | 5 6 5 4 | 2 — | 2 2 4 | 2 1 |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7. 1. 1 1 4 | 5. 2 | 2 2 1 2 | 1 0 | 2 2 7 1 | 2 1 7 1 | 2 1 |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8. 2 5 | 5 2 | 1 — ||
 咱们的 理想 是 自己的 理想

1943年5月18日《解放日报》刊出由贺敬之作词、庄映作曲的《赵占魁运动歌》

3. 切实负起参议员的工作,反映群众对本厂的意见,并能制止本厂职工违反群众利益与政府法令。

(四)学习:过去一字不识,现在识500字,在十月革命节能做到看群众报,能写简单的信,在每次讨论会议上要讲话(因为他是股长,工厂在工作时间内,优待2小时。),保证每天4小时学习。^①

中央印刷厂在组织开展赵占魁运动的劳动竞赛时,发现有的工人拟订的生产竞赛计划不切实际,责令其马上整改。该厂机器部工人张映建,为人老实,从来就没有与别人发生过争吵。他的计划里写有“保证不吵架不打架”的一条,被组织发现后要求删除,添加一条新的内容是:“每天认一个字,每月写一百个字,群众报每期看完,会议上学习发言。”另一个工人王德成,平时经常与人争吵斗殴,个人生产竞赛计划里却不提此事,被组织发现后责令他增加这样的内容:“绝对不与人吵架,有意见正式提,不在下面乱说。”^②到抢救运动开展起来后,这样的生产竞赛活动就被顺理成章地转化为面对工人的整风抢救运动。每个工人都必须在班组车间和工厂大会上反省检查自己的历史和言行,然后让大家对自己进行帮助和抢救,以此求得个人和集体在政治上的清白,在道德上的清洁。

当工人都被改造成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站在工人背后的工会组织,也就转成了国营工厂里的一个辅助机构。

早在1936年4月1日,中央组织部颁发《苏维埃国家工厂怎样工作》,规定国家工厂管理体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三人团”,由厂长、工会委员长和党支部书记组成。“三人团”会议由厂长召集,厂长并有最后决定权。在具体分工上,厂长代表政府在生产上、技术上负全部责任;党支部领导全体党员在生产上起着推动与模范的作用,是团结教育工人的核心;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其任务是教育工人,提高劳动热忱,帮助厂方完成生产计划,保护工人利益。但在实际工作中,三方

^① 《愿把我的标准提高一步》,《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4月9日。

^② 《中央印刷厂职工会一年来的工作总结》(1944年3月2日),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同前引第233页。

面关系却经常处于矛盾状态。“因为厂长虽然是一厂之长,负责工厂行政的最高职权,但他没有权利决定党的工作,也不能直接干涉工会工作。”遇到工作矛盾的时候,有人建议策略的方法应当是,“如果某方不同意彼方的工作办法,而协商不通的时候,均可向自己的直接上级提出意见。”^①将矛盾上缴,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势必影响生产进度,不利于战争环境下的军事工业发展。适应于战争环境下的公营工厂内部新的管理制度,是“三位一体”。八路军印刷所的经验是,“所部是来执行计划,支部就是经过支部小组同志保证计划的执行,职工会则动员群众来完成这一计划。”^②到整风运动中,便由“三位一体”进一步发展为“一元化”。1943年3月2日至4月21日召开的边区政府直属工厂厂长联席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的洛甫(张闻天)宣布:“为了彻底改造我们的工厂,我们必须贯彻工厂管理一元化的方针。工厂是一个统一的生产单位,有一定的生产任务,他只有由政府、由厂长集中管理时,才能把工厂办好,多头的分散的管理,只能把事情弄坏。”^③在同一会议上,刘景范代表边区政府作总结报告,更明确强调,“在厂长的领导下动员全体工人与全厂党员为完成生产计划而奋斗,工会与支部的一切活动,如与该厂生产计划抵触时,厂长有停止执行之权。”^④

实行厂长一元化领导体制后,公营工厂工会的工作范围是:“经常检查工会会员的生产情况与劳动纪律,并领导讨论生产计划,帮助工人定生产计划,向行政、党反映工人的生产情况和意见;配合行政、党进行工人教育,出版墙报,组织时事政治报告,主持俱乐部,开展文化娱乐生活,并推进业余生产,改善职工生活。”^⑤这样的工会是在党的组织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指导下,从事于具体的日常工作,“如组织全厂职工在工会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组织文化政治技术学习,适当改善职工生活,解决职工的困难问题,动员与组织工人增进产量质量,

① 悉根:《略谈公营工厂三人团》,《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月30日。

② 马文:《新的管理制度与新的劳动态度》,《中国工人》(延安)创刊号(1940年2月7日)。

③ 洛甫:《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5月1日。

④ 刘景范:《为改造我们的工厂而奋斗》,《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6月9日。

⑤ 崔田夫:《一年来赵占魁运动总结》,《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2月7日。

发动与组织劳动竞赛,维持劳动纪律,注意工厂环境卫生,举办托儿所、子弟学校,举办储蓄与合作事业,组织工余副业生产,帮助职工家属建立家务,调解职工与工厂的纠纷。”^①团结在这样的工会组织下,工人只要也只有勤奋干活,生活维持着基本温饱的水平,集体的温暖时刻提醒着你应当有幸福的快感。

“旧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创造新时代的时候。这个新时代的创造者就是今天二百多个劳动英雄,以及成百万的边区革命的人民。”^②1943年11月26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者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来自边区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按比例分配层层推选出的200名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者,还有有组织的3万群众一起参加了大会。会议表彰先进,展示成果,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作了这个庄严的宣告。革命让大家走到了一起,组成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国营工厂是革命政权物质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每个工厂所负担的生产任务,即为革命的政治任务而服务,按其重要性说来,这正像八路军在前方同敌人打仗所负担的军事任务一样。为完成此生产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即为革命的政治斗争的一个方面。”^③经过这样一整套的意义诠释之后,工人的劳动程序和动作依然如故,但其性质和意义大不相同了。国营工厂里的工人们,不再是为资本家劳动,也不再是为自己个人劳动,而是为革命劳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劳动。只有这样的劳动才是无上光荣的,也应当是不计报酬的,且在劳动中体现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质和自我牺牲的伟大精神。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皖南事变”后国共矛盾激化,内战一触即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国营工厂通过开展赵占魁运动的劳动竞赛,改造着国营工厂里的工人,使生产效益大大提高。截止1944年5月,边区国营工厂97家,职工6174人,运动开展一年时间,各工厂产量与上年同比平均增长30%至50%,全边区涌现出500名劳动英雄和模范

^① 《中央职委关于国营工厂工会的问题》(初稿)(1945年9月29日),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同前引第539页。

^② 《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者大会昨天隆重开幕》,《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11月27日。

^③ 洛甫(张闻天):《关于国营工厂的几个问题》,《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5月1日。

工作者。这样的工人不穿皮鞋,不戴礼帽,是生产模范、劳动英雄,是那个时代社会的光辉荣耀。

五 附 论

劳动英雄的工人也很自豪,虽然个人劳动报酬不多,但政治荣誉很高,政治地位也不错。问题在于,这种劳动观念的背后,是将工人放置在军事化和政治化的历史语境下进行人生改造和重新塑造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它会带来三个难题:

其一,工厂里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行政权力的泛滥和腐化倾向。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实行厂长一元化领导不久,就出现纬华毛厂工人从厂长办公室走出很少不哭鼻子的现象。交通工厂(纺织)“有一个时期,工人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饿饭、打骂、斗争、禁闭、开除,上行下效,甚至生产管理员也可打骂工人”。日常生活中,对于职工食堂伙食、病员待遇、社会保险等问题,厂方都可以困难为由而推诿或拒绝。^①当然,这可以说是延安时期的个别极端现象,暴露出来的却是公有制工厂的绝对权力形成后,对于其贪污腐化堕落,有意无意地造成国有资产大面积流失,没有有效的体制性的监督管理办法。

其二,政治化的工人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失去了一个政治符号的历史功能,逐渐凸显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怎样才能得到保障。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每年都推广着延安时期赵占魁运动中的经验,评选出一批又一批全国的、上海市的和各行业的劳动模范。他们是劳动英雄,获得的又都是政治荣誉。当他们从工作岗位退休,曾经为之流大汗出大力的工厂有一些不知不觉地被厂长们经营得关门倒闭了,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温饱便成为整个社会的问题。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出于道义考虑,近年来多次在年底发起为生活困难的劳模募捐活动,以解其燃眉之急。2002年春节到来之际,又为400余位

^① 高自立:《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奋斗》,《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8月22—25日。

生活困难的劳模们分忧解难。^①

其三,用组织开展群众运动的方式,将工人改造成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和政治标兵的单面人,将所有社会资源都收拢在政治的掌握中,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

^① 参见陈果:《关爱老劳模》,《解放日报》(上海)2002年1月24日。

改造“二流子”

由改造人而改造社会,由重新塑造人生而重新塑造理想社会,这是延安革命队伍里的一项崇高历史使命,一个伟大的发明创造。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的深刻社会历史影响,就在于它由最初的党内高层权力交替,衍变为一系列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生的社会政治运动。在机关单位,它主要表现为改造和重新塑造抗战后进入革命队伍里的新知识分子;在国营工厂,它表现为如何将普通技术工人改造和重新塑造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模范职工;在边区农村,它表现为如何将自由自在、懒惰散漫的农民改造和重新塑造为积极生产的劳动力。

1943年5月3日下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秧歌队在川口公演,特为即将在延安县干部会上受到表彰奖励的模范干部编词歌颂。当一位时年43岁,却已两鬓花白,高高的身材,瘦长的脸,身穿褪色蓝布棉袄裤,腰系一条破围巾,吊一杆羊腿骨烟管,脚登布袜单鞋的农民被引上舞台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达几分钟之久。延安县党委书记王丕年在一旁高声介绍:“这就是



向吴满有看齐(木刻,1943年) 古元

模范党员申长林同志!”话音刚落,台下一人高呼,千百人响应:“学习模范党员申长林!”

申长林是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树立的三个农民典型之一。较之“边区农民英雄”吴满有、“模范退伍军人”杨朝臣而言,“模范党员”申长林的典型模范意义在于,他是贫苦农民出身,曾经沦落为“二流子”达十年之久,后来参加革命赤卫队,现在成为新农民,连续四年种粮多多,对革命贡献多多。为此,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一位新的榜样》,并配发长篇通讯。正在医院治病的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看到消息后,禁不住亲笔写信给申长林,称他出身于无产阶级的队伍,曾沦落为失业的游民,现在是“边区自由的公民”,“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富裕的主人”,“边区党的模范党员”,这是中国人民最正确的解放道路。^①

二流子,是对陕北农村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活,搬弄是非,装神弄鬼,为非作歹的各种人的统称。此前,他们被村民们称为“爬鬼”、“地痞”、“牛毛”(流氓)、“二流答瓜”。

大约在1940年春延安县的一次生产动员大会上,两位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的干部胡起林、王庆海最早提出,要拿出有效办法,迫使农村二流答瓜的那种人参加生产。这个提议很快得到执行,并且取得很好的效果。

据统计,该县1937年有二流子1629人,到1941年已改造1173人,占总数的72%。与此同时,劳动力迅速增加,荒地得到开垦,粮食收入日愈增多。仅该县川口区第六乡调查显示,1937年开荒328亩,产细粮471石;至1941年相应数字为2733亩,3793石。这其中当然有许多其他因素起作用,但与“二流子”改造运动在农村所激发起的广泛的劳动热情有直接关系。

^① 《向申长林学习》,《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3月16日社论。



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战士开赴南泥湾,垦荒屯田,备战备荒

随着生产运动由八路军延安留守部队初步尝试,并由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成功实践,1943年,趁着上一年全党整风运动的浩大声威,一场全民参加的大生产运动在延安机关、学校和陕甘宁边区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朱德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上指示,“贪污、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①延安县为执行大生产运动指示,绝大多数农村沿用“吃各伙”的旧例,全村合吃一羊或一猪,当场规定若干公约,互督互助,积极生产,“不许再有一个二流子,不让再有一个劳动力站在生产圈外”,违者除须罚出羊资或猪资外,另并接受公议的处罚。^②《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改造二流子》,积极推广延安县改造二流子的经验。这样,在延安全民大生产运动中就出现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农村改造二流子运动。

三

这时的陕甘宁边区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建立起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广大农村普遍建立边区政府(相当于省)、

^① 《延安举行生产总动员,建立革命家务》,《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3月6日。

^② 《延安县村民公约,互督互助积极生产》,《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2月25日。

县、乡村和行署、专署三级两辅制层级组织,以及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妇联、民兵等群众组织。改造二流子运动通过这个严密的社会组织自上而下被有效地运作起来,有典型,有经验,有计划,有步骤,有广泛的舆论支持,有良好的社会效果。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边区各县将任务分解到各乡村,按照上级指示和报纸提供的经验,按图索骥,对号入座,首先划定二流子名单。1943年初,边区属下10个县,约150万人口中,共划分出二流子约9500人,占总人口的近150分之一。如果除去总人口中的“公家人”(军人和干部、学生),那么,在农村二流子所占人口的比例还要高。不过,当这项政治任务演变为群众性政治运动时,也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很快,《解放日报》发表王丕年的文章,重新界定划分二流子的标准,“看他是否有正当职业和他对生产的态度,这是根本的”^①。并要求分出层次,有“二流子”,还有“半二流子”、“民选二流子”,区别对待。

60

1943年4月15日深夜,甘泉县六里庙乡自卫军和干部一起,深入山沟村落,提出事先圈划好的11名二流子。第二天下午召开全乡群众大会,领导讲话动员,群众发言揭发,二流子表态宣誓改过自新,并寻出担保人,订出生产计划。其中,就有道佐铺街上的女二流子冯老婆。群众对孤立起来的女二流子分外看中,当乡长刚宣布处理意见后,会场里的人就吵起来,笑起来,“先叫冯老婆向我们宣誓!”大家快活地呼叫着。

冯老婆从那边墙角里走出来,她细瘦的身材,黄黄的脸蛋,看来30多岁的样子,羞得连头都抬不起来。她走到台前,惭愧地低声说:“我改过,我自新,你们看我再吃洋烟,活剥我……”

“不行!”她的话被台下有力的呼喊打断了。

冯老婆怔了一会,又惶恐地说:“我保证制车子,纺线……”

“得寻保人!”大家向她喊叫。

她一时茫然地向台下张望一眼,又低头无助地想:“叫我寻谁作保呢?”

^① 王丕年:《谈农村二流子》,《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6月4日。

会场立时寂静了,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像怕做她的保人。在难堪的沉默中,终于站了起来一个红脸的老头——她的丈夫冯开文。“我保你,你是真改过?”冯开文板着面孔,认真地问。

“真……真的,我改过……”冯老婆眼角里挤出了泪花。^①

对于宣誓愿意改过的二流子,由政府安排,分配或联系租借一定的土地、种子和农具,扶助监督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或其他劳动。杨朝臣同庄有个李同德,从前做巫神,一亩地都懒得种。现在不能下神了,夫妇二人挨饥受寒。杨朝臣劝他:“如果你今年耕种,我借三斗粮和一把锄头给你,不要报酬。”李同德感动得哭了起来。

距离杨朝臣庄上十里远的张同华,曾经也是个二流子,竟日游手好闲,邻里说这个人是无法教育的。杨朝臣得知后,主动找他,耐心说服,并借给牛和镢头,帮他订出生产计划:开荒10垧,12岁女儿可送饭、拾粪,老婆照顾家庭副业。计划订好后,怕他不努力,杨朝臣又和他变工。不久,张同华革除恶习,开出荒地,养起鸡鸭,连看戏也不去,为的怕误工。有人问他:“老张,为啥变得这样好?”张同华总是感激地说:“没有老杨哥救我,我这辈子都完了。他把我从梦中唤醒了。”

劳动英雄杨朝臣、申长林等的模范带头和榜样作用,使不少二流子思想开朗了,他们觉得弃暗投明,前面有奔头。尤其是申长林的事迹经宣传以后,很是激励了二流子们改过的信心。同住在蟠龙川的二流子刘生贵,自己跑到申长林家登门拜访,痛说前非,保证改邪归正。安塞县的二流子刘四有表示:“别人能学好,咱就不能转变吗?”他春天下地劳动,秋季就有收成,报纸为他发表通讯《刘四有转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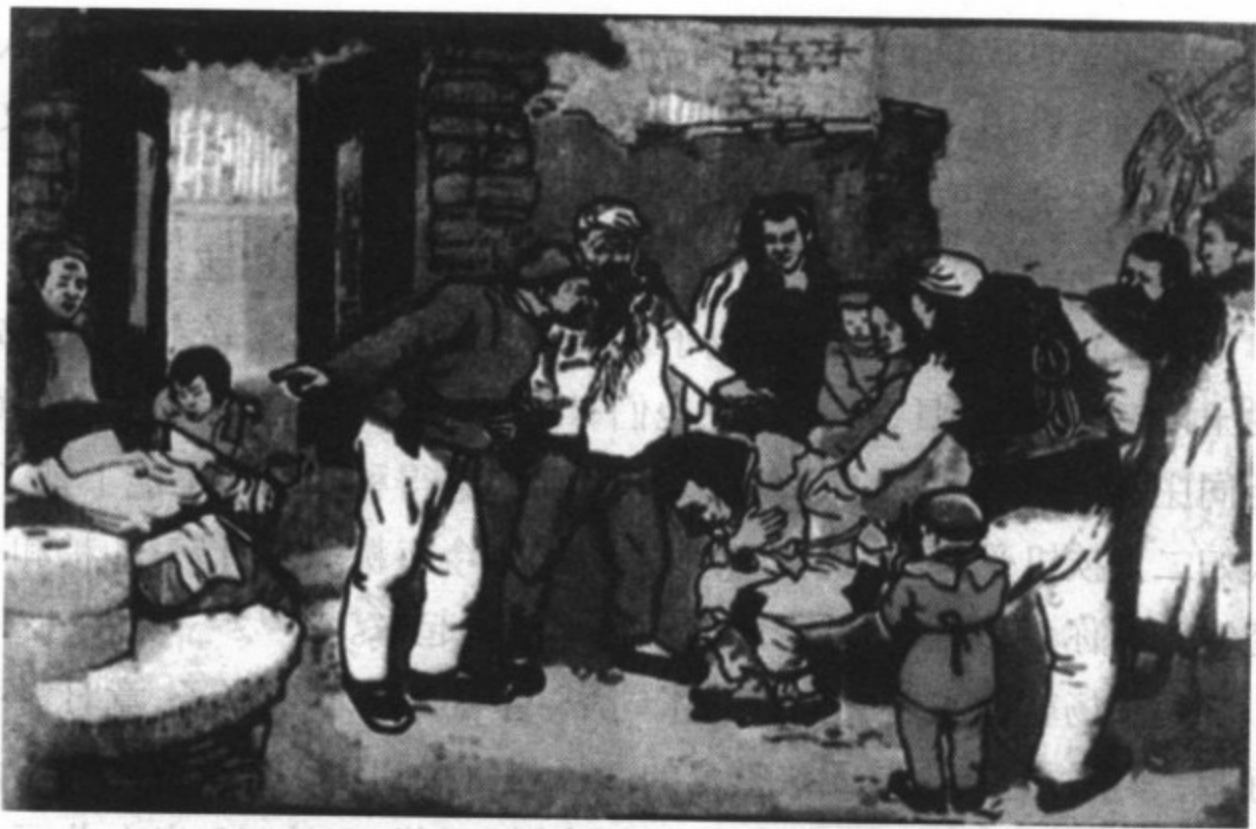
对一般宣传教育和帮助监督改变不了的二流子,则采取大会训斥、当众耻辱和强制改造。

在吴旗市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王县长厉声训斥着二流子:“高长腿,你站出来,你讲为啥不生产?”

蹲在地上的高长腿紧缩着头颈站起来,把身上穿的破羊皮短袄一束,脸色黄得像焦棒,眼睛呆望着地下。

“你不该偷偷地从友区买大烟来吸,啥也不干。”老县长数落着他。

^① 北群:《改过》,《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5月20日。



改造二流子(套色木刻,1943年) 王式廓

高长腿懒惰成性,不事生产,靠两个儿子给人揽工挣的钱,每天躺在床上抽大烟。

“今年要规定你生产,你要种五垧地,有啥困难,全村都帮助你,能不能成?”王县长对他说,大家的眼睛都集中瞪着他。停了一会,他才瘪着嘴说:“成,我种六垧。”

“要你戒烟,你是愿意自己戒,还是住在政府的窑洞里来戒?”

“戒!自己戒!”

“要多少日子?”

高长腿先说要一百来天,当王县长逼迫一步问到底要多少天,他改为50天。

“不成!50天要到五月份,生产时间都全误了。”王县长最后说,“30天。”

延安市划定二流子110人,其中女二流子39人,以南区为最多。二流子的门上和身上被强迫佩带有二流子的徽章标志,只有在真正参加生产之后才被准许摘去。对女二流子,规定她们受家人严格束缚,帮助丈夫整顿家务,如有不改,则丈夫打骂,政府不管,也不准离婚。^①

^① 张汉武:《谈延市二流子的改造》,《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5月24日。

绥德分区各县、区在奖励劳动英雄的大会上，同时斗争二流子。身上带着白布条，低垂着脑袋，二流子被一个一个地拉到台前。台下群众都报以哄堂大笑。这对有的二流子就成了强烈的刺激。二流子蒋生俊、辛振有就是被公众讥笑以后，回家彻夜不眠，因而痛下决心，改做好人的。在政治、道德、思想、文化一元化的社会里，群众舆论是种无所不在的强大力量。吴堡县王县长在后胡家山村开会宣布二流子的可耻，邻村二流子王岭来村上串门，一个瞎子听说他到了，当他面向地上吐口唾沫，说“呸”！这口唾沫对王岭产生极深的影响，从此他开始走上正路。

四

在营造社会舆论上，边区政府不仅取得二流子家庭其他成员的积极支持，而且还组织利用群众所熟悉的各种艺术形式，编写出《兄妹开荒》、《二流子变英雄》等街头短剧，以及民歌童谣，深入乡村巡回表演。

63

绥德市第七区就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童谣：

二流子，李克明，好吃懒做不务正，嫖赌抽都干，不管家小与亲邻。七区人人个个讨厌他，全市二流子挂牌，他是第一名。^①

《解放日报》上曾公开发表过依“顺天由”（即“信天游”）的调式填写的歌词《笑话二流子》，并注明是“农村妇女儿童嘲笑二流子唱的”：

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看那二流子过来了，快来看他那球样子！你撒泡尿来照照面目，好好的庄稼你不种，常年像老鼠钻地洞。爹娘养你不成材，你又抽洋烟又要牌。捉定什吗吃什吗，人家说你是贼娃娃。睡到太阳照屁股，醒来吃上些糠糊糊。吃净了粮食吃籽籽，二流子你早晚要讨吃。有饭

^① 韦君宜：《警区二流子的改造》，《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7月12日。



运草(木刻,1940年) 古元

给你不胜喂狗,凭什么养你这二流流。你婆姨也恨来你儿也嫌,二流子顶个球不蛋。不要上我家串门子来,怕你把懒劲串进来。二流子你长得也像个人儿,为甚不好好的过年景儿?二流子二流子快回头,劳动起来甚也不愁。^①

对顽固不化的二流子,采取的是集中管制、强迫劳动的办法。绥德市二流子戒烟所就是有组织地收容改造被称作“社会的寄生虫”的二流子。早上6点钟起床,由所长领导着到操场上跑步,上午都集中在一个院子里捻毛线。午饭休息后,下午上课。“那曾经是枯黄的肮脏的脸,现在泛出了红色,头发和胡须,都剃得干干净净。”^②他们操着不熟练的姿势,被迫过着有秩序的生活,但饭可以随吃。一个叫马生荣的高个子青年,婆姨死了,只剩下瞎眼母亲和一个孩子,自己靠偷窃为生。进所后他饭量增加了5倍,一天早餐竟吃了8碗干面。享受着生活优待,接受过思想教育后,他决心改造自己,善待母亲,教养孩子。

戒烟所以对每个二流子都造册登记,张榜公布,犯何前科,改造计划,内容日期,一一在目,经所长考察鉴定,并经众人评议合格后,才可出所。

^① 真夷:《笑话二流子》,《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4月24日。

^② 岳瑟:《人的改造——记绥德市二流子戒烟所》,《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4月30日。

五

这场全社会动员,方方面面配合,步调一致,口径一致的改造二流子运动,是卓有成效的。

在1943—1944这短短一年时间里,陕甘宁边区共改造二流子6400余人,占原划定二流子总数的三分之二,并逐渐达到百分之百的改造。

改造二流子的运动,除了提供农村劳动生产力,推动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开展外,还提供了通过农业生产劳动来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经验。《解放日报》当时总结说:“几年来我们不仅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设,而且还进行了‘人’的改造和建设。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换了原来的面貌,变成健康勤劳的农民。”^①

一个主要由健康勤劳的农民组成的社会,是温饱的、稳定的、淳朴的、净化的。不间断的周而复始的生产劳动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切,成为一种新的时代风尚。其他一切属于旧时代供游手好闲者消磨时光,供生活有闲者享受休闲,都被视为颓废或颓唐现象而受到铲除消失于生活中。

1944年春夏之交,中外记者采访团在延安就发现:“那里没有颓唐的现象,人们相互督促地生活,所以大都是被称为‘突击队员’、‘劳动英雄’的青年,和这些名词对峙的是二流子,这批人则到处遭到白眼,受人鄙视。”“至于介乎两者之间的一般农民,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就不敢不以‘劳动英雄’为模范,而一任日常生活的支配了。”^②

严密有效的社会组织,一元化的政治权威,渗透于每一个生活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共同改造并塑造出单质同构的适应新时代的新人。当新人的品质成为风气时尚,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国家就可以达到高度的统一,并进而实现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最全面、最深入的开发和利用。

^① 《改造二流子》,《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2月24日社论。

^② 谢克:《延安十年》,上海:青年出版社1946年2月初版,第5、66页。

把日本战俘变成革命战友

抗战八年,如何处置那些曾经穷凶极恶的日本战俘,一度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优待俘虏,释放俘虏,在延安创办专门教育日本俘虏的“日本工农学校”,化敌为友,以德报怨,是为大仁大智的攻心之举,也是面对敌对分子,施行重新改造人、塑造人的方略的成功范例。

66

1941年5月15日下午6时,位于延安城北门外青年文化沟(大砭沟)的八路军大礼堂,正在隆重举办日本工农学校开学典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西北青年救国会主任冯文彬,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界代表共两千多人参加了典礼活动。该校30多名学员,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宝塔山麓的学校住处来到会场,迎接他们的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宝塔山下的窑洞,就是日本工农学校旧址

大会主席台上交错高悬着“日本工农学校”的校旗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盟旗，旗帜下面悬挂着毛泽东的肖像和已故日本革命领袖片山潜的遗像。主席台左右两侧显目位置分别张贴着毛泽东的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日文大字标语：“万国プロレタリア团结せ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旁边还贴满了各机关、学校和部队送来的锦旗，以及朱德、王明、洛甫等中共领导人的题词。

会议由傅钟主持，朱德、冯文彬相继讲话。“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总崩溃的时代。人民会翻身的，时间不会很长，就在这几年之内。日本人民和士兵现在多数还受着欺骗，但他们会觉悟过来的，他们和中国人民一样，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朱德讲话很朴实，也很动听。他说着说着，语调逐渐高昂起来：“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华北，在华中，在中国各个战场上，在日本，都设有‘日本工农学校’；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只是在中国有八路军，而且在日本也有日本的‘八路军’——这为正义为人民而战的军队！”^①

会上宣读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发来的贺电、贺词。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代表发言，表示全体反战同盟的盟员们，要始终站在反战同盟的光荣战斗岗位上，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会议高潮是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列队登台，集体鞠躬后，庄严宣誓：

亲爱的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将士们：

我们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怀着满腔真挚的感情，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战友般的感谢并说几句我们的誓言。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是曾经在战场上，将枪口瞄准过你们的日本士兵，然而，当我们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侮辱我们，没有杀掉我们，不仅没有把我们当作敌人，而且还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平等、安全和优厚的物质待遇，与各位共享生活的欢乐。八路军实在就是我们生命的恩人，对此，应怎样表达我们的谢意呢，我们实在是找不到最恰当的

^① 转引自王向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军政杂志》（延安）第3卷第6期（1941年6月）。

语言……

八路军不仅仅是挽救我们的生命,而且,又为教育我们,创立一个特别的学校,这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学校我们要学习很多不曾学习过的东西。我们的胸中燃烧着对新生的渴望,满怀信心地去学习革命理论,彻底改造思想……^①

他们的宣誓得到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两千多人振臂高呼:“欢迎日本同志与我们并肩战斗!”“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当他们依次走下台的时候,八路军敌工部的同志们早已等在台口,热情地拥抱着他们。典礼结束,紧接着是游艺晚会。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和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同志们,表演了准备已久的日本歌舞,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所属少年演出童话歌舞剧《公主旅行记》等节目。浓郁的民族艺术特色,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演员是观众,观众也是演员,宾主不分,其乐融融,感染着每一个参与者。晚会持续到子夜时分,大家在欢乐的气氛中依依道别。

次日,日本工农学校召开学员座谈会,征求大家意见,组织学员畅谈感想。学员泷泽说:“我经常听到劳动者、国际主义精神的话,但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昨晚,我体验到了。当我登上舞台,受到中国同志热烈的掌声时,我的呼吸短促,眼眶发热,我几乎流出眼泪,我平生从未受过这样大的激动。来到八路军之后,中国同志从没有把我们当作俘虏看待过,可是‘俘虏’这个观念却像恶魔似的盘据[踞]在我的脑海里,我被这个恶魔苦恼着,使我忧郁,使我叹息。但昨晚,这恶魔竟[竟]然离开了我,我再也不觉到自己是个俘虏,而是被中国同志所欢迎的嘉宾了。”^②这天晚上后,他在校部的窑洞前面徘徊了很久,最后还是鼓足勇气推开窑洞的门,把一张纸条交给学校负责同志。纸

^① 参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95—96页。

^② 转引自王向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军政杂志》(延安)第3卷第6期(1941年6月)。

条上写着：以前填写的表格是故意写错的，他本来有一兄三妹，填表时都没有写；他真实的住处是神户××区第三町目，而填表时却写成第四町目；他本来大学只读一年，表上填大学毕业，等等。

另外一位学员小林青在座谈发言中说：“一年多来支配我的思想的俘虏观念，直到昨天大会上，才完全地消失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

话音刚落，年龄最大的学员，42岁的酒井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小林，你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今天我才感觉我们的心是和中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①

酒井应征入伍前是日本一家工厂里的工头，性格倔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总是瞪起眼睛大吵大闹，被八路军俘虏后一直态度强硬，甚至在工农学校还进行过绝食斗争，要求释放。此前的1940年11月3日“明治节”（纪念日本明治天皇诞生的节日），他带领5个日本学员偷偷地爬到山顶，面对东方，遥拜日本东京皇城，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发誓与八路军对抗到底。现在，他的反省表态对于其他士兵影响很大，大家都认真检讨，读书思索了。

二

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共领导人接受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林哲的建议，于1940年10月筹备建立的。该校主要从被俘日本士兵中选拔一部分受过教育者入校学习，以培养抗战同盟干部为目标，也就是为日共在中国培养革命干部。学校刚成立时只有学员11人，后来陆续增加，到1941年开学典礼时已有35人。他们都是从华北战场送来的日本兵，其中下级军官6人，在八路军政治攻势下主动投诚1人，不堪忍受日军内部军官侮辱打骂出逃而被八路军捕获2人，其余都是作战时被俘虏的，尤其是“百团大战”中被俘者占多数。

该校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校长林哲，副校长赵安博、李初梨。办学宗旨为十字校训：和平、正义、友爱、勤劳、实践。学校实行八路军

^① 参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97—98页。



日本工农学校部分成员

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下的民主自治管理,设立5人理事会,及学生审查、教育、经济等委员会。学制一年,分三个阶段,即资格审查(一个月)、预科教育(两个月)和本科教育。学员学习期满后,根据需要分配到前线各地,参加反战同盟领导的实际工作。

林哲,又名冈野进、野坂参三,1892年3月出生在日本山口县,是个身材矮小、神情庄严的日本人。青年时期他留学英国学习经济学,后参加英国共产党。1921年回国后,担任日本劳动总同盟书记,次年7月发起创建日本共产党,被捕后长期遭监禁。1931年至1940年作为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出席1935年5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40年3月,他随周恩来一行从苏联经迪化(乌鲁木齐)、西安秘密到延安。他原拟潜回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因战事受阻而留在延安,帮助八路军敌工部做瓦解日军思想的政治教育工作。他化名林哲,只有中共党内少数高层领导人知道其真实身份,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他公开自己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代表身份。^①

^① 野坂参三(1892—1993),在苏联期间曾向斯大林诬告,致使日共另一位领导人死于非命。此事半个世纪后被暴露,野坂参三被日共中央开除党籍。

在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学员,大多数出身于日本国内的社会低下阶层,文化程度不高,很多只有小学程度。学校开设的课程有:

- “日本问题”、“联共(布)党史”,由林哲任教;
- “时事问题”,由林哲、李初梨、赵安博任教;
- “政治常识”,由李初梨、王学文、廖体仁任教;
- “社会科学基础”,由何思敬、赵安博任教;
- “政治经济学”,由王学文、李初梨任教;
- “中国语”,由李初梨任教;
- “文化课”,由赵安博任教;
- “中国问题讲座”,由江右书主持;
- “中国革命史讲话”,由罗明达主持;
- “修养讲座”,由王斐主持;

此外,还有为提高学员日文水平的“日语训练班”,由王晓云主持。

这些任课教师除日本人外,都是曾经留学日本,且精通日语。学校所有课程的课堂教学都用日语讲授,但学员讨论时必须用中文发言,即使中国话讲得很差,也要开口说,为着尽快提高汉语水平。

教学内容,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日本国内的具体实际或战争事实,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基础”课程,教员从英、美、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两种社会制度对比中,认识日本的社会制度与战争本质,从而揭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恶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这对学员们的思想冲击最大。

据该校学员梅田照文(又名香川孝志)1942—1943年的听课笔记,“社会科学基础”课程共分四篇,外加导言部分。具体章目如下:

导言:为什么要学习政治常识 // 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什么 // 学习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篇: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 // 原始共产制社会 // 奴隶制社会 // 封建制社会;

第二篇：资本主义社会 // 经济的意义 // 商品和货币 // 资本和剩余价值 // 经济恐怖；

第三篇：帝国主义 // 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 // 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第四篇：社会主义社会 //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 //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从远古的社会到今天的社会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呢？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什么呢？现在的社会为什么会有富人和穷人，为什么会爆发战争？课程提供了对于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认知武器，那就是生产力加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促使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生产的发展史，就是生产方式不断变化的历史，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充满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法则，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以革命的手段（武装起义）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以共产党这样强有力的战斗司令部为领导的无产阶级，把由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夺走的财富再通过革命夺回来。并且无产阶级把夺回来的财富，作为自己统治的国家所有，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样，该门课程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将听课的日本战俘学员们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剥离开来。

并且，课程当中特别注意列举分析日本近现代社会史实现象，加以剖析讲解。如列举1929—1932年日本的物价指数，说明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就是作为摆脱经济恐慌（即经济危机）的政策来进行的。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而发动“七·七事变”，同样是作为摆脱经济恐慌的一个原因。“资产阶级无论如何谋求对付恐慌的对策，也是摆脱不了恐慌的。没有自己的灭亡，是解决不了的。”^①

在课程教学过程当中穿插有许多讨论，形式上分为“小组讨论”、“星期一讨论”、“读书会”三种。就课程教学中的疑点和难点，广泛交流探讨，要求每个人都发表意见，谈感想，说体会，有疑问作解答，有争论更欢迎，总以解决思想问题，形成统一认识为目的。多年后，接受教

^① 何思敬、王学文主讲，香川孝志记录：《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北京：求实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2、170、119页。

育的日本学员回忆：“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所学过的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从而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提高了思想认识。也使我们从理论高度认识了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真相和他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恶。”^①

放下手中的武器，他们成了战俘；还要放下精神思想上的武器，他们才有可能成为革命的战友。这些战俘在精神思想上的最后武装是“武士道”。这种源于日本文化传统，并依附皇族神权崇拜，尚武使气的道德原则，被运用到侵略战争上则表现为对发动战争的天皇的崇拜，对上级命令的绝对服从，对个人名节的无上推崇，甚至以死效忠，剖腹明志。工农学校的教育首先就是要破除他们对于天皇的神权崇拜，从而认清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

据当时《解放日报》刊发的一篇通讯介绍，该校学员按文化程度不同分A、B、C三组学习。“三个组的共同课程是冈野进校长讲的时事问题。他联系墨索里尼的崩溃，讲述社会发展的法则和东条内阁被推翻的必然性，他结合红军胜利的消息，讲述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力量的源泉等等。冈野进同志讲课内容深刻，其解说也很巧妙，而且把修养锻炼和‘坦白运动’的问题编入讲义中，有时甚至对问题的看法、想法、分析和处理方法也给以指点。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对时事问题都抱有极大兴趣。”

除上述正常课程外，各种研究会则组织开展时事政治研讨活动。1943年10月，在记者采访的当时，他们正在研究讨论冈野进发表的《中日战争六周年之际告日本国民书》一文。“学员们从这篇文章中清楚地了解到日本军部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如何进行欺骗宣传，日本人民在战争中究竟得到什么，日本人民对这场战争抱有什么态度和怎样参加反战斗争等等。”同时，对于那些已经“加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志们，目前正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献”^②。在整风运动中，他们更深刻地反省自己的思想，彻底清除骨子里的法西斯武士道和所谓的“大东亚圣战”的毒害。

^① 参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90页。

^② 《愉快地紧张地学习着的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10月12日。

三

曾经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后来分配到山东战场工作的小林青,根据延安在华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本部的指示,参加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胶东支部的整风运动,学习中国共产党统一下发的整风文件,一字一句地精读、讨论,再联系自己的实际进行深刻反省和检讨。小林青的反省报告当时就以《我的思想反省》为题,公开发表在1944年7月23日《大众报》上,并配有一篇大加激赏的评论。

在这篇保存完整的反省报告中,他生动描述了自己被八路军俘虏后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大家从我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情况中,知道我现在的思想作风情况。还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我要在工作中逐渐改正。可是我刚被八路军俘虏的时候,在日本军队中的武士道精神和以死表示效忠天皇的思想支配下,自己曾暗暗想过和计划做一些对不起八路军、对不起中国人民的错事。”

74

因为做了俘虏,他观念中感觉这是最大的耻辱,“不仅自己的一生完了,就连家属也永远受到人民的唾弃与谴责”;“支那人太野蛮……(如果被俘就要)与八路军一刀两断,否则永世不能再投生了;切腹自杀也不能缴械投降,”等等。“由于有这种思想,所以,我一直顽固地表现出大日本皇军不怕死的大和魂精神。我还十分傲慢,蛮不讲理,经常大声叫喊:‘你们杀死我吧,我不怕死!’”

死之未成,他便想逃。“我刚被俘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逃回日本军队去,但仔细一想,自己不会讲中国话,又没有路条,是根本跑不掉的。即使是这样想了,但还是硬着头皮跑过一次,被抓了回来。后来,我又和布谷商量准备伺机偷一张路条再跑,可是通行证在八路军同志手里,我们曾企图偷过,几次都没有成功。我们还一起商量把管通行证的同志杀死,拿到通行证逃跑,但又怕万一逃不成,被抓回来,就犯了杀人罪。我左思右想,不敢下手杀人。”

逃之不成,他又想同归于尽。“当时思想变化无穷,后来又暗自思忖,既然逃跑不成,那就找机会设法杀死几个八路军的长官,和他们一起同归于尽,以此来尽我誓死效忠于天皇的‘赤诚之志’。……(这

样)一来可以为大日本皇军‘立功’,二来也炫耀了日本军人以身殉国的武士道精神。”并且,如果将来日本军部知道此事,还可能被追谥为有功之臣,而不是贪生怕死的国贼了。

有一次,八路军胶东五支队缴获了几门日军掷弹筒,不会使用。这是一种当时比较先进的专门对付机关枪的武器,日军中也只有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士兵会使用。八路军参谋处请他去部队驻地的临时练兵场讲解掷弹筒的构造和使用方法,当时周围有许多八路军干部战士,其中还有胶东五支队参谋长李发等司令部同志,都在全神贯注地听讲解。装弹、瞄准、射击,他一边讲解一边示范,“猛然间,我脑海里闪了一个念头:如果让我用实弹作示范讲解的话,我就趁机在装弹时把炮弹倒装,必然引起掷弹筒当场爆炸,炸死我,也炸死八路军的长官和士兵,让我在八路军的俘虏营里为日本军队立个大功吧!”

同归于尽未成,他消极抵抗,并故意让同样被俘的自己上司逃跑,当时佯装不知,过后才去报告。

那时,我在八路军敌工科同志们的帮助教育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思索以后,刚刚下了狠心决定不再回日本军队去了。正在这时,和我在一起的濑古,作了八路军的俘虏,他是我原来的顶头上司。濑古偷偷地找我商量,如何设法逃回日本军队去。我尽量避免单独和他在一起,实在躲不开他,就谈别的话题,或用其他话搪塞他。反正我不愿和他谈逃回日本军队的事。濑古见我不愿意逃回日本军队,就威胁我,让我无论如何帮他创造个机会逃跑回去。他对我说:我绝不会像你这个怕死鬼一样,在八路军面前屈服投降,即使我逃不掉,也要和他们以死相拼。可我却守口如瓶,这些事一点儿也没有向八路军敌工科的同志反映汇报。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反正我是不打算逃回日本军队去了。但濑古毕竟是我的老战友,是我的民族同胞,我何必去向八路军报告呢?只要濑古能设法逃回去,我就不去管,不去帮他的忙,也不愿去阻止他,人各有志,随他自己的便吧!

这样,在不久的一次日军扫荡过程中,小林青和其他战俘们被转移到一个山坳里。连日行军,大家都很疲惫。乘大家都进入一个山洞休息的时候,“这时,濂古悄悄地坐起来,望了望周围,见没有动静,又慢慢地站起来,推了我一把,用手向外面指了指,示意趁此机会和他一起逃跑。说实话,当时尽管我自己根本不愿意再逃跑了,但不想去阻止别人,更不想将濂古的逃跑报告八路军。我装着没有看见他的眼色和手势,像睡熟了一样,一动也不动。他见我很久没有动静,狠狠地跺了跺脚,冲着我挥了挥手,然后看看其他人仍在睡觉,没有人发现他的举动,于是就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山洞,飞快地朝山下跑去。”直等到濂古跑过了一道山梁,他才装作刚刚发现的样子,急忙推醒身旁的八路军同志大喊:“不好了,不好了,濂古不见了!”同志们急忙起身,四面寻找,但见山坡下隐隐约约一个人影,已经跑得太远,无法追上便作罢了。

这个反省材料,最初是其本人在支部整风审干会议上的检讨发言。毫无掩饰的思想反省,使听者动容,也使自己的精神解脱。“我也把几年来一直压在我心头的沉重包袱丢掉了,觉得轻松了,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今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工作,设法弥补由于我思想上的偏差而给革命工作造成的损失。”

小林青后来不仅参加了八路军,而且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将自己的后半生与中国人民的命运联成一体。

四

促使这些日本战俘思想发生根本变化的,除了日本工农学校的课程教育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物质生活上的优待,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早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军直接交锋之际,为了分化瓦解敌人,八路军就设立敌工科,专门负责处理战争俘虏问题,并逐步确定起优待俘虏的政策。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告日本士兵宣言,将日本士兵与发动战争的日本军阀区别开来。“日本资本家、地主、军阀发动对中国的侵

略战争,把日本的工人农民,大批地强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来,当炮灰而牺牲了。每天在中国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被牺牲了。你们离开你们的家乡,离开你们的父母妻子,你们战死在中国的沙场上,尸首也无人收敛,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呵!……在前线上与你们打仗的中国士兵,也是工农出身的。为着保护中国的土地,为着保护自己的家乡,为着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中国的军队不得不进行神圣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但是中国军队绝不是反对日本的工农,他只反对日本的军阀。因此日本士兵应与中国的士兵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阀。”并且,公开承诺:“中国军队决不虐杀一个日本士兵,只要日本士兵解除武装,马上就给这种日本士兵以优待,如果他愿意回去,就送他回去,如果他愿意在中国军队内做事,就给他事情做。”^①

同时,又以八路军名义致日本士兵书,公开自己的身份,希望与日本工农出身的士兵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你们大概早听过红军这个名字吧,我们现在的八路军就是原来的‘红军’,也就是日本报纸上所常说的‘共产军’。今天我们在战场上以血刃相见是不幸的!你们都是从日本工农出身的,被你们的军阀强迫的穿上戎装,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了,离开你们的父母妻子,离开你们的家乡。我们也都是从中国工农出身的,今天开赴前线作战,只是为了抵抗日本军阀的侵略,保卫中国的领土,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保卫日本工农的利益!我们并不反对日本的工农,我们时刻在希望与日本工农携手。”“日本士兵们!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决不虐待你们,决不乱杀你们。如果你们自愿的[地]到我们这边来,一样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中国人民的朋友。”^②

时至1938年7月,八路军制订了更加完备的《关于对待日本俘虏的命令》:

1. 严禁伤害或侮辱日本俘虏,严禁没收或损坏其私人物品

^① 《中共中央告日本海陆空军士兵宣言》(1937年9月25日),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863、864页。

^② 《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1937年9月25日),见《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同前引第865—866页。

品。我军指战员如有违背,将受惩处。

2. 对伤病日俘应予以特别照顾和适当治疗。

3. 日俘凡欲回归日本国或回归原有部队者,均给予一切可能的便利。

4. 日俘如有愿留在中国或为中国军队服务者,应给予适当工作;有愿学习者,应尽量协助进入适当学校。

5. 凡欲与其亲友通信者,应给予便利。

6. 阵亡日军应予埋葬,并在坟前竖立石碑或木牌。^①

这些优待俘虏政策的执行,起到了分化瓦解日军士兵的效果。小林青回忆自己在山东战场上被俘后受到的优待情况是,虽然他曾逃跑,“但是与我接触过的八路军官兵都是既不打我,也不骂我。除了我的枪、子弹、刺刀等武器被没收以外,我身上所有的个人生活用品,一点都没动,全部由我自己保存。他们还十分热情地款待我,关心我的身体健康状况。他们不厌其烦地找机会和我聊天,启发教育我。……虽然他们大都不会讲日语,却十分耐心地叫懂日语的同志做翻译来和我交谈,帮助我正确认识这场由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不正义的,使我懂得了中日两国人民应以睦邻友好的关系相互交往,中日两国人民没有仇恨,应是朋友。”^②

在革命队伍供给制生活中,日本战俘享受着较一般同志高的生活待遇。“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一律按连级待遇,每月津贴费3元。在伙食供给上,中国同志以小米为主,我们则是以白面、大米为主。通常都是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每天除各种素菜以外,几乎天天都有一点肉,每星期还能包一次饺子。”^③如果学员生病了,还会享受到更好的照顾。

当八路军的宽大政策被越来越多的日本兵了解后,也有被荒唐误解的现象。

1942年5月,在太行山区,一个名叫小西政贤的日本兵被俘后,受

^① 转引自《延安秘事》上册,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76页。

^② 参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203页。

^③ 同上,第88页。

到八路军敌工人员的优待。到傍晚时分,他竟然让看守他的侦察员送来一张纸条,上面用日文写着:“早先到院子里来的姑娘能借给我一晚上吗?”八路军敌工人员看罢,肺都气炸了,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但又不能。最后,想出个办法,让县长摆开架势审讯他,敌工人员假装翻译,实则用日语痛骂一阵。反正县长不懂日语,俘虏不懂中文,八路军敌工人员搜肠刮肚,将自己所知不多的日语骂人的话全部抛出来,骂他个狗血淋头,叫他死了这份野心了事。^①

实际上,宽大不等于一味地放纵,而是恩威并重,争取人心,重新改造人、塑造人。当然,对待俘虏政策还存在一个对外宣传与对内把握的分寸问题。1941年8月,毛泽东等致电新四军主要领导同志时就指示:“对待伪军应采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对伪军俘虏,不分官兵与社会出身,原则上一概不杀。对我成见深放了又来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杀,即再捉再放的办法比不杀的办法要好,效果要大。……我们应耐烦地采取七擒孟获政策。”^②

在延安,对于日本战俘的这种重新改造与塑造工作,就显得更加突出。

五

从各个战场上俘虏后被转送到延安的日本兵,除了必须参加的学习、劳动外,其他时间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在延安一些公共场合闲逛,但是,在由边区联防军和自卫军严格把守的特殊部门,以及交通路口需要路条和通行证的兵法社会环境下,企图单独走出延安是不可能的。

^① 参见刘国霖、铃木传三郎:《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9—50页。

^② 毛泽东、王稼祥、谭政、傅钟致陈毅、刘少奇电,1941年8月17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1页。

在延安,也有两个日本俘虏。据说是从山西解来的,他们仍旧穿自己部队的军服,戴的也还是那顶钵形的日本军帽。他们也和在赵城(1938年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所在地,位于山西境内——引者注)的两位伙伴一样的[地]在中国享受自由。在延安,差不多人人都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天天在街上闲逛,有时和人混熟了,就跑到人家里去喝茶聊天。顽皮的孩童,有时跟他们后面追着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鬼子!”他们却一点不恼,回过头和孩子们笑着,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不要打倒我们,我们是日本的劳苦大众,我们应该大家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军阀!”^①

80

被俘后,他们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八路军提供的灰布军装,也可以继续保留穿戴自己的日军黄呢子军装。但是,经过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习生活后,尤其是“每人每月须当同学面前审查及批判自己底[的]工作一次,同学们互评优劣而予以应得的赞赏及应受的谴责”^②。在这种强烈的集体舆论力量作用下,他们都纷纷主动脱下黄呢子军装,换上灰布军装。

设在学校学员活动室里的墙报,将每次学员讨论会上的亮点话题写成文字,对于每个学员身上出现的哪怕一小点进步都给予肯定和表彰,对于顽固不化的学员也组织巧妙的批评攻击。学员青木发表在墙报上的一篇题名《过去的回顾》,其中写道:“到延安来,已经过了两个秋天。回顾过去一年,可说是我思想转变的大革命时代。生下来之后,二十多年长期间的教育(原文如此——引者注),就在这一年内根本颠覆过来了。要是没有这一年,我好像是不知有大海的井中之蛙,庸庸碌碌的[地]度过我的一生吧!”^③

课外娱乐时间,提倡有组织的集体游戏活动。

^① 舒湮:《战斗中的陕北》附录《延安行》,上海:文缘出版社1939年3月初版,第19页。

^② [美]福尔曼:《中国解放区见闻》,重庆:学术社1946年2月初版,第70页。

^③ 转引自赵安博、王向立:《思想革命——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生剪影》,《八路军军政杂志》(延安)第4卷第3期(1942年3月)。

在丰衣足食的口号下，学员们的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刘校务主任的努力和中国共产党深切关怀学员们的结果。

学校每月开一次晚会。特别是中秋节那天，要举行盛大的娱乐晚会。学员们演出许多短剧，如《弥次喜多的侠义》、《希特勒的威风》、《某中队长》等等。每个节目都富于奇特的想像。同时又带有健康的政治内容。

每天晚饭后，在运动场上，或打棒球，或打排球。不然的话，就在俱乐部里打扑克、打麻将、玩纸牌、下围棋、下象棋。以此来消除一天的疲劳。

学员整天都是这样紧张地学习，尽情地娱乐着。校园里充满欢乐和希望。^①

当时的延安，唱歌、跳舞、打篮球、打排球等体育运动都很普遍，唯有日本士兵们在宝塔山下的河滩上玩打棒球，这是新鲜的玩意儿。通常是在吃过晚饭后，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们简单地划好场地，就兴致勃勃地玩了起来，你追我赶，不亦乐乎。渐渐地，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八路军敌工部和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同志们，近水楼台，率先得知棒球比赛的规则和要领，很快就学会了打棒球。偶尔中共中央首长散步经过这里，驻足观战，其他观看的同志们会更加呐喊助兴，球场上奔跑着的学员们会玩得更加起劲。

生活的优待，娱乐的丰富，共同营造了一个实紧似松、恩威并重的精神革命的环境，使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要接受人生改造。

六

截至1944年10月的统计数字显示，抗战以来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俘虏的日本官兵约2400人，其中经过教育被释放的约

^① 《愉快地紧张地学习着的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10月12日。

2000人,先后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大约400人全部被改造成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另据统计分析,在这些学员中出身工人的有34%,出身农民的有32%,出身小商人、小职员有21%,其他出身的13%。^①他们在重新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接受着政治思想教育,从而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改造。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开始没有安排生产任务,但在该校任教的中国教员都有生产任务。正在接受人生改造的这些学员们,为了表示对边区生产号召的积极响应态度,主动要求参加生产。到1944年5月,他们开荒种地90亩,并且经营得非常仔细认真。“他们在耕种方面,和去年完全不同,生荒都挖过二次至三次,熟荒大部分都挖了二次,播种已经完毕,洋芋长的[得]很好。”在突击开荒中,校方为了顾及到同学们的身体和习惯,让大家休息,但他们说:“在这里劳动与日本是不同的,在日本是为了地主们劳动,在这里劳动所得的果实,完全归自己享受。”^②到这年年底,学员们的劳动成果折合为小米66石6斗。“计农业组生产小米20石,纺纱组生产小米13石5斗,木工组6石7斗,糊洋火盒及修理窑洞2石4斗,帮助团结合作社做点心、染色、铁工等,口报酬24石。”^③其中农业组组长新川久男被评为中直系统特等劳动英雄,并出席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

除了上述物质生活优待外,他们在校内外所享受着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民主权利,也是促使他们精神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校内民主是由学生会实现的。由学员自己投票选举出的学生会,负责管理学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及其他各项活动;同时,也保障学校教育计划的实施。学生会经常有组织地向学校反映学员们的意见,学校方面非常重视学员们的意见,只要认为是合理的,能

^① [美]冈瑟·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89、391页。

^② 《日本工农学校学生种地九十亩》,《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5月25日。

^③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生产值六十六石》,《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12月24日。

办得到的,基本上都接受,并在工作中加以改进和完善。

校外民主是让学员与其他公民一起,同样享有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参议会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参议员按照地区和单位,依照三三制标准确定名额选举产生。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抗大、鲁艺等7所院校为一个选举单位。各校先按要求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然后由候选人进行公开演讲,让选民投票选举出正式参议员。日本工农学校的候选人是该校学生会会长森健,鲁艺候选人是周扬,抗大候选人是郭化若,还有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候选人徐特立等。

森健是日本士兵,出身工人,曾在中国东北日伪满洲铁路做工,1938年被八路军俘虏后经教育,申请加入八路军,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发起创办人之一。

正式选举那天,各学校的选民们像过节日一样,簇拥着自己的候选代表,扛着标语,有的还敲锣打鼓,列队进入会场。设在延安机场的选举会场,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鲁艺师生发挥自己的特长,将周扬画像抬出来,以张声势。

大会正式开始后,首先由候选人所在单位介绍候选人情况,接着请各位候选人发表20分钟演讲。森健是用日语演讲,由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现场翻译,所以特许时间延长40分钟。他在演讲中说:“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够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选举,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我们的一个学习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好机会,这将为我们打倒反动封建的日本军阀政府,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积累宝贵的革命的经验。”^①演讲博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最后,由工作人员当场发给到会选民每人一张选票,实行无记名投票,由选民们在候选人名字后画勾,依次走到投票箱前投票。投票结束后,当场开箱验票。选举结果,森健当选为第二届陕甘

^① 转引自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107页。

宁边区议会正式参议员。^①同时,工农学校学员中小路静还当选为延安市议会的参议员。

11月6日至21日,边区第二届议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召开。会议开幕的次日,即11月7日,日本工农学校召开盛大庆祝会,欢庆森健和中小路静分别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市议会参议员。庆祝会邀请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敌工部、抗大、鲁艺、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以及延安各界人士参加。大家热情称赞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所做的贡献。而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们都表示,森健当选为边区议会参议员,不仅是他一人的光荣,也是所有在华日人的光荣。为此,他们决心要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以此报答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关怀、信任和期望。

七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或毕业后的日本学员,在接受思想精神改造后,都积极参加对日军进行的反战宣传工作。制作慰问袋、书写日文标语传单、编写日文反战报刊、上前线直接喊话或通电话、接待日军俘虏,等等,都发挥了极大的分化瓦解和反战作用。

1938年以前,八路军俘虏来的日军多数是负伤后被俘虏的,在缺少会说日本话的干部条件下,大部分都经过简单的宣传教育后,根据其本人意愿,释放回去,但一般都要带些传单,作为义务宣传员。只有少数俘虏因害怕回去后受到军法处分,而留在八路军中。

193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太行山区日军俘虏在山西省

^① 关于这次选举结果有不同记载。郭化若在其回忆录中说,此次选举延安七所院校只有一个名额,他以1650票当选。见《郭化若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1、142页。小林青回忆此次选举是四所院校竞选两名代表,结果是森健、周扬当选。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106、108—109页。但到此届边区议会正式开会时,这几位竞选者全部都参加了会议。其中徐特立作为安定县代表,森健、郭化若、周扬三人都作为“边区政府聘请”代表。见《边区二届参议员题名录》,《陕甘宁边区议会文献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第169、170页。

辽县麻田村发起成立“在华日人觉悟联盟”，随即又觉得“觉悟”二字未免让人感觉狂妄，更名为“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同时，在重庆的日本进步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其他各地日人反战组织逐渐成为该组织的分支机构。1942年8月15日，经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倡议，决定将分散在八路军、新四军领地的各地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组织合并，成立“在华日人反战联盟华北联合会”。会议通过纲领、章程、工作方针和计划，具体规定了反战宣传的内容方法、成员训练、接待新俘虏措施、协助八路军办法，等等。

当这些战俘被改造成革命的战友，不仅空前扩大了瓦解日军的力量，而且也完全改变了八路军敌军工作的方式，即此前主要由曾经留学日本和懂日语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直接承担，现在是在正确方针指导下，依靠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后来更名为“日本人解放联盟”）的干部做具体工作，并且工作更有针对性，更到位，也更见成效。

1943年以后，特别是1944年，日军在许多战场上屡吃败仗，国内经济衰竭，兵源危机严重，“被我军俘虏的日兵日渐增多，1944年起就很少有要求释放回原部队的。”^①随着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的广泛传播，主动投降的日军逐年增多：

1940年主动投降的人数占中共军队所收容的日军俘虏总数的7%；

1942年主动投降的人数占18%；

1943年主动投降的人数猛增至48%；

1944年主动投降的人数达到86%；

1945年主动投降的人数更增至125%。^②

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是谓善用兵。中国古代《孙子兵法》的战争智慧，在八路军改造日本俘虏工作中，得到了成功的应验。

“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就是优待和释放俘虏。”“反战同盟随时随地地对日本士兵进行宣传，无法防备。”这是来自日本军部

^① 刘国霖、铃木传三郎：《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同前引第49—50页。

^② 转引自《延安秘事》上册，同前引第403页。

的感叹。

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承认,“在过去日清(甲午战争——译注)、日俄战争年代,日兵没有主动投敌的,即使负伤后被俘,也不会向敌人审问下供出我军情况。现在情况变了,被俘后很多人供出我军军情,并有叛逃投敌者,实为可叹。在华北,还有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这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新现象。对此,他写道:“据说共军捕获我伤兵、逃兵时,首先让阵营内的日本兵和日本通等对俘虏进行甄审,并把被认为不合格的兵放还。这些被放还的逃兵再次落入我军后,均被送交军法会议以投敌罪加以重罚。审查合格的俘虏则接受教育、训练,从事对日宣传,甚至参加战斗。”^①

改造精神与思想,重新塑造人生,这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一个历史创举。

^①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版,第330页。

人文篇

考察延安生活的文化方面，医生、文艺工作者等，
探讨文化人在革命阵营里的精神思想特征及变迁，
探讨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实现途径。



蘇子知
在

延安医生“告御状”

延安中央医院是延安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之一，在这里，以西方解剖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需要有严格的组织管理制度作保证。接受过现代医学科学教育，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们，为了建立起科学民主的组织管理制度，曾经经历着激烈的矛盾斗争。逃避出走、“告御状”、妥协与被改造，逐渐成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从而促进一种局部民主整体专政，对下民主、对上集中的社会体制格局的最终形成。

89

1940年7月，毛泽东夫人江青住进中央医院妇产科待产，毛泽东经常到医院探望。距离医院不远处有某单位的一台发电机，噪音很大，影响医院工作和病人休息。医院曾经向有关方面多次反应都没有结果，这次由直接为江青接生的妇产科助产师丁兰趁机向毛泽东汇报，请主席干涉一下，将其拆迁。

毛泽东凝思片刻说：医院需要安静，这个建议很好。但是目前不要搬，要不别人还误会以为江青分娩搞特殊化呢。噪音也不是太大，还是等江青出院后再说吧。

果然，江青生下李讷，出院不久，这台发电机就被搬走了。^①

就社会交往而言，医生是个特殊的职业，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职

^① 参见赵炎：《毛主席和延安中央医院》，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6—7页。又见《为江青接生》，《人民政协报》（北京），2001年12月21日。



1942年毛泽东在窑洞前教么女李讷识字

业行为,直接接触并交往社会最高领导者,有意无意地参上一本、告上一状,就可以通达在集权专政社会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的捷径。这是一个比较早的延安医生“告御状”的记录,随着告状结果出人意料的成功,医生“告御状”的范围和胆子也就越来越大。

1941年初,该院儿科护士发错了药,剂量超过数倍,危及病儿生命。时任儿科主任的侯建存博士发现后,盛怒之下大发雷霆,一把将担任护士长的自己爱人张宗惠推倒在地。本来这段时间里延安伤寒开始流行,护士们工作就不安心,现在出了这件事正好成了导火索。护士们群情哗然,气不打一处来,管你们是夫妻不是夫妻呢,动手“打”我们护士长张大姐,这还了得?

正在此间,毛泽东因患肩周炎,医院安排时任妇产科婴儿室护士长何奇到杨家岭为毛泽东做理疗。就此机会,何奇实实在在地告了侯建存一状:

有一天,我一面替毛主席做治疗,一面聊天,趁机向毛主席讲了侯大夫如何发脾气、训人、打老婆等等。我说,侯大夫

太不像话了,他不满意延安的医疗条件困难,他想出去就让他走算了,少了一个大夫就不革命啦!①

侯建存是中央医院不多的几位医学博士之一,辽宁大连人,1900年生,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小儿科主治医生,是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的内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国际红十字会到延安考察,便留下来担任中央第二保育小学儿童保健工作,1940年7月调任中央医院儿科主任。年前不久,曾经主持中央医院筹建工作的何穆博士愤然出走刚刚回来,现在怎么也不能出现第二个出走的呀!这次毛泽东没有买护士的账,而是耐心劝导何奇要支持侯建存工作。

得通天捷径之便,医生们“告御状”的种类也就五花八门。生活细节问题告状,政治运动更告状;中国医生告状,外国医生也学着告状;有一定级别的领导人住院时心情烦躁,不配合治疗,医生要告状;人们对护士工作不重视也要“告御状”,一状未果,再告一状。

为了引起人们对护士工作的重视,1941年4月,中央医院护士集会,要求设立护士节,当然要就便找到毛泽东的支持。医院护理部主任沈元晖得以当面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批准,拨给经费,派专人协助筹备工作,并题词“护士工作有很大的政治重要性”。5月12日延安医务界隆重举行纪念国际护士节暨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成立大会,朱德、洛甫(张闻天)、陈云、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中央领导都到会讲话。

护士工作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和保护,但延安护士节能搞得这么快,这么隆重,很显然是与中央医院护士们能够“告御状”,寻求到最高层的支持分不开的。

1943年7月,延安整风抢救运动铺天盖地,满城风雨。中央医院335名工作人员中,几天之内就被“抢救”出“特务”、“汉奸”、“托派分子”等108人,医务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在此服务的苏联医生安德烈·阿洛夫博士着急了,趁着给毛泽东看病的机会,坦言自己的忧虑。而陪在一旁的翻译杨金涛也乘机发挥一通,反映医院里有人在大搞逼

① 何奇:《毛主席对侯建存同志的公正评价》,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76页。

供信,把人往死里整。

整风抢救运动是毛泽东组织领导的一场全局性政治斗争,自有自己的安排打算。洋医生“告御状”没有马上见效,但多少会给最高层带去一种危急的信息,从而为这场运动稍后的策略调整作了铺垫。

“告御状”是人治社会的暗箱操作行为,如果受告者将告状人透漏给了被告者,那么,被告者迟早都会打击报复告状者的。

1938年3月2日,林彪在山西隰县晋绥防区经过,因为身披一件缴获来的日本军官黄呢子大衣,脖子上挂一个望远镜,被国民党晋绥军哨兵误认为是日本军,开枪射击,子弹伤及脊椎神经。在延安治疗一段时间后,又转送苏联医治,仍留下不少后遗症,性情日渐怪僻。1941年初回到延安后,他还经常住进中央医院高级干部疗养病房。曾任陕甘宁边区医院和中央医院院长的傅连璋,私下里将林彪的真实病情告知毛泽东。20年后,林彪成了党和国家的副统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最最亲密的战友。傅连璋受到林彪的嫉恨和迫害,死后尸骨难寻。

“告御状”也是有风险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境下,对于局部问题的解决,却有药到病除的神奇功效。“告御状”相习成风,制度化的现代科学管理和公正化的社会民主体制,就会受到影响。延安医生“告御状”既有特殊环境条件下的不得不然,也有轻车熟路的习惯成自然。前者是客观社会的历史因缘,后者是精神文化的一脉惯性与人性懒惰的恶劣表现。

二

延安中央医院是延安时期条件最好的医院,也是发展得最完备的医院。

1939年8月,在延河上游,距离延安城西北方向大约十公里处的李家圪村旁边的一个山沟里,经过4个多月的筹建,已经开挖出上下两排40多个窑洞,可以应急收治病人的中央医院初具规模,即将开业。可是主持其事、负责筹建工作的医生何穆博士,却在这种时刻与其夫人陈学昭博士,带着他们8岁的孩子,愤然离开了延安。对于他

们愤然离去的原因,现在所有公开出版的回忆资料里都语焉不详,或者笼统地称为“因事离开”、“因故离开”,其真实原因是他关于这座现代医院的管理理念和自由民主、科学效益的社会人生理想,与革命队伍里某些地方日渐孳生着令人窒息的落后愚昧、专制奴性习气的矛盾冲突。

何穆(1905—1990),江苏金山县人(今上海市金山区),震旦大学医学科毕业,1926年留学法国,主攻肺科,获都鲁士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初,他与同在法国留学,并获得克



延安中央医院的创办人何穆

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陈学昭一起回国。经过几年奔波辗转,1938年8月,他们通过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重庆办事处介绍,举家来到延安。据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科工作,具体接待何穆夫妇的金城晚年回忆:“何穆中等身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陈学昭身材瘦小,一副理想主义文人的风范。两个人热情很高,一到交际科就要求参观、访问、工作。……我对他们的到来内心感到十分喜悦。因为当时边区的医疗条件很差,特别对肺结核病束手无策。这种病即便在中国大城市也是被视为绝症的,一个患者只要被确诊为‘T. B.’则无异于判处他极刑。我经常看到许多好好的干部和群众,包括被人们所敬爱的高级干部,就因为这种绝症而丧失了工作权利,甚至被夺去生命。如今能有何穆同志这样的肺结核病专家来,该能挽救多少党的宝贵财富,怎不值得庆幸呢?”^①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亲自安排,何穆被分配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以重庆《国讯》旬刊特约记者身份,被安排到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专业采访写作。

红军到来之前,陕北地区缺医少药,现代西方医学几乎没有。红

^①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60—161页。

军长征带来的一些医疗队,都开赴前线做战地医疗服务。1937年1月,中共中央随红军总指挥部从保安迁驻延安,原苏区红军医院院长兼红色医务学校校长傅连璋受命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任院长。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整编后,该院改称为陕甘宁边区医院,条件简陋。1938年冬季,延安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边区医院迁往安塞,留在延安的只有中央总卫生处及其门诊部和军队系统的军委卫生处直属卫生所。何穆没有随边区医院到安塞,而是被留住任中央组织部,为中央首长看病,偶尔也到中央卫生处或门诊部上班。他后来介绍说:“中央卫生处原在25华里以外的山沟里设有50张病床的疗养所,病人以肺结核为最多。没有医生,我每周去一次,傅连璋同志每三四周去一次。由于只有一名护士,病人病重时,治疗与护理多有困难。”^①在这种情况下,傅连璋和何穆建议在延安组建中央医院。

两位医生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的同意和支持。1939年4月,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将主持筹建一座正规化综合医院的任务交给何穆。当时现有的筹建条件是:中央财政准备的3000元钱,以及“华中万国红十字会理事长马克维尔(Maxwell)、汉口美国教会苏露士(Suess)女士及希金(Higgins)先生、史沫特莱(Smedley)女士等捐赠给了我们足供一百病床半年之用的药品器械及现款20600元”^②。何穆受命之初,寝食不安,竭尽全力,在两位工人的陪同下寻找院址,雇工布局开挖窑洞,购置医疗家具器械,忙得不亦乐乎。至于市场上买不到的消毒锅、小便壶、大便盆等诸多医疗特殊用品,他就亲自动脑筋,画图纸,然后带领工人用美孚油桶、白铁皮、木料等土法制作。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不断地抽调医疗和行政管理人员来充实壮大医院组织机构,这样经过四个月的紧张筹备,到同年9月就已经初具规模,11月7日正式成立,对内称中央医院,对外又称国际和平医院总院。

成立仪式很平淡,到场领导只有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① 何穆:《延安中央医院是怎样创办起来的》,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37页。

^② 《抗战八年来延安国际和平医院总院(中央医院)的概述》(1946年),转引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263页。这项捐赠主要是周恩来在武汉、重庆向国际友人募集而得,该院“后来又得到保卫中国大同盟(抗战胜利后改称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经济与物资大量接济”。

王首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军委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和新四军代表张鼎丞等。这在延安是很少见的。通常举凡学校开学、俱乐部开张、群众团体成立、岁时节庆，都有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中央主要领导人纷纷到场，题词演讲，蔚为大观。此番平淡冷清，暴露出中央医院正式开业前何穆愤然离去，引起中央领导者对医院内部矛盾激化的冷处理。

这种矛盾有人事上的纷争，更有价值观念上的冲突。

当初，何穆从李富春那里受命之际，双方都以为何穆是医院筹建工作的全权负责人。但实际上，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的傅连璋还可以对医院筹建工作起领导作用。虽然傅连璋曾经长征的资历威望，以及与中央领导人的私人交往都是何穆所不可以比拟的，可是何穆觉得他更有责任将医院筹建成一座正规化、科学化、现代化的综合医院。而中央对于医院究竟要办成什么样的规模，什么样的规格，



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的傅连璋

开始并不明确。甚至医院的名称是“中央干部医院”，还是“中央医院”，也不确定。据传是傅连璋拿到毛泽东那里，请示后定名为“中央医院”的。最初草创阶段，尽可以让何穆去操持，现在要开张了，傅连璋就不能不表示关心。还有人事上的调配，也是傅连璋在拍板决定着的，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与何穆通气。这些都出乎何穆的意料之外，他不愿意自己卷入无谓的人事纷争。

而更让其难以忍受的，是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当时与何穆生活在一起的陈学昭稍后创作了自传体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其中记述了女主人公每天晚上听男主人公晓平在忙碌一天后对工作和人事上的抱怨：

工作没有一个严格的工作制度,工作效益不高,人才的使用好像是建立在了解上,被了解就能被重用。但是怎样被了解呢?怎样才算是到了被了解的程度呢?如果要被大家,这一个和那一个人,人人了解之后才能得到一个适当的工作,那至少在这个地方需要混上10年20年。到那个时候,自己的技术可能已经落后了,人也老了,能工作的精神最旺盛的时日也过去了,况且到了那个时候还是可以不被了解的。很多时间,消耗在开会上,会而议,议而决,决而行,但行而改样。时间的观念是很淡薄的,人们把很多时间花费在等待开会上,因为每个赴会的人都害怕等待别人。如果说下午两点钟开会吧,就算是早一点的,也要两点半或三点钟才去,这就使得大家花更多的时间,等待得更久。晓平对医院里技术上的领导者感到不服气,以为技术不如他。他觉得技术人员的地位不够高,所以人们都不安心做医疗工作,愿意去当政治、军事干部,有地位,有发展。^①

这里还没有现代社会的专业技术分工,“青年人都忙于把时间应付一个号召又一个号召,没有把时间用在一个有体系的有计划的学习和工作上,而且他们经常被调来调去,很少有固定的工作,结果人人都有变成一般化的危险。”^②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战争环境下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大家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休息在一起,判断问题的价值标准是统一的,也是唯一的,那就是对革命贡献大小,职位高低,待遇多少都应当是相匹配的。于是,闲暇时间里大家对人的评判也就是职位与待遇的大小多少之比较。何穆当时享受小灶、骑马待遇,但马房里的马还有骏马与病马之分,当马夫为他套出一匹病马,别人在他身后窃窃议论,他自己也就感觉是被捉弄了。同样,到仓库里领东西,保管员看你的级别与亲疏,可以精心为你挑选最佳,也可以将被挑选过的遗弃物分发给你——只有这些存货,你不要?那可就没有啦!

^① 参见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2—293页。

^② 同上,第293页。

供给制按照个人所处的一定行政级别进行资源分配,一方面造成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人人平等,处处公平的理想景象;另一方面又在一切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垄断的前提下,分配过程暗箱操作,上一级知道下一级情况,下一级不可以知道上一级情况,从而掩藏着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的可能。而社会政治道德一元化的价值取向,取消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舆论监督。作为一种补偿,是直接民主的道德清洁运动,即每个供给制单位里的定期民主生活会制度。通常每周一次,批评自我批评,大家进行道德集体清洁游戏,没有个人隐私,也无需个人尊严,要拿得起放得下,自己不要把自己当人,才不在乎别人是否把你当人,这样才能将个人价值消解到集体生活规则之中,变得通脱开朗起来,敢想敢干,敢作敢当,敢破敢立。

这种集体生活规则,是个无物之阵。平常闲居可能并不觉得,一旦当你有所追求,尤其是个人事业追求时,你在行动事功中就能感觉到四面临敌、跌落陷阱的困境。丁玲小说《在医院中时》^①,写的就是搬迁到安塞之前在延安拐峁的边区医院里的实际情况,人是确有其人,主人公陆萍的原型就是该院助产士余武一,事是“确有其事,不是编的”。时隔近半个世纪,丁玲谈到此事还不禁感叹:“一个知识分子到延安生活开头很不容易适应,又在那样条件确实很差的医院里工作就更加不容易。”^②这个医院体制就是,医生可以是专业技术人员,但行政领导者都是有革命资历的“老干部”——不一定真的年龄大,只是当时对于工农出生,参加过长征,没有什么文化者的一种习惯称谓。院长是个不识字的庄稼人,指导员是个放牛娃娃,后来在抗大经过三个月或半年的短期培训,被组织安排到医院当领导者。他们对现代医学完全是外行,但代表着党的利益和权威。在其领导之下,任何个人“除了服从没有旁的办法”。此外,在领导者和专业技术医生之间的是懒散世故市侩的群众,是流言蜚语的散布者与传播者,因为追逐着物质利益享受是其生活鹄的,所以天然地逢迎着领导者的意趣。当陆萍真诚地对医院工作提出种种改良意见,无形中就触动了领导者和群众的习惯及利益。“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

① 见《谷雨》(延安)创刊号(1941年11月),后来改名为《在医院中》。

② 参见庄钟庆、孙立川:《丁玲同志答问录》,《新文学史料》(北京)1991年第3期。

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它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不久,她就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在看着”。然后,支部会上有人批评她,院长找她谈话,病员也对她冷淡,对现实不满就是党性不强,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知识分子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在作祟。

于是,她变得非常的孤立,神经衰弱,每晚失眠,生活工作都如临大敌,如坐针砭,但她并不知道对手是谁。这是无物之阵,是可怕的陷阱,吞噬着现代文明播种的可能。“是的,应该斗争呀!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要是她不同他们斗争,便应该让开,便不应该在这里使人感到麻烦,那末,她该到什么地方去?”

最后,陆萍获准离开医院去学习。而同样曾经在边区医院工作过的何穆,现在筹建中央医院过程中正遇到与陆萍同样的困境,他也只有愤然离去。

三

肺结核、伤寒、回归热、天花等传染疾病,都曾经先后肆虐过缺医少药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严酷的战争年代里,敌人的炮火与身体的疾病是夺取战士生命的两大杀手。面对疾病,最立竿见影的武器是现代医学。“救活一个革命干部,比消灭一百个鬼子还重要,因为他们都是火种,革命事业正等待着他们去完成啊!”^①延安中央医院正在不断地从延安各学校,从晋察冀、苏北等其他各抗日根据地抽调选派医务人员,也从西安、上海、重庆等国统区大城市招揽医务人员。作为中央医院筹建主持人的何穆,带全家愤然出走,是个影响很大的事件。

为了挽回影响,中央有关方面安排让傅连璋亲自写信给何穆,表示:中央医院已修建了更多的病房,接受病人日渐增多,正需要更多的医生护士,医院院长一职还留待着你回来就任。而何穆夫妇回到重庆后,虽然开着私人诊所,但已经难以再过普通百姓的生活。此前陈学

^① 杨先彬:《我在传染科工作》,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167页。

昭在《国讯》旬刊连载《延安通讯》，所以他们一直受到国共双方的监视与争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聘请他为保健医生，始终与他保持联系，并对他的生意垂顾有加。而国民党政权拉拢不得，便对他施加压力。乘此时机，经多方努力并由周恩来出面，又争取何穆夫妇带领其他一批招募来的医务人员，于1940年11月从重庆返回延安。

重新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对中央医院组织关系及何穆工作作出重大调整。任命何穆担任中央医院院长，医院直属中央机关，供应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工作由中央组织部领导。这在延安是绝无仅有的，它使得中央医院脱离了中央总卫生处，具有很大的自主权。

1940年12月20日，何穆一行历经坎坷和风险抵达延安，中央医院盛会欢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亲临致辞。次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部长陈云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专门看望何穆，表示热情欢迎。随后，陈云、李富春又找到医院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石昌杰强调：“希望你们认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非党专家。如果再走人，要对党负责，要追究政治责任。”^①同时，医院召集党员大会，陈云动员党员积极团结非党专家，与非党专家交朋友，支持何穆工作。后来，周恩来回延安期间也严肃指出：“中央医院拥有一大批中、高级专家，是一个统战工作任务很重的单位。医院的党政工作同志，必须作[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工作安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他们产生要离开延安的情况，有关同志那就要向党负责。”^②

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何穆再次主持中央医院工作，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设计一个比较正规的综合性医院了。

经过几年建设，至1945年，该院已有病床210张，设置内、外、妇、儿、结核科和传染科。医院主体部分占地九层窑洞，布局整齐，远远看去像九层楼房，一层是儿科，编号从101开始，二、三、八层是工作人员宿舍，依次编号从201、301、801号开始，四层妇产科，五层为外科，六

^① 赵炎：《毛主席和延安中央医院》，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9页。

^② 石昌杰：《努力建设“科学化正规化的最高级医疗机关”》，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44页。

层为内科,七层是胸科和肺科,最高的第九层是学生疗养院(1941年学生疗养院与干部疗养院合并后迁走,这里改作高级干部疗养病房),编号从901开始。依照地势走向,各层窑洞编号一律从西到东,每个窑洞四张病床。医院另有手术室、婴儿室、药剂室、检验室和X光室,以及俱乐部、食堂、厕所等生活设施。如此规模,中央医院成了延安对外展示的窗口,经常接待中外记者或嘉宾的到访。

更重要的是,医院通过何穆和苏联医生阿洛夫博士^①的努力,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现代管理制度。医院内部从院长、科主任、主治医师,到实习医生、护士长、护士、卫生员、炊事员,都有明确的岗位分工和职责;从出入院、值班、接诊、门诊、病房、手术,以及消毒、隔离、病历书写等局部细则方面都有明确的规章可循。在此基础上,医院建立起全院业务学习制度,各科主任定期为本科医务人员上课,同时不定期聘请院外大夫做报告。对各级医务人员的学习成果,褒贬臧否,奖罚分明。这样促使全院上下,虚心业务,杜绝是非,驱之向善。

据何奇回忆,该院仅护理工作制度主要就有以下这些:

1. 病历制度:病历首先是体温、脉搏、呼吸、大小便次数等图表。第二部分是病史、查体、诊断等。第三部分是医嘱、处方等。第四部分是护理记录。第五部分是各项检查报告单。延安纸张虽然十分缺乏,我们还是设法用白报纸和有光纸铅印的表格,每个病历都用木板夹的[得]整整齐齐。

2. 值班制度:分白班、小夜班、大夜班。白班上午人数最多,分工负责晨间护理、查病房等,做各种治疗,配合准备工作等。

3. 晨会制度:在护士长主持下,听大夜班报告,安排当天护理工作,交代重危病人的特别护理,检查纠正差错和注意

^① 安德烈·阿洛夫,1905年生,毕业于莫斯科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曾留校任教授,苏德战争中上过前线,是一位出色的野战外科专家。1942年5月,他受斯大林委派来到延安,担任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填补了骨科空白。他优良的工作作风,严谨的科学态度,周密的组织才能,给人们留下良好的印象。1944年6月28—29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刊登他的事迹报道。同年12月,他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1945年8月底,抗战胜利后回国。

事项等。

4. 交接班制度:夜班护士向白班护士交接,写在交接班本上,向全体值班者宣读,重危病人一律床头交代病人曾发生的各种异常现象和问题。此外还要交东西,包括诊室的注射器、针头,仅有一、二支体温表都要逐个查看,有否损坏,在交接本上签名。^①

这些严格完备的规章制度,严密科学的管理体制,保证了医院医疗水平的充分发挥。自1939年9月至1946年6月,该院共收治伤病员13886人,治愈数13423人,总治愈率96.67%,历年平均治愈率达97.25%。这在当时中国所有医院里都是可以成就骄人的。

当时国内产妇平均死亡率为1.5%,而中央医院各年收治的3143名产妇中,除1941年因农村旧式接生难产病危始送医院而死亡2人外,其余无一人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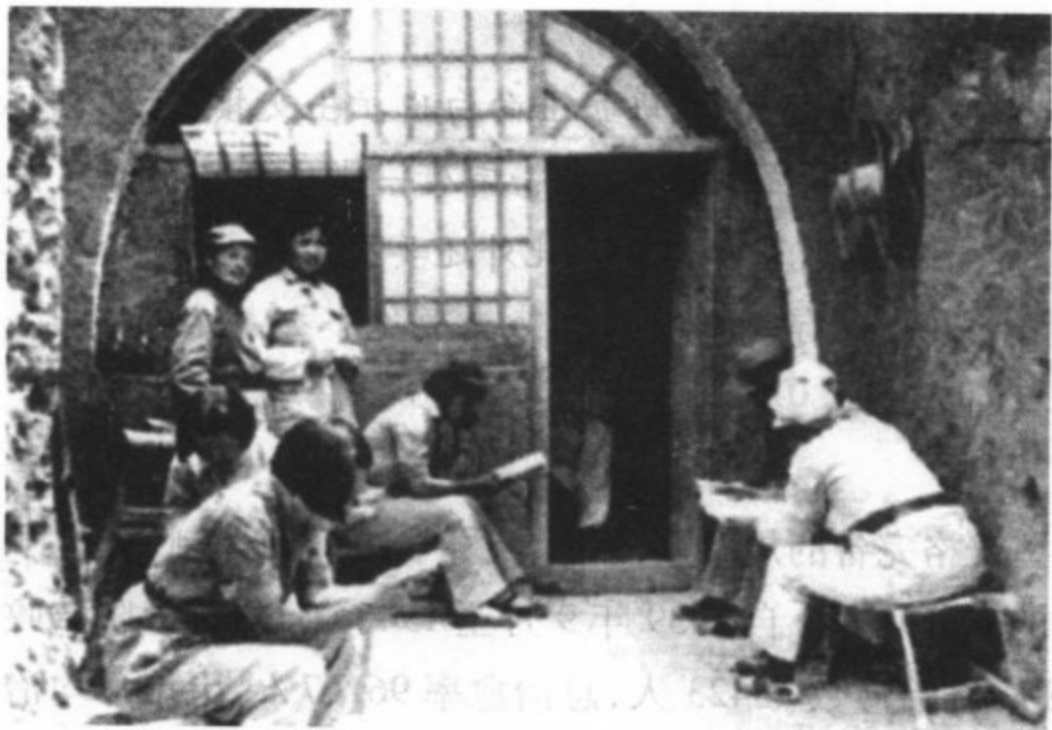
另据同时期国内一般医院统计,小儿腹泻肠炎、小儿支气管肺炎、成人大叶性肺炎的死亡率都在20%以上,而延安中央医院则分别为8%、5%、3.7%。

在延安当时那样艰难的环境下,中央医院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

四

当时延安有四座医院,除了边区医院、中央医院外,还有位于延安东北角20里铺附近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0年创办),与之隔延河相望位于柳树店附近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1943年创办)。这些医院对于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的“公家人”都是免费医疗。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要求住院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央医院在内部管理方面可以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现代管理体制,但对于外

^① 何奇:《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护理群体》,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119页。



中国医科大学学员在窑洞宿舍前

部社会环境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住院制度和探视制度两项聊以抵御纷繁的社会干扰。

住院制度规定,病人必须由所在机关单位卫生所介绍,经过中央医院医生检查,依照病情,确认需要住院的,才允许住院。这改变了以前由单位卫生所或行政领导决定病人是否应该住院的情况。探视制度规定,医院在限定的时间地点接受探视病人,此外一概由门卫挡驾;探视病人时必须遵守医嘱。“这些制度,改变了过去在长期游击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习惯,院内外都有强烈反应。一位从前方回来的将军来院探望战友,因为不到会客时间,被收发挡了驾。此类事不只一桩。”^①

八路军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因患肺结核,住院接受脓胸排脓手术,体质虚弱。毛泽东在探视时间里前来看望时,说话较多,值班护士刘鑫炎马上提醒:“首长,医生不让关政委多说话!”

毛泽东也只能点头称是,默默地坐了一会就告辞了。出了病房,他再向护士询问关向应的病情。

事后,关向应问护士刘鑫炎:“小刘,你认识这位首长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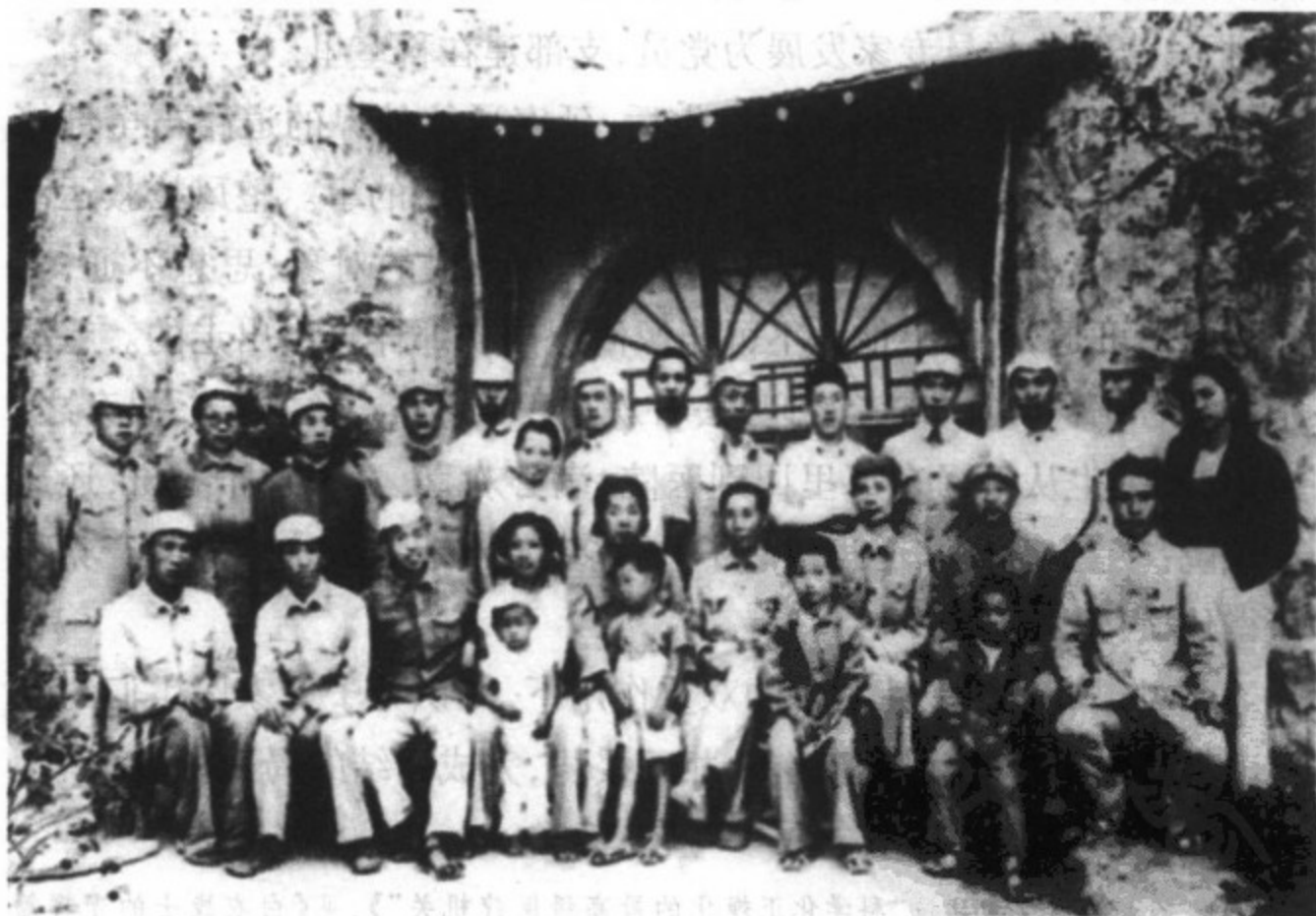
^① 伍义泽:《陈云和王首道同志教导我们团结非党专家》,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49页。

护士回答：“不认识。——不管是谁，都得服从医生的吩咐！”

这件事后来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一直传为佳话。有章可循，按章办事，规章制度大家制定，大家遵守，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现代社会一个最基本的行为准则。遗憾的是，延安时期只有中央医院能够在其内部建立起完备的现代管理体制，而在医院外部的广大社会，仍然是个人情世界。医院里的医生们在遇到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时，仍然习惯于凭借着与最高首长们有医务上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告御状”，而达到自己个人的或集体的目的与愿望。而首长们也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通过人情这根绳索，作为制度政策的补充，留住人才，安抚人心。

江青生产出院后，1940年9月16日农历中秋节，毛泽东邀请中央医院主要医务人员到杨家岭住处，分两桌吃饭，并合影留念，让参加者感到莫大的荣幸。

1941年初，吴玉章患败血症，高烧不退，经中央医院各科主要医生多次会诊，抢救治愈，中央领导数次宴请医生。



中央医院部分医务人员合影

在物资供应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将宋庆龄捐赠的手表、贺龙部队从前线缴获的留声机,以及冬季取暖的木炭等,都特别转送中央医院的医生们。他们在享受着领导关怀、人情温暖的同时,也就滋长着通过人情关系,“告御状”,走捷径,以达到集体或个人局部问题特殊解决的目的。

当何穆一行再次回到延安中央医院,领导层采取的具体工作策略就是:物质上由行政总务部门尽财力、人力、物力之能,做好供应保证,为治疗任务的完成提供必要的条件;精神上组织党员医生主动地悄悄地与非党员专家医生结对子,一对一地分工承包,关心之、感动之、改造之。医院党支部一开始就设置了,但是秘密存在的,直到1942年3月才公开。伍义泽的分工对象是从四川来的几位医生,何奇的分工对象就是何穆。党员医生对于分工对象,“几乎每天业余时间都要轮流到他们家里和他们谈心、互相交流思想,讨论问题,参加文娱活动……还专门请了政治教员给他们讲解社会科学知识,和他们座谈,帮助他们了解党和边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组织他们参加中央机关高级理论班的哲学学习”,邀请参加中央办公厅的周末舞会。^①这样结对子,直到非党员专家发展为党员,支部建在科室里。

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延安通往外界的道路被全部堵死了的情况下,中央医院再没有发生过医生出走的事。整风抢救运动中,侯建存再次成为被“告御状”和批判“抢救”的对象,思想不通,宣布辞职。可是,实际上他是不可能像何穆当初那样自由出走的。毛泽东得知后,嘴上说:“来者欢迎,去者欢送!”行动上又宴请之、温存之。据说,侯医生从毛泽东那里回到医院,满心欢喜,立即宣布上班,还逢人就说:“毛主席都知道我救活了一百多个小孩,那么这些小共产党员懂得什么!”^②

在组织策略与人情策略的双重作用下,知识分子专家医生们与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之间逐渐让步,相互妥协,完成团结的局面。

^① 石昌杰:《努力建设“科学化正规化的最高级医疗机关”》,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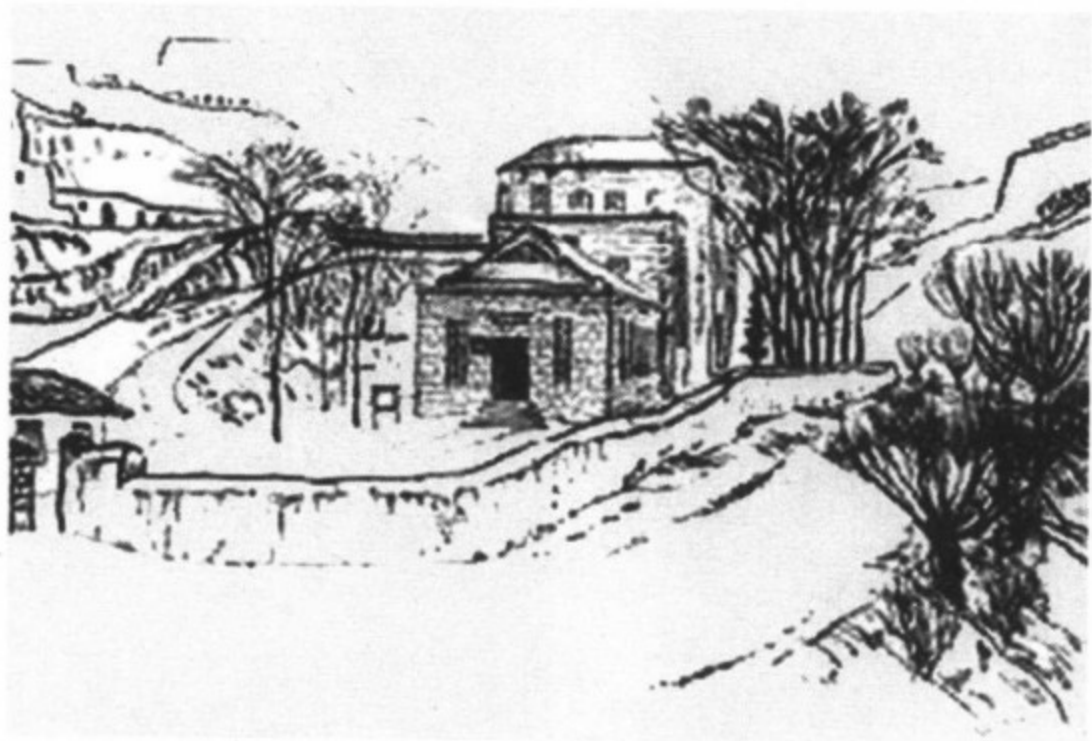
^② 赵炎:《毛主席和延安中央医院》,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21页。

1941年7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中央医院广告启事:“本院何(穆)院长近因医疗工作繁多,一切院长事务暂由石(昌杰)副院长代理。”这样一直到1942年12月,中央正式任命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璋兼任中央医院院长。1942年7月,何穆与陈学昭在边区法院办理正式离婚手续,不久与医院化验室副主任姚冷子结婚。1945年8月,经组织安排他到晋察鲁豫军区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医院主要医务人员分数批抽调转移后,改编为陕甘宁晋绥卫生部第一后方医院,后更名为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

在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曾经是个很生动鲜活的会议。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先后分三次举行，与会代表百余人围绕着文艺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关系等诸多事关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争吵。



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飞机楼”。(素描)

一 毛泽东的开场白

1942年5月2日下午一时半，当地日晷正是正午时刻。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不大的会议室里，100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长条板凳上，静候着毛泽东的到来。

来了！毛泽东面带笑容，精神饱满，从连接山上宿舍一头的门里

走进来。大家都自觉起立，由周扬介绍，毛泽东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大家说说笑笑，气氛融洽活跃。

当周扬介绍到公木（张如松）时说：“公木，《八路军军歌》、《八路军大合唱》词作者。”毛泽东点点头笑笑，边握手边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

毛泽东走到郑景康跟前时，没等周扬介绍，郑景康激动得站起来自我介绍：“我是照相的，叫郑景康。”周扬还是补充介绍道：“这是从重庆国民党总统府来的摄影师，曾给蒋介石照过相。”毛泽东很礼貌地与他握手致意。



毛泽东的讲演总是幽默生动，对于延安革命青年魅力十足

特地从晋西北前线演出现场赶回延安参加文艺座谈会的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双手握住毛泽东的手，没想到毛泽东还认识他。“欧阳同志，你从前线回来了。”欧阳山尊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眼睛都湿润了。

有人发现，毛泽东两条肥大的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薄薄的灰布棉袄的肘弯处露出棉絮。

问候完毕，毛泽东走到主席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凯丰宣布会议开始。接着，小小的会议室里，响起了毛泽东柔绵细长、抑扬顿挫的湖南腔——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

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①

开宗明义,这是以平等的态度,从民族解放、军事战争的角度,来探讨文艺工作与其他革命工作如何取得协调的发展关系。他风趣地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生动形象,幽默风趣。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中,改为我们“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②

毛泽东讲话中间,隐隐传来国民党军队的炮声,到过前线的人习以为常,一直在后方的同志难免有些担心。一张折叠的小纸条传到讲台前,毛泽东接下来,停止讲话,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然后清清嗓子,岔开话题道:“大家不要担心,炮声离我们还远着呢。我们前方有联防军在保护着我们,所以呀,我奉劝大家两点,一是母鸡不要杀了,留着下蛋;二是娃娃不要送给老乡,还是自己抚养好。如果前方抵挡不住,我还可以带你们钻山沟吗!”^③

这一段题外话,使大家哈哈大笑,部分代表的紧张情绪顿然缓释。

毛泽东讲完之后(即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引言”部分),会议稍作休息。蔡若虹和白朗去得早,坐在离主席台最近的一排。因为此前为筹备召开会议,毛泽东曾多次邀请住在蓝家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的作家萧军、艾青、丁玲、刘白羽、舒群、罗烽、白朗等,和住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欧阳山、草明等,及住在桥儿沟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的周扬、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曹葆华、严文井、姚时晓、华君武、蔡若虹、张谔等人,到杨家岭征求意见,并留饭宴请,所以这次开会白朗就打趣地问毛泽东:“主席,今天可还要请我们吃一顿?”毛泽东笑着回答:“小米饭是有的。”

整个座谈会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三餐,并不是小米饭,而是延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10月19日。

^② 《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45页。

^③ 罗工柳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记录,2002年4月23日,北京史家胡同。又,于敏:《毛主席讲得很有说服力》,见王海平、张军锋主编:《回想延安·1942》,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48页。

安难得见到的大米饭,佐之以炒肉片、炒鸡蛋。文人们胃口大开,满饱肚肠。

二 萧军头炮大走调

休息过后,继续开会,大家发言讨论。

开始有些冷场,台上看着台下,台下看着台上,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

萧军在开会前曾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为避免意见冲突,打算到三边地区体验生活,等会开完再回来,是毛泽东几次写信一再挽留邀请,他才参加会议的。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直言不讳,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其中说到:

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①

萧军延安时期的文章话语尽如其人,文气逼人,桀骜不驯,多有词不达意,词不尽意之感。多用省略号以示无尽,多破折号以作解释,多冒号以为说明,多独字句以作果敢刚毅语。他是延安文人中绝无仅有的一位与即将归于一统的政党社论话语格格不入者。加之,他是被尊为现代孔圣人的鲁迅先生之弟子,与毛泽东有通天之交。更有甚者,是情急之处,每每以兵刃相见,似乎只有角斗厮杀才足以发泄心中的大恨与大爱。所有这些,使他与一般人之间的交流争论都成了困难。

^① 高杰:《流动的火焰——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始末》,《传记文学》(北京)1997年第5期。

此刻发言,显然是跑题走调之论。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其他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者,但都难以对话。

只有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①

据胡乔木晚年回忆,第一次会议后,毛泽东叫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吃饭,庆祝斗争胜利。

萧军毫不示弱,马上给以回击。胡乔木照顾大局,没有再接茬,而是让更多的人发表意见。

鲁艺音乐系教师向隅,发言批评周扬有宗派主义,说自己提交入党申请已经有三年了,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坐在一边的周扬没有应答。^②

何其芳发言中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

这位曾经以《画梦录》获得1936年度《大公报》文艺奖的温情脉脉的诗人,1938年8月到延安后,扔掉了忧郁感伤的调子,换上一副高亢明亮的歌喉。他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会心的一笑。但知识分子当时的反应并不一致称赞,在回到各单位组织的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③

第一天大会发言的还有李伯钊、丁玲、艾青等人,何其芳之见却渐成主流。

三 有人陶醉《小放牛》

5月16日的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也是争论得最激烈的一次。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54页。

^② 罗工柳:《大树是从苗苗长起来的》,见王海平、张军锋主编:《回想延安·1942》,同前引第121页。

^③ 转引自肖云儒、高杰:《延安文艺座谈会写真》,《陕西日报》(西安)1992年7月2日。

会议开始发言还是比较和平的,笑声不断。长期带领“民众剧团”在边区各地巡回演出的负责人柯仲平,介绍该团坚持走通俗化道路,在边区巡回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况。在延安文艺界热衷演大戏,“关门提高”受到批评的舆论环境里,他颇为得意地说:“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给老百姓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喜欢。剧团离开村庄时,群众都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得好远,并送给很多慰问品。你们要在哪些地方找到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①

柯仲平曾经参加过“创造社”、“狂飙社”演剧活动,到延安后倡导街头朗诵诗,喜欢喝酒,留着一把大胡子,讲话嗓门很大,时常陶醉在酒的微醺与诗的沉醉境界里。他那种洋洋得意的神情,逗引得会场上许多人都哈哈大笑。毛泽东也乐了,插了一句: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②

接着,是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他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前辈欧阳予倩之嗣子,上次会议没有发言,当时既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又感到自己懂得太少,水平太低,在这么多中央负责同志和文化名人面前,没有勇气发言。开完会回到自己住的窑洞,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经过几天的思考,终于鼓起了勇气,他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意见写了出来,寄给了毛泽东。“大概是建议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动员作家艺术家们到实际斗争中去,到抗日的前线上去。”没几天,他接到毛泽东的回信,正文只有一句话七个字:“你的意见是对的。”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于是,这次会议就大胆地举手发言了。

^① 参见何其芳:《毛泽东之歌》,见《何其芳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420—421页。

^② 孙琴安:《毛泽东与柯仲平》,见《柯仲平纪念文集》第2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03页。

他发言介绍前线战士和敌后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一个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即俱乐部）。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甚至发两份光。初看起来似乎你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习到的却更多。”所以，他提出：“前线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欧阳山尊 1938 年 4 月随上海救亡演剧队一队经山西、西安到延安，在“抗大”学习后，调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长期在前线工作。发言中他还说：“有一些人在部队里搞文艺工作不安心，感到到头来也只是个排级干部。我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干部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和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要注意的倒是如何满足群众的要求，如何把工作做好的问题。”^①

他说话当中感到很紧张，也很激动，虽然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但发言之后还是发现自己手上都出了汗。

不过，毛泽东对欧阳山尊的发言频频点头微笑，显然感到很满意。

四 长篇大论被“轰”下台

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

他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

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早就应该整了，而且还要整得厉害一点，但这样整风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怀疑。此前，他在与毛泽东的频繁交往过程中，毛泽东曾经动员过他申请入党，但他拒绝了，他表示自己个性

^① 欧阳山尊：《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见《落叶集》，北京：红旗出版社 1995 年 1 月版，第 598—599 页。

太强,与贵党的组织纪律性难于相容,还是在党外自在些。

对于这种具有挑衅性的话,还是胡乔木针锋相对。因为有过上次的交锋,并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他这次更侃侃而谈:“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①

接着胡乔木这么一说,曾经留学苏联,在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长征到陕北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编辑部主任,这时在中宣部工作的吴亮平也站起来,驳斥萧军的观点。他讲的时间长一点,赞同萧军观点的人就打断他的发言:“你不要在那里讲课了,这里不是课堂!”

这次讨论会开得非常活跃,笑声、掌声、争吵声不断。

有人提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认为人性是文艺的永恒主题;有人说还是杂文时代,需要鲁迅笔法;有人提出文艺和政治都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彼此殊途同归;有人说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老是觉得影响创作情绪……

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在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也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因此,他主张普及与提高来个分工,像文工团、演出队,去做普及工作;像鲁艺这样的学府,能不能主要去做提高的工作呢?^②

此前,1940年元旦前后,毛泽东数次约见张庚,提议延安也应当上演一些国统区作家的作品,比如曹禺的《日出》就可以上演,并要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把戏演好。^③这样,延安戏剧舞台上才出现中外古今的“大戏”,鲁艺教学体制步入正轨,由原来的6个月改制为3

^① 温济泽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冯惠、刘益涛采访记录,1988年8月25日,北京。

^② 参见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7页。

^③ 张庚:《〈延安十年戏剧图集〉序言》,见钟敬之编:《延安十年戏剧图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页。



1938年4月，毛泽东题写的“鲁迅艺术学院”校名

年，系科在原来的戏剧、音乐、美术基础上，增设文学系。毛泽东为该校废除旧题校名“鲁迅艺术学院”，重新题写校名“鲁迅艺术文学院”。现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又指责这是“洋教条”、“关门提高”，张庚心里不能理解，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位被“轰”下去的发言人，是欧阳山。

他当时的工作单位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看到大家争吵得不可开交，觉得自己有责任阐述到底什么是文学艺术，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等等，应当正本清源，讲讲清楚，避免不必要的无谓争吵，有效的讨论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大家站在一个认识平台上进行交流。

于是，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就拉开了阵势道：“写什么，怎么写，首先要明确文学艺术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接着，他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讲起，谈到文学现实主义、阶级性、形象性、典型性等一系列问题。

开始人们还静静地听着，慢慢地会场上就出现了切切私语。大约占了近一个小时后，就有人高声喊道：“主席，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他大概是怕我们中央的同志不了解文学概论，来上课的。”^①

这么一叫，会场上顿然就揭开了锅，欧阳山也就中止了发言。

第二次会议开了一整天，大家的意见不管是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讲完之后，也没有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是做到了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自己来讨论解决，不带任何强逼的性质，发扬艺术民主，大家心情特别舒畅。即使被“轰”下去，也没有怨言。

^① 高杰：《流动的火焰——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始末》，《传记文学》（北京）1997年第5期。

五 “投降”“缴械”成主流

第二次会议上，周扬有个发言，明确维护毛泽东的观点。而吴奚如的发言，却受到朱德的点名批评。

吴奚如认为，搞文学的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他刚从“皖南事变”的流血冲突中，历经艰险，突围逃难，回到延安，现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稍后，他发表在1942年7月19—20日《解放日报》上的纪实小说《未了的旅程》，真实地记述了他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血战到底，冒险突围，从皖南经重庆到延安的艰难旅程。小说的字里行间表露了他的上述观点。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曾经是叶挺独立团成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1930年代他在上海“左联”工作，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一度负责代表中共党组织与鲁迅联络。1936年秋受命到西安，在张学良部队从事特科活动。“西安事变”后，他到延安担任“抗大”一期教员。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和丁玲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他又受命到武汉出任周恩来秘书，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不久，他被调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再到新四军总部。

吴奚如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马上引起朱德的严厉批评。

参加会议的朱德一直坐主席台上旁听，吴奚如发言后，他站起来讲话，没有批评萧军，而是点着吴奚如的名字说：“吴奚如，你是人民军

鲁迅
艺术学院

1940年8月，
毛泽东重新
题写的“鲁迅
艺术学院”
校名



丁玲(左一)与西北战地服务团部分成员在山西

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意思是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此一时彼一时。“西安事变”后,我们讲一切有利于抗日;现在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们不能再笼统地讲抗日统一战线,应当明确是什么人领导下的抗日,也就是说站在什么立场上的抗日。

朱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当时没有捉小辫子,吴奚如也没有反驳,也没有回话。可是,整风运动中,继中央研究院批斗出“托派”王实味后,接着就在中央党校批斗出“特务”吴奚如,证据就是白纸黑字印在报纸上的小说。从此,开始了在思想上发现敌人,在文学作品里发现特务,用政治眼光审查文学,用政治手段解决文学问题。

第三次会议期间,朱德还有一个讲话。他不点名地批评萧军的发言说: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还说他自己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以我看,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有工农兵群众批准。

关于思想转变问题,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一

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①

针对歌颂与暴露的争论,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平时和蔼可亲的朱德,这次发言却颇有些疾言厉色。发言的最后,他还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②

这是用通俗的大白话,一语道破了文艺界整风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根本转变。其直接的影响,一则文艺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走向工农兵大众;一则文艺家们思想转变,对知识分子进行洗心革面的人生改造。

六 毛泽东口头答卷

5月23日第三次会议,也是下午开始的。事先都知道毛泽东要做结论讲话,所以,这天下午会场上就爆满。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议时,与会代表合影 (吴印咸 摄影)

① 参见何其芳:《朱总司令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1月30日。

② 参见何其芳:《毛泽东之歌》,见《何其芳全集》第7卷,同前引第430页。

徐特立来晚了,没有座位,大家都让座给这位延安“五老”之一,可是他却坚辞不受,自己转到靠墙边的窗户,伸手一撑,身体跃起,很轻巧地坐到窗台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再摸出一截寸长的铅笔头,用舌头舔一舔铅笔尖,认真听讲记录。

整个下午继续发言讨论,罗烽赞成萧军观点,郑景康提出党对文艺工作还是不够重视。下午发言讨论到朱德为止,吴印咸招呼大家到礼堂外边合影留念。前边一排小马扎,后边放着几排长条板凳,中间再站上一排,一百余人的合影照就这么随便站,随便坐。没有领导群众之分,谁愿意坐前排中央位置都可以。在前排当中紧挨毛泽东右边的是鲁艺文工团演员田方,他当时回家对妻子于蓝讲:“闭幕前宣布毛主席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但是,很多同志都那么谦虚,不好意思靠近毛主席去坐。我不怕,我就要坐在毛主席身旁!”^①

118



这次会议气氛一直很活跃。合影照时,坐在前排左二位置的刘白羽,大个子,身量重,一下子将小马扎坐塌了,引起大家哄然大笑。站在一旁的郑景康用自己的私人照相机抢拍下这个精彩的瞬间 (郑景康 摄影)

^① 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1页。

但毛泽东还是特别关心着丁玲。他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旁边,才放心地坐下,开玩笑地说:“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①

现在的标准合影照片中,前排左起第二人的刘白羽,大个子,身量重,不小心一下子就把小马扎给压塌了,仰面朝天,引得大家一阵哄笑,眼光都转向他。自己带相机站在一旁的郑景康,按下快门,抢拍下这个场面,留下座谈会合影照的另外一个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合影的104人并不一定就是会议全部代表。会议正式代表名单,是毛泽东委托李伯钊、周扬一起拟订的,经中央同意后,发出正式请柬。这些代表基本上都是参加革命,并且当时就已经比较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但代表名单上的人没有都参加,一种情况是从前线赶回延安,路途上耽误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收到请柬,但拒绝参加,比如高长虹,他认为自己到延安是要放弃文学,研究经济的。还有,名单上没有的人,自己跑去旁听了,正赶上第三次会议照相,就留下了身影,像方纪、郭小川就是。

会议先后分三次召开,有的人参加了前边的两次会,第三次会没有参加,合影时就没有,像吴亮平、吴奚如就是。

黄钢作为《解放日报》记者,参加了三次会议的全过程,并作了详细记录。

合影过后,大家吃晚饭,天气已经晚了。毛泽东作“结论”讲话,是在晚饭后,考虑到人太多,临时将会议安排在小礼堂外边的空地上开。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棍架成一个三角形的木架子,木架上悬挂着早已准备好的煤气灯。银白色的灯光,把会议室外面的广场照得一片通明。然后,毛泽东作结论报告。

据参加会议的姚时晓回忆,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还坐在自己窑洞前的石桌旁对讲话提纲作删改。

另据参加会议的罗工柳回忆,他个子小,当时就席地坐在临时放置的小讲桌旁边,听到毛泽东拿出提纲讲稿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哎呀,这个文章难做啊。”

^① 转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34页。

作“结论”报告的时候,会场静悄悄的,一百多人似乎都在屏息倾听。毛泽东依然用他那柔绵细长的湖南腔抑扬顿挫地说:

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①

这段话也没有写入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从中透露了召开这次座谈会,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偶然行为,而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会议期间,有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一是在第一次会议之前,即4月10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这个座谈会,拟



担任中央文献速记工作的中央秘书处速记组成员

^① 于学伟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记录,2002年4月23日,北京垂杨柳。另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同前引第364页。

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后来,因为博古忙于其他工作,未能参加座谈会筹备事宜,所以座谈会是以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召开的。请柬上也就署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二是在第二次会议与第三次会议之间,即5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文艺座谈会的结论报告作了汇报。会议同意毛泽东对于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偏向问题、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等意见。

此外,座谈会期间,博古组织《解放日报》特设“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分别在5月14日、15日、20日分三次刊出,选译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列宁《论文学》等经典文章,配合座谈会的召开,也为会议代表的讨论学习提供理论材料。

发表这一组文章的意义,就是要参照苏联的经验,将文学艺术当作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文艺界整风运动,使之成为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文本,是由胡乔木根据自己的会议笔记,并参照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四位会场速记员轮班记录稿^①,整理而成,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审阅。距离座谈会结束一年多以后,1943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首次刊发经过整理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文本

^① 据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速记组成员,延安文艺座谈会四位速记员之一,后任中共清华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周昆玉介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事先没有写出讲话稿,手头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依据这份‘提纲’,他自由、生动而又深刻地阐述了革命文艺运动的根本方向及有关具体问题。会议设了一个速记组,详细地记下了毛泽东的讲话全文和每个人的发言。”见孙国林:《寻访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速记员》,《中华读书报》(北京)2002年5月15日。

年10月19日,即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同时,采用“通改报版”的办法,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32开本的铅印单行本。

次日,延安整风运动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就发出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

同年11月7日,中宣部做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示“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并强调,《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其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

随之各解放区、国统区和香港等地共翻印出版有85种版本。1953年4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作了266处修改,其中删掉原文92处,增补文字91处,文字修饰的83处。



秧歌是这样开发的

秧歌,是20世纪中叶中国革命红色文化、行为艺术的时尚标志。

扭秧歌,是永远令人神往的。跻身革命群众的歌舞乱阵,和着震天动地的锣鼓节拍,不断有节奏地扭动着个体身躯,气喘咻咻,浑身发热,彼此召唤,相互感染,一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亢奋的革命集体情绪就在队伍里被迅速激发起来,热血沸腾,宠辱皆忘,如痴如醉,如癫如狂。这是延安后期中国革命的歌舞,是以延安“鲁艺”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意识形态,对民间传统秧歌舞的现代化开采开发,而创造出的中国现代革命红色文化。

—

1943年2月4日,农历腊月三十,从下午到晚上,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各界军民两万多人聚会,庆祝中美、中英订立新约,废除近代以来对华不平等条约。相互拉歌,领导讲话,群众欢呼后,锣鼓队、秧歌队、宣传队等近百个文艺团体,竞相表演,气氛热烈,广场上到处洋溢着一派火热的革命喜悦气氛。在人声鼎沸的歌舞海洋里,鲁迅艺术文学院派出150人组成的“鲁艺宣传队”特别出众。他们阵容强大,乐器齐备,节目也特别出彩。尤其是他们组织秧歌队,“踢场子”、“推小车”、“跑旱船”、“挑花篮”,等等,还演出新编秧歌小剧《拥军花鼓》,让人耳目为之一新。

王大化手拿一面小锣,白眼圈,白鼻子,白脸蛋,头上扎着许多朝天的小辫子,腰系一根红布条,脚穿一双带彩球的鞋子,整个一副小丑扮相。李波穿一身红花袄裤,背一只小鼓,女扮陕北村姑形象,用真声



整风运动后,鲁艺宣传队以其新秧歌在延安大出风头

本腔的民族唱法演唱。这样土的扮相和唱腔,在鲁艺都是第一次。^①他们且歌且舞,一唱众和,在群众中却大受欢迎。

124

正月里来是新春, / 赶上猪羊出(哇)了门。 / 猪哇、羊啊,
送到哪里去? / 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 / 哎哩美翠花, 黑
不溜溜儿花, / 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

当他们唱到“哎哩美翠花,黑不溜溜儿花”的时候,秧歌队全体队员一齐非常热情地大声接唱叠句,为之帮腔,观众更是大笑不止,前仰后合,掌声雷起。开始,他们都以为演员表演精彩,观众爆发笑声掌声。但后来发现不对,观众笑得有蹊跷?几场演出都是在这接唱叠句处引发全场骚动,散场后他们请教当地群众为什么,群众又都笑而不答,这就更奇怪了?后来,他们找到民间秧歌老把式,得到的回答是:“那是一句儿[恶]话(即不好听的话),是说男女下身部分……”这才恍然大悟,他们后来将此处唱词改为:“哎哩美翠花,海哩海棠花。”^②

^① 参见李波:《往事的追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总第12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81—82页。

^② 刘炽:《“鲁艺家”的秧歌》,见《延安鲁艺回忆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28页。

这是延安革命秧歌当初起步阶段一次小小的失误,是由于对民间话语的失察而导致艺术上的误会,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还没有将秧歌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完全占领而留下的一点纰漏。

二

艺术形式也是美的要素,它积淀着历史的意味。

秧歌的历史,在陕北,在农业社会的中国乡村,源远流长,普遍存在。其本名为“阳歌”,是“阳间”人世唱给“阴间”鬼神世界的原始祭祀歌舞。它起源于一种原始巫术,通过法术百兽率舞,以祀神驱鬼,祛除邪恶;并四处游走,挨家挨户祈祥纳福,保佑平安。^①“陕北秧歌自古以来就是一项祀神的民俗活动,传统秧歌队多属神会组织。……过去每年闹秧歌前,先要在神会会长(主持或会首)率领下进行‘谒庙’,祈求神灵保佑,消灾免难,岁岁太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保存着鲜明的祭祀特色和傩仪遗风。”并且,在陕北,“过去有不少人自幼就参加秧歌活动,目的就为报答神恩,进行还愿,表示对神的虔诚。”^②这种传统秧歌一般从正月初二“坤日”或初七“人日”开始,先以“敬神秧歌”谒庙,庄严肃穆,虔诚之致;再以“排门秧歌”挨家挨户去拜年,继之以“彩门秧歌”,各村交流互访;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达到高潮,直闹到灯火阑珊,东方既白,才告结束。这种秧歌,娱神亦娱人,乐神更乐人,在偏僻遥远的陕北乡村,是一年中最大的节庆,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

125

中国革命从江西苏区开始,就非常注意开展群众性宣传活动,扩大革命影响。受苏联革命文化影响,革命歌咏、活报剧、红色舞蹈以及街头诗等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城市知识分子深入内地农村和抗日前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他们主张搜集利用中国民间音乐资源,旧瓶装新酒,用旧曲调谱写新唱词,借以教育民众,鼓舞士气,但对秧歌舞却并没有引起重视。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

^① 参见柯琳:《傩文化刍议》,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7—8页。

^②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陕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5年12月版,第49、51页。

陕北,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原来的“工农剧社”更名为“人民抗日剧社”,继有中央机关戏剧爱好者组成“平凡剧社”、抗大学员组成“战号剧社”、延安青年学生组织“青年剧社”,以及边区的“锄头剧团”、“陕甘剧团”等出现,并陆续接受从上海、武汉、西安、重庆等大城市远道而来的演剧队、战地服务团等,共同形成延安热闹的戏剧演唱和抗日宣传局面。他们多采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现代话剧、歌舞、活报和民间曲艺、杂技、魔术等艺术形式,进行宣传娱乐活动,偶尔也有秧歌,但始终是舞台上的表演,还没有形成后来群众运动意义上的开发利用。

也许,秧歌是岁时节庆之物,战争连年,动荡不安,民间没有节庆的情绪,革命队伍也还没有感觉到需要用秧歌来表达特别喜庆的意念。这样,最早是在1940年春耕期间,“反汪、冬学各种运动,以及收复温塘和欢迎一、五团子弟兵胜利归来,百团大战的伟大的庆祝中和反妥协投降及双十纲领的政治斗争的浪潮里”^①,才开始了延安秧歌有组织的民间革命扭动。

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3月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日报》上展开过一次关于秧歌舞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新秧歌鲜明的革命特征就被敏感的文艺工作者关注着。从延安鲁艺到华北联合大学任教的丁里撰文说:“一般的秧歌,多在冬春的农闲季节,而作为劳动之余的戏乐;但在边区的扭秧歌,除了娱乐之外,已成为参与政治斗争、社会活动的利器,在群众文艺运动中尤其起着极大的作用的。”它具有集体活动的广大群众性,可以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如果再加以自觉的实践改造,应当具有灿烂的前途。但作者是从知识分子的艺术实践与欣赏角度,最终将秧歌定格在舞蹈艺术的框子里,认为“秧歌舞之发展的前途是向‘舞’的发展的”^②,这又自我限定了革命意识形态对秧歌的全方位开发。

要到1942年,鲁艺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正经历着脱胎换骨的生死抉择和人生改造,他们彻底否定并委弃了几代新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和艺术精神,砸碎并扬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开创的西洋话剧

^① 丁里:《秧歌舞简论》,《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9月23—24日。

^② 同上。

艺术传统,选择秧歌这种本土的艺术形式,带着探索冒险、奋不顾身、拼死一搏的精神心理,进行革命行为艺术尝试,希望以此获得在革命队伍里的新生。如此生命的投入,才有了延安秧歌的辉煌。

所以,秧歌的改变,首先是对人的改变。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的当天,时任鲁艺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的周扬,就召集院务扩大会议,作整风动员报告。两天后,又召开全院整风动员大会,并随即成立由周扬、宋侃夫(时任鲁艺党总支书记兼政治处主任)等36人组成的鲁艺整顿三风总检查工作委员会,下设秘书、研究、材料、墙报四个小组和一个办公室,周扬出任办公室主任,全面组织领导鲁艺的整风审干抢救运动。这个建立在平时最高权力基础上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对最高领导以下每个人进行抽查日记、抄家、审讯、监察、处治,掌握着最高领导以下每个人的浮沉生死。



1943年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鲁艺学员在延河边开荒种地 (徐肖冰 摄影)

从此,鲁艺停止了一切正常的学校艺术教学活动,全院师生员工停课学文件,停课闹革命,停课抓生产。刚开始计划停课9个星期,集中学习22个整风文件,检查讨论鲁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①其中学风学习讨论3个星期,党风学习讨论2个星期,文风学习讨论3个星期,总结研究1个星期。可是,随着运动的步步深入,整风,审干,抢救,大生产,停课时间持续达3年之久,一直到1945年春季才恢复正常课程教学。据1942年春季入学的美术系学员赵泮滨回忆:“谁知整风时间由原规定的三个月又无限延长了,学习文件又增多了,毛泽东同志又亲自召开了文艺座谈会,由一般到具体,由远及近,把文艺界翻了个底朝天。”“整风生产,三年时间过去了,画室总是空闲着。磨起老茧的手很久不摸画笔了。但是,延安文艺界,三年内发生了根本变化,空前活跃起来,作家艺术家纷纷打起背包,下农村,去部队,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暂时不下去的,也活跃在街头,办墙报,出画刊,尤其是闹秧歌,更为深入人心。”^②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政治运动。

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鲁艺共有49人参加,占会议代表的近半数之多。^③会议期间,5月13日,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所属戏剧委员会,组织在延安的各剧团负责人、戏作者、名导演、重要演员、戏评家和剧运工作者40余人,在大砭沟文化俱乐部的凉亭上,就当前戏剧发展方向问题进行连续8个小时的激烈争辩。5月19日,《解放日报》公开报道这次戏剧界讨论。^④这对专门从事艺术教育的鲁艺来说,无疑是个严重的挑战。

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结束一个星期,5月30日,毛泽东又亲自来到鲁艺,在学校篮球场上对全体师生作指示:“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

^① 《鲁艺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党外艺术家欣然参加》,《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4月22日。

^② 赵泮滨:《整风随想》,见《延安岁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398、400页。

^③ 参见鲁艺史料征集组集体讨论,高维进整理《延安鲁艺1938—1945年简要纪事》,《新文化史料》(北京)1988年第2期。

^④ 唯木:《当前的剧运方向和戏剧界的团结》,《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5月19日。

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屁股坐到工农兵这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①

“这里很不平静。”^②

围绕着“教育总方针有无错误? 所学与所用是否脱节?”这样一个中心问题,整顿学风阶段,鲁艺全体师生员工都被动员起来。“周扬同志在一次大会上号召为鼓励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发表,不妨组织各种‘派别’展开争论。”于是,就有了“激进派”、“温和派”和“保守派”,彼此之间针锋相对,唾可铄金。“鲁艺全校员生的生活日程就已卷入在这激烈的辩论里面,从清晨到夜晚,饭厅里和树阴下,散步的时候,连星期天也不例外。……各个讨论会就好似大雨滂沱一般,尖锐和大胆的意见,无时不是满溢和泛滥着。”^③“中立是不可能的,没有中立,就如同鲁艺教育方针的悬空是不可能、提高是不可能悬空一样。”^④讨论的结果是每一个参加学习讨论的师生员工都必须接受政治考试,试题为:

你参加这次大讨论会以前,对中心问题的认识如何? 在听了争论以后,有无改变? 改变在什么地方? ……

这是必答题,此外还要从下列三题中任选一题:

(一)为完成某一政治任务,需要你参加一种艺术活动,而这创作,你根据你的生活经验和创作作风感觉不合适,这时你采取什么态度? 假如不做,你觉得有什么理由来拒绝? 假如做,怎么做法? 如何做好?

(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

① 转引自钟敬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概貌侧记》,《新文学史料》(北京)1982年第2期。
② 黄钢:《平静早已过去了!——鲁艺论辩特写》,《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8月4日。
③ 《鲁艺全院展开热烈辩论》,《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8月4日。
④ 黄钢:《平静早已过去了!——鲁艺论辩特写》,《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8月4日。

的”，这句话如何了解？并以亲身经历的例子来具体说明之。

(三)研究文件,你读书方法有何改变?试以新的观点去分析一篇你最近所看到的论文或作品。(以在延安发表、演出、展览者为限。)^①

然后,由周扬代表组织在全院整顿学风学习总结大会上,作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总结报告,并择要公开发表在9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②他承认鲁艺教育中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关门提高”,彻底否定了鲁艺正规的艺术教育体制,进而痛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艺术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

与此同时,周扬带领鲁艺部分整风骨干到中央研究院参加批判王实味的斗争,将学术论争转化为政治斗争。回到鲁艺后,马上就开始了“从思想上发现敌人”,并从反对自由主义着手,组织开展反奸斗争。斗争方法是“选择典型”,“教育群众”,即各单位领导发动,积极分子带头,群众检举揭发出自由主义比较严重者,进行抢救斗争。“过去我们有个糊涂观念,把特务及特务活动看得简单神秘。认为打冷枪,偷文件才是特务。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敌人会钻到文艺界中来,以文艺思想为武器来瓦解我们党。王实味那样的事件发生后,我们知道了,我们便接受了这一经验,认识到像王实味反动性的文章在鲁艺文艺知识分子中,亦是严重的[地]存在着。”^③结果就查出了文学部的晋驼、方杰、公木等人,利用在《部队文艺》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散文、诗歌进行特嫌活动,通过组织群众检举揭发,并进而认定“晋驼是叛徒,并有特务嫌疑,方杰是复兴社,并作了特务结论”。其中公木的诗歌《崩溃》,在描写黑暗王国的群魔之王时,写到魔王头上装饰着几颗金星。有人就质问:这金星是指红星,是明目张胆地攻击党、攻击革命。

越批问题越大,越批问题越严重,很快就整出以晋驼为“第一面大旗”,方杰为“第二面大旗”,公木为“第三面大旗”,《部队文艺》为阵

^① 《鲁艺全院展开热烈辩论》,《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8月4日。

^② 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9月9日。此文收入《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时,有改动。

^③ 《延安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1945年10月),陕西省档案馆藏。

地，“鹰社”为堡垒的“特务集团”组织。

《部队文艺》原是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一个综合文艺刊物，创办于1941年12月，共出3期，至次年4月终刊。文艺研究室主任公木任主编，晋驼、朱子奇、方杰等担任编辑。“鹰社”也是军直文研室下属的一个文艺团体，成员约二三十人，其中有部队的，也有地方机关的，都是些文学爱好者。这时，杂志和组织的主要成员都被集中到鲁艺，参加整风运动。没有问题是不来参加运动的，参加运动就是有问题的。这些人几乎都成了怀疑对象，接受鲁艺革命群众的批斗。



鲁艺美术系部分教员

这样的批斗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目的是要在迅速取得并大力推广典型经验，让每一个人都洗心革面，重塑人生。

于是，在党风学习阶段，鲁艺要求每个人都填写“小广播表”，交代社会关系、个人思想历史等。然后，由总检工委抽调专人研究查看，并有重点地研究各部门提供的“平时自由主义比较严重的同志”的文章、日记、学习笔记和平时言行。文学系的章焯、毛勇等人；美术系的石泊夫、东方等人；戏剧系的迪之、田民等人；音乐系的肖松、杜矢甲等人；院部机关的朱棠、蔡光华等人，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凡是发现文字中有可怀疑的地方，便立即展开审讯、逼供、检举、揭发、抄家、突击规

劝，“劝不下，斗；斗不坦白，关”。以此，清除革命队伍里的“半条心”和“两条心”。

据1945年10月一份油印的《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材料介绍：“逼、骂、打、捆这四种方法和延安各机关恐怕差不多……鲁艺比较特殊的是禁闭室和‘工农合’。”这个“禁闭室直接归当时的校部领导”，就设在院部办公室旁边。“禁闭室某些时候可以说是相当黑暗的，经常打人、吊人，画着圈圈叫犯人站在中间，不反省就不能出这个圈圈。如有一位有孩子的母亲名叫张元芳，她与孕妇林白都被关了禁闭^①，有几次饭不给她们吃，两三天没有给她们水喝，棉衣早发下了，但是某些单位压着不送给她们。”^②

这时，受张闻天、博古特别关照，由周扬亲自安排住在桥儿沟鲁艺东山窑洞里的高长虹，“他的窑洞是最高的一排，他‘站得高，看得远’，居高临下，山下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一批批干部被抓走，一声声惨不忍闻的哭叫从各单位传来……他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③这是极个别受到特别保护的对象，近似于逍遥派，尚且受到精神刺激，处于运动激流当中的人们的处境和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鲁艺文学系第五届学员李纳被“规劝小组”传讯：“你相信不相信组织？”

“相信。”

“你既然相信组织，那么组织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

时隔半个多世纪，当她回忆起此情此景，仍然心有余悸。她说：“我真如五雷轰顶，接受不了，真想跳崖算了。”^④

石泊夫被打成“特务”关押起来后，他的妻子高洛英极度惶惑，精

^① 林白，鲁艺戏剧系第三届学员，1939年1月入学，留至第四届、第五届，晚年从长春电影制片厂离休。见《延安大学校友录》上册，延安大学编印，1988年8月，第112、116、117页。

^②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1945年10月），陕西省档案馆藏。这里的“单位”是指鲁艺的部门。鲁艺管理体制自1941年4月由原来的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系改为部，学制也由原来的6个月改为3年。

^③ 言行：《一生落寂，一生辉煌——高长虹评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434页。又见华君武：《回忆周扬几件事》，见王蒙等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86页。

^④ 李纳1993年9月9日接受李辉采访记录，见李辉编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39页。

神近于崩溃。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她自己也坦白曾经被捕叛党,并企图谋杀周扬。当天夜里,她回到自己的窑洞里,将门窗堵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在窑洞里点起火,她和三个孩子都活活地在浓烟中窒息而死。

第二天,学校在大操场上召开大会,“周扬宣布了这件事,他没说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只说她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把孩子都拉起[去]和自己一同去死,可见她对党的仇恨有多大。”^①

继此之后,鲁艺又有两个学员先后投延河自杀。

还有一些自杀未成者。戏剧系教师杜矢甲,跳进一口枯井,被发现救了上来,继续批斗。胡征也是自杀未成,再受批斗。美术系教师陈铁耕拒不承认,遭到残酷斗争,落下终身疾病。文学系第五届学员中,一位女同学的丈夫被抓,家被抄,自己又被扭送保安处,精神崩溃,神经错乱就疯了。

当时鲁艺在校师生员工大约 300 余人,其中被打成“特务”的有 267 人,90% 的人都受到审查。被审查出的“特务组织”有:“二战区系统、民艺系统、五战区系统、四川‘红旗党’系统、文化特务系统,每个系统都是在 10 人以上。”后来经过历时 22 个月的“甄别”,至 1945 年 10 月的结论是:“被甄别的 208 人中,其中属于政治问题的占 58%,党内问题的占 8.2%,无问题的占 19.4%,完全搞错的只有 19.4%,完全搞对的 14.7%,部分对部分错的占 65.9%。”^②

对于这些被审查出来的“特务”或“特嫌分子”,拒不坦白者大多数被送进边区保安处关进“黑窑”或中央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临时看守所,主动坦白或经“规劝”“抢救”而坦白者,大多数被安排调进“工农合”,即鲁艺工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鲁艺审干总结报告中称,“有些同志在讨论康生同志的报告时很愤慨,说这里是劳动营、集中营,和国民党一样。当然这种话是过火的,但是‘工农合’在客观上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不可否认,‘工农合’在鲁艺生产任务的完成上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对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锻炼亦有某些作

^① 李辉编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同前引第 140 页。

^②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1945 年 10 月),陕西省档案馆藏。

用。”^①很显然,这种“工农合”正是20余年后各级各类“五七干校”的前身。

问题更复杂的是,在政治挂帅、价值取向渐趋绝对一元化的社会环境里,鲁艺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无论是规劝者或坦白者,审查者或被审查者,抢救者或被抢救者,几乎没有人对这场运动产生怀疑——至少就目前所见到的史料看是这样。所以,他们都积极主动报名要求参加“工农合”,因为只有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磨炼人的地方去,甚至到最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去,才足以证明自己纯洁的革命性。还在整风运动初期,戏剧系一位老师就说,他通过学习讨论认识到,“已往对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和责任了解的[得]不够”,现在,“他恨不得有时把自己拆散,然后再根据文件把自己重新建造起来。”^②这样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精神心态,就出现了普遍的自虐狂现象。肉体的自虐是主动去吃苦去受难,精神的自虐是彻底否决自己过去一切的价值体系和生命意义,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去创造曾经为自己看不起的东西。前者表现为踊跃报名去“工农合”,后者表现为抹上白脸演小丑,扭秧歌。



早期秧歌中的小白脸

①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1945年10月),陕西省档案馆存。

② 黄钢:《平静早已过去了!——鲁艺论辩特写》,《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8月4日。

所以,延安秧歌是在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态下,作为政治道德审美价值绝对一元化社会环境里,展示自己的革命真诚,表白个人的政治态度,而被迅速开发的。

四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1938年4月10日,缘起于同年1月28日延安文艺界为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公演《广州暴动》、《血祭上海》等话剧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提议这伙人别散了,要以他们为基础创办艺术学院。鲁艺成立之初,原拟请蒋介石出任院长,希望以此获得国民政府的教育经济援助,未果,院长一职始终空缺,由副院长沙可夫主持工作。1939年11月,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鲁艺抽调部分师生由沙可夫带队到晋察冀边区创办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中共中央任命吴玉章担任鲁艺院长,周扬任副院长主持工作。第一、二届学员学制6个月,第三届学员学制4个月,学期之间没有寒暑假。

据长期担任鲁艺戏剧系主任的张庚介绍,1938—1939年间,延安只上演抗战题材的戏,而且几乎都是在延安的作者创作的。1940年元旦,由鲁艺和抗大部分演员以“工余剧人协会”名义,排演曹禺话剧《日出》,连演八天,大获好评。“我记得上演这个戏是毛泽东同志提议的。他说,延安也应当上演一点国统区名作家的作品,《日出》就可以演。他还亲自把我找去,说:这个戏应当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为了把戏演好,应当组织一个临时党支部,参加的党员都要在这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以保证把戏演好。”^①从此以后,延安戏剧舞台变得丰富多彩,中外知名作家的剧本都有上演。鲁艺教学日趋正规完善,在原有的戏剧、音乐、美术专业基础上,增设文学专业,毛泽东重新题写校名“鲁迅艺术文学院”。第四届学员学制更改为3年。

而所有这些,在整风运动中,又被当作“关门提高”、“洋教条”来

^① 张庚:《〈延安十年戏剧图集〉序言》,见钟敬之编:《延安十年戏剧图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页。

批判。

唯一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是政治。当初提倡演出中外名剧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你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吗,我共产党就是要敞开胸怀,来个艺术上的古今中外,向天下人表明公道;现在批判“关门提高”也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国共合作已经岌岌可危,陕甘宁边区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完全被堵死,整风运动就是要彻底统一党内认识,延安戏剧舞台不能再让钦差大臣、马门教授们长期占领了。



1942年元旦,鲁艺实验剧团演出苏联话剧《带枪的人》剧照,干学伟饰列宁,田方饰雪特琳,以其逼真的造型在延安轰动一时

1942年7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开过,鲁艺组织学风学习大讨论的同时,为纪念抗战五周年,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周扬就抽调部分政治上比较可靠的师生开赴茶坊镇兵工厂开展“七月宣传”活动,为工人和附近农民巡回演出。“这次演出的节目全是和我国抗战没有多大关系,和陕北的农村生活也毫无关联的西洋音乐和外国话剧。由于生活习惯、语言、动作以及生活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是当时当地群众所不熟悉、不了解的,所以一点儿也没有得到群众的欢迎。”“去时热热闹闹,归时冷冷清清。”^①没有群众反响和政治影响的文艺演出,使得准

^① 于蓝:《难忘的课程——〈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有感》,见戴淑娟编:《文艺启示录》,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58页。

备走群众道路的鲁艺师生们反省,更让周扬沉思,群众为什么不欢迎我们的演出呢?我们的演出怎么才能获得工农兵群众的喜爱和领导同志的称赞呢?

这时延安文艺界都纷纷筹备开展通俗文艺活动。9月10日,延安文化俱乐部在文化沟(即大砭沟)口树起“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座巨型墙报。《解放日报》为此发表通讯,称其为“面向群众,面向工农兵”的“延安文艺工作的新步调”。^①9月13日,延安剧作者协会干事会在文化俱乐部展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发动会员创作出具有战斗生活、适合工农兵观众的新剧本。

不久,延安传来美英两国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大好消息,《解放日报》连续数日在报眼位置刊登准备欢庆的通知。还有,元旦来临,春节将至,这都是戏剧表演的大好时机,鲁艺必须抓住这些机遇,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

鉴于“七月宣传”的教训,周扬要求这次的演出“不但要让老百姓懂得所宣传的内容,而且还要让他们爱看”。担当演出任务的戏剧系主任张庚觉得:“这真是个难题,真叫人发愁,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因为“到底如何做,当时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好在这时时髦的就是发动群众,于是让全院师生想办法,找出一批课堂正规教学之外的小能人。“他们对民间的东西过去就比较熟悉,有的人民歌就唱得好,于是大家在一起七拼八凑,就凑出一整套节目来,有花鼓,有小车,有旱船,有挑花篮,还有大秧歌。”^②这样操练了一段时间,提心吊胆地先在鲁艺院内操场上预演一次,还挺红火热闹。

转眼间,1943年元旦就到了,鲁艺将这支新的宣传队伍拉出去到桥儿沟村演一次,让老乡们瞧瞧。没想到老乡们说,你们鲁艺“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喊妈(指西洋唱法练声),美术系不知画啥,文学系写的一满解不下”,只有这回才“一满解得下”,都能看得懂了。

接着,在2月4日下午延安南门外广场上的庆祝大会上,鲁艺宣

^① 黄钢:《街头画报·诗·小说——延安文艺活跃的新步调》,《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0月16日。

^② 张庚:《回忆〈讲话〉前后“鲁艺”的戏剧活动》,见戴淑娟编:《文艺启示录》,同前引第142页。



于蓝演出秧歌《挑花篮》

宣传队着实风光了一把。

回来后，周扬赶紧召集宣传队成员，总结成功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要求改变王大化的“傻丑角”扮相，认为这不符合新时代的边区农民形象。

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鲁艺宣传队调整增加了一些节目，尤其是突击赶排出秧歌剧《兄妹开荒》，开始连续在杨家岭、文化沟、枣园等地扭秧歌拜年表演。据说，在枣园表演时，毛泽东看过后满意地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①

有了这个最高层的肯定，各单位各部门都蜂拥而动。到农历正月十五，全延安就有27支秧歌队在上下翻滚，翩跹起舞了。

五

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间秧歌，而是被政治意识形态充分开发了革命秧歌。

政治宣传，甚至是具体的政策宣传、时事宣传，是延安革命秧歌的

^① 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419页。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版）中册第426页，有类似记载，但日期为2月5日，即农历正月初一，疑有误。

突出内容。“秧歌运动的开始,是为了宣传生产,表扬劳动英雄。那时的观念是利用这老百姓所熟悉和爱好的形式,来表现老百姓和部队对于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注意力当时是集中在内容上。”^①最初获得成功的秧歌小剧《拥军花鼓》,就是词作者安波将拥军的政治内容,配上民歌“打黄羊”的曲调,采用“凤阳花鼓”的表演形式,再加上王大化采用陕北秧歌的演员舞台扮相,和李波首用民歌真声唱法,拼凑而成。而中国民间花鼓、秧歌艺术的程式化特征,又为旧曲牌翻唱新歌词,基本舞蹈规则变化新鲜玩意儿,敞开着大门。

与秧歌有着血缘关系的花鼓灯艺术,其表演方式“既严谨而又活泼,既有规定套路又留有即兴表演的余地,可以说,只要会跳花鼓灯,就能参加到演出中来,无须事先进行排练便能达到某种默契”^②。同样是作为民间大众艺术,秧歌也具有这种近乎神奇魔方般的变幻功能。

位于延安县西川口,地处偏僻的难民工厂(即难民纺织工厂),平时文娱活动较少。整风运动后,延安秧歌已有大发展,有些到延安看过《兄妹开荒》、《赵富贵自新》的人,常常把这些故事、歌词、曲谱、表演方法,津津有味地说着,于是有人提议自己也动手演。但工人中有些会跳秧歌的人按老套路做,“欢喜把脸谱画得乱七八糟,衣服穿得奇奇怪怪,扭扭捏捏地跳着旧式的一套骚情舞步”。另有一些愿意改良的人,把秧歌掺杂一些新的内容剧情,主要是青年文化班的青工。两支队伍同时演戏,后者胜利了,因为现实的内容与观众产生了互动。

为了推进赵占魁运动,提高生产情绪,克服织单经单纬布的困难,该厂朱小乙执笔编写了很多与本厂生活和生产任务密切联系着的剧本。如:

《单经单纬》:1944年当年春天该厂决定改织单经单纬土布,但原料有困难,纱也不好,并且厂里已经分出一部分人上山开荒,要留厂的部分技术工人选纱、试纱,用坏纱织好布,觉得困难。此剧采用活报形式,表现织单经单纬布的各个制造过程中的各种困难,以及克服的方

^① 张庚:《谈秧歌运动的概况》(1946年6月),见《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488—489页。

^② 赵丽:《试论花鼓灯艺术的多元化构成》,《淮南文艺》(淮南)2001年第4期。

法,并强调由于国民党封锁边区,洋纱来源困难,边区要实现工业品自给,所以改织单经单纬布是当前首要任务。“这剧的演出,加强了工友们改织单经单纬布的决心和信心。”

《土经土纬》:全剧用快板,以棉花妈妈和她的女儿土经土纬出场,经过浆面叔叔、风车干妈、织机大哥而揭露出在生产过程中某些不良现象,如不爱惜原料、丢弃难络的纱、技术保守、浆纱不细心、老婆疙瘩多、纬子常垮、布多缺纬、窟窿等。“是一个对工人有教育意义的剧本。”

《学习袁广发》:袁是边区特等劳动英雄,难民工厂工人,现任棉织科科长。此剧即号召全体工人同志向他看齐,二流子工人也因他的事迹而感动得转变了。

这几个秧歌剧的内容,因与生产有密切联系,所以工人喜欢看,而且鼓舞了他们的劳动热忱。看完后总是大家议论纷纷,说那浆纱的就是刘文澜,可是过火了,刘文澜有缺点,但不能写得太厉害;说没有把袁科长写好,很多模范事迹都没有写上;看见里面有个二流子,便说,演的真像×××,就是那种样子。

这样的工人观众,他们所有的戏剧经验都是旧式秧歌所培植出来的。在娱乐活动机会稀少的情况下,能看到一场戏本身就是一件过瘾的事。这在形态上首先就吸引了他们。当他们看演出的时候,能从中寻找出自己生活中的影子,故而更加兴奋了。毫无疑问,他们会用生活实际来评判演出,这就有了参与,精神参与,意识形态创造。

此外,还有一个秧歌剧《娃娃病了怎么办?》,是1944年9月在砖窑湾驴马大会上演出的。当时乡间的小孩常患气管炎或百日咳,因相信巫神或乱用土方子治疗,先后致死的有几十个。由该厂工会发起,当晚调查材料,根据实在情况连夜编成剧本,赶排一天,第三天在大会上演出。老百姓都能理解,都还清楚地数说着几天来的不幸,痛斥迷信误人,许多婆姨都哭了。后来延安市市长说:这个戏还应该再演,要让每个老百姓都看到。^①

旧瓶新酒的革命秧歌在陕北农村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很快被总结

^① 陈明:《难民工厂的戏剧活动》,《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11月27日。

出革命秧歌的创作经验。“每个剧本要以它所触及的那个问题的政策为核心,通过我们的创作,向群众宣传和解释革命的政策”,“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问题(这就很自然地和政策合致了),用具体的方法(政策),解决问题(通过艺术的形式),这个过程,就是主题。”所以,“写秧歌剧,首先要熟悉当前的革命政策,要适合当时当地的具体要求,服从当时当地的政治任务。”^①作为一种红色流行文化,与现代社会其他一切流行物相似,在内容含量上必须是轻型的、软性的。革命秧歌借助政治宣传而时兴,同样,也只有符合革命政治、政策的内容,才能被写进新的秧歌剧中。

传统祭祀类秧歌唱词有:

老爷庙,盖得高,/初一、十五把香烧,/你老保佑天收了,
年年都把秧歌闹。//秧歌来到庙观中,/山神土地一声请,
山神常保山中静,/土地常佑土上人。

141

传统拜年秧歌唱词有:

进得门来抬头看,/这院地方修了个端,/背靠金山面向南,
祖祖辈辈是富汉。//秧歌今年来拜年,/敲锣打鼓扭得欢,
祝愿全家身体好,/有吃有穿又有钱。//过罢大年头一天,
蛮汉来到贵门前,/手拿杆杖镇邪恶,/人财两旺保平安。

革命秧歌唱词有:

宝塔高来延水长,/咱们边区变了样,/自力更生闹生产,
丰衣足食喜洋洋。//山川秀,天地新,/共产党是咱的救命人,
月亮明,太阳红,/边区人民过上好光景。//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三哥哥光荣把军参,/保卫咱的陕甘宁,/杀敌

^① 艾青:《论秧歌剧的创作和演出》(1946年8月),见《新文艺论集》,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年5月初版,第68—69页。此文是作者1943年参加中央党校秧歌队时所做的总结之下部分,其上部《秧歌剧的形式》,发表于《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6月28日。

立功上前线。^①

这些秧歌唱词可以任意选配秧歌曲调,段落之间可以随意搭配。比较新旧秧歌唱词,如果说传统祭祀秧歌是敬神娱神,是人对神的礼赞与祈愿,是“下情上达”;那么,革命秧歌则是革命宣传,是政治政策宣传,是“上情下达”。经过整风运动洗礼后的延安知识分子们,通过秧歌代替老百姓立言立论,那就是:谁能带领我们解决基本生存温饱问题,我们就将他请到原来只有神灵才能享有的位置上去,接受礼赞与歌颂。

可是,当政党及其领袖取代了传统秧歌中的神灵,秧歌便不允许再以“旧瓶”的形式出现了。革命宣传的组织纪律性原则,要求革命秧歌在审美形态上做彻底的改装。



完全革命化了的秧歌男角(素描)

扭革命秧歌的是革命群众,他们的扮相必须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要求,所以是积极的、革命的、快乐的、热情的、健壮的。“大秧歌应当是人民的集体舞,人民的大合唱。它必须热闹,如老百姓所喜欢的那样。它要表现集体的力量,它要在各式各样的形象和色彩当中显示出它的美妙的和谐。”这样,主题变了,人物扮相也变了。“新的秧歌取消了丑角的脸谱,除去了调情的舞姿,全场化为一群工农兵,打伞改用为镰刀斧头,创造了五角星的舞形……”传统秧歌在娱神之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农民们的自娱自乐。“在森严封建社会秩序和等级面前,丑角是唯一可以

^①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陕西卷),北京:中国 ISBN 中心 1995 年 12 月版,第 74—75 页。

自由行动,自由说话的人物,他或则嬉笑怒骂,或则旁敲侧击,他貌似糊涂,实则清醒,他的戏谑和反话常常是对于上层人物和现存秩序的一种隐讳而尖刻的批评。”^①这样的丑角在新秧歌队伍中被清除了,像王大化在《拥军花鼓》中的原丑角扮相也被改造成精神抖擞的翻身解放了的陕北青年农民形象。

在表演更成功、影响更大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中,王大化扮演其中的哥哥形象,“动作是活泼、轻松,而又充满了活力的”。他当时介绍自己的表演体会时说:

在我上场的第一段歌,我唱“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时,我就大胆地采用民间形式,踏着节奏,用身体和上秧歌的步调,用双手伸向天空,摇挥着——这个我表示了清晨太阳的红光引起了内心的欢跃,一方面表现了主人公愉快的心情;另外一方面把观众带到戏里来。这种表演我是通过了内心的想像的,也正是从内心出发而支持了我,充实了那形象的表演。……

当我唱到“山呀么山冈上,好呀么好风光,我站得高来,看得远……”我也用了一个旧的民间形式里常见的动作,以手遮眼跷起双脚向前展望,这动作是俗得很的,但当我心里想到重叠的边区的山头,山头上的庄稼,山下的流水,边区生活的畅快,这些一反映到心里便使我有了真实感,丰富了我的想像,变一个形式的东西而为带有生命的。^②

太阳是领袖,天空是光明,山上是庄稼,山下是河流,生活是幸福与欢畅……从这里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革命舞蹈艺术的程式化经典造型,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忠字舞”和“样板戏”。

曾经在秧歌剧《夫妻识字》中成功扮演刘二媳妇的孙铮,后来回忆

^①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3月21日。

^② 王大化:《从〈兄妹开荒〉的演出谈起——一个演员创作经过的片断》,《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4月26日。

她在寻找这个艺术形象的舞台造型时,当初非常伤神,为了表示自己走出课堂,面向群众,干脆坐在鲁艺门前的大路边上,观察来往赶脚的农村媳妇们,但总是不得要领。一个偶然的机,她和导演张水华到一个集镇去赶集,发现了一个理想中的青年妇女:



完全革命化了的秧歌女角(素描)

那妇女穿了一身黑布棉袄、裤。棉袄里面穿了一件玫瑰红的土毛线衣,毛衣的袖口和下摆都露在棉袄的外边,就像黑棉袄的周围镶的一圈玫瑰

色的花边;她腰间束了一根粉红色土毛线的腰带,红黑两种颜色非常调和的[地]衬出她那健壮的身材。头上梳的也是陕北妇女中非常流行的那种几乎占了半个后脑勺的发髻,十几粒像珍珠似的插针,均匀的[地]插在她那浓黑的发髻上,十分素美,一看就是陕北妇女的典型打扮,但又不一般化。更可贵的是她那一双有神的眼睛,和带有红色而透露出幸福笑容的脸庞。

按照导演的要求,孙铮一直跟踪这位媳妇到家里,与她拉家常,交朋友,用革命的眼光去理解生活里一个年轻健壮的军人家属的行为举止,然后转化成自己的舞台动作。

例如我演出时,每说到:“如果有人问我是谁呀?我就是刘二家的婆姨!”这自问自答的自我介绍,像京剧里道白似的,起初我说不好,总以为是对戏曲形式不熟悉,拼命在字句上下功夫。当那天看到军属婆姨怕我要看她给丈夫的信那副神情,以及她说“是写给娃子他爹的”那种声调中包含的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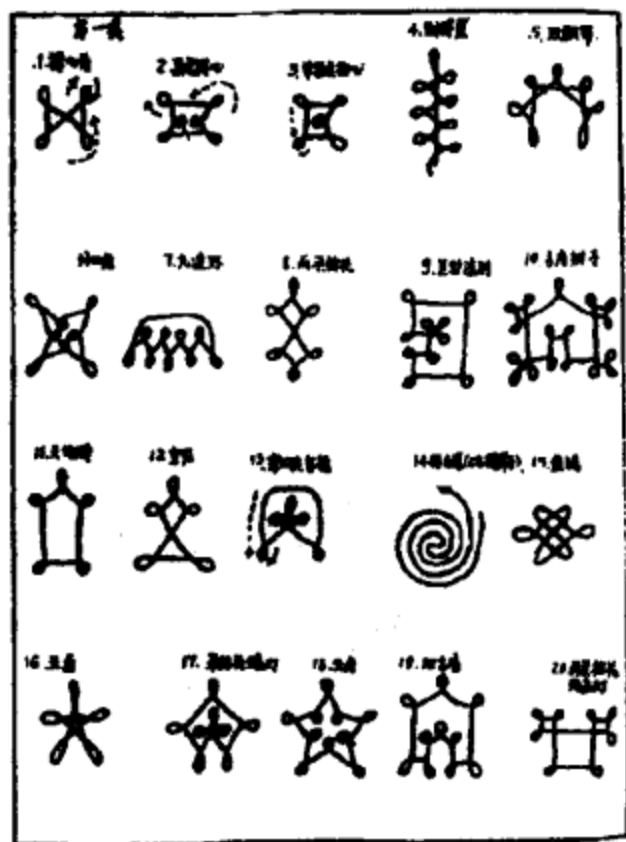
台词,不只是表现了一种妇女扭捏的常态,也充分流露了对丈夫的热爱,以及有那样值得骄傲的丈夫的自豪感。^①

这样的男女舞台形象,才是革命理想中的工农兵群众,浑身充满着预示革命即将胜利的团团喜气。

与秧歌内容、人物全面改装成功的同时,是秧歌队伍阵势的革命性变化。传统秧歌队伍角色都是男性扮演,伞头手持“灯笼伞儿”,身后跟随两个手持擗面杖(或马鞭子)的“门神”,接着是“武身子”和“文身子”若干人,最后是丑角。演出一般按照谒庙、沿门子、搭彩门、转九曲等程序进行。而革命秧歌队伍则将象征着风调雨顺的伞头、扇面、标牌全部更换成革命领袖的巨幅画像、标语或五角星,男女演员的角色形象都以当今人物为主体,多集体群舞表演,演员手里的道具都是象征革命与生产的武器、生产工具,或红绸带、红伞面等。

在具体的表演现场,革命秧歌队伍还有一个主持人,用普通话报节目,以介绍提示性话语进行串词,让每一个秧歌节目所包含的政治内容更加彰显出来。欧阳山的小说再现了当时革命秧歌队下乡演出时的情景:

乡亲们,弟兄们!你们刚才已经看到我们两个人演出的《兄妹开荒》。你们要知道,边区的老百姓用了全副力量来开荒种地,不过想吃一顿饱饭。大家想一想看,边区的老百姓想吃一顿饱饭,这有什么罪呢?开荒生产,这又有什么罪呢?



当年延安油印的秧歌舞谱(局部)

^① 孙铤:《延安“鲁艺”学习生活片断》,见戴淑娟编:《文艺启示录》,同前引第192、194页。

为什么不让老百姓吃一顿饱饭,为什么要兴师动众来边区打仗,破坏老百姓的安定、幸福的生活呢?希望大家一面看戏,一面好好地想一想这个问题。等一会儿,我们两个人还要给大家再演一个小戏,叫做《夫妻识字》。这讲的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开荒生产以外,还希望认识几个字,扫除自己头上那顶文盲的悲惨帽子。大家想一想看,为什么老百姓想学一点文化,国民党也不允许呢?也要派那么多军队到边区来,破坏老百姓的安定、幸福的生活,不让他们吃饱饭,学习一点文化,扫除文盲这顶帽子呢?下面就请大家看戏吧。^①



1943年春节,革命秧歌舞遍延安,并蔓延整个陕甘宁边区

秧歌经过这样一番从内容到形式的政治改造,革命意识形态占领了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的所有审美空间,秧歌队是宣传队,具有号召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功能。

^① 欧阳山:《圣地》,见《一代风流》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1723页。

六

作为黄土地上的红色革命流行文化,被革命意识形态成功开发了革命秧歌,还具有广泛参与性、互动性的红色行为艺术特征。舞到汹涌澎湃的革命秧歌队伍里吧,什么个人恩怨,什么忧愁烦恼,都被忘却在了气脉畅通、情绪高涨的红色艺术潮流里。

1943年春节期间,在27支延安秧歌队伍中,最红火的除了“鲁艺家”的,其次就是边区保安处秧歌队。与其他所有秧歌队不同的是,这是一支全部由整风运动中被抢救出来的“特务”、“托派”等“犯人们”组成的秧歌队。胡沙是队长,迪之、程之等人都是骨干。

胡沙离休前是北京京剧院院长,1938年16岁的他入了党。中学时在重庆加入“怒吼剧社”进行抗日宣传,随后与剧社的另外3个同学从重庆到成都,准备奔赴延安。由于当时形势紧张,成都地下党组织劝他们回重庆,以后再找机会。其他3人都回去了,胡沙没有走,留下来参加旅外演剧队,挂着刘湘的旗帜,在川西北进行抗日宣传。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成都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转移一批党员骨干。此时恰逢阎锡山在四川招收350名政工干部,成都中共地下党组织乘机招进一半共产党员。转移途中,在宝鸡经秘密征得延安方面的同意,这批人就直接被接到陕甘宁边区,进入设在安吴堡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胡沙被分配到延安的青年艺术剧院。1942年整风审干运动开始,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很快就被打成“特务”,关进军法处,一年后又转被转到保安处。1943年秧歌运动兴起后,保安处领导为了不落后,就让胡沙组织保安处秧歌队,人员调遣分配全由他负责。

于是,胡沙就认真地将其作为党交给自己的重要任务来完成,是将功折过,表白自己革命立场和革命精神的最好机会。关押在保安处的知识分子们都盼望着能被挑选上,谁有幸被挑选上,谁都卖命地严格训练,一丝不苟。所以,保安处的秧歌队一出演就名扬延安。随后,他们到处表演,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他们都是在押“犯人”。除了不能与外边的人随便交谈外,秧歌队队员也没有受到什么其他太多

的限制,所以大家扭得很认真,也都很放松,并且越是放松越是见精神。胡沙这个队长一直当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他被完全甄别平反,奔赴东北解放区。

1993年,延安大学55周年校庆。71岁高龄的胡沙应邀回访母校,在师生联欢篝火晚会上,他忘情地带着一帮老校友们进行了精彩的秧歌表演,一招一式,仍然是专业水平,那气象、那激情依稀见出当年的风采。

多才多艺的王大化,山东潍坊人,北平读书时就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参加学生运动避居济南,遇凌颂强(凌子风),一起到南京考入国立戏剧学校。抗战爆发后,他随学校迁徙到重庆,1939年11月到延安。他先在马列学院学习,业余时与陈波儿一起演出话剧《马门教授》,受到领导好评,被调到鲁艺戏剧系任教。鲁艺整风运动中,他被抢救,不得不坦白,既是“CC派”、“复兴社”特务,又是“托派分子”、“日本特务”。可是,就数他的秧歌舞跳得好,所以并没有关押。他在秧歌剧《赵富贵自新》中扮演一个被派到边区投毒的国民党特务角色,唱到:“昧着良心到井边,为了自己就把那众人来害,哎——”熟悉他的为人,知道他受了冤枉的人们,能听出他唱腔里的辛酸和隐痛。但是,最能止痛的也是秧歌,只要他还能够上舞台,他就可以在热烈的集体场面上淡化个人的情绪。遗憾的是,1946年冬,在撤离延安转赴齐齐哈尔途中,他搭乘载货卡车,把最好的位置安排给别的同志,自己挤在车后一个角落里,不幸被车子颠落下来,伤重不治,年仅27岁。^①

鲁艺秧歌队的“龙头”(即“伞头”)刘炽,也被抢救成“CC派”和“复兴社”的“双料特务”,他坦白后被奖励一碗肉丝面,感觉很好,还希望去坦白,只要再给肉丝面吃。其实,他当时年仅15岁,根本不知道“CC派”和“复兴社”是什么。

创作《拥军花鼓》的安波,同样受到抢救。

一天晚上,鲁艺篮球场上汽油灯明亮。在教务处工作的杜夏,正在坦白自己是如何加入“特务组织”的。台下的人纷纷责问:“你的上

^① 参见李乃忱:《给王大化塑像》,见《情系剧专》(《南雁丛集》第2辑),广州:国立剧专在粤校友编印1997年9月,第502—504页。另见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350页。

级是谁?”

杜夏的同乡,也是其入党介绍人之一的安波,在运动之初表现很积极,担任小组长。他也在台下大声喝到:“杜夏,你坦白得不彻底!”

被逼无奈的杜夏看了安波一眼,迟迟疑疑地说:“我坦白了怕报复。”

“你说,没关系,我们给你做主!”安波振振有词。没想到杜夏提高嗓门,却说:

“我的上级,就是你安波!”

像猛然遭到雷击,安波脸色惨白,一下子惊呆了。但会场上立即响起一片喊叫:

“安波交代!安波交代!”

等安波反应过来,他突然跳了起来,声嘶力竭地喊道:“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员!”

这时,已经有几个背着枪的人走过来,不由分说地将他扭住,押送出会场。安波连连回头,还在嘶哑地呼喊:我是共产党员啊!①

在如此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没有后退之路,个人生存之道只有奋勇向前,你革命,我比你更革命。所以,明明知道“工农合”劳动任务非常艰苦,但报名者踊跃。“他们踊跃报名的实质是为了在生产中去逃避现实,麻醉自己。”②留在学校,被挑选参加秧歌队,同样可以在革命歌舞的韵律中暂且麻醉自己。

到“工农合”去劳动,到秧歌队去歌舞,分工不同,性质一样,都是革命工作。“我们提倡集体创作——和群众合作,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对群众负责,对革命负责;反对自以为是的创作方法,反对从个人主观、趣味、空想、幻想出发的创作态度。”这种集体创作就是创作方法上的群众路线,也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觉悟的地方。“一个剧本,从搜集材料、编写、配乐、排演,到演出,这个过程,原来就是作者、导演、演员、乐队队员、剧务工作者的集体

① 李建彤:《足迹——记鲁迅艺术学院》,见《延安鲁艺回忆录》,同前引第370页。另见杜夏:《一个鲁艺学员的回忆》,见《延安岁月》,同前引第309页。

②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1945年10月),陕西省档案馆藏。

创作;任何一方面的步调不一致,就会使工作遭受到损害甚至失败。”^①这种集体创作,是以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为基础的,这充分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每一个秧歌剧演出中贯彻执行的绝对可能。

因为取消了个人艺术创作的可能性,所以每个秧歌剧演出过后,都广泛征集群众的意见,再根据他们的要求愿望去修改,让群众获得最大的艺术参与可能。有一个战士看到秧歌队演出的秧歌剧里,战士称呼本连战士为“刘连长”,他就提意见说:部队里的习惯,战士称呼本连连长是不带姓的,所以“刘连长”应当改为“连长”。下次演出,马上就要改正过来。^②

越是遵循艺术创作规律,革命意识形态就越是在秧歌这种民间文化资源中,开掘深入。在迅速成熟的革命秧歌舞阵里,群众获得最大的参与可能,而被改造过的知识分子获得的却是革命集体情绪感染。

传统秧歌是“闹”,革命秧歌是“扭”。闹秧歌发泄的是乡野的“骚情”,“烂裆的裤子漏水的锅,没钱的爱些穷红火”。秧歌舞起来,一层层一圈圈的秧歌队伍里,“汉们、婆姨们、后生们、女子们,此时只觉耳边鼓声隆隆、喊声隆隆、脚步声隆隆,如醉如痴,如梦如醒,如胶如漆,如火如荼。脚下踢起的黄土烟尘,团团上升,从一层层卷进卷出的受苦人中,冲出来,又扑回去,散开来,又裹回去,直把个人群从头到脚接定在怀中!黄土中的人们,如狂如颠,如雾如烟,如鱼如水,如箭如弦……”^③看这样的传统秧歌,讲究的是扭得活泛,摆得花哨,走得轻巧,踢打蹦跳要麻利,女子走路要一溜跑,好似那个水上漂。对生与性的苦闷与欢乐的尽情宣泄,无所顾忌地表现着这片黄土地上率真而又热烈的无限“骚情”。

但革命秧歌是不允许个人撒野的,舞蹈动作上既要求全身都扭动起来,又不轻狂浮躁。要诀端在于“秧歌舞主要在腰的扭动,腰扭动自然扭动起来。而后才是两肩和屁股头子的扭动;两手不必用力,由他

^① 艾青:《论秧歌剧的创作和演出》(1946年8月),《新文艺论集》,同前引第74—75页。

^② 参见欧阳山尊:《从三个臭皮匠说起》(1946年),见《落叶集》,北京:红旗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37页。

^③ 王克明:《闹秧歌》,《传记文学》(北京)1992年第1期。



陕北秧歌是黄土地上的精灵，尘土飞扬中，他们世世代代舞起的是对生的渴望，对爱的“骚情”

[它]自然摆动，脚尖先落地。……过分着重两肩，姿势一定生硬呆板。过分扭动屁股头子，姿势一定淫荡肉麻”。因为革命秧歌所抒发的不再是传统秧歌自娱自乐的生的祈求与爱的放纵，“今天演的是一群工农兵，演他们的斗争故事，表现群众的集体力量。”^①秧歌队伍里扭动的个体，是革命队伍里的一个兵，一个螺丝钉，具有高度的革命组织纪律性与行为道德准则。所以，相对传统秧歌的“野”，革命秧歌倒反而显得“文”了。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处于群体运动着的人们，其行为“主要不受大脑支配，而是受脊椎神经的影响”^②。革命秧歌虽然没有了传统秧

^① 教育生活社编：《秧歌舞》，明理书店 1945 年 7 月初版，第 2—3 页。出版地点缺。另据迪之《秧歌浅谈》介绍，革命队伍里的扭秧歌，“它的主要特点是进三步退一步，腰部左右摆动，很少变化。”腰部扭动是关键，“双臂尽量松弛，随腰部扭动而甩起节奏明确，跳动时全身关节都在活动，全身肌肉都在颤动。”见《延安文艺丛书·舞蹈、曲艺、杂技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 年 3 月版，第 28 页。

^②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第 25 页。

歌的猛浪,但秧歌队伍里不断扭动的腰身,就可以让脚步支配心灵,在热情亢奋的舞阵里将个人小我融会到集体大我之中,享受革命胜利或即将胜利的喜悦。

我们已临到了一个群众的喜剧时代。

在今天,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是表现人民胜利,人民“大团圆”的喜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①

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团圆就是实际和可能的事情了,它是生活中的矛盾的合理圆满的解决……^②

这是对传统秧歌艺术的重新框定,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的重新改写。革命秧歌中孕育着一种全新的美学观念。

七

1943年3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充分肯定了以新秧歌运动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发展方向,

1943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艺和其他几个专业文艺团体,分别派到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分区去劳军,兼给当地老乡演出,借此把秧歌运动普及到各个分区去。鲁艺去的地方,是绥德、米脂地区。“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到一个地方,先进行调查访问工作,看看这里有些什么工作需要配合,有些什么劳模需要表扬。另外还有一部分人进行艺术上的调查访问,看这里有什么老艺人,有什么特殊的艺术;并且立刻向他们学习,记录他们所唱的歌,搜集他们口述的秧歌本子。经过了这样一番调查之后,就连夜赶编一些适合当地情况的新节目在秧歌

^① 艾青:《论秧歌剧的创作和演出》(1946年8月),《新文艺论集》,同前引第64、67页。

^②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3月21日。

中间来演出。”^①在这几个月的下乡演出中,发现了后来集体创作《白毛女》的素材。

随着《兄妹开荒》、《白毛女》等新式秧歌唱遍各边区、解放区和全国各地,革命秧歌越来越成为革命红色文化的时尚,急速传播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意识形态。

^① 张庚:《回忆〈讲话〉前后“鲁艺”的戏剧活动》,见戴淑娟编:《文艺启示录》,同前引第146页。

晴朗的七月十五日

一

延安十年,有三个日子对于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来说是终身难忘的:

1938年11月20日,日本侵略者第一次派出9架飞机,连续投下159枚重磅炸弹,将延安古城顿时炸成一片火海,死伤军民200余人。这是一个灾难的日子,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是战争的血腥。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延安军民奔走相告,载歌载舞,点燃火把,彻夜狂欢。这是一个灿烂的日子,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是抗战胜利的喜悦。

其间,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将整风运动、审干运动发展为群众性的抢救运动。这是一个晴朗而严肃的日子,但人们对政治斗争的恐怖却将其记忆成黑色的。

二

7月15日,正是延安夏季的日子,黄土高原星星点点的绿色映衬着蓝格盈盈的长天。1943年的这个时节,延安晴朗的日子里有了更多的严肃。已经持续一年多的整风运动,火药味越来越浓。停止一般正常工作,专门学习22个整风文件,写学习笔记,写个人自传,填报“小广播表”,小组发言,大会交流,人人坦白,人人过关,抓“红旗党”,捉特务汉奸,机关学校里很多同志先后被带走,隔离起来,有的就此音信全

无。最近,又到处传说国民党军队正准备包围进攻陕甘宁边区,同志们都同仇敌忾,决心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一个月前,在与艾思奇的婚礼上被带走,隔离在蓝家坪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中组部干部王丹一,时年23岁,这一天同其他被隔离审查者一起,午饭早早地吃过了,然后整队出发,来到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她一早就接到通知去听报告,但



公众场合的康生,穿马靴,扎皮带,不苟言笑,让人好生敬畏。

不知道什么地点,听什么人的报告。来到这座落成不久,一年后作为中共七大会址而闻名遐迩的中央大礼堂,她才知道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报告。会场正面主席台上方张贴着“挽救失足者动员大会”的大字横幅,四周墙壁上贴着“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挽救失足者,是每个人的义务!”“要热情地对待失足者!”^①还有“柯庆施是大特务!”等标语口号。中直机关各单位整队入场,划片入座,总共一千多人将会场坐得满满的。会场气氛很严肃,没有往常开会前那样相互拉歌,也没有一般开会前那么拖沓等待,熟悉的人们之间彼此都不打招呼。^②

会议由彭真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延安形势危急,国民党军队纠集日本侵略者正在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消灭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被逮捕。”“特务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部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

^① 林青山:《康生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2版,第100页。

^② 王丹一接受朱鸿召电话采访,2002年10月10日,北京、上海。

的问题上给予帮助。”^①彭真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校长由毛泽东兼任)、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委员等职。这里所记的“特务部”,应当是指由康生负责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具体承担审查内奸,反对特务斗争。

开场白之后,接着就有12个所谓的“间谍特务分子”鱼贯登台,公开坦白自己混进延安、破坏革命的罪行。在他们每个人登台下台之际,都有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迎接或欢送。

早已被树立为坦白典型的张克勤,神情严肃地介绍自己怎样在国民党的“红旗政策”下,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再潜回革命队伍,从兰州来到延安。在此“红旗政策”下,甘肃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成为“红旗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组织。依此类推,陕西、河南、四川、浙江、湖北、贵州等地的党组织也都成了“红旗党”,从这些地方来的党员干部和群众,都值得怀疑,都必须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这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次坦白,但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氛围中再次出现,仍然具有强大的震慑力。

绥德师范学校的一名女学生徐曼丽,坦白自己“失足”又“失身”,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带着任务再混进革命队伍,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说着说着,她声泪俱下地控诉国民党特务政策强奸她精神和肉体的罪恶,并大喊大叫要挖掉国民党特务的眼睛,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喝他们的血。台上痛不欲生,台下情绪激昂,整个会场亢奋极了。

典型坦白之后,彭真概括出如何识别国民党间谍特务的方法,并表明态度,凡是坦白讲出来的人,都可以既往不咎,重新做人。

会议主题内容是康生做《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

同志们!

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是正当着国民党以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三个集团军的主力,以暂二十五师、六十一师、二十八

^①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38页。

师、五十三师、新三十七师、第八师、一百六十五师、新骑二师、新二十七师、一百六十七师、七十八师、新二十四师、新二十六师、一百九十一师，及七个保安团、一个炮兵旅、一个重炮营，作为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线紧紧包围，待令出击之时来开会的。是正当着日寇第五纵队的国特机关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之时来开会的。是正当着国民党为了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不惜将第一军、第九十军等河防部队调离河防，背向日本，面向边区，内战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的会议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局中间来开的。^①

对延安当时所处外部环境的这个基本判断，来自毛泽东。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不久，毛泽东估计国民党“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由于“皖南事变”是在国共两党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战的形势下发生的，所以在人心向背上，“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基于这样的判断，毛泽东主张，“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②此之“军事攻势”是指如果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表现出强大的攻势，会引起蒋介石政权的猜忌和警觉。

一年后，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取得莫斯科会战胜利，粉碎德军“闪电战”的企图，掌握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动权；亚洲战场上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日本发动反苏战争的可能性不大。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时局的报告称：“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布置很久了。今明两年是我

^① 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1985年10月，第380—384页。

^②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1年2月14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0页。

党最困难的两年,我们准备在这两年中间地方缩小,人口减少,军队缩小,党员减少,财政经济缩小。我们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反共高潮的困难,另一种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困难。今天的困难,是黎明之前的黑暗,是胜利前夜的困难。”^①这种困难是假设,实际情况是日苏战争没有爆发。自1939年冬季开始出现的边区经济困难,是国民政府缓发、停发八路军军饷,边区“公家人”数量急速增长,劳动力因征兵入伍而减少,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

对于这个迟迟没有到来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多次解释:“国民党企图发动进攻边区的反共战争计划,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以及国民党内部问题的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向。”^②“最近日本人打云南,打浙江,使得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暂时停顿了。国共之间暂时可以缓和一下,但是仗还是要准备打的……”^③“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决裂,是拖的局面。但到希特勒倒后,国际局面变化,势必影响中国……”^④

158

上述形势判断基本是正确的,但只限于毛泽东与个别高级将领的电报通信或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很小范围内传达。问题是,当时延安地理闭塞,军事封锁,通讯条件落后,“我党和共产国际的通讯往来,尤其属于政策、方针等方面的问题,全由毛泽东亲自处理。”“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⑤一般公家人同志只有从上级领导,或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那里才能得到关于边区外部形势的消息。怎么说,说多少,就成了事关紧要的政治策略。在对外政策具体操作上,

^①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所作时局的报告,1942年4月13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375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2年5月21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381页。

^③ 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所作的报告,1942年5月28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384页。

^④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6月26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389页。

^⑤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178、179页。

“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①，“一点也不刺激国民党”^②，“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③。对内舆论宣传上，始终强调外部环境的险恶，时刻准备应对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到来。

所以，等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传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消息，国民党是大题小做，而共产党却借此小题大做。

7月6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一条消息称：“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与其说这是一种信号，倒不如说这是国民党政府对此有国际影响的一件大事的例行表态。这里所谓的“西安各文化团体”举行座谈会，实际上只不过是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复兴社成员张涤非，于6月12日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只有9人参加的所谓“西安文化团体座谈会”，通过了一个由张涤非事先准备好了的攻击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的宣言。时间上拖延了将近一个月的消息，已经是过了气的新闻。

159

与此同时，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命胡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④这个密电通过长期安插在西安，并升任胡宗南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的中共情报员熊向晖，迅速传递到延安。毛泽东一方面密切关注国民党动态，另一方面大造舆论，号召全延安、全边区都动员起来，准备应对他早已预料过的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到来。

蒋介石一直视共产党、陕甘宁边区为自己的心腹之患，极力主张“剿共”，企图实现自己“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统帅”的独裁统治。共产党立足陕北，始终处于被国民党军队的觊觎之下，生存的危机感

^①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年6月1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43页。

^② 毛泽东致周恩来、林彪电，1943年5月8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38页。

^③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9月15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03页。

^④ 参见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2月版，同前引第22页。

形影相伴。但是,实际作用早已日渐微弱的共产国际组织解散,对于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对峙,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所以,这只能是作为某种军事行动或政治斗争的契机,甚至是一种作秀姿态。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6月9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等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18日,胡宗南又到洛川主持军事会议,部署军事力量。但是,驻防在南泥湾前线的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军警备八团的战士们,却依然参加锄草劳动,他们的反应是:“保险打不起来!”^①

7月4日、6日,毛泽东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分别致电胡宗南、蒋介石、何应钦等,揭露事实,呼吁团结。同时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嘱其将电文广泛散发各国使馆和媒体。

7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决定拟订宣传计划,要求“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②。

7月9日,延安举行三万人群众集会,纪念抗日战争爆发六周年,各界代表讲话,刘少奇以新四军代表身份讲话,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大会还向国民党当局发出通电。当天,《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

7月10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停止行动,撤退一个师和两个军部(第一军、第九十军)。次日,胡宗南致电朱德:“为实施整训将第二线部队接替防务,并视察军师”,因而造成误会,“此皆由于弟之疏漏所致,不胜遗憾怅惘”云云。^③

^① 《王恩茂日记》(1943年7月13日)抗日战争时期(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60页。“从根本上说,蒋、胡‘闪击延安’的计划未能寿终,关键在于国际国内的大形势不允许此时国内国共重新开战。”杨者圣:《胡宗南这个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59页。该书对此有较详细分析。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1943年7月8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52页。

^③ 参见毛泽东致董必武电,1943年7月13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5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508页。

同在10日,《解放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11日,《解放日报》继续发表社论《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并发表报道《延安各界紧急动员,进入了战斗的哨岗》,中央印刷厂工人连夜赶印宣传品,新华社工作人员自动取消休息日。

7月12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

7月13日,《解放日报》头版社论位置发表博古的文章《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第四版刊发林默涵的文章《保卫边区》。

7月14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一二〇师全体将士呼吁:制止亲日派祸国阴谋》,配发消息:晋冀鲁豫文化界通电,誓为陕甘宁边区后方,消灭法西斯思想毒素。第二版刊登《被服厂致函边区各工厂,加紧组训自卫军》。

7月15日,《解放日报》除头版、二版编发各地声援延安的活动外,第四版还开始组织发表延安作家的反内战诗作文章,很少写诗的陈学昭陆续写出激烈的诗篇《十倍的打击!》、《边区是我们的家!》。接着,艾青的诗《起来,保卫边区!》、何其芳的文章《全中国人民都反对进攻边区》、张谔的文章《怪事》、黄既的诗《中国人民不容许》等,先后刊发。

这种强大的宣传舆论阵势,前后持续近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也就是说,当康生言之凿凿地陈列边区军事形势危急的时候,实际上最危急的时刻已经在三天前过去了。他仍然要极其严肃地去说,是为了突出开展审干抢救运动的必要性。

如果一个普通的政党,普通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是会[被]吓倒;如果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看到国民党撤退河防,发动内战,会发生悲观失望的。但我们却还是照常开会,更加积极的[地]工作、学习、整顿三风、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是边区人民,我们坚信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无论国民党想如何挑动内战,我们的党和军队是有力量打破和粉碎他们这种祸国殃民

的阴谋。

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①

战争是战争的理由，而战争环境、兵法社会，正是通向一元化集权的最便捷的路口。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不久，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为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②两年后，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上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书记，统一指挥中共军事力量。同年11月，王明、陈云、康生一行从莫斯科回国到延安后，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增补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在随后关于抗战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与军事指挥上，五位书记之间，尤其是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多有意见分歧。从1941年5月开始，毛泽东就酝酿通过改变全党的学习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和政治上的统一，但效果并不理想。9月10日至12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史称第一次“九月会议”。参加会议的28人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相继检讨，只有王明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中途称病，再不临会。会后，张闻天组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亲自带队下乡作为期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于是，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整肃作风，清洁精神，统一思想。

“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

^① 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

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②，转变作风，洗心革面，然后步调一致。这是将整风运动由高级领导层转向全党后的基本目标定位。

全党整风运动初期，毛泽东将自己曾经遭受的政治挫折和蒙受的羞辱，几次在不同的场合尽情袒露出来，并表达了一定要搞好这次整风运动的强烈决心。“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上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③为此，“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主要是解决个人与党的关系、局部与全体的关系，现在反对宗派主义是党性决定的发展。”^④这种党性原则是铁的纪律，“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整体……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⑤这是整风运动要达到的目标，可是目前却距离很远。“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浓厚。”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样的思想状况，他觉得“延安失掉了还没有什么，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所以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得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烂也要搞”^⑥。

^①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9月10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327页。

^②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27页。

^③ 同上，第817页。

^④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2年2月28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366页。

^⑤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见解放社编：《整风文献》，苏北新华书店印行1949年8月，第108页。出版地点不详。

^⑥ 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14—416页。

所谓造成“一河大水”，就是先要放，让各种思想观念、错误言论都充分暴露出来；然后再收，就是找出典型，深挖猛打，搞倒搞臭，作反面教材，以点带面，人人坦白，人人过关，忠诚不贰。

我们不要忘掉 1942 年 5 月时局紧张之时，于炳然特务已准备好人，准备好枪，企图配合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军队来破坏我们，[。]虽然于炳然这个阴谋被我们破获了，但是这个教训是不应忘记的。

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国民党特务分子、破坏分子，他们不去破坏敌人，而是与敌探一起来破坏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和华中、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他们不是去拯救被日寇毒害的中国青年，而是将许多有为的中国青年，拉到特务的罪恶泥坑中去为日寇的第五纵队服务。因此[，]从 4 月 10 日起，我党中央又一次的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阱[阱]。三个月来，经过所有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人的努力，促使许多失足被害的青年接受了党的号召，起来控诉日寇与国民党杀害青年的罪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 450 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不管他们其中尚有许多人未彻底觉悟，但我们应该欢迎他们这种进步，因为他们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可能，使我们可能引导他们跳出罪恶的泥坑，走向新生的道路。^①

整风运动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肃奸反特、清除异己分子的内容，只不过前期是不公开的，暗中进行的，经过 1942 年 6 月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逐渐转为公开进行。这也是形成整风运动强大精神震慑力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早在 1927 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为了在白色恐怖的海、武汉等大城市生存，率先建立起以情报保卫工作为主要内

^① 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 年 7 月 15 日）。

容的中央特科,派遣特工人员长期隐伏在敌人的要害部门,深入虎穴,开展隐蔽战线的革命斗争。随后,国共双方都暗中互派特工,知己知彼,兵不厌诈。1931年顾顺章叛变革命后,赵容(康生)曾参与中央特科工作。^①1933年到莫斯科后,康生积极参与主持在旅苏学生中开展“镇反肃托”活动,推崇王明,排斥异己。1937年回到延安,他通过促成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很快获得毛泽东的信任,先任中央党校校长,1938年8月出任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收集掌握敌情,稍后更名为中央情报部)主任。他将上海时期对敌斗争的经验和苏联肃反运动的做法,运用到对延安革命队伍的清理整治。1939年,他炮制了所谓的钱维人(钱伟仁)、王遵及(王尊济)、李凝(李宁)“三大特务案”^②,震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当事人无能答辩,其他人无法辨别的情况下,这就是他的工作成绩,晋级的资本。同年10月,中央社会部成立,主持处理和肃清内奸工作,康生兼任部长,成为掌握生杀大权的“铁腕人物”,甚至被称为中国的“捷尔任斯基”。

整风运动全面开始后,1942年6月康生插手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事件,将王实味定性为托派、国民党特务。紧接着制造出所谓于炳然和“五人反党集团”案,插手中央党校制造出所谓李国华、吴奚如国民党特务案,在西北公学审查出所谓张克勤案以及“红旗党”。这些事

^① 参见穆欣:《隐蔽战线的统帅周恩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42、444页。

^② 钱维人时任陕甘宁边区公路局局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三次国共合作,他负责与国民党方面联系修筑公路,被康生诬陷为特务逮捕,从1939年关押到1945年,后由西北局公安部作甄别结论,予以平反。王遵及原在北平读书,因不满其叔父王克敏的汉奸行为,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康生怀疑她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从里到外,她家都反动透顶了。难道她一个女孩子,就能出污泥而不染?”经过三天三夜的车轮战,并威胁要放两条大蛇到她的窑洞里,逼迫她承认自己是“双料特务”,从1939年到1946年整整七年,都被关押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窑洞监狱里。李凝原是东北地下党员,曾被日本人逮捕,经家人保释出狱后,1938年到延安。1939年7月,她突然被边区保安处逮捕,在黑客里接受先定性后取证的审讯。“你长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逼迫她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入党内充当汉奸”。最后为她定罪结论的依据竟然有:走路像日本女人、有日式女内衣、刺探军事秘密,等等。参见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68页。[美]约翰·拜托、罗伯特·帕克:《康生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63—166页。承蒙该书中文译者之一顾兆敏先生相告,中文原版为《龙爪》,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5月版,上述引文见诸第179—181页。林青山:《康生传》,同前引第80—92页。

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证,证明都是冤假错案,现在都已得到甄别或平反。

实行“三三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设有公检法机关,但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活动不属于边区公检法职权范围。实现一元化领导,除了建立起以单位制为基础,以供给制为核心的社会基本组织机构外,还通过不断设置临时性组织,如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授予可以决定几乎所有干部群众浮沉生死的特权,从而实现对社会基本组织机构的垂直穿插,扁平化管理,不定期地开展反特肃奸,惩治腐败运动,达到对社会肌体的清理保洁。

时至1942年6月2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五位书记中,王明、张闻天是斗争的对象,陈云对整风审干运动有不同意见,1943年3月被批准休息三个月,中组部工作交由刘少奇负责^①,只有康生可用。此外,高层领导中的周恩来、朱德、博古都是有案可究,需要检讨的。另有刘少奇、彭真等人可以信任。所以,在抽调刘少奇从华中局回延安途中的行程安排问题上,毛泽东无数次致电嘱托要注意安全又安全。

此种体制下,对最高真理的解释程度,直接取决于被授权的大小。反对本本主义,倡导调查研究,康生“活学活用”到整风审干工作中,解释为:“调查研究在延安有几种新的创作,叫做三种‘自传’:刚来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检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应当是四种自传,但原文如此——引者注]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怕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了大纲写一百遍也不会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就有漏洞;还有一个叫作‘年表大事记’,哪一年干什么,从小一年一年的[地]接起来;还有叫作‘月表’,哪一月干什么,这个‘月表’有好处,可以找到毛病。把那个表放在审讯室里,故意把表画得那样大,在审讯犯人的时候,你讲我看你的年表,看对不对,他想审判官把他的年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414页。同时被批准治病休养的还有王稼祥。另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14页。

表列出来了,不讲不行了。这个‘年表’也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之一。”^①这是康生在西北公学举办的整风审干训练班上的报告,美其名曰对“调查研究”的“新的创作”,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逼供信”,是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莫须有”的遁词。

说1942年5月,于炳然“已准备好人,准备好枪,企图配合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军队来破坏我们”,也是康生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即席发挥,信口开河,为着创造一种能够威逼众人的气氛而已。

由王实味的两篇杂文,到托派思想、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无限上纲,不断升级。影响所至,不但延安、陕甘宁边区人心惶恐,人人自危;而且,边区之外的国民党借以大做文章,在西安发起所谓的“活人追悼”会,追悼在延安“新文字狱”中“想必被迫害致死”的王实味、吴伯箫等28人,同时,还编印《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象》的小册子^②,歪曲篡改萧军、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进行反面宣传。从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分析来看,王实味事件被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可能是引起毛泽东对内奸特务问题警觉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开始把过去从积极方面来理解的许多言论,重新加以考察,并决心制止之。”^③于是,毛泽东指示将王实味的文章印发



延整顿风运动中曾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成员的潘芳、宗铮夫妇。此案至1982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予以平反。

① 《康生关于整风审干问题的报告》(1943年8月),记录稿,第58—59页。

② 《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象》,统一出版社编印,1942年9月,出版地点不详。此见《“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它》附录,1957年8月编印,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资料室藏。

③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41页。

各单位讨论,组织讨论,并联系实际,举一反三。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过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的讲话中,谈到文艺界情况时仍然称王实味“同志”,“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深一些。其他作品都与此不同,只是部分的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①。到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态度就改变了。“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②并且,会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在整风运动中,各机关学校主要负责同志要善于把真正犯错误的同志与破坏革命的坏人加以区别的意见。

毛泽东的这个态度转变,实际上是对康生工作的肯定。于是,由王实味到“五人反党集团”,从中央研究院到中央党校,尤其是西北公学的张克勤牵出所谓的“红旗党”,反特肃奸斗争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到年底88天西北局高干会议(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上,毛泽东的报告称:“我们党内包括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这里来闹乱子。王实味最近也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讲话,他们五个人就组织了五人反党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一个叫吴奚如,一个叫王实味,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其余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吴奚如?第四个王实味?这是应该审查的。”^③

高干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1942年12月6日),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反特肃奸的指示。前者强调:“对敌人、汉奸,及其他一

^① 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同前引第427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2年6月19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388页。

^③ 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2年11月20、23日,记录稿。

切破坏分子等,在被俘被捕后,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予以自新之路。这里是提示了镇压与宽大两个政策,并非片面地只有一个宽大政策。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是除外于宽大政策的,这就是镇压政策。……对于一切破坏民族利益的分子,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凡属破坏抗日政府、抗日军队、抗日人民、抗日政党的利益者,都是破坏民族利益的分子,对于此类破坏分子如不采取坚决镇压政策,即无异帮助敌人。对于此类分子采取放任态度,并谬托于宽大政策,是完全不正确的,是脱离群众的。凡在此类分子的行为上已经证明是坚决破坏民族利益者,即应依法严惩,绝对不应放任。只有那些真正表示改悔者,才应采取宽大政策。”“在实施时,又必须区别首要分子与胁从分子。在首要分子中,真心表示改悔者也是可能的,也是有过的。但在胁从分子中,真心表示改悔的可能性最大,过去经验证明也最多。根据此种情形,我们在惩治破坏分子时,主要的应是惩治那些首要分子,其次才是惩治那些胁从分子。同时,我们的宽大政策,主要的是施于胁从分子,其次才是施于首要分子。”^①

紧接着,12月16日,康生在会上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提出“特务如麻”。报告认为:“特务,一种是打进来的,例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②随后两天,12月17、18日,会议分各组讨论并大会交流,检讨揭发本单位本部门存在的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麻木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检举清算对党的宽大政策的不了解和各种误解,使参加会议的干部提高开展反自由主义和清查内奸、特务问题的认识和警惕。

西北局高干会议后,中央要求康生收集审干锄奸工作经验:

与此同时,中央通过一系列决议,规范上下级关系,强调党的领导,“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一切服从战争”。^③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上年12月30日抵达延安的刘少奇提议,中央书记处只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

^① 《中共中央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1942年11月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49页。

^② 转引自《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同前引第220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02页。

的助手；书记处的职权为决定和处理日常工作。^①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②

会上，康生作审干肃奸工作汇报说：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并透露，要把审干作为1943年工作的重要内容，把延安的审干工作经验推向全国。

当天，刘少奇即致电华中局称：“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③

这已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正在此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第八战区的朱绍良、胡宗南，派国民党陕西省行政专员胡公冕到延安设立联络机关，与之同行的还有国民党少将副师长侯声。他们一行十余人，携带电台，准备于4月3日到达延安。获此消息，中共中央书记处认为，这可能是国民党暂时放弃军事进攻，加强政治攻势的具体表现，决定委托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采取措施，防止有暗藏的特务乘机活动。^④于是，就发生了4月1日晚的延安“大逮捕”行动。

当时参与执行任务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接到任务后曾问康生：“要抓的这些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的材料，我们怎么抓人？怎么审问？”得到的回答是：“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⑤

^① 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同前引第415页。

^② 《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1943年3月20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1985年10月，第345页。此处文件名称为简称。

^③ 转引自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北京）1990年第3期。

^④ 转引自《任弼时传》，同前引第504页。

^⑤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同前引第222页。

这样整整忙活了一夜，总共抓起 260 多人。边区系统由边区保安处负责，中央直属机关系统由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汪金祥（二室主任）负责。康生为总负责。

事后，康生对此坦言：“国民党也帮了我们一手。胡宗南派了一个胡公冕来了，这时我们也急了。胡公冕来了，特务找胡公冕去保护，这就不好办。这两个‘胡’[应当是三个，但原文如此——引者注]我们也要感谢。第一是吴南山，第二就是胡公冕，第三个是胡宗南。胡公冕不声不响的[地]来了，我们听说他要来，把这个斗争向前发展了。到了 4 月 1 号来了一个突变，一夜鸡犬不闻就捉了二百多人。捉人是突破阶段。”^①

怀疑就是理由，不作任何说明，也没有任何举证、申辩、宣判，就这样抓捕、审讯、关押，甚至无名目地失踪。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怖在延安日常生活中弥漫着，在参加整风运动的“公家人”心里潜伏着。此刻，当康生宣布已经逮捕两百多人，有四五百人向党坦白悔过时，坐在台下听报告的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们，“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②

其实，胡公冕一行到延安公干，属于国共两党合作时期的正常行为，在后来的联络工作中也没有做什么坏事。胡公冕，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 年回国，参与筹建黄埔军校工作。1927 年“四一二”事变后脱党。1930 年在浙南任红十三军军长，1932 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四年后释放。抗战爆发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经胡宗南推荐任国民党陕西省岷县地区行政专员。1949 年后曾任国务院参事。

“戴笠特务案”，是指 1940 年末，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在关中地区破获的一起特务案，查出戴笠在汉中地区训练的特务四十多名，吴南山就是其中之一。据他交代，由于这些青年的家都在边区，或邻近边区的边境线上，他们想，如果不自己坦白交代，将来一旦被发现，全家都会受牵连。当时边区实行对特务的宽大政策，一经自首坦白，不抓不杀，并允许他们照常工作。后来，

^① 《康生关于整风审干问题的报告》（1943 年 8 月），记录稿，第 36—37 页。

^②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北京：红旗出版社 1997 年 1 月第 2 版，第 241 页。

康生调走了卷宗,并报告毛泽东。康生后来对师哲说:“毛主席很重视这个案子。”^①

继4月1日行动后,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提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又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②为此,决定再延长一年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

4月9日、12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对处置特务问题的方针政策。张克勤作为已经悔过自新的“特务分子”,在会上作坦白报告。任弼时代表中央作题为《特务的活动和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介绍延安抓捕特务情况,敦促更多的人尽早坦白。“最近,延安检举了一批特务内奸分子,那些有确实证据而又不肯坦白说出的,都已由保安机关加以逮捕了。其中有敌伪的特务,也有国民党的特务。日本和伪政权的特务,他们既不愿意向我们自首,那自然只有逮捕起来加以无情的镇压,这都是大家很容易明了的。至于国民党是和我们合作共同抗日的,照道理讲,他们的特务机关应当是对敌伪进行工作,而不应该对我们也进行暗害和破坏活动的。但事实不然,国民党各个系统的特务机关,还是派了不少的特务分子到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中进行阴谋破坏,采取机密的行动,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把其中的重要分子加以逮捕。”“根据我们长期侦察的结果,根据改过自新分子的报告,根据这次检举中被捕人犯的供词,知道国民党和敌伪特务机关都有着很庞大的计划,要打入我们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中进行暗害破坏的特务活动,特别是集中注意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活动。为着这样一个目的,他们花费了很多经费,用了各种各

^① 参见《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同前引第220—221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同前引第354—355页。

样的办法训练和培植了一批青年男女混入我们边区,其中一部分重要分子已被我们逮捕起来。但在中央和边区直属机关内,还隐藏着这类分子,我们现在还未加以逮捕。”^①

据康生后来说,这个消息一宣布,“有些同志的脸也白了”^②。

接着,任弼时宣布:“中共中央决定,要给予这些一时被迫误入歧途的青年一种有保障的出路,就是号召他们决心出来忠诚坦白、改过自新,使他们有可能脱离这种特务机关的圈套,而真正有可能继续他们所要做的革命事业。因此今天召开这次会议,其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对那些误入歧途的青年所采取的方针,使各位同志了解中央这一个方针,同时那些一时误入歧途的青年或者以前曾是甘心做特务现在愿意悔改的人们,再不要惧怕,要他们向党真诚坦白承认过去一时的错误,而表示改过自新。”“这里我们必须宣布,对那些甘心情愿为敌伪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继续进行阴谋破坏暗害活动的特务分子,一旦被发觉而检举出来的时候,那就会受到加倍的应有的处罚。必须懂得,在宽大的政策的反面,就是无情的镇压。因为对这些人的宽大,就是对抗战对革命对中国人民的残酷。”^③这里,任弼时强调除了“宽大”的一面,还有“镇压”的一面;而镇压是向着“不肯下决心坦白改过自新”的人的。最可怕的是,即使自己从来没有特务行为,如果被别人逼供牵连,就成了不被“宽大”的镇压的对象。

4月15日、24日,毛泽东两次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继续清查特务,进行防奸教育问题的决定。暂停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在五、六、七三个月内,专门进行防奸教育,由中央总学委落实执行,刘少奇负责领导,康生主持日常事务。

4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谈到肃奸反特问题时说:我们一方面要肃清内奸,另一方面要培养锄奸干部,教育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400人,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

^① 任弼时:《特务的活动和中央对特务的方针》(1943年4月),见《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8册,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237—238页。

^② 《康生关于整风审干问题的报告》(1943年8月),记录稿,第37页。

^③ 任弼时:《特务的活动和中央对特务的方针》(1943年4月),见《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8册,同前引第238—241页。

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为主任。^①

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部署,有动员,有响应,审查干部和肃奸反特斗争就在全党、全延安、全边区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坦白,劝说,控诉,个别谈话,小组讨论,群众大会,可谓形式多样,参加者在热闹中无不心惊胆战,如履薄冰。在一个具体单位里,这种坦白运动大体采取如下步骤:

首先,根据填写的“小广播表”,联系平时言论,以及其他一切关系线索,大胆怀疑,发现嫌疑分子,领导班子相互通气后,召集小组会议,分析形势,讲明政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提醒暗示,诱导嫌疑分子主动坦白,或由其他人发难,大家一起提出质问,让嫌疑分子孤立出来,百口莫辩。这样,嫌疑分子升格为审查对象。

其次,由单位领导找审查对象个别谈话,交代政策,特别警告组织上已经了解事件真相,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是最能见出你对党的忠诚程度如何,是考验你的政治立场的时候了。如此,敦促审查对象主动招认。再不开窍,临结束时鼓励为之,你回去仔细考虑考虑,希望明天的会上能看到你的新形象,云云。

再次,召开群众大会,请坦白悔过者报告自己的特务行为和悔过心理,领导宣布宽大处理,有的不咎既往,仍分配一定的工作;同时启发其他审查对象登台坦白,或由别人检举揭发;仍无效果,则实行看管,表示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只有扭送上级保安机关处理。

运动之初,是发动群众揭发领导;现在恢复了领导的权威,权威就意味着真理,扬眉吐气中整出的反革命特务越多,就越能显示出领导的忠诚、水平与工作业绩。“有的单位对90%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陷于停顿;而那些还没有搞起来的单位首长,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某单位因为没有人‘坦白’,受到康生的批评,负责人回来后吃不好,睡不着。一天深夜,人们都已经进入梦乡,他忽然吹起紧急集合哨,全体人员从床上惊醒,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待集合之后,这位负责人开始训话:‘别的单位的特务都

^① 《刘少奇年谱》上卷,同前引第420页。又见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同前引第371页。

坦白了,有那么多,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其实很多,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向我坦白,否则我要严厉惩罚你们。’于是,当晚就有几十人交代了‘问题’。”^①

进入5月份,延安的政治气候更加严峻。5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委员的高岗,在陕甘宁边区党群系统工作人员会议上作《关于宽大政策的报告》。报告再次重申:“最近延安捉了几百人,大家都是知道的,现在还在检查每个人的历史和思想。因此,过去或多或少有些问题的干部就害怕、恐慌、动摇、抑郁、痛苦、不安起来,感觉到非常苦闷,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想法:有的人想,‘为什么抗战七年了,从前不这样的检查,单单今年来这样一下呢?’也有些人想,‘过去我做的那些事情有点污点,从今以后下定决心再不搞了,讲出来不好看,又不好听’。因此他就不讲,把过去历史上的污点埋藏掩饰起来,但是人一追,他就自己不安、苦闷、忧郁、恐慌起来了。还有些人想,‘如果讲出之后,到底怎么办?是不是要杀头?党的宽大政策到底宽大不宽大?’这个问题他们还在怀疑。又有些人想,‘今天党讲宽大政策,就是让大家都讲出来,等到讲完以后,将来算总账,又能不能算党员呢?’他们的这几种想法,都是不对的。”

“同志们,讲出了以后,这就是破坏国民党的特务政策,知道他用什么方法糟蹋青年,逼写东西,要青年给他们做特务。党可以研究如何对付他。这件事对你本人有好处,就是对党也有好处,也就是说堵死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争取青年站在我们这方面。宽大政策的目地,就是在争取青年站在党的这方面,继续为党工作,为革命奋斗,为中国人民解放奋斗。”“要知道,只要你痛改前非,以后坚决为党工作,我们对这些人是同情的,痛恨的是日特、国特,这有什么害怕呢?以后就是睡觉也可以睡得好,吃饭也可以吃得饱,干部仍然是干部,党籍仍然是可做党员。”高岗还表示:“有人讲,讲出来是可以的,就是不愿意分[公]开的讲。这可以向负责人讲,西北党校向赵校长讲,自然科学学院向陈康白同志讲,文协向柯仲平同志讲,西北局向我讲,同时也可以到保安处去讲,干脆就把那根线、那条根割断,变成一个革命干部。所

^①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16页。

以宽大政策不是假的,是真的,我讲话负责任的。如果讲了以后,还把你捉起来,打屁股,那么你来问我,说我是说空话的人。”^①

5月22日,边区政府大礼堂召开大型坦白大会,形式上是个人自省与集体帮助相结合。

加之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对预期中的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强烈反应,使得敌情观念空前浓厚。6月24日,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指出:“延安各机关学校干部一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将近一千人。”“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各机关中,暗藏的日特国特分子,估计一定是很多的,慎重清理这些分子,关系于党的生命。”^②6月29日,在延安的刘少奇致电陈毅、饶漱石称:“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已经是非常精明,非常广泛使用的政策,是国民党目前反对我们的主要斗争方式。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并还有成千的特务与自首分子派进各根据地来,如果我们不能现在学会反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的全部艺术,我们一定失败无疑。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必须使全党一切忠实党员都学会[反]特务斗争,但你们今天还绝对不宜提出这个任务。”^③这里所说的“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破坏,是指由“张克勤案”牵引出的“红旗党”问题。

毛泽东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7月1日致信康生,再次强调此前5月21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的防奸工作六项原则,提醒分清两条不同的防奸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

^① 《高岗在边区党群系统工作人员会议上关于宽大政策的报告》(1943年5月17日),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甲第3册,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印1994年11月,第224、228、229、230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1943年6月24日),转引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③ 刘少奇:《对反特政策与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同前引第379页。

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①并提议将此批语刊登在《防奸经验》杂志第六期上,以引起重视。

对此,康生一切照办,但对于防奸工作六项原则,他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创造性地加以发挥和理解。比如,“首长负责”,他是这样操作的:“首长负责,你们到前方,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首长倘若不负责怎么办?……这种自由主义,有什么办法使他负责,毛主席下的命令还不行,应该让他知道他有病,我们是给他治病,治病救人。这个病怎样才能治好,首长要负责,有三个药方,在延安吃了这个药还灵。头一味药,他不负责,他有右倾思想,你在搞,他在你屁股后头说你的闲话,使你相当生气。但是你应该想想他有病,应该把他的病治好。我们现在告诉大家,这药是单性药,就是于炳然的口供。把口供送去叫他‘吃’。‘吃’了一下就好了,自由主义就取消了,这方面的责任心就加强了。倘若这副药不行,还有第二个法子,就是‘拉’吧,拉他一块去审讯。这个法子有三味药,拉去叫他自己动手去审讯,第一味药使他直接的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接触。他看到很调皮捣蛋,越搞越生气,阶级仇恨就起来了。第二味药是,你七搞八搞搞得差不多快审出来了,叫他去,他去一问,你还不讲,赶快讲好了。你搞的[得]差不多了,他一搞就讲了,他就有了兴趣,使他有了味道。第三味药,他去搞没有搞出来,他更加动摇了,你看:冤枉好人。他说他不来了。你不管他,要走就走,他要动摇让他动摇好了。他走了,你七搞八搞,搞出来了,你告诉他,要他去问,他一问知道真的是,他自己反省,动摇还是不对。这些药吃了,你看治好治不好?倘若再治不好,怎么办?还有第三个法子,就是叫他‘发急’,[让]他跑到旁的机关,听旁的机关搞的[得]很好,旁的机关首长负责,搞的[得]轰轰烈烈,他却冷冷清清,这样相形之下,人家轰轰烈烈,自己冷冷清清,他心里难过。你在总结时可以这样讲,那[哪]个机关搞的[得]落后,人都有改进心理,何况是共产党员,群众力量起来了。假如这三副药‘吃’了还不好,在[再]用自然科学治病,今天吃这一味,明天吃那一味,有时也可以同时吃两味药。我们的办法,把这三味药给他统统吃。这三味药叫什么名字,一个是

^① 毛泽东致康生信,1943年7月1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48页。

宣传药,一个是实践药,一个是群众药。这三味药在延安治过首长的病大致有效。再顽固那有什么办法?像孙力余吃了什么药也不行。那就不大好听了,叫做‘滚蛋’药。滚蛋,不要你负责,那就叫做‘泻药’。哪个首长不负责,那就不要他负责。”^①

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部署工作时要求:“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②

其间,刘少奇作《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报告,对审干肃奸工作作具体安排。“审查干部与清查内奸的运动,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发展及整风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审干运动的全部任务是:“清查内奸,争取失足者,训练干部。”^③

肃奸,反特,坦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整风运动真正形成一河大水,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几百个失足青年一致起来感谢共产党的拯救,控诉国民党的罪恶,这就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与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作了一个很好的对照,更加证明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是祸国殃民杀害青年的政策,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则是救国救民挽救青年的政策。你们亲眼看到国民党特务分子破坏边区,破坏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共产党的罪恶,但必须晓得,他们的这些罪恶是与日寇勾结在一起的。大家晓得王实味是托派汉奸,但更要晓得他同时也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王实味与国特分子纠缠在一起呢?因为他一方面为日寇服务,同时又为国民党服务,他是敌探、托匪、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当我们与王实味斗争时,为什么一些敌探国特不惜揭破了“左”倾面目,出来为王实味打抱不平呢?因为他们是一家人,有共同厉害的关系。为什么国民党为了声援一个托匪汉奸,动员了他们大后方所有是报纸杂志向共产党进攻呢?因为他

① 《康生关于整风审干问题的报告》(1943年8月),记录稿,第52—54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7月13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55页。

③ 刘少奇:《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1943年7月),见《刘少奇年谱》上卷,同前引第429页。

们的特务机关实质上就是日寇第五纵队的组织，敌探王实味也正是国民党的特务人员。

国特为日寇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是不胜枚举。如：混入新四军的许遇之，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破坏边区银行的萧煌，破坏自然科学学院的彭尔宁等等，他们都是敌探兼国特、国特兼敌探的兼差特务分子。要将这些杂种特务机械的[地]划分是不可能的，而且国民党并不以此为耻。如日寇密使吴开先公开作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敌探托匪张涤非公开的作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主任，就是铁的证据。因为敌探、国特在反共的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个一致的目标之下，他们彼此结成“反共同盟”，并不惜蒙蔽一些青年去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来破坏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因此我们应该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全体失足分子，起来反对国民党这种叛国殃民的滔天罪恶。

另一方面，你们也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它将几百个陷入特务泥坑的青年，从敌人的第五纵队里挽救出来。三个月以来，全体党员们执行党的宽大政策，以坦白运动、劝说运动，以及各种方法，去帮助那些失足的人觉悟，将几百个失足的青年从罪恶中挽救出来。同志们！这是一种光荣神圣的事业，是改造人类的事业。许多改过自新的人说：“共产党是他的重生父母！”从这些感激的声音中，证明了共产党宽大政策的伟大，党的集体力量才是真正改造灵魂的工程师。^①

在肃奸反特运动中施行宽大政策，是毛泽东的主张。

早在1941年4月，毛泽东修订《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时，就增加了其第七条内容：“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分

^① 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

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①该施政纲领经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于1941年5月1日颁布实施。而此前执行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对此表述为:“厉行锄奸工作,提高边区人民的警觉性,彻底消灭汉奸、敌探、土匪的活动,以巩固抗日后方。”^②这显示了毛泽东的天下之志和仁慈胸怀。到1943年7月,他在枣园与来自绥德的袁任远谈话时,了解到那里的抢救运动情况,再次强调:“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有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③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对普通民众始终怀抱着真诚朴素的情感,希望自己和由自己所组织的政府都能为人民谋幸福。他确定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政治斗争的对手“放弃主义,把人留下”,让革命队伍里的每个同志都清洁精神,重新做人。这就是所谓重新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伟大历史工程。

运动到达肃奸反特、审干坦白和抢救运动时期,毛泽东的个人崇高地位已经在军队和党内得到确认。

洛甫、博古在1941年的“九月会议”上就相继表态,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推崇毛泽东的领导。朱德在1942年12月4日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表态,“现在路线正确了,以后我们党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一元化。”^④刘少奇继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毛泽东

^①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291页。

^②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年4月4日),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209页。

^③ 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60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530页。

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后,7月6日又在《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章占据头版整版位置,宣称:斯大林所说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历史上也是存在的,前一种假马克思主义者,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后一种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们历年来所坚持、所奋斗的路线,他们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两天后的7月8日,王稼祥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以头版整版再转二版、三版的宏大篇幅论述:“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周恩来1943年7月16日从重庆回到延安,他在8月2日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言表态:“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民主的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①

国民党与共产党两种不同政策,摆在所有失足者的面前,何去?何从?这是很明显的。因此四百五十个人向党自新改过,正是这两种政策对照的结果,党的宽大政策胜利的结果。但是不是所有失足的人,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呢?不,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除了一部分少数甘心为敌人作第五纵队的人们外,其中大多数是在他们的脑子中尚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他们过去想不通,我们尚有时

^①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词,1943年8月2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681页。

间等待,但是现在是军事时期,我们应该赶快的[地]促使他们觉悟。今天开会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①

康生的报告事先准备了发言稿,洋洋洒洒,慷慨激昂中又临时发挥了许多。会后主要依据他的发言稿整理成文,约两万余言,由解放社印制成册,发至各单位学习,领导干部人手一册。但另有现场记录稿在文字上与此略有出入。

接着,康生就如何认识国民党、如何看待蒋介石、如何理解三民主义等三个方面,揭破人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幻想”;对比证明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是不可战胜的。这部分内容与8月5日中央总学委发出的《关于进行认识国民党的本质和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基本相同。

一切失足的人们! 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的[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的[地]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 号召你们再不要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 为什么共产党要这样苦心的[地]救你们? 为什么在目前如此紧急的时期还要挽救你们? 这正是你们做一个中国人,不要再被欺骗着为敌人服务。失足的人们! 现在应该赶快觉悟,下最大的决心,向共产党悔过自新,赶快脱下特务的衣服,脱下第五纵队的制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将你们所受的欺骗、污辱、损害和所做的一切罪恶彻底讲出来,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为抗日救国的中国人的。……你们被日寇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强奸了、欺骗了,拉你们去做了第五纵队。由于你们幼稚无知,贪图名利,贪生怕死,而走入了特务的泥坑,我们共产党为使你们重新做人,用了宽大政策、坦白运动、劝说运动、开大会、做报告、集体劝说、个别谈话等等多种方法促使你们觉悟。三个月来,我们既怕你们执迷不悟,又怕伤害了你们的面子;安慰

^① 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

你,怕你伤心;关照你,怕你自杀。请问一问,你们的父母有没有这样在政治上关心过你?你们的兄弟、姐妹、爱人、朋友,有没有这样想到你的前途?

一个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的[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靠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因此,我们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已经坦白而未彻底的人们,要重新反省,彻底的[地]迅速的[地]向党解决自己的问题。已经坦白的人,要在任何的困难下毫不动摇,要下最大的决心为革命服务,要以坚决的牺牲精神,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人民共同一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特别是那些未坦白的人,要在此地就下定决心,在这里或者回去立刻坦白自己的问题。我们提心吊胆的[地]怕他们失却时机,这一个忠告,望他们牢牢的[地]记住。

最后,我要警告那些不愿坦白的人们,我们坚持宽大政策,但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希望他们严重注意。有些人听到国民党要进攻边区,他们高兴了,他们想他们的问题不需要坦白了,蒋介石派兵来接他们了。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坚决镇压特务,我们又有钢铁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在这里我们送给他们一副对联:“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①

这个报告的后半部分带有明显的威胁性、恐吓性。作为一个旁观者,弗拉基米洛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康生的讲话起了吓唬人的效果。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礼堂,听众显然都吓呆了。人们突然

^① 转引自林青山:《康生传》,同前引第100—103页。又见《艾思奇延安笔记》,1943年7月15日,记录稿。

意识到,情报局头子掌握着多么大的权力,而胆敢捍卫真理的人,又会落个什么下场。”^①

康生的报告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中画上句号。据说,彭真刚要宣布大会结束,朱德突然走上主席台,用平静的语气质问康生,并对刚才的主题报告表示不满,但没有得到回答。彭真随即宣布大会结束,各单位各部门代表都默默而有秩序地散去。

时隔半个多世纪,据参加会议的王丹一回忆,当时坐在她旁边有两个秘密监视者,康生报告当中传来纸条子:“特务分子听了报告有何感想?”“特务分子赶快坦白!”她知道这些人是监视她的,便不理睬他们,自己认真记笔记。

另据参加会议的石澜介绍,康生报告时间很长,会议结束时,天已垂暮。^②

从杨家岭整队回到蓝家坪、枣园,或清凉山、南门外,要走三五里、七八里的路程。夜幕降临,胆怯的星光在遥远的夜空下隐约闪烁。参加会议的人们沉默寡言地行走着,谁都没有心思去抬头张望。

^①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同前引,第139页。

^②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94页。对于此次会议的具体时间,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多数人回忆是从中午到傍晚,整个一下午时间。只有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记作:“7月15日上午,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中直干部大会,延安所有机关都派人来听。”疑有误。见《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18页。

黑色的七月十五日

人生有的记忆是为了不忘记,有的记忆却是为了忘记。主观意志上为了忘记,恰恰是因为客观上不能忘记,生活中挥之不去。于是,人们改变记忆的颜色,用憎恶的颜色来表达仇恨的心理和厌弃的情绪,借以维持人间道义,呵护善良美好的意愿。

1943年7月15日,本来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①,可是,曾经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却将它记忆成一个黑色的日子。这是因为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对这个日子,对这天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直机关干部大会,越想越后怕。

185

这次会议之后的第二天,延安中央直属机关各单位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开展群众性的坦白运动和抢救运动。

据当时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预科读书的林伟后来回忆,该校1943年4月3日凌晨抓了5个人,然后就转入坦白运动。“号召坦白,坦白了的,吃一顿汤面条或带红花。好些干部子弟也去‘坦白’了。4月12日(星期一)开始审查我,我是预科中第一个被审查的,大学部被审查的,首先是彭尔宁。7月16日,来了个‘抢救运动’,在边区大礼堂听了报告,听完报告就不让回来了,由学校送饭去,第二天天亮才宣布回学校继续搞。开始是决定突击‘抢救’10天,当时把一些思想问题、说几句怪话看得很重,当成政治问题来搞。负责搞审查的人工农干部较

^① 参见《谢觉哉日记》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512页。

多,他们对边区外边的情况不太了解,曾闹出了不少笑话。例如有的单位有人问:‘你如何来延安的?’‘坐谁的火车?’‘你不是国民党员,为什么能坐上国民党的火车?’等等。10天没有‘抢救’完,又延长了5天,以后转入正常。抢救后大学部和预科合起来了,有四五十人,一起搞到年底,没挨整的寥寥无几。”^①

另据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罗迈(李维汉)晚年回忆:

边区政府系统也同样,在康生报告的第二天,7月16日召开“抢救”大会,就不要实事求是,不要调查研究了。在短短十多天中,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以“坦白”号召“坦白”。同中央机关和军队系统一样,边区政府也把张克勤请来作“坦白”报告,要他现身说法,劝说别人“坦白”。这叫做思想发动。第二次,欢迎和劝说。劝说“回头是岸”,欢迎上台“坦白”。气氛极为紧张。大会以后的若干日日夜夜里,我自己也头脑发热,参加了几次具体的“抢救工作”。如文书科的一个女同志,在“抢救”她的时候,满头大汗,紧张极了。研究室有一个同志,x校领导人打来电话,说他是“CC分子”,“抢救”了一个晚上,形式是和平的,实际上也是“逼、供、信”。教育厅有一个同志,因档案上有“CC”嫌疑材料,也“抢救”了他。财政厅有一个同志,是中央社会部通知我,说他是“叛徒”,要我把他送到保安处。我说保安处要找你谈话,他老老实实地去了。后来的甄别证明,他们都是一条心为党工作的好党员,但却把他们当作“两条心”抢救了。这时“逼、供、信”已十分明显和突出,我开始有所怀疑,有所警惕,但还是没有决心停止。第三次,控告。这次是我当主席,由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控告一个工作人员。场内群情激愤,如果有人提议处以死刑,也是一定会得到拥护通过的。我一看形势不对,只好立即宣布逮捕送保安处了事。台下还喊:“捆起来,捆紧点!”这样一来,我清醒了。原来还有5个被控告的,我

^① 林伟:《忆自然科学学院发展中的一些情况》,见朱鸿召编:《众说纷纭话延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65—166页。

与主席团商量,停了。会后,我请各厅负责人留下商量。我说,“抢救”大会已经搞得黑白难分,人人自危,不能再搞了。大家同意,就决定再也不搞“抢救”大会了。^①

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当一河大水已经浩荡汪洋,任何人都被卷入其中,要么检举揭发审查别人,要么被别人检举揭发审查。

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抢救运动的曾志,先在小组里用五六天时间报告自己的经历。“最初小组同志只是听,偶尔询问一两句,待我交代完了就让我休息了几天,他们则对我的报告进行研究、分析,提出疑点和问题。一星期后,转入小组内的面对面责问,人问我答,许多事情都要反复询问,我也必须反复回答。……这样大约又是一个星期,他们没有从我身上‘突破’什么,于是认定我属于顽固不化分子。小组便集中火力对我实行逼供,仍无进展,又扩大为全支部都来逼供,还是车轮战,白天黑夜不让休息,每天都要搞到下半夜两三点,有时则要通宵。所提问题都是事先作过分工的,只要我的回答不合他们的意,就有人用手敲我脑袋,或把我像皮球那样推来推去,甚至揪头发踢腿。比较有‘创意’的办法是把板凳翻过来,逼我坐在凳腿上。”^②

在抗大具有“创新”的坦白花样有: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等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这样,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602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57.2%;干部队496人中,揪出特务和特嫌373人,占75%以上。^③

这些都只是在单位部门里,同志之间开展的抢救运动。如此抢救中如果获得什么重大“突破”,则可以作为该单位部门的重大成绩、“大喜事”,上报上级领导机关之外,则是将被抢救的个人送交中央社会部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12—513页。

^②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35页。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462页。

或边区保安处接受专政。

1943年8月5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进行认识国民党的本质和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指出:“目前边区周围局势暂较缓和,延安地失足者的抢救运动亦告一段落,保卫边区与审查干部工作虽仍须继续进行不懈,但趁此时机利用活生生的事实与群众中已经激发的情感,有系统的[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实为迫切的需要。”通知规定自8月16日至31日,“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①。教育内容就是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中所谈论的对于当时如何认识国民党、蒋介石和三民主义的问题。显然,这不但没有停止审干抢救运动,实际上更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告诫学员们:这次党校一共开六门课,就是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党的历史、马恩列斯著作、军事课和文化课。通过学习,要达到季米特洛夫所说的干部四条标准,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遵守纪律。^②

8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从延安派出干部到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帮助开展整风运动。^③

8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认为:“特务之多,原不足怪。……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化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

^① 《中共中央总学委关于进行认识国民党的本质和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1943年8月5日。见《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118、119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3年8月8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2—463页。

^③ 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429页。

正确方针。”基于这样的形势判断，中央决定：“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级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最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这种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政治思想问题的办法，结果是造成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环境局面。该决定还要求：“各机关学校均严密地组织自己的自卫军，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戒严，除可靠人员携带通行证得互相出入外，一切有问题的人都暂时禁止个人外出自由，只许随大众集体行动。”^①这种自卫军，即后来的民兵，早在此前就已经担负戒严任务，只不过有的单位严格，有的单位不严格而已。这个决定一下达，延安各机关单位都非常严格起来了。

“审干一开始，各个单位都关了门，连亲族朋友也不相往来。”^②1943年7月15日以后，“这个城市已经非正式地实行戒严。各机关学校已经用栅栏围起来，并设有门岗。已婚的人被严格禁止与家人见面，否则就有被捕的危险。两人之间的私人交谈也明显地担有风险。”“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系，要通过康生情报局的特别通讯员。”^③

国民党军事封锁，进出陕甘宁边区的大门被关起来了。延安实行内部戒严，各单位的小门也被堵上了。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同志都被锁定在各自的组织机构中，接受思想检查和政治考验。运动中，上级领导视下级单位检举揭发的特务人数多少，作为其工作业绩与政治态度看待，于是，像开展劳动竞赛一样，各单位之间竞相开展坦白竞赛、抢救竞赛。

^①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29、330页。

^② 陈学昭：《天涯归客》，见《陈学昭文集》第4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47—148页。

^③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年3月版，第150页。

据张克勤晚年介绍,一次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坦白大会上,他被要求现身说法后,审干积极分子们就“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

在边区行政学院九班学习的一个组的同志,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按照坦白光荣,不坦白可耻的原则,他们随即举行庆祝大会。大家捐钱买了花生、红枣,还邀请其他组织没有坦白的人去参加。庆祝会上大家漫谈各自坦白的思想过程,启发没有坦白的同志回到本组去坦白。

边区政府总务处有一批勤杂人员出身贫苦,历史清白,文化程度较低,苦于没有问题可坦白,老处长因此急得吃不下,睡不好。平时大家都相处得很好,看老处长这个样子,同志们都不忍心。他们便私下商量,一是为了解除老处长的苦恼,二是坦白了有奖励,能戴红花,吃饼干,于是,大家一齐坦白成“特务”。这样,皆大欢喜,不亦乐乎。

据当时已经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地下党员朱子彤回忆:“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的,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代问题。”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促使他们交代问题;有时组织被关押的所谓“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坦白交代”,给他们施加压力。

有一位新婚不久的同志,一天因工作回家迟了,半夜到家,新媳妇仍独守孤灯等待他。他不仅不为之感动,反而认为她有问题,硬揪着她到一位负责同志那儿交代问题,弄得大家啼笑皆非。^①

杨家岭中直机关后勤处有三个剃头的,运动中也都坦白了。康生以此为发动群众的好经验,大发褒奖:“我们看杨家岭的勤杂人员有个经验,把群众教育好那时党才能巩固。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你说巩固了,你头、喉就不巩固。特务的刀子刮来刮去,还吹牛皮,我们的头在特务刀子下刮来刮去,这样危险的问题,多重要。你说吴奚

^① 转引自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12—213、217—218页。

如重要,吴奚如他不能挨到你的头,他不会每一个月拿刀子在你的头上、脖子上、喉咙上刮来刮去。你看多危险,说起来蛮有趣味,将来我们调查一下,看有多少人的头在特务、在特务的刀子下滚过,看延安有多少人头在特务道子下刮来刮去。”^①

这些荒诞不经的事,主要出现在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很低的革命同志当中。对于革命队伍的文化人来说,这场运动给予他们记忆最深的,是精神思想上的恐惧。

二

曾经留学苏联,参加长征后受党派遣从延安到河南,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危拱之,在听了张克勤的典型坦白后,被所谓的“红旗党”吓趴了。她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和经历^②,在自杀未遂后,“愿怎样就怎样”。其他一般同志就没有这份“自由”和“自在”了。

191

时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的王晓东(王峻昆)、何湘夫妇,下午还在王家坪的军委大礼堂布置会场,晚上就被本单位的一位干部和“两个手上端着枪、枪上还上着刺刀的人”,从炕头被窝里叫起来。“王晓东跟我走,”那位干部说。

王晓东起身出去了,两个拿枪的仍站在房里,大约十分钟王晓东又回到房里叫妻子为他找两件衣服和被子,说自己要走了。但那位干部不准他说话,应该由这位干部来安排一切。这位干部说:“何湘,王晓东被捕了,你把他的衣服、被子收拾好。”

这一句话有如晴天霹雳,她猛然从床上跳到地下,拉着丈夫问:“这是怎么回事?”王晓东很坦然:“不要怕,有党中央在跟前,什么问题都会弄清楚。”

“不准你说话。”再一次禁令。

^① 《康生关于整风、审干问题的报告》(1943年8月),记录稿,第65—66页。

^② 危拱之曾经是叶剑英夫人,此前,“她的身体非常强壮健康,有细小洁白的牙齿,实在是苏维埃女性的良好的代表人物。”参见[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180页。

妻子急忙收拾好衣被，带枪的人命令王晓东拿上就走。她不顾一切地抱着丈夫的胳膊，丈夫回头望一眼已经熟睡的小女儿，叮嘱妻子：“好好照顾孩子，注意身体，不要怕。”

“不准你说话。”又一次禁令。

王晓东被带走了，何湘追出门口，有人推了她一把，她跌倒在地。天下着雨，外边一片漆黑。何湘从地上爬起来，趴在围墙上，听到丈夫的声音“你们轻点捆”，随即一阵泥泞下山的脚步声。孩子已经被吵醒，她懵懵懂懂地走到房里抱起孩子，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来了两个同志对她说：“王晓东是特务，你好好想想把他的问题老实向组织交代。”没有其他话，说过就走了。何湘独自在屋里，孩子还不会说话，一片茫然。她下意识地抱起孩子呆呆地坐着，自言自语：晓东是特务吗？我和他认识至今，为什么没听他说过一句对党不满的话？……

朦胧中，她忽然想起昨晚丈夫被拉出门去，消失在黑暗中，会不会被枪毙呢？越想越不对。她把孩子放在床里，趁同志们都未起床，跑下山，顺着延河从文化沟口一直往下走，找了三四里的路，没有发现枪毙人的迹象。她又沿着山路往回找，也没有。她想如果丈夫被枪毙，就是被狼吃掉，地上也会有血迹的。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被枪毙。这样，她的心安定了些。

刚回到屋里，又来了两个人，责问她到哪里去了？她如实禀报，得到的是警告：“以后不准随便出去，有什么事要请假。”

从此每天都有人逼着她交代王晓东是特务的材料。她觉得自己没有发现丈夫有什么特务问题，就坚决不回答。

斗啊！批啊！骂啊！我都忍受着。叫我交代峻昆参加“CC”没有。可什么是“CC”我都不清楚，我说不出，又是一片批斗声。从精神上我已被折磨得不像样子。有一次，我觉得耳朵里有东西在蠕动，我用点水倒进耳朵里，顺水爬出两只虱子。由于这突然的打击，我的心脏跳动过速，常常头昏站不住，医生叫我躺着，不要多动，但哪里能行呢？每天都要受围攻，逼迫我交代峻昆的问题，后来发现我的痰里有血，而

且越吐越多，自己知道肺里有问题，但又能对谁说呢？（1983年我右肺切除，就是那时留下的病根。）我的心情不好，因此也影响对孩子的照顾，[。]有一天下午，我要写峻昆的材料，我写什么呢？我不能瞎编，我呆呆地坐在桌边，拿着笔，看着纸，这时突然听到孩子哇的一声大叫，我猛地回头，看见孩子爬在火盆边，嘴对着火盆上的热水壶。孩子渴了，她自己爬到火盆去找水喝，她的嘴被烫坏了，我扑过去抱着孩子，母女俩眼泪混在了一起。

大约是7月15日后的某一天晚饭后，她被叫去参加中央直属机关在中央大礼堂举办的另一场抢救大会，仍然是康生作主题报告，最后说：“胡宗南要进攻延安，有问题的人，现在是你们交代问题的最后时机了，我们再不等待了，今天晚上必须把问题彻底坦白，你们若不坦白，我不会开枪，但会下命令。”整个礼堂鸦雀无声，笼罩着一片恐怖。接着就有许多好心的同志们规劝所谓有问题的人，讲台上不断有人去坦白。凡是坦白的人，都受到欢迎，在讲台上唱啊、跳啊！可是，何湘就是不坦白，压力也越来越大，康生限令“十二点”前有问题的人要作彻底坦白，结束战斗。围在何湘身边规劝帮助抢救的同志们一个个心急火燎，有的人恶狠狠地说：“何湘，你真顽固，要为你的‘特务’丈夫而死吗？”

这时，我紧紧地抱着孩子，闭着眼睛，等待康生下命令“枪毙”。突然听到“何湘，站起来，跟队伍走！”啊！要枪毙人了。我睁眼一看，礼堂的人都在往外走。这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怎么也不能把女儿一个人留下，爸爸被捕，妈妈被枪毙，孩子这么小，孤独无靠，太可怜了。我把孩子贴紧自己的胸口抱着，跟着队伍离开了礼堂，[。]外面下着雨，刮着风，延河的水哗哗流着，人们静静地走着，到了延河边，我迟疑地站在那里，（因为小时候我看见过枪毙人，都是在河滩上）会不会在这里枪毙我呢？我默默地想着，一个同志说：“快过河，你站着干什么？”过了河，到了我们住的山下，我又站着了，我

是否能和同志们一块上山,回到自己的房里呢?一个同志关心地走到我的身边:“下这么大的雨,站在哪里干什么,快回房里去。”这短短的几句话,使我冷却了的心得到了一点温暖。回到房里,我把孩子放在床上,看看门外没有人,我迅速跑到组织部长的房里,跪在他的面前说:“王晓东有什么问题,我确实不知道,若要枪毙我,就把孩子和我一块打死,不要把她一个人留下。”我泣不成声地请求着,组织部长叫我起来。“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不起来。”我仍然跪着,组织部长又说:“你起来回房睡觉去,王晓东的问题会弄清楚的。”我静听组织部长的话,不像要枪毙我,而且从峻昆被抓走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有情理的话,我才放心地站起来。

接下来的六七天没有人再批斗她,但通知她从单位院内搬到山顶上的一个窑洞里。“在这孤单的窑洞里,母女俩相依为命,尤其冬天的夜晚,北风呼呼,饿狼在大貶[砭]沟内凄厉[厉]叫着,这时我只有把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以慰我那孤寂痛苦的心。”^①

在这整个事态发展过程中,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她在遭受逼迫的时候,对于下一步可能会出现遭遇,总是心理夸张,想像得很可怕,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她想像的一个个场景。但正是这种精神想像,无限扩大了事件的能指含量,从而造成强烈的思想恐惧和无边的心理恐怖。这是抢救运动中有文化人与没文化人根本不同的精神心理状态。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过后,原来住在蓝家坪“文抗”的专业作家们都陆续调走了,最后只剩下党支部书记刘白羽。“我们的窑洞一间一间空了出来,人走得一干二净,冷冷清清,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经请示,他被安排到其爱人汪琦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参加整风运动。不久,1943年4月15日,中央研究院名号被取消,归并为中央党校三部。一天夜晚,他参加这里的坦白大会。

在一间当作礼堂用的大房子里,那个戏剧性场面,不免

^① 何湘:《经受考验》,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449—452页。

使我愕然,使我震惊。所有的人黑压压地挤在屋里,前面一个土台,这时,中央研究院已改为中央党校三部。三部领导人主持了这场人与人之间的挑战,看谁先坦白交代。一位广东哲学家在台前不断声嘶力竭地奋臂高呼口号,这里的气氛突然炽热得变为一场骚乱。我站在人群的后面,眼看一个一个走上台去,还不断有人向台上递纸条。愈是亲近的人,愈要表明态度,于是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喊得愈加声嘶力竭,以表示自己的忠诚。……在这种关头,只要被递上纸条,念出名字,就得表示坦白,这样一次又一次轮回旋转,人们脑子糊涂了,思想混乱了。在“文抗”和我最要好的一个同志忽然悄悄走到我的背后,低声问我:“我应该向你挑战吧?”我当即愤然挥手拒绝了。这样一直开到夜深才散会。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心叫住他,对他说:“不是没有人向你挑战,我们收到四张条子不过没有公布;你的问题希望你主动交代。”

顿然之间,刘白羽觉得“毛骨悚然”。

第二天,我一个人陷入苦苦思索。平时活跃的三部,整个落入沉闷之中。人们走着路,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说话,大家的嘴巴都像贴上了封条。在这种情况下,愈是亲近的人愈须回避,何况被认为有问题的呢?我怎么也不能理解,我站在山上,看见一对夫妇在山下那一小片种着向日葵的园子里窃窃交谈,不太久,一个震颤人心的消息传了开来,这对夫妇回到各自支部,交代自己是“特务”。

经过那一夜大会后,斗争转入各个支部,“一个一个审查,有的大哭大闹,有的吵嚷不息,但一到吃过晚饭,满院里充满了欢乐”。再过些日子,晚饭后的欢乐也消失了。

如果我前面形容审干运动像是狂风暴雨,而真正的“抢

救”高潮，却像延河夏天的山洪，充满巨大的恐怖，挟持无穷的威力，一下冲击而来。当时我们常常到中央党校去参加坦白交代大会，多数是吃过晚饭之后。天已昏暗下来，我们趟过饱涨的延河，还要走过一段峻崖小径。在中央党校一部里，黑压压地挤满一个院落。我们秩序井然，纪律严明，一个支部一行坐在地上。前面是用木板搭的台子，一个跟一个上去，坦白自己的“罪行”。有一次我看到康生翘着腿坐在台下，洋洋自得，煞有介事。这种会经常开到夜深，台口点着两盏明亮的瓦斯灯，照亮坦白交代的人，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声泪俱下。每当这时，有人便带头喊起口号，有如大海洪涛，回环激荡。

在这些会议上，刘白羽虽然没有被点名上台坦白，但也不断传出对于他的“险情”报告，他的心理并不坦然。他反复对照学习整风文件，回忆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挖思想根源，写思想自传。直到晚年他还感叹：“这时我彷徨，我惶惑，这是锥心之痛啊！”

经过无数次的心理矛盾斗争，反省搏击，他的思想自传写了二稿、三稿、四稿，却一次次地被退回来。“一次退稿是一次打击，但我从哀恸中渐渐醒悟过来，我明白，我必须举起双手，向无产阶级投降。于是我痛下决心，举起锋利的解剖刀，从头细细地解剖自己。我从我刚刚记事写起……我克制了怜悯自己的心情，毫不隐藏地挖掘自己灵魂中的痛疽与腐朽……这是鲜血淋漓的生死较量。我为了洗去我的罪恶，连骨头缝都掏挖净尽了，可是还不行，这怎么办呢？”他的心就这样被悬挂着，“羞涩心加上耻辱感，使我整个灵魂都悚悚颤抖”。当第五稿交上后，他终于接到一张纸条，张如心约他去谈话。他害怕极了。

张如心住在小砭沟口高山上一个窑洞里。我在黑漆漆的夜空下，走过那弯弯曲曲的壁陡的山径，当我来到山巅之上，一种冷酷的感情缓缓升上心头，我的眼前一下发焦发黑，绝望之感猛然袭来。这样活下去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不如死了好，我忽然想从高高的悬崖跳下去……这一刹那间，我

马上出了一身冷汗,我慢慢停下脚步,呆呆站在夜空下,我觉得我像背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走呀,走呀,实在走不动了……天空星辰明亮,我想到刚才萌生的那个可怕的念头,不禁毛发悚然,浑身大汗。

总算挨到张如心的窑洞门口,战栗地推开门,他看到的“竟是张如心和颜悦色的笑脸”。他的泪水夺眶而出。^①

三

这种普遍存在的巨大的精神恐惧是怎么形成的呢?

客观环境上的无可逃脱,逼供信威逼着个人生命朝夕难保,是置身于群众性政治运动狂潮中的个人感觉到精神恐惧的主要原因。

延安,陕北,黄土高原经过亿万斯年的雨水冲刷,形成沟壑纵横、梁高谷深的特殊地貌。山梁与山梁之间,人可对歌信天游,走到一起却要大半天。道路都在山谷里盘旋,当时陕甘宁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大道通行需要护照或通行证,小路行走如果没有当地人做向导,很难走出黄土地。1937年12月陕甘宁特区政府规定:“凡出入特区边境的任何公民以及在职的公务人员必须持有特区政府保安处的护照,方准出入特区边境。”^②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加紧对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封锁,边区政府也加紧行旅检查^③,出入边境更加困难,奔向延安或走出延安几乎都不可能。

欧阳山的小说《圣地》记述抗战后从广东来到延安的一群青年知识分子中,张纪文、何守礼整风运动时试图离开延安,殊料他们“走了一夜,走迷了路,又走回原来的地方”^④。

^① 刘白羽:《心灵的历程》,见《刘白羽文集》第9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372—382页。

^② 《出入特区边境护照使用条例》,《新中华报》(延安)1937年12月15日。

^③ 参见《陕甘宁边区检查行旅办法》(1942年2月7日),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216—217页。

^④ 欧阳山:《圣地》,见《一代风流》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1566页。

到1943年抢救运动中,迄今所知唯一从延安出走的文化人是《解放日报》青年记者海燕、林坚夫妇。他们两人分别从延安、绥德出发,在清涧汇合后,取道宜川、西安,到重庆。边区政府保安处立即下令通缉“特务分子”海燕,因为这逃跑本身就是“特务分子”的明证。海燕,四川人,大学文化,先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总政治部工作,后调任《解放日报》记者。他个性鲜明,恃才自信,1941年11月陕甘宁边



边区哨兵 (徐肖冰 摄影)

区参议会期间,为争取与会记者的待遇问题而发动记者们联名向参议会提出议案,受到报社组织的严厉批评。“他害怕在整风运动中挨整,特别害怕在抢救运动中被捕,因而偷偷地逃跑了。”^①国共两党势不两立,作为经常在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上出现的青年记者,他们夫妇逃到重庆后,不可能被国民党机关接受,也没有宽敞的第三方空间容身,所以,他们只有主动找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向董必武同志坦诚交代、深刻检讨。

1939年底到延安,先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参与主持文化沟墙报《轻骑队》,1941年9月调到《解放日报》工作的李锐,因为一个大学同学被当作托派嫌疑抓捕后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特务并诬告李锐是他的“上级”,在1943年4月1日晚

^① 田方:《海燕事件——延安“抢救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炎黄春秋》(北京)1994年第12期。

的“大逮捕”中，被关进凤凰山麓边区保安处的黑窑里。审讯中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李锐的父亲是被红军所杀的，李锐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幸亏曾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秘书长、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的李六如向边区保安处作证：李锐的父亲1922年在长沙病逝，当时还没有红军。李锐亲属中的确有人被红军所杀，那是1931年红军一度实行极“左”策，在江西的亲属中男丁早已外逃，留下老弱病残被迫迁徙，路上两位祖母走不动竟然被推下山崖，其余亲属沿途病饿，要饭到长沙，投奔李锐家。李锐始终坚持认为，“这些亲人死于红军的极‘左’政策”。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关了一年又三个月。直到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访问，其中有一个国民党报纸的记者是李锐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吩咐有关部门将李锐提前释放，以便做些统战工作。这样，他才得救。

他追述自己被关押的情况是：

1. 严重的刑讯，搞逼供信。我受的刑罚还是比较轻的：5天5夜不准睡觉，不准瞌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枪监守，威胁），还要逼着写材料，不断受审。据说有这样一种理论，可能是苏联传来的：如此日夜紧张，可使受审者精神疲劳，终于说出真话。这种残酷的“疲劳战术”，听说有长达15天15夜的，姓名已经忘记了，千真万确。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我手上伤痕，几年才消去，也挨过耳光之类。

听到的有各种各样刑罚：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挨鞭抽（周兴即亲自这样打人）；假枪毙；等等。当时是几个人住一个窑洞，这种情况容易交流。第一次见到林里夫时（东北人，因上海党受破坏，1938年即关入狱中的“老号”），他伸出伤痕累累的双手给我看，说道：“这能解决问题吗？”

魏伯跳崖受伤之后，长期带上脚镣，因而双脚惨伤。赵一峰长期带脚镣，当时即神经失常；听说现在还不能提往事，一提就神经不正常。

还有饿饭的办法,专设“特字号”,将“顽固分子”集中,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

2. 发动群众搞逼供信假坦白(1943年夏季才开始,这是由当时延安的“坦白运动”发展到监狱来的),开群众大会围斗,也打人;树假坦白标兵,搞乱思想;严重的诱供。结果增加甄别的困难。

3. 在狱中见过钱维人(已去世)和蔡子林。这两人在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上早已宣布枪毙了。蒋齐生(原在新华社),只是由于一个同姓名的“特嫌”,而误关了8年。还见到多年[被]关成白毛女的人:满头白发的青年。

4. 窑洞卫生条件很差。铺草睡在地下,因而关节炎普遍。

5. 我是1944年6月有幸最先出狱的。其他绝大部分人都是日本投降后才放出来。“新号”、“老号”一起总共有三四百人,或者还多。^①

像这样被关押起来的有1500余人,被抢救成各类“特务分子”达15000人,抗战后到延安的新知识分子有80—90%被抢救成“特嫌”或“特务分子”,其中未能经受折磨考验,“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就有五六十人”^②。

被关押起来的1500人分三类处理,问题最为严重的被关押在位于枣园后沟的中央社会部监狱;问题严重的被关押在位于凤凰山麓的边区保安处监狱;问题比较严重的被分别关押隔离在中央党校、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有问题,但不很严重,或有特务嫌疑的,留在本单位受到看管和监视。

随着坦白抢救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处关押的人都越来越多,人满为患。仅边区保安处关押点,“凤凰山坡上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已经

^① 李锐:《在延安保安处受审情况》,见《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5—46页。

^②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0页。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同前引第222页。



位于枣园后沟的中央社会部旧址，整风运动中被揪斗出的重要“特务”、“反革命分子”都被收容在这里的黑窑里

201

挤满了人，又新挖了一些窑洞。原来一个炕睡四人，后来睡五、六人，挤得翻不了身。”^①

康生试图大开杀戒，“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审枪毙人”，被致力实现“三三制”政府、创办抗日民主模范特区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汇报毛泽东而制止了。^②

对此，康生自己的说法：“因为杀，杀不了，关，关不起，必然是宽大政策，必然是争取方针。”^③

宽大是有条件的，条件之外就是残酷的惩罚。除上述李锐在边区保安处所受所闻的惩罚，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式样，诸如：“给他喝很多水，不准溺；给他吃很多盐，不准喝水。”^④压杠子、举空甩地、焚香进逼（用燃着的香刺烫腋下），等等。仅关中地区的一个县就采用过24种肉刑。^⑤

① 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同前引第215页。

② 《林伯渠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286页。

③ 《康生关于整风、审干问题的报告》（1943年8月），记录稿，第46页。

④ 同上，第51页。

⑤ 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同前引第217页。

所有这些审讯和刑罚,最后主要都集中到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分子身上。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出身于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上学读书,在民族危亡之际自觉地选择延安,选择以抗日救亡为号召的中国共产党。他们中的优秀分子,秉承了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士可以杀,不可以辱”。他们彼此之间的文化程度或有高低参差,但是非褒贬、道义良知的理性价值观念,是他们共同的精神生命底线。

四

不杀人,而改造人,来自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把自己曾经考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以及中国古典小说中农民起义的韬略,还有长期游击战争对兵法文化的深切感悟,融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斯大林的政党学说中,出之以群众路线,用组织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问题。整风运动是他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的尝试和样板。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虽然开始强调整风学习中的领导作用,但仍然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在讨论中要发展争论,在规定检查期间内,不管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见,都得自由发表,不得加以抑制。”“在讨论与检查期间内可以出墙报,并设墙报委员会领导之。”^①

对于此前已经存在一年多、影响甚广的中央青委在大砭沟(又称文化沟)口主办的墙报《轻骑队》,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公开褒奖:“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55页。

普遍的发展。”^①据说,“早已存在”就是指《轻骑队》墙报。^②

整风运动之初,几乎各单位都出墙报,大鸣大放大字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除中央青委的《轻骑队》,还有诸如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西北局的《西北风》、关中地区的《新马兰》、三边地区的《驼铃》,等等。

中央党校学员还专门谱写了《整风运动歌》,一时间到处传唱:

野草除净,苗儿易长;/病菌消灭,身体健康。//同志们,
下定决心,//忠诚坦白,严正直爽,//克服不良作风,/改正错误思想。//一定要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造就优秀的
干部,//建设新社会的栋梁。^③

这首歌的曲调已不可知,但仅凭歌词完全可以想像,整风运动之初在鼓励鸣放的特殊政治气候下,同志们那种昂扬亢奋的精神风貌。

1942年6月,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会议多次重申,各级领导要启发引导群众,畅所欲言,暴露思想。“要使领导者善于启发,使大家有话敢说,展开争论,然后从容结论,达到真能‘治病’与‘救人’。”^④“各机关、学校出有墙报者,为着展开思想上、工作上的论争,对于投稿之选择,不论其正面的与反面的,正确的与不正确的,均应登载,不得抑制。”^⑤

一时之间,大家都以为整风运动的目的是帮助共产党找毛病,改善工作。

到1943年4月3日,只限于各地各单位领导层传达的中央《关于

^①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40页。

^② 参见宋金寿:《延安整风前后的〈轻骑队〉墙报》,《新文学史料》(北京)2000年第3期。

^③ 转引自王县:《革命干部的熔炉——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9页。

^④ 《中央总学委第二次会议决定事项》(1942年6月7日),见《文献和研究》(1984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221页。

^⑤ 《中央总学委第三次会议决定事项》(1942年6月15日),见《文献和研究》(1984年汇编本),同前引第222页。

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第二个“四三决定”)中,才透露,“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因此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上,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亦不能发现与肃清。因此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该决定还一再叮嘱:“不论同志的错误思想与内奸的反党表现,领导人员对之均要镇静忍耐,不慌不忙,以便冷静地正确地观察与辨别谁是有错误思想的同志与谁是反党的内奸分子。”^①

康生在1943年8月举办的整风审干干部训练班上对此不无得意地解释说: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如何进行“思想暴露”和如何组织“反驳深入”。他认为从1942年3月至6月23日中央研究院反王实味斗争大会,属于思想暴露的一个阶段。“那时候我们领导上的方针是强调四三决定的民主,号召大胆的[地]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刻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一般的是这样,于是这



王实味(1906—1947),整风运动中因写作杂文《野百合花》等,被打成“托派”、“反革命”,蒙冤遇难,1992年公安部予以平反。

^①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1985年10月,第355页。

个时期就热闹。”从6月23日批斗王实味之后到11月中央党校批斗李国华、吴奚如，“这时候不是强调四三决定的民主，而是强调四三决定领导方面，当然两方面也还有民主，也还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时候是这样，这时候是思想反驳，这个思想反驳一直驳下去斗争到深入……一些干部从一般的学习深入到个人反省，个人的实践，从一般的反省到个人坦白，所以那个时候就写思想自传，写历史自传。”并且，“这时候已经从思想斗争整风学习中，个别机关，个别人的身上，已经与审查干部反特务联结起来了。”通过这样的“纵”与“收”，康生得出结论：“我们的经验就是哪个地方自由主义特别多，哪个地方的奸细就特别多。”^①显然，所谓“自由主义特别多”的地方，就是发动群众比较成功，对领导和工作提出批评意见比较多的单位或部门。而最后衡量这些批评意见正确与否的决定权，不在这些提出批评意见的群众，而在于收拾局面的某些领导。

还有一项工作是树立反面典型，开展现身说法。整风运动中有两种不同的人物典型，一是平时就好发议论，好出风头，容易激起众怒者，如王实味、吴奚如；二是平时很平常，老老实实，但硬是从没有问题的地方整出问题，最足以警醒众人，如张克勤。

从1942年底到1943年底的大约一年时间里，整风运动的组织者精心物色，仔细挑选，组建一支由不同单位部门坦白积极分子组成的坦白报告团，被邀请到延安各单位作巡回坦白报告。成员中有西北公学的张克勤、边区教育厅的吴伯箫、原“文抗”的于黑丁、绥德分区的徐曼丽，还有马彬等人。^②1943年7月15日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12人坦白报告，是他们比较集中的集体亮相，平时因为邀请单位太多，多分散成三两个一小组，应邀到各单位示范表演。他们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张克勤，据他本人晚年介绍和当时参与审讯的李逸民回忆，实际

^① 《康生关于整风、审干问题的报告》（1943年8月），记录稿，第1—19页。

^② 参见高浦棠、曹鹿平：《吴伯箫：在抢救运动中》，见《记忆》文丛第1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81—86页。1943年8月1日，他们中的吴伯箫、于黑丁、马彬应邀到鲁艺作坦白报告。见《延安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1945年10月），油印件，陕西省档案馆藏。

上这个典型本身就完全是屈打成招，逼供信造成的。^①

当坦白运动、抢救运动相继兴起，造成一河大水，波涛汹涌的时候，对于任何一个被波涛冲击者来说，都是强大的精神折磨。“当群众性的坦白运动起来时，要使干部懂得坦白运动中的群众压力，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时至1944年5月，中央发现延安整风反奸斗争中“左”的错误，“最主要的是捉多了人，逼死了人，冤枉了人，损伤了人。有的地方和军队将所有新知识分子都认为是特务，有的学校将整个班的学生甚至十二三岁的小学生都戴上特务帽子，有的在一个整风班内使用24种肉刑及变相肉刑，有的农村将大多数居民都坦白成特务。”^②

1943年9月开始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期间，任弼时、周恩来等人对抢救运动提出质疑，时在1943年底，然后转入甄别平反阶段。为了对每个同志负责，甄别工作持续时间达一年多，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还有一些人没有做结论。经请示，毛泽东指示：现在东北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作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怕什么呀！^③据说，几无一人跑到国民党方面去。

对此，另一种说法是：“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位负责人指示，要求在历史老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中，罪行比较严重的处死一批。”^④

1944年1月，中央有关部门对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坦白和被抢救者作过分类统计，将其分为六类：职业特务、变节分子、党派问题、被特务利用和蒙蔽分子、党内问题、被特务诬害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但职业特务是极少数，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

^① 参见《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13—115页。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71—372页。

^② 《中央关于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同前引第389、390页。

^③ 转引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关于蔺克义案件的调查报告》，1981年10月29日。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同前引第223页。

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①这些人当中,又以经济贪污、生活作风、道德败坏、工作渎职等为多。有的基层单位干脆将整风运动变成主要是“公审贪污腐化分子”活动。^②同年的3月,康生在西北局干部会议上说:“坦白运动,是我们审查干部进行反奸工作一种好方式,是暴露敌人,调查材料,搜集证据的一种好方式,也是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干部、教育群众的一种好方式。同时,坦白运动不仅限于审干反特可以使用,不管对那[哪]类事、对那[哪]类人,都可以适用的。一年来坦白运动采用过多种形式,经验证明最好的形式,是采取整风学习自我反省的姿态,不要求只坦白特务问题,而欢迎坦白的、道德的、工作的、思想的、政治的、党派的、特务的各种问题。……在一切坦白会议或谈话中,均须提倡说老实话,解释坦白就是老实,坦白运动就是实事求是,反对一切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③

在当时的体制下,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舆论,怎样实施对自身组织结构的监督保洁,是社会有识之士普遍关心的问题。1945年7月,黄炎培和其他六位社会知名人士到延安参观考察后,问共产党能否跳出中国历史上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④

^① 《中央关于坦白分子的六种分析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1月24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同前引第387页。康生在1944年3月29日的西北局干部会议上说,这三类“共占坦白者90%以上”。曾任国民党军统局西北区区长的张严佛晚年介绍,他们曾经试图通过在延安电报局安插特务,以及收买来往陕甘宁边区的小商小贩等办法,都未得逞。其主要原因还是边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得到了实惠,拒绝接受国民党的挑拨和收买。参见张严佛:《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101—104页。

^② 《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54页。

^③ 康生:《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演》(1944年3月29日),记录稿。

^④ 黄炎培:《延安归来》,《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04—205页。

“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①延安抢救运动之后，其基本模式经验被迅速推广到其他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

主持延安中央党校整风抢救运动的彭真认为：“抢救运动是对是错？我们把它的内容分析一下：第一，叫特务分子坦白，现身说法把自己讲一讲，这是对的，他一讲别人就动摇了，在思想组织上就瓦解了敌人。第二，群众的检举，群众的质问。好多特务就是这样被群众检举出来的，只要引导正确，这个方法是可以用的。第三，大家都隔离开，关门整风，把敌人隔开，各个击破，使之不能商议，好多材料都是这个时期搞出来的，这个方法是很有效的。第四，把群众动员起来，就能清查的特务。群众未动员起来，群众还在睡觉，他会说我们这里那[哪]会有特务？这就没有了警觉性。抢救运动起来以后，把黑暗扫光了，来个灰锰甲洗澡，教育了群众，教育了干部，打破了对蒋介石的一些幻想，肃清了投降主义的思想，从思想上瓦解了特务和国民党。假如党校只用三五个人进行审干，那就不会得到什么经验，也不能教育群众。而大家动手，就都有了审干的经验，好有好的经验，错有错的经验。问题就在于总结经验教训……”^②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任上也同样受到群众运动的冲击。对此他不能接受，也不能理解。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态度激昂地责问：“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意思是说他是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的人。^③尽管如此，仍然无济于事，他终未能摆脱首批被打倒、惨遭十年残酷迫害的命运。

从1944年元旦到1945年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不同场合向整风抢救运动中被抢救者公开道歉。康生在1945年5月2日的七大第六次会议上，作对毛泽东政治报告的认识和两年多反奸工作经验教训的发言，未作一字的自我批评，引起与会代表，尤其是受到抢救运动冲击的代表们的强烈不满。但5月3日，他仍然作为第七次会议执

^①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页。

^② 转引自《延安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1945年10月），油印件，陕西省档案馆藏。

^③ 曹颀：《“万岁”的故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透视》，《报刊文摘》（上海）2003年2月24日。

行主席主持当天的会议。会议选举时,康生仍然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他被免除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职务。1946年12月,康生出任中央土改工作团团团长,先到陇东地区考察土改情况,次年3月又从陇东到晋绥分区的山西临县郝家坡主持土改工作。毛泽东让其爱子毛岸英跟随锻炼。毛岸英“他不算团员,是毛泽东把他托付给康生的,要康生把他带在身边”^①。1956年康生被重新委以重任,历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12月去世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讣告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五年后,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党籍,撤回1975年的讣告,将其骨灰驱逐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1967年2月,听说陈毅重提延安抢救运动整人整得太凶,警惕“文化大革命”重蹈覆辙,毛泽东非常恼火,说道:“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那就叫陈毅上台,我下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去!”^②

^① 于光远:《毛岸英的故事》,见《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初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03页。于光远是当时该工作团成员之一。1936年底,康生受派从莫斯科到马赛港(一说巴黎火车站),接应随东北军将领李杜从上海到法国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然后将他们带到莫斯科。见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65—66页。对于此次毛岸英随康生参加晋绥土改,另有说法是,康生“他给自己拼凑了一个班子,包括把分局(晋绥分局——引者注)副书记张稼夫同志拉到自己身边,还特地邀来毛主席的长子岸英参加他的土改小组,说是为了跟他‘学习’”。但毛岸英本人对这次随行似乎兴致很高,自己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很有趣”。“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他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这个组的工作。”见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年1月第2版,第273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同前引第566页。又见林青山:《康生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2版,第336页。

男女篇

考察延安生活的情感方面，女同志、恋爱、婚姻等，探讨改造人、重新塑造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蘇
氏
行
記

飒爽英姿是怎样炼成的

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是一道风景。她们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逃离旧家庭,投身革命的队伍里,军事化生活强健了体魄,脱落了小姐们的脂粉气与羞涩感,在磨炼出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女性飒爽英姿的同时,又承载着革命婚姻带来的光荣与苦痛,有的甚至付出了肉体和精神的沉重代价。但她们没有因此而发出公开的叹息或尖叫,只有用更加革命的外衣包裹起自己曾经受伤泣血的心灵。

213

1938年8月3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陈学昭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和我们(指何、陈——引者注)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顾她”^①。何穆、陈学昭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一为肺结核病专家,一为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而欢迎的高级人才。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介绍,途经西安到延安,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

而这位同样受到特别照顾的女青年,原名温联琛,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刚刚翻字典取了一个化名叫夏沙,时年只有14岁。她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从小娇惯。抗战爆发后,其父温崇信出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

^①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52页。



梳运动头,穿制服,扎腰带,脚上的草鞋也用红布条作点缀,这群初到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们浑身上下都透着那个时代的时髦和青春气息

214

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①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武汉时,夏沙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把她拦截下来。到重庆,夏沙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②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夏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再次形成,重庆方面自有关照,因此,伍云甫也就特别看待夏沙这位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

延安革命队伍里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大都走过一条叛逆者的道路。她们首先是背叛自己出身的中产阶级家庭,投身抗战救亡的革命行列,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后,继而更背叛自己曾经出生并成长着的那个阶级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给她们首先

^① 参见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9页。温崇信祖籍广东梅州,生于江苏扬州,留学美国,后来到武汉、重庆、宝鸡等地任职,与邵力子、李宗仁交游深厚。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任市政府秘书长,后去台湾。女儿到延安后,就与其断绝了父女关系。

^② 黎辛:《我说说夏沙》,手稿。

带来的是一种离家出走、人身解放的无限畅快感。

1938年3月,原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阎明诗,离开成都来到武汉,寻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周恩来亲自接待了这位时任“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阎宝航的千金,看其幼小的年龄,问她:“你吃得了苦吗?”她故意提高嗓门,声音响亮地回答:“能,我能吃了苦!”在等候通知的日子里,她想到:

由于父亲的社会地位,我一直过着教会大学生的优越生活。现在就要踏上革命征途了,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鞋,那是一双进口的捷克皮鞋。这种鞋是不能穿了,它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称。我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那是梳的披肩长发,[。]我立即跑到附近的一个理发店,理了一个露耳朵的短发,大家看了都说我像个假小子。

215

不久,她被组织安排从武汉乘火车经郑州到西安,再改乘汽车到延安。“我以为,自己踏上了革命的路,也就是革命的人了,不能有一点自私自利思想。因此,一路上把我随身带的钱和衣物都分给了大家。”^①这不是杜撰的故事,而是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细节。

抗战爆发后,四川成都街头的宣传活动一度非常火热。时在中华女子中学初中读书的孟于,是十五六岁的妙龄少女,生来一副好嗓子,她积极参加学校进步师生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经常到街头、茶馆、集镇去唱歌演讲。她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地演唱着东北人民家破人亡、四处流浪的歌谣《松花江上》(张寒晖作词作曲)，“爹娘啊,爹娘啊……”,后被父亲获悉,得到的严厉呵斥是:“我还没有死,你就哭了?”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一顿狗血喷头的狠骂后,她保证以后不唱了。

不久,她又参加宣传活动,在茶楼里演唱另一首抗日救亡歌曲《丈夫去当兵》(老舍作词,张曙作曲),被一位父执朋友听到了。这位关心她的长辈当晚就转到她家,对她父亲说:

^① 阎明诗:《总理送我上征程》,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4页。

“你闺女的戏唱得好呀!”

“什么戏?”父亲不解地问。

“哼,什么戏!‘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毛儿的爹你等等我,为妻的将你送一程……’”

“啊?这还了得!没出嫁的姑娘怎么到大街上、茶楼里唱歌唤夫君呢?”这还成何体统?还有什么脸面呢?又是一次更加严厉的训斥责骂,她违心地再作保证下不为例。^①

可是,烽火连天,国土沦丧,青春热血为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所鼓舞,孟子再也忍受不了旧家庭和社会的束缚,1939年7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来成都招生,她毅然报考并被录取。“我和李仲民是偷偷从家里出走的,出发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们到我们向往的地方去了,请不要找我们……”^②半年后,她和伙伴们终于从宜川转赴延安。

进入革命的队伍,一声“同志”的称呼就让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们感慨万千。她们曾经是小姐或太太,但她们无限向往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在军事化的革命队伍里,生活供给,精神清洁,她们最初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意气风发,自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孙铮,被称为“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其父孙泽余是安徽桐城人,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孙泽公,也是她读书时的监护人,曾留学日本,出任冯国璋



抗战的号角唤醒了中华儿女强烈的民族意识,冲出家庭,叛逆社会,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奔赴延安,成了一代热血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

^① 孟子接受朱鸿召电话采访记录,2002年7月12日,北京、上海。

^② 孟子:《抚育我成长的摇篮——延安》,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同前引第289页。

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更是雍正王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抗战爆发后，孙铮从北平第二女子中学回老家奔丧，借读安庆女子中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叔父怒不可遏，她干脆登报声明解除被监护关系。她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和“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1943年7月辗转到达延安。她用自己清脆的歌喉为抗战作宣传，在读书会上大胆发言讨论。“在这些讨论会上，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事情做得不好，后来认识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评；看到别人的缺点，可以提出批评，帮助别人进步。这使她感到新奇。在她的记忆中，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从来都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她仿佛沐浴到一股清风，和煦而有力地荡涤着自己的灵魂。”为此，她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①

对家族的反叛，对革命队伍的向往，这是奔向延安的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在革命队伍的知识女青年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据统计，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出身多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亦有极少数的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其中：

知识分子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4%。

大学程度的10%，中学程度的70%，其他为特别班的程度。

最大的41岁（1人），最小的14岁（2人），最大部分的年龄在20岁左右。包括不同的21省，以河南、四川、江苏、湖北等省人为最多，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为最少。此外，还有一个台湾人。^②

^①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3页。

^② 《王明同志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妇女》（延安）第1卷第3期（1939年8月）。

中国女子大学是中共为专门培养妇女干部人才而创办的,是那个时代中国妇女寻求解放,争取女权的象征。女大只存在两年时间,学员主要是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陕北公学(陕公)女生队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办的妇女培训班抽调归并,或公开招生而来,在延安革命女青年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20岁左右的年龄,初高中文化程度,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敢想敢干的叛逆性格,是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的主流属性。她们接受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关于妇女运动的理论阐述,相信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只有消灭了私有财产,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翻身解放,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只有在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下,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解放。

二

走进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青年,首先改变的是身体,集体生活练就了她们青春健美的飒爽英姿。

过集体军事化生活,是革命女青年体验革命的新奇与崇高的开始。到达延安的初夜通常都被安排住在城里的招待所或南门外的西北旅社,食宿全部免费。延安以自己的方式,张开双臂,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叛逆者。这些生长在村镇大家庭或城市殷实人家的知识女青年,初进延安感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神奇。

1938年10月24日,17岁的于蓝随队伍从晋察冀根据地过黄河到延安。这时的延安古城还没有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自1936年底从东北军手中接管过来以后一直保存完整。傍晚时分,这支小分队步行进了延安城,“城内一派和平景象,人们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于蓝和她一起到延安的伙伴赵路到了招待所,放下背包,让队长去办理报到手续,她们自己却轻轻地跑出去玩了。沿着街道,边走边看,她们“有说不出的欢快和新鲜感”。穿着灰色、蓝色制服的“公家人”,与坐商行贾的老乡们和平买卖交易着。来到十字路口,她们看到很多人涌进一座非常洋派的教堂改制的大礼堂。“我俩怀着好奇的心理,也跟着拥



1938年10月,初到延安的于蓝,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涌]进去了。只见里边黑糊糊地坐满了人,歌声沸腾着,台上有两盏灯,后来才知道它叫汽灯,要打足了气才能燃着。灯上边挂着一条红布大横幅,横幅上贴有白色美术体的大字:‘干部联欢晚会’。醒目的横幅再加上‘干部’、‘晚会’这两个词语,在我的人生中是第一次看到,好不新奇啊!”^①还有队与队之间互相拉歌的场面、话剧演出等节目,更是令她们耳目为之一新。看过晚会,别人都散场了,她们才想起来自己今晚不但晚饭没有吃,而且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睡呢?

赶快按照原路找到招待所,女生宿舍的炕头和地上都睡满了当天来延安的新人们,她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将就着熬过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填过表格,她们就被编入抗大8大队第5队。一年后,她们又转入中国女子大学。

编入革命的队伍,穿上统一的制服,这些叛逆的女青年就开始了真正的革命者生涯。从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后到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前,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进出延安的大门基本上是敞开的。中共党内集体领导,生活相对民主,延安给予这些革命女青年的天空和舞台,都格外富于革命理想主义的浪漫情调。

1937年12月31日,元旦前夕的延安街头,到处都是抗日救亡的标语、口号、漫画、宣传画。“假若有凉血的人走入这样的城池,我敢担保‘他的血一定会沸腾起来的’。”在这火热的救亡革命气氛里,身穿制服的革命女青年格外引人注目。“各机关都放假了,冷静的小街上,行人格外的[地]增多了,一些青年的学生们——抗大与公学的学生——生气勃勃的[地]穿过街心,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走在行人密密的街

^① 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34、35页。



奔赴延安的革命女青年,有很多出生于中产以上的家庭。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有过像童年的于蓝(右二)这样的家庭和生活

头,尤其是一些女军人,看来更加出神,她们谈着,笑着,一点没有什么拘泥;她们穿着那庞大的灰布棉衣,鸡婆似的[地]跳着,怪天真的,谁敢说女人比不上男人呢!”次日早晨,就是1938年的新年元旦,“太阳射出那万丈光芒,风也停止了!一群群的青年男女,带着马,穿上‘老资格’的军服走到旷野里去,它[他]们兴奋的[地],快乐的[地]跑着马,说着,笑着,简直是一群群天使,他们几乎忘形了!跑得够了,大伙围在一块野餐,他们的食品,不会有什么洋套,而是这里出产的核桃、花生、南瓜子,看他们真吃得顽强起劲,‘欢迎××唱歌’‘欢迎××跳舞’的高亢声音,不时的[地]由他们的圈子中吼出来,静下去,继着就是个人或几人的唱歌跳舞,他们毫不拘泥,他们毫不顾虑。”^①曾经叛逆的斗争和长途跋涉的艰难,都兑换成了对于延安革命圣地的热情崇拜和万丈豪情。走在延安的街头上,她们甩甩手,手是自由的;踢踢脚,脚是自由的;扭扭脖子,伸伸腰,感觉到哪里都是自己的了,再也没有了曾经在那个中产阶级旧家庭里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她们尽情享受叛逆、解放、革命带来的无限畅美的最初体验。所以,当她们群体出现的时候,相互感应,彼此激荡,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夸张身体扭动的幅度,不时地发出夸大其词的惊叹与尖叫。

不过,这种最初的美好经验持续时间并不长。她们一身戎装,

^① 烈群:《新年的延安》,《大公报》(汉口)1938年1月25、26日。

很快就被整合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分子,接受集体军事化生活的磨炼。

抗战初期,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所属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青救”),在国统区的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和“战时青年训练班”(“安吴青训班”),是西安事变后共产党接受、训练并甄别革命青年的一个早期场所。^①教学单位的组织机构为连队,学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安排全部军事化。每天早晨的跑步操练、临时安排的夜行军和野外拉练,以及帮厨、修路、运粮、背柴,甚至开挖窑洞等体力劳动,使得这些投奔革命的知识女青年饭量大增,体格逐渐健壮起来,一改从前弱不禁风的小姐模样。据亲身经历者介绍:

诚然,有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学,在刚来的时候,捧起碗筷来看着那单调的青菜豆腐汤,不免发愁,吃不饱饭,夜里还要遭受到“游击队”似的跳蚤之袭击,确有坐卧不安之感。可是过了几天紧张活泼的生活之后,他们也居然吃得下三碗大米饭(这是她们空前未有的饭量),跳蚤的活动,也失去了劫夺她们美梦的作用了。

每逢劳动日,女同学像男同学一样踊跃地参加劳作。尽管她们气力不大,但并不气馁,相反的,都拼了命似的要在这些工作里获得她们的成绩。^②

据另一位曾经是上海“小小流动剧团”团员,1938年9月来到安吴青训班的当事人晚年回忆,刚到青训班生活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清晨闻号起床、野外跑步、集训,然后回来才洗脸、吃饭:

^① 安吴青训班1937年10月1日最初创办时,借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陕西省泾阳斗口村农场的房舍;11月中旬,迁至云阳镇城隍庙;1938年1月,再迁云阳北边的安吴堡一座地主庭院里。1939年8月,主体部分迁往晋察冀边区并入华北联大,1940年4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青训班全部撤离安吴堡回延安。参见王县:《革命干部的熔炉——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04—110页。

^② 夏青:《青训班的女同学》,见《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114—115页。

天还是漆黑的,我正在睡梦中,就被紧急集合的哨声惊醒,我迅速起床,跟上了队伍。我从脚步声里已辨别出我们已经跑出了城堡的门洞,向着开阔地、田埂、小松林,向着山坡跑去。一小时后,我才发觉我的脚已踩在山顶上的一块巨石上,在迷人的晨星微光之下,我看到山坡上站着一个瘦长个子的人,他是我们的军事教员,他把这次演习作了讲评。然后,我们又回到城堡。这时候,黎明才悄悄地来到,城堡的周围飘荡着浅蓝色的丝带。不久,我们在城堡外筑起一条很长的简易跑道,整个青训班的同学们,不管是多么刺骨的寒风,还是多么凶恶的风沙,几乎每天都要出城进行军训,跑步。这之后,才回到城堡进早餐。^①



每日晨训,不间断的军事演习,男女同学都要参加,是青年知识分子到延安后在革命集体生活中必须接受的又一项考验

^① 葛炎:《古堡的足迹》,见《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同前引第221页。

这种军事化生活管理,是当时延安革命队伍和学校的普遍现象。它强壮了投身革命者的体魄,培养了组织纪律性,磨炼了顽强的意志,也改变了革命女青年们的身心面貌。1937年8月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学员在校同样采取军事编制,平时生活要求军事化、战斗化。据时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后来介绍:

军事训练把女学员由娇柔的小姐训练成英武的女战士。女学员开始时不适应夜行军快速集合的要求,深夜紧急号吹响了,女生队乱成一团,这个穿错了鞋,那个摸不着袜子,还没出发,背包带又散了,笑料百出。一回生,二回熟,训练几次之后,几分钟内,女生队就报告“集合完毕”,得到军事教员的夸奖。夜间站岗女生队也同样参加,开始时,听见风吹草动,腿就发软。但是硬着头皮坚持。当我问到她们怕不怕时,她们挺胸立正说:“报告校长,不怕。”

223

除了军事训练外,女学员们还要同样参加体力劳动。

劳动锻炼了她们的肌肤和意志。第五队是第一个女生队,她们和男学员一样参加了建校劳动。挖窑洞,平操场,修厕所,都不甘落后。镢把比她们手腕还要粗,她们拼起全身的力气抡起沉重的镢头,胶质黄土格外难挖,但她们不退缩,不叫苦,一点一点地挖洞不止。劳动的第一课,炼硬了她们的臂膀和意志。^①

中国女子大学也是这样。“为了回答日本鬼子的企图渡过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动员了全体教职员工学生实行军事化,天天练习爬山,跑步,学习防空防毒,准备行军,白日夜间经常演习行军和紧急集合。”^②据当时的女大学员晚年回忆:“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就要集

^①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47页。

^② 郭靖:《女大概况》,《中国妇女》(延安)第1卷第2期(1939年7月)。

体出操,自此一天所有的生活和学习都是军事化的。1940年,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延安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冬天寒风刺骨,我们每天洗脚洗脸都在延河。吃的是小米饭,一天两顿,没有菜,有时饿得难以忍受。”^①也有不能坚持者,便离开了延安,退出了革命行列。

延安的物质供给是贫乏的,但军事训练和体力劳动给予了她们肉体的饥饿与精神的富足。前此早在1936年10月就率先来到陕北的革命女作家丁玲,在革命队伍里摸爬滚打了一年多时间后,接受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采访时说:“我喜欢此地简单的生活,我正在长康健长肥起来,虽然我来之前是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②大量活动,坚持劳累,人就能吃得多,睡得香,长得壮。同样,那位从“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孙铮来到延安鲁艺,参加大生产运动,“一个星期吃一次馒头,她一顿能吃五、六个。平常吃小米,她也是一大碗一大碗地吞。”^③

初期来到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青年,感受到的是比较简单和淳朴的同志关系、集体温暖和昂扬精神,民主生活会上批评与自我批评蔚然成风,很是鼓舞人心。丁玲到陕北后曾跟随红军队伍上前线,担任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感觉到“在这里红军的生活中间,使人觉得非常快乐和年轻。他们是那么坦白活跃,又那么年轻。红军兵士们是一个完全新的典型,中国别的地方所不能找到的。除了革命,他



我是一个兵,我是一个骄傲的文艺女兵!这种感觉不仅是丁玲的,几乎所有飒爽英姿的背后都以这种感觉为精神支撑

^① 贾保平:《从小学教员转变为革命战士》,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同前引第176—177页。

^②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269页。

^③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60页。

们无所知。因为他们本来住在苏维埃化的地方,他们没有财产的意识,没有家庭观念。心里从来不会有不快乐。他们只想到如何去克服他们工作的困难,从不想到他们的困苦。”但同时,她又发现,“红军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因为它不是从土地而是从土地革命产生的,它的组织坚强得惊人。”^①这种坚强得惊人的组织,其中一个重要的组织原则,就是民主生活会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位于延安城南门外杜甫川的自然科学院,是个男女兼招的战时高等学校。“每周都有一次生活漫谈会,分组进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都本着革命同志间团结互助的精神,有啥说啥,不讲客套,偶尔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但并不强加于人,争完就过去了,不存什么事。这种直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而使同志间的关系更为融洽。”^②

安吴青训班的集体生活中倡导精诚团结、吃苦耐劳、克服困难、自我批评四种精神。其后者为:“无论谁,缺点和错误都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既然不明知故犯,犯了错误,也不害怕,更不隐瞒。而要能鼓起勇气,立下决心,细心检讨,认真纠正。特别是能虚心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这样诚恳地提出和接受批评,互相帮助,共同发展,才是真正亲密团结的基础。”^③该训练班初办时期学制只有2周,到第5期增为1个月,到第8期增为3个月。凭着民主生活会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利器,训练班发挥着巨大而快速的同化功能,尤其是女生连队的集体生活。

在每星期开始的时候,新同学们从外边带来许多新消息和经验来,也带来了许多不好习气。有些人喜欢“自由自在”地和她的爱人卿卿我我地碰在一堆;有些人和男同学认识了几天就大谈起恋爱来,甚至破坏了生活纪律,不按照作息间,引起落后的群众的误会;有些人爱出风头,整天吹牛,迎奉别人;有些人自以为癖性天生,高兴一个人躲在一个角落

^①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同前引第269页。

^② 胡琦、何华生、许明修:《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办的经过》,见《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96—397页。

^③ 刘瑞龙:《战工团下乡实习工作的总结》(1939年2月),见《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同前引第140页。

里不声不响地“独立门户”，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理……真是各具一格。可是这些浪漫的古怪的等等习气，不久便“沦亡”了。因为在每个星期六的晚间，她们经常地举行一个生活检讨会，大家拿出自我批评的武器，消灭各种不良倾向。积极、诚恳、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精神大大的[地]发扬了，渐渐地大家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①

这种军事化集体生活的影响，既赋予了革命女青年们飒爽的英姿，又塑造了她们直爽、泼辣，无私、无畏，没有羞涩感，一切相信组织，一切依靠组织的情感范式和思维模式。

三

226

用军事化的方式来锻炼她们的目的，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斗争就需要讲原则立场，更需要站到前台作面对面的较量。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尤其是在各类学校培训的女同志，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的后备人选。她们必须抛弃传统闺秀和仕女的羞涩感，学会理直气壮，斩钉截铁，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走上前台，发表言论，激起众怒或拥护。

红军初进延安城，被派往延安县担任妇女部长的周生荣，是个年方18岁的米脂姑娘。晚年她对来访者爽朗地说起这段经历：

18岁的姑娘，正是害羞的年龄。这羞，一方面是生理原因，一方面是感情上的原因。因为中国人对姑娘的审美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那姑娘知不知羞，没有羞态就显示不出其美态。我们米脂就有这么个讲究：要是谁家的姑娘对人讲话干干脆脆，脸不红，声不软，就会遭人说闲话。

可是，我是延安县的妇女部长，若是羞羞答答，就没法工

^① 夏青：《青训班的女同学》，见《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同前引第115页。

作,就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所以,我就不能羞。

我到乡下,把成千成百的婆姨子往一块一召集,就站在碾盘子上挥着胳膊大声作动员。^①

几年后,由习仲勋代表党组织,安排决定了她与李会有同志的婚姻大事那一刻,她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到了羞涩的情感。

那一天,她到习仲勋那里去谈工作,正“巧”李会有也进来了。她大大方方地主动与李握手,李却蹑手蹑脚地往后退。她心想,这人怎么还这样封建呢?

习仲勋笑着把他们俩看了一阵,拳头砸了一下桌子说:“你们两个美得太!”

李会有脸红腾腾地也跟着说了一句:“就是美得太!”

周生荣懵了,闹不清领导同志说的是啥意思,就问:“什么美得太?”

习仲勋把腰一挺,朗声笑道:“你们两个过日子美得太嘛!”

地道的陕北话,醇厚质朴,说道这等新潮时髦的革命婚姻,抑扬顿挫的腔调里,满蕴着的是美轮美奂、醉人心脾的豪情爱意。

有习仲勋代表组织这么一说,李会有就两眼瓷瓷地短距离地直盯着周生荣这个爱恋已久的对象。周生荣的感觉是: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呼”地一下子都涌到脸上来了,脸红得不敢见人;心潮一涌一涌的,不知道自个儿是谁了。

这一下着实把我羞坏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害羞。我体会到:女人真正的害羞,往往只是最幸福的一瞬,而这幸福的一瞬会让你深深地铭记一生。^②

羞涩,是青春的波光闪烁,是少女至真至纯的情窦初开的天然美

^① 黄富强:《米脂婆姨——中国第一美人窝秘闻纪实》,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4页。这是一本对延安时期米脂地区诸多历史人事的采访记录,遗憾的是书名副题如此艳俗。

^② 黄富强:《米脂婆姨——中国第一美人窝秘闻纪实》,同前引第18页。

姿美态。但很多叛逆的女青年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之一,却是部分地或者干脆是完全地丧失了青春和性别的羞涩感。革命在占有了她们的全部作息时间和生活空间后,更进而充斥了她们几乎所有的情感器官和思想领域,将她们从肉体到精神都全副武装起来,锤炼成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革命运动全民皆兵,这些延安当地女子经过组织动员,也被纷纷武装起来。一身戎装,刀枪在握,成了边区妇女追慕的时髦

1944年夏天,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采访的记者们发现,经历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后的延安,“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①采访中,这些来自外来的记者们注意到,“失却了一部分家庭生活的烦恼,使这些所谓新女性恢复了大部分的自由,她可以工作,不必再倚靠男人生活,她可以不必再死忍气听受丈夫的无理谴责了!”“延安新女性给人的印象,是她们能够

^①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版,第58—59页。

那样泰然生活的精神,确是配合着男性做了同样的工作。”^①甚至通过观察比较,深刻的记者们当时已经意识到,在延安革命队伍里,最有典型意义的不是那些出了名的模范共产党员,而是“女同志”们。

从那些“女同志”身上,我们最可以看出一种政治环境,怎样改换了一个人的气质品性。

她们有的来自天津、北平,有的来自上海,有的已在各沦陷区工作过,长远的旅途以及工作的经验,加强了她们的倔强性。一般说起来,“女同志”的好胜心理,都超过男的,她们唯[惟]恐受到[被称为]“弱者”的批评,所以尤其要特别表示她们的倔强性格。

另外有一部分女党员,是从工农出身的,旧时代的家庭生活磨难过她们,因而她们此时的急进,也甚于普通人。

所有这些“女同志”都在极力克服自己的女儿态。听她们讨论党国大事,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比我们男人还要认真。恋爱与婚姻,虽然是免不了的事情,可是她们似乎很不愿意谈起。至于修饰、服装、时髦……这些问题,更不在理会之列了。

有一次,这位记者斗胆放肆地问一位 C 女士:“你们简直不像女人!”得到的回答是富有挑战意味的执拗的反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

政治生活粉碎了她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被工作上的交际来往冲淡了。因此,原始母权中心时代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渐在她们身上复活了。^②

这是经过整风抢救运动的精神清洁与斗争烈火的考验,以及大生产运动的劳动改造后,革命面貌更其突出的女同志形象。此前,大约

^① 谢克:《延安十年》,上海:青年出版社 1946 年 2 月初版,第 67、68 页。

^② 赵超构:《延安一月》,同前引第 90—91 页。

在1938—1942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延安革命女青年还有过短暂的红色浪漫青春。

四

在团结一切力量参加抗战,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来延安的旗帜下,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妇女工作一度得到普遍重视。

1938年3月8日,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筹备工作,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师范学校召开,并同时宣告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简称“边区妇联”)。

1939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展与加强妇女工作的决定》,强调培养妇女干部工作。3月3日,中央妇委发出《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具体落实中央决定的精神。3月8日,延安各界在北门外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中央领导人都出席会议并讲话。毛泽东在题为《妇女们团结起来》的讲话中指出:“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①会上,他倡议创办中国女子大学,并得到中共中央的一致赞同。“我们要培养几百几千的女英雄、几百几千的妇女运动的职业家和博士。”^②

同年6月1日,《中国妇女》杂志创刊,毛泽东题写刊名,并应邀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奋斗,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早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③

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开学典礼,王明担任校长,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并讲话。毛泽东说:创办中国女

^① 毛泽东:《妇女们团结起来》(1939年3月),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69页。这个正式公布的文本,与其他记录文本有出入。

^② 转引自赵海编著:《毛泽东延安纪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60页。又见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27页。文字略有出入。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6页。

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女大叫我题字,我就写了下面几个字:“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①

这样,延安妇女运动有组织、有阵地、有声音、有气色。正如1941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妇女工作的指示中所言:“自1939年三八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转变妇女工作以来,前年在全党内造成了对妇女工作从忽视到重视的思想转变,并奠定了开展妇女工作的组织基础。”^②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在中国女子大学前后享受着两年红色浪漫的战时共产主义集体生活,并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我是女大值勤兵!

当时我们的生活仅能维持温饱。刚到延安时,偶尔还能吃到大米、白面、猪肉,以后只能吃到小米、高粱米。一度给养供应不上,只能靠粗糙的黑豆过活。……有些南方同学刚到延安时,看到黄澄澄[橙橙]的小米饭还以为是蛋炒饭,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不吃也得吃,硬着头皮慢慢咀嚼,久而久之,就感到粟米之香了。特别是女同志,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身体壮实起来。有人还高兴地写信告诉父母:“延安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回想我们几个队干部在一起吃饭,常花几分钱买点酱油、香油、辣椒、醋,往小米饭里一拌,嘿,甭提有多香了。

学校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天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把棉花取出变成了夹衣。谁如果带来多余的衣服,会无私地送给缺衣的同学。一旦得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131页。

^② 《中共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41年2月5日),《中国妇女》(延安)第2卷第10期(1941年3月)。

知某位学员要奉命到大后方工作,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会立刻捧出来时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选。

延河成了我们的盥洗室,冬天敲开冰窟窿洗,夏天跳进河里冲。盛夏时分,几个同学相约到河边沐浴,先洗好下衣,晾到河滩上,人躲进河中泡着;待下衣干透,着好再洗上衣。没有肥皂就用石块在河边捶打衣服,要么用草木灰过滤的碱水来洗。

物质生活很苦,但在精神上,我们却是最富有、最快乐的一群。最能说明我们心境的,要算是回荡在延河边的嘹亮歌声了。除了睡觉、上课、吃饭,学员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饭前饭后唱,课前课后唱,行军时唱,开大会时更唱,歌声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动山摇。^①

232



中国女子大学的篮球队员们,个个健康青春,英姿飒爽

这段幸福时光的最高潮,是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中国女子大学在延河滩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女大有歌咏队、舞蹈队、京剧队、话剧队、篮球队、排球

^① 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75、276页。

队,经常组织文娱活动和球类比赛。记得有一天,朱德总司令给我们做完报告,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一起观看篮球比赛,与民同乐,深受感动。令我最难忘的是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和松柏彩门,四周布满彩旗和标语,身穿一色列宁服、腰扎皮带、排列整齐的队伍,把延河沙滩打扮得格外壮观。当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健步登上主席台时,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当看到500多名学员穿上我们做的列宁服,表演集体舞,不断变换队形,一会儿三八形,一会儿五角形时,无不感到内心的喜悦。化妆秧歌舞表演很精彩,雄壮有力的《女大大合唱》激励我们奋进。下午进行的排球对抗赛,抗大男子居然败在女大手下,格外增添了我们的欢乐。^①

这次演出轰动了延安,并传为永远的佳话。在“公家人”穿着统一制服,灰蒙蒙一片模糊了男女性别的延安,女大学员仿照苏联服装式样,自己组织裁剪缝制出绝无仅有的校服——列宁装。^②大翻领,双排扣,腰身收束,将女性青春健美的身材特征巧妙地显露出来,再穿上绣缀着两只红绒线球球的布草鞋,实在是别出心裁,标致极了,也时髦极了。这样的装束,配一张饱满红润的面孔,质朴诚恳的颜容,健美结实的身材,就成了后来影响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女英雄飒爽英姿标准形象的最初范本。^③

^① 孙画秋:《忆延安女大——革命的摇篮》,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同前引第173—174页。

^② 女大校服列宁装是她们自己缝制的,有些事出偶然。1939年生产运动中,“经过一年的农业生产劳动,有相当一部分女同学例假不准了,第二年就改变了生产方式,搞工业生产”。学校从边区外买来十几台缝纫机,组织缝制的第一批衣服就是1940年三八节作为校服发给全体学员的列宁装。参见徐岚:《女大的劳动生活》,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同前引第253页。

^③ 王朝闻创作的刘胡兰雕塑形象,就是以当时从晋察冀边区“七月剧社”到延安“鲁艺”部队文艺干部训练班(随后改制为“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部队艺术学校”,简称“部艺”)学习的吕光为生活原型。冯松、吕光接受朱鸿召采访记录,2002年5月14日,北京德胜门外。



女大学员们在延河岸边跳起愉快的集体舞

每到周六傍晚,女大门口一直延续到延河边上,就拥挤着来迎接女友或妻子回去过周末的男同志们。也有目前还没有固定的对象,但自觉不自觉地跑过来看热闹,兴许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艳遇呢?

呵,因为有了如此烁热的簇拥,女大学员们越发显得这般非常的美丽!



飒爽英姿炼成之后

进入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在军事化、供给制集体生活中,磨炼出一副健康的身体,飒爽的英姿后,就面临着革命婚姻的选择与挑战。

1941年3月,《中国妇女》杂志受命停刊;8月,中国女子大学接受命令,与陕北公学(分部、总校相继迁出后,1939年冬在延安复办的部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组建延安大学。^①女大突然停办,对于延安妇女运动和革命队伍里女同志的人生影响是明显的,突出表现为革命婚姻和1942年三八节前后的激烈纷争。

235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范文澜亲自率领河南大学和高级中学的部分进步青年学生,深入到开封、许昌、临汝一带作抗战救亡宣传活动,先后有大半年时间。他总结成绩的时候说:“在我领导的流动工作团中,从未因男女之间的交往而妨碍过工作。这是很平凡的一件事,但也是很难做得到的一件事。我时常对青年男女说:你们是处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下,生活是在非常紧张和急骤变化之中,应付自己已感不暇,假如再来个小娃娃那将如何安置呢?所以你们该忍耐一下,等到处境比较安定时,那我并不反对

^① 王明担任女大校长期间,为学员调配等问题与中央组织部发生过激烈的矛盾,这是为毛泽东所绝对不允许的,女大不能成为王明培植自己政治势力的园地。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198—200页。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41年2月部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你们进行制造小娃娃的工作。我经常这样向他们解释。”^①好在范文澜能以身作则,更好在这些热血青年学生们都能信奉师长的教诲。

来到延安之前,孙铮曾在“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工作两年。流动工作队有30余人,三分之二是大学生,青年男女们整天再一起难免不产生好感和爱恋之情。遇到这种情况,主持工作的几位共产党员就会召开民主生活会,组织开展思想斗争,将这种“小布尔乔亚世界观”批得体无完肤,“那阵势简直就是斗地主,直到两个人痛哭流涕,表示一定‘痛改前非’”。“后来在新四军,一个叫陈亚军的画家与盐城中学一个女学生谈恋爱,也是开大会狠斗了一场。可见在‘革命队伍’里,不经过组织批准谈情说爱,可是最忌讳的事。”^②

早在江西苏区时期,33岁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华夫,作为共产国际特派员在参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同时,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过夜。“可是中国妇女一见他便吓跑了,说他长得太大,太粗暴,使她们的肉体受不了。”他在瑞金所住的“独立房子”离共青团机关不远,当时共青团一位领导人的妻子非常漂亮。他便主动给她送礼物,这位领导赶快找中央汇报:这太不像话,得赶紧采取措施,不然要出事的。中央考虑这事既不能不管,又不能对他进行警告或管束,便通过中央妇委的李坚,找到一位叫萧月华的女同志。她是广东人,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十分淳朴。经过对她说服动员,“她像完成任何一件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一样,奉命与国籍不同,语言不通,性格作风差异巨大的洋顾问结了婚。”

虽然成了夫妻,但从政治地位到生活待遇,两人却是极不平等的。李德享受苏区最高的物质供给,而萧月华依然和大家一样过着普通战士的艰苦生活,并且照常在原单位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到他那儿去履行妻子的义务。他不关心她的生活,反而怀疑她偷吃偷拿了他的东西。“两人在夫妻生活上也很不协调,女方对李德只能从组织纪律以至‘党性’来要求自己,实际上对李德毫无感情可言。”

^① 转引自铁夫:《范文澜先生》,《中国青年》(延安)第1卷第10期(1939年10月)。

^②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68页。

他们生过一个男孩,很黑,像娘不像爹。曾吃过李德闭门羹的毛泽东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长征开始后,他们就分居了,到陕北几经周折,终于离婚。^①

王定国是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1937年初,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组织上找到她,希望她同谢觉哉同志一起生活,照顾好谢老的身体。王定国是共产党救出来的苦娃子,只要是党交代的事,没二话。她爽快地答应了,带着“把爱情献给革命”的信念,接受了组织安排。谢老见了开朗活泼、娇小玲珑的王定国,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两人很快结婚。她晚年笑对来访者说,她的婚姻是地地道道“组织分配”的,“革命需要么”。^②

1937年11月底,从苏联经迪化(乌鲁木齐)到延安的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次年1月,陈云流鼻血旧疾复发,休养三个月。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中组部秘书长邓洁受命到陕北公学第五队女生队去挑人。“邓洁来到陕北公学五队,找了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了来意。经过五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于陆华)。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③3月,他们结婚。对此,于若木当时向其远在国内的长兄介绍说: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农历,1937年冬——引者注)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

^① 参见梅剑编:《延安秘事》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605—606页。此书披露诸多历史细节,可惜没有与相关历史文献对照印证。1938年,李德又与从上海来延安的女歌唱演员李丽莲结婚。1939年8月27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忽然接到通知,搭乘周恩来去苏联医治手臂跌伤的飞机,返回苏联。“我急忙穿好衣服,匆忙向李丽莲告别,她是周末从艺术学院回来的……”由于飞机推迟起飞,李丽莲赶到机场要求一起走,未能得到组织批准,只得留下来。见[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358页。后来,萧月华、李丽莲都重新建立了家庭,并且终生都不愿意提起与李德的不愉快婚姻。

^② 参见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1、170页。此书主要材料来自对原延安中国女大学员的采访,没有相关历史文献的佐证。又见卢弘:《女红军“定国公”》,收入《中国女兵档案》下册,北京:长城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339—358页。

^③ 郭思敬主编:《我眼中的陈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84—285页。

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①

王定国、于若木们都很幸运,她们服从组织安排,遇到了有道德感、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中国革命巨人们。

由于维系这种革命婚姻关系的只是口头承诺、组织批准和事实存在,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所以,婚姻破裂的现象也很普遍。中国革命队伍里的男同志们,大多数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凭着英勇顽强的斗争和各方面的努力,升至各级领导岗位,有的还曾到苏联学习军事。“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有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②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情感与婚姻问题。

担任抗大校长的林彪,由组织安排解决其婚姻问题。当一名抗大女学员被带到校长室后,例行公事的那位同志并没有向这位女学员讲明是什么一回事,就自个儿跑了。女学员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什么工作上的事,静静地等着校长发话。可是,干巴巴地等了好一会,并不见校长开口,两个人都尴尬地坐着。突然,林彪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白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哇”的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喊:“我不干!我不干!”^③这是当时同在抗大任职的莫文骅晚年回忆的细

^① 于若木致其长兄于道泉信,1939年5月28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同前引第219—220页。

^②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8页。

^③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49—350页。

节,应当不假。

与此有大体相同情节的是,1938年底在延安采访的陈学昭所作的记录:

也许,有一天,在窑洞的转角,他认识了地,像一声春雷把冬蛰的动物都惊觉了,像但丁(Dante)遇到比德丽淑(Beatrice)。“怎么?在陕北,有这样的女性!”这样的庄严,这样的美丽!一个稀有的神秘的 occult 的微笑……而且,穿着一副军装。“同志!”继之一个敬礼,他们认识了!多少革命的理论好似都与爱情脱离了关系,因为这在他生平,还是极生疏而极新鲜的事情。

星期六的晚上,女的提议:“我们上城头看月亮去吧!”

“月亮有什么好看呢?还不如在家里吃花生!”男的回答。

“我们到延水边去走走吧!”

“又来了,你们天天在延水旁跑,还看不厌么?”

两种完全不同的情趣和喜好,如果没有大型集体活动可参加,只有两个人的夜晚是难熬的。最后,男的说:“还是去合作社喝四两白干。”

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非常规律得近乎本能的生活:吃饭,睡觉,打仗……“虽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应该尊敬女子,而且,中国的男子该帮助女子,求得解放,[。]但偏偏有些时刻,一下子,他忘记了!眼前却只映起在小时候他在农村所看到男子的抢婚,养媳妇这一类事……一个女子怎么不接受男子的爱?!”^①

确实,面对这样的情况,女青年们很难再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和可能。红军干部黄克功枪杀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的事件,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②一时的众怒可以平复,但革命婚姻中深刻的问题却一直残

^①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8—119页。这样的事例在当时颇为普遍,另见马加:《间隔》,《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12月15—17日;欧阳山:《圣地》,见《一代风流》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1372页。

^② 参见朱鸿召:《恋爱中的枪声》,《上海文学》(上海)2000年第5期。

留着。

1938年8月来到延安采访的陈学昭,注意到了革命婚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当初,她不爱他,他常常来看她。在晚上,他有时半是玩笑半是真的赖在她的床上不肯走:“今夜我睡在这里,不回去了……”这让她手足无措,左右为难。

经过组织出面,她不得不接受革命婚姻。

不久后的一天,一个特务员(红小鬼,勤务员),背着铺盖,她跟在后面走。“怎么?你搬家了?”

“不!”

“那你到什么地方去呢?”陈学昭问她。

她不好意思地回答:“为了工作的需要,我搬到……”

其实,她就这样地与他结婚了。

7个月后,陈学昭又遇见了她。依然是前面一个特务员背着铺盖,后面,她眼睛哭得红红的,垂头丧气地走着。

“你搬家了?”

她没有回答……原来他们离婚了。她肚子大大的,怀着已经5个月的身孕。

据说,他已经厌倦了她:“妈的……滚出去!看你这个大肚子!我不要你了,我要讨个比你更洋气的洋包子!”他命令特务员把她的铺盖拿出去,叫她快快跟了特务员滚蛋。^①

如果男女知识青年在革命队伍里相互爱恋了,那么,一定要及时报告组织,取得上级领导的认可,才可以有保障。1938年11月,罗工柳报名参加“鲁艺术刻工作团”上前线,女友杨赞却留在延安,他感到这样情况不妙,机智地让女友通过在鲁艺任教的李伯钊,找到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就说罗工柳是自己的爱人,她要 and 爱人一起上前线。这样,得到同意后,一起维持了他们的爱情。^②

①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9页。

② 刘骁纯整理:《罗工柳艺术对话录》,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81页。

二

中国现代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直接表现为一系列的解放运动,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叛逆者、逃亡者和理想追求者。走出家庭,叛逆社会,抛弃“三从四德”的旧式道德伦理,是青年知识女性踏上革命道路的必然开始。这场革命从来不提倡性解放、性自由,但在旧伦理已经被委弃,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之际,婚姻自由与性自由曾一度蔓延过。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①

这种极端行为很快就被革命组织制止了。但在投身革命的一部分激进青年知识分子中,曾经一度歪曲地传播着苏俄女革命家柯伦泰的“杯水主义”。其实,柯伦泰本人不是提倡“杯水主义”,相反,她是在自己的革命生涯里,切身感受着革命所带来的婚姻迷乱,并提出深刻的批评和反省。造成“杯水主义”的原因,一则革命生涯常分手,生死未卜,朝不知夕;二则革命侵占了几乎所有的个人生命空间,“区地中的活动将我们一切的人完全占领了,以致我们中间没有什么人有时时间去想到旁的一点事,就是私人的事也不能想到。我们做完了这一件工作,又赶着做那一件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超过同志的友爱之第一阶段。”就这样,个体性欲的解决,“我们只是利用所许给我们的那极短的几个钟头内的自由——毫没有束缚,也没有责任”。她惊叹的还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真实情感的流失,幸福爱情的沦丧。“在一切之

^①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51—52页。

中,最使我悲痛的……乃是全部是那般无热情无感觉的。”^①

中国革命同样是在极其残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革命组织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动员、组织、控制、调配一切社会资源,包括人口资源。这当然需要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就有很多革命行动,表现在婚姻关系上或极端过激,或因战争环境无暇他顾而失控,或不得已而为之。“当时,井冈山上男女关系是比较随便的,双方一对歌,中意了,就可以成为夫妻,住在一起。”^②苏区最初简单的婚姻条例,是王明从苏联改进引入的,1931年11月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该条例主要针对旧有的社会婚姻关系,“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③这固然为解除旧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为革命婚姻关系的解除提供了便捷。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22条。该条例依据“民权主义之根本精神与陕甘宁边区之实际情况”而制定,以“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其中对离婚条件作了10条具体的规定,“感情意志根本不合,无法继续同居者”位列第二;“生死不明过一年者,但在不能通信之地方以二年为期”位列第九。^④

1944年3月,该条例经修正归并为15条,重新颁布。其中离婚具体条件仍然列举10条,但“感情根本意志不合,无法继续同居者”降位第七;“生死不明已过三年者”位列第八,年限延长了;增加大生产运动中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参加生产劳动,改造二流子,“男女一方不务正

① [俄]柯伦泰:《三代的恋爱》,见《伟大的恋爱》,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10月初版,第232—233、230页。该书收入柯伦泰三篇主要小说,翻译者是创造社主将郑伯奇的学生李兰,影响甚广。丁玲的第一个丈夫胡也频在其小说《同居》、《到莫斯科去》中都有谈论。

② 一凡编著:《延安丽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74页。

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931年11月28日公布),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94—195页。

④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年4月4日公布),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40—41页。

业,经劝解无效,影响他方生活者”^①。

1946年4月,边区政府颁布新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16条。其中关于离婚的具体条件列举11条,“感情意志根本不合,无法继续同居者”,位列第一。^②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法律条文的执行是有一定限度的。黄克功枪杀刘茜案件的判决执行,主要取决于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坚决态度。而在1939年4月以前,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婚姻主要是靠组织纪律来约束。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为:25岁,8年军(干)龄,团级干部^③;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八路军的团职干部,双方男女必须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和为50岁。^④对此,笔者至今没有查找到任何具体的组织决定,估计很有可能只是各地,甚至是各个部门自行拟订的,执行当中也时常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比如,当时驻守在米脂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规定的婚姻条件就宽松得多:红军时期入伍的连以上干部、抗战时期入伍的团以上职务,年龄在28岁以上,即可就地解决婚姻。^⑤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感觉到,随着革命女青年的到来,婚恋情况也多起来。为了不影响学习,他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抗大政治部做出决定,要求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可是不久,抗大一位校领导干部没有报告,就与女学员结婚了。有人汇报后,毛泽东一纸手令,将该领导撤职,并降一级使用。莫文骅又觉得事情处理得严重了点,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情信。毛泽东叫人把莫文骅喊去,当面责备说:“你这个莫文骅,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的是你,现在说情的又是你,出尔反尔,怎

^① 《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4年3月20日公布),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同前引第435—436页。

^②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46年4月23日公布),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2—83页。

^③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89页。

^④ 常建忠:《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95页。

^⑤ 黄富强:《米脂婆姨——中国第一美人窝秘闻纪实》,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29页。

么搞的嘛？”莫文骅自知理亏，赶紧检讨。^①后来，抗大发生黄克功事件，大家知道问题严重了。

受托随何穆、陈学昭夫妇到延安的夏沙，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在抗大总校文工团工作。抗大总校于1939年迁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又回晋察冀。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她带着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回到了延安。

17岁时，她与文工团一位同事恋爱。不料，另外一个同事在与她接近过程中却使她怀孕了，这时她刚18岁。她相信组织，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交代，并请求处分。张际春给她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的处分，但劝她结婚。张际春说，共产党员不结婚生孩子，怎么向群众解释？也不能把你长期“坚壁”在山洞里不让人知道。你们感情不好，生育以后可以离婚嘛。1942年，张际春调任八路军野战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抗大来了新的副政委，他说共产党员怎么能那么随便，结婚不久就离婚？

244

既然你未婚怀孕了，那么，反正都是你的错。身心疲惫中，夏沙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和风湿性心脏病，经请示获准回延安医治。整风抢救运动中，她的“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都成了抗大总校的重点批斗对象。这时，夏沙生育后得产褥热，高烧40℃，但人是清醒的。她将孩子寄养在一位农民家里，自己在批斗会上，诚恳地大声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但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

中国现代革命素来就是以消灭有生力量为目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于双方所消耗的人口资源都是巨大的。于是，尽快补充兵源，保护儿童，就显得非常重要。早在1930年12月，江西苏区就颁布了保育儿童的决定。1938年7月4日，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作为全国性组织的分支机构，负责收容流亡儿童，以及抗日将士子女。按总会规定，所有受收容的孩子每月发给生活津贴5元，到1939年5月增至6元。^②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新的保育

^①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50页。又见莫文骅：《莫文骅将军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73页。

^② 《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新中华报》（延安）1939年7月28日。

儿童决定。其中明确规定：“严禁打胎。有特殊情形，经医生证明及当地政府批准，才可经医生打胎；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论。”私生子与一般婴儿享有同等待遇，“周岁以前之婴儿，无论由母亲养育或雇人养育，每儿每月均发保育费10元；周岁以后的婴儿，领取半成的伙食粮费，并发给保育费5元，不领伙食费者仍发10元。”^①每月10元的概念，除去物价上涨的因素，就账面数字而言，是八路军师长的双倍标准。这个时期，八路军津贴每月标准是：战士1.5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津贴也是每月5元。

“儿童是民族的后代，是新中国的建设者，是我们妇女的快乐和幸福。”^②边区儿童都可以享受保育和免费教育的权利，但限于条件并非每个孩子都能够寄托在托儿所或幼儿园。

三

这样的婚姻制度和婚姻环境，这样的胎儿保护政策和儿童保育政策，使得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对于婚姻产生“四怕”心理。

一怕怀孕。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叛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甚至她们中的有些人，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时，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这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呀！

女大学员洪红（陆红）与教员徐以新，通过交际舞恋爱结婚，一年后怀孕了。她担心拖个孩子会影响工作，就“从早到晚猛跳猛蹦，用拳头使劲擂肚子，想把胎儿流下来”^③。没想到这孩子比她还坚强，顽强地生了出来，还活了下来。

先后在抗大、女大和中央研究院学习过的石澜（梅洛），自称“我是一个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女子，涉世未深，只因国难当头而投奔延安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1941年1月21日公布），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同前引第80页。

^② 《祝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一周年》，《新中华报》（延安）1939年3月10日。

^③ 参见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45页。

寻求真理,承蒙错爱……”1942年9月1日与舒同结婚。由一个女战士成为妻子,她觉得最大的难关是怀孕后的妊娠反应。直到晚年,她仍然记忆犹新:

本来延安的小米饭、南瓜汤、盐水煮土豆,吃得香喷喷的。可是妊娠以后却难以下咽。当时我是多么想吃一条鱼啊!住在我隔壁的张鼎丞夫妇有一条咸鱼干,可惜已吃掉大半,但他们还是把剩下的半截送给我,我把它挂在墙上,想呕吐时舔一舔鱼味……有的孕妇反应严重,吃进多少吐出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胆汁,好像五脏六腑都在腹腔里翻滚。本来延安的饭菜营养已经够单薄的了,加上不能进食,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即使是矫健的年轻女战士,也会变成病号。胎儿的营养全靠母亲自身储备,十月怀胎,待婴儿呱呱坠地,做母亲的白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达不到一个战士的素质要求了。^①

246

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②而她执意离开毛泽东,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

于蓝与田方1940年11月7日在鲁艺结婚后,看到其他女同志做母亲的艰辛,希望自己“千万不要生孩子”。可是,偏偏自己也怀孕了,她怀着极大的恐惧,征得丈夫田方的同意,还征得戏剧系领导张庚的同意,并通过同学苏菲的帮助,得到其丈夫马海德医生的介绍,才得以到柳树店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所有的苦痛她都忍受了,能这样已经很幸运。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又怀

^①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90、93页。

^② 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79页。又见王行娟:《贺子珍的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年4月第2版,第227页。

孕了。“我恐慌极了”，“我苦恼了许久，瞒过田方，又去找苏菲同志，把自己的处境和决心告诉了她。她多么善良、友好，理解我，帮助我找到几片药，吃了以后，流了很多血，但是没有全部打下来，只好又去做了第二次人工流产。我只说是肚子痛，瞒过了田方和所有的人。”^①

这样的苦痛、暗伤和隐忧，是革命女青年们所始料不及的，也是没有任何精神思想准备与物质措施防范的。但即使是这样，于蓝还感到欣慰，因为她做了一般女同志想做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二怕生育。不能堕胎，只有生育。战争环境，条件简陋，知识女青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体生活，于蓝出落成标致的革命女青年



于蓝和田方选择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结成婚姻

年们接受革命婚姻后，几乎都要经历血淋淋的生产事实，有的甚至是生死考验。

王丹一与艾思奇的婚姻，正赶上抢救运动。在《解放日报》所在地清凉山上的窑洞婚礼当夜，艾思奇就被组织上隐藏在隔壁的窑洞里。王丹一守过一夜空房后，第二天就被带到蓝家坪中组部招待所隔离，接受为期一年的审查抢救。到1944年5月，由中组部组织科长王鹤寿亲自做甄别结论，说确实弄错了，她才与艾思奇真正结成夫妻。1945年9月，正是重庆谈判的时候，她在清

^① 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1、94页。

凉山窑洞宿舍里生产了。

艾思奇在另外一间窑洞里写文章，我在窑洞宿舍里，没有灯光，感觉得疼痛难忍，就哼叫了。隔壁××夫人听到了，叫来艾思奇。艾思奇束手无策。这位夫人让勤务员赶快叫来中央印刷厂卫生员，问我预产期是哪一天？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预产期。这样，就在窑洞宿舍里生了。

大家的心思全在重庆的毛泽东身上，根本没有人照顾我。我知道月子里的妇女不能看书，就要求艾思奇把每天的报纸读给我听。艾思奇仍然每天都要给报纸写文章，只有一个勤务员，年纪太小，什么也不懂，第一天帮我们洗了一下，以后就不干了，脏衣服放在窑洞里八天没人碰。^①

1941年3月，曾志住进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妇产科准备生产。最关键的时候，接生的医生们都去吃饭去了，产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孩子顺产出来时，护士没有接住，“咚”的一声，竟然掉进了产床下面的铁盆里。这个孩子就是陶斯亮。孩子生下来了，但吃饭的医生还没有回来，她就只能在产床上躺了有一个小时，才被抬进病房里。“病房也在窑洞里，这个窑洞还住了一个女同志，刚分娩两天。我被抬进病房后就再没有人来管我了，而我却开始大出血。想请医生来，又不好意思让刚分娩的病友去，这个时候我真希望医生能碰巧来一下，哪怕进来一个护士也好呀，可始终等不到。直到我感觉快虚脱了，才告诉对面床上的同志，她立刻起来，看我脸色苍白，马上去叫来了医生，此时我已失去知觉了。”^②她是陶铸的夫人，尚且如此，其他人住院生产的护理情况也可想见了。^③

1943年6月，石澜临产的当天，还在中央党校三部审干办公室接受审讯：“现在再问你，你是怎样选择和舒同结婚的？延安有那么多年

① 王丹一接受朱鸿召采访记录，2002年5月8、12、16日，北京南沙沟。

②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下册，同前引第326页。

③ 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后改名为《在医院中》），虽然是个案情况，但由此可见当时的医疗环境和质量。见《谷雨》（延安）创刊号，1941年11月。

轻男子追求你,你都没有看上,偏偏找个比你大十多岁的老红军,是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以便达到你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她还没听完,只觉得耳朵发出嗡的一声,心脏猛烈地收缩,腹部绞痛。她咬紧嘴唇,半晌不说话。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才喊出声来:“啊哟!我的肚子好痛啊……”当她被送到医院时,直接上产床就分娩了。^①回顾自己作为一个妻子,在与舒同的40年婚姻里,先后4次生产、1次流产、2次妇科手术,她觉得自己元气大伤,身心疲惫。

革命女青年们作为妻子和母亲,在为人类繁衍生育所经受的苦难与折磨,流血与伤心,是男同志们和其他非亲身经历者所难以想像的。

三怕带孩子。“当时延安条件困难,不是生下小孩就有托儿所。如果有了小孩,就得编入母亲班,任务就是保证孩子的健康,每天要给孩子做饭。边区政府有专项优待,发白面、发补助,不让孩子吃大人的食堂。许多母亲为了给孩子一点营养,十分辛苦,要自己养羊、放羊才能挤出羊奶给孩子吃。为了给孩子做饭,要到大伙房后边拣煤核,才能烧起小炉灶。”^②当初奔向延安的知识女青年们,都是怀抱着一腔救亡报国、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热忱,可以说,她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叛逆了旧家庭和旧社会,来到革命队伍里还要回到窑洞,回到家庭,去带孩子。

一个做了母亲的人,她应当是快乐的。然而,我却看见有许多人,她们天天皱缩眉头,仿佛在背负一个永远解脱不掉的痛苦!因此,我也听到,许多人,她们从内心里传送出那一致的、迫切的、期待的呼声:“救救母亲呵!”

她们有了孩子,她们便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绑在一个狭小的笼子中了!她们迈动不开脚步,向学习,向工作,去进取她们自己的希望。为了抚育着革命的新的一代,她们是愿意付出最大的牺牲与忍耐的。因此,烦恼与劳累,不能使她们发出一句怨言。只是她们不愿意放弃为革命所应尽的母性

^①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同前引第95页。

^②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1页。

外的人性的职责。她们在矛盾中挣扎!^①

如果说流产和生育的流血与疼痛,是直接剥落着革命女青年们的飒爽英姿;那么,回到窑洞抚养孩子,日常生活的平庸与琐碎,就是间接侵蚀着她们的壮志豪情,耗损着她们的身体健康,同样是在摧毁着她们的飒爽英姿。

四怕弃孩子。这些为人之母的革命女青年们,不是没有母爱之心,而是陷于母性与人性的两难矛盾困境。但革命对于革命者来说,总是第一位的。于是,就出现了将孩子送给老乡临时抚养或永久抚养的事情。可惜,陕北老乡们家里的条件之简陋,又往往是出乎想像的。这更成了年轻母亲们的心痛,因为孩子毕竟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呀。

1941年3月,韦茨在中央医院生育后,身体非常虚弱。她与艾青商量后,决定把孩子暂时托放在附近的一个老乡家,准备等自己出院后再接回来。一个月后,他们去接孩子时,“推开门,发现主人不在,再看炕上,婴儿身边放着一碗小米汤,碗里还趴着一只苍蝇。……孩子骨瘦如柴,显然是缺少营养的缘故。不几日,这个孩子终于夭折了。”^②这是韦茨与艾青婚姻中的第一个孩子,给他们刺激很大。孩子死后的第三天,他们两人在窑洞里枯坐,半晌都没有话。

石澜在抢救运动中生下孩子,但觉得最痛苦的是生下孩子后又被迫丢弃孩子。“1943年我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后,用乳汁哺育了将近一个月,当婴儿第一次向我发出天使般的微笑时,我是多么的陶醉啊!但就是在这时,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舒同要到前方去,我必须随他同行。这是大局,我别无选择。当我把自己的幼儿,从怀中用双手托起交给一个陌生农妇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这个年仅26岁的小母亲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昏倒在农妇的家门前。”^③当她强忍着心痛,整理好行装,却并非要上前线,而是被怀疑是特务,将她隔离审查。

^① 曾克:《救救母亲》,《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8日。

^② 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35页。

^③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同前引第93—94页。

所有这些,在消耗革命女青年们飒爽英姿的同时,更煎熬着她们的母性。当她们坚强地承受着肉体 and 精神的剧烈苦痛之后,她们的母爱之心也几乎被掏空了。

四

《中国妇女》杂志停刊,中国女子大学停办,延安妇女工作明显受到削弱,一般人并不清楚这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前兆。相反,刚开始的党内整风运动,却一度被误解是全社会都来帮助共产党寻找差错,纠正歪风,弥补不足。于是,1942年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性在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副刊上,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倾诉文章,言辞激烈地指控革命女青年在革命婚姻过程中所遭受的身心损伤与苦痛。

3月8日的《解放日报》上,除了艾青的诗《给姊妹们》,还有三篇出自知识女性之笔的文章:

曾克的《救救母亲》,指陈革命女青年为人之母后的种种矛盾困境,建议各级领导真正关心孩子们的营养健康与疾病防治,希望更广泛地建立起小规模托儿所,用实际行动拯救这些在革命婚姻中沦为母亲,回到窑洞家庭里的知识女性们。“新的女性,不仅是做一个好母亲,而且是各种学问与事业的创造者,她们每一个人应当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救救母亲!为着革命事业的成功,为着新社会的建设!”

草明的《创造自己的命运》,对于那些借革命婚姻攀附政治权势,图慕虚荣,甘心回到窑洞家庭里的个别女性,给予猛烈的抨击和痛切的鄙夷。“因为缺少创造自己命运的信心和决心,往往把自己的一生花费在几个孩子的抚育上;或因嫁了一个政治家,而抛弃了自己的医学技能,和单纯的为了体面而嫁给一个艺术家,这在延安的女同志中,也有些渣滓。”

白霜的《回家? 到社会?》,认为抗战以来,由于战争的需要和妇女英勇参战的事实,在初期曾使妇女回家的论调收敛;“近两年来,随着整个抗战中倒退逆流的产生,妇女回家运动,又在各种不同形式下,蠢蠢发动。”对此,她尖锐地指出,“提倡妇女回家,对整个社会国家来

说,是摧残民主,削弱抗战力量,维持半封建的旧社会的企图;对妇女解放来说,是加紧妇女封建束缚,奴役妇女的勾当。”

紧接着第二天,3月9日《解放日报》又刊出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极其深刻而尖锐地揭示出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性,在恋爱、婚姻与家庭问题上所遭遇的陷阱和困境。

在男女比例曾经30:1、18:1、8:1的延安革命队伍里,一个女同志不想结婚似乎是不可能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地]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如果选择结婚,僧多粥少,同样要遭到议论。“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嫁了工农干部,同为知识分子的男同志讥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训斥:“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结婚以后,不要孩子不行;有了孩子,严重的社会不公使得绝大多数母亲只有自己领养,又被讥讽为“回到家庭了的娜拉”。

离婚,更是她们遭受诽谤的谈资。

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克[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密[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惟]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地]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地]去吃着堕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在延安革命队伍里,深切关心妇女命运的,最初是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稍后是陈学昭 and 丁玲。尼姆1937年到延安,当时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还不是很多,主要是经过长征的女干部。陈学昭1938年到延安,她从妇女解放的理性思考与个人婚姻破裂的痛苦经验

中,发现了边区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客观方面的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等,都已经并可以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待遇,但是在主观方面的精神上、心理上、情感上,尤其是生育方面,却存在着许多深刻的矛盾问题。如果说陈学昭偏重于理性思考,那么,丁玲则主要凭借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敏感,通过对不同社会层次妇女的贴心观察,感觉到“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这就具备了鞭辟入里的艺术力量,从而揭示出中国革命进程中最初不为人们所料想得到的,以后又为人们所讳莫如深的深刻矛盾。

同在3月9日报纸上的,还有王定国的文章《听听乡里妇女叫苦声》,反应“我们的妇女工作,很不深入。只是机关上的妇女有自由,老百姓的妇女很多还是被当作物品一样的买卖”。就住在延安县宝塔山下县法院门口的一户人家,丈夫和公公对媳妇严重打骂虐待,而这位十七八岁的年轻媳妇欲告无门。文章呼吁,“在我们眼面前的妇女同胞都没有得到解放,远的地方就不能谈了。”

也许这只是个别的案例,但有个案的存在,至少说明边区妇女运动在1940年高潮过后,在一定程度上是松懈了。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夜》,还有马加的《间隔》、莫耶的《丽萍的烦恼》、洪流的《乡长夫妇》等文学作品,都是对边区妇女运动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问题的披露。

在紧随而来的抢救运动中,这些被揭示出来的问题,不但没有被引起重视,反而被当作知识分子抢台,造成整风运动“偏向”的证据,在揪斗出王实味事件后,惩一儆百,“转向”对知识分子革命性的审查斗争。丁玲为《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先在4月初的一次高干会议上接受曹轶欧等人的批评,幸亏毛泽东在作总结时为之解脱:“《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丁玲深深地感念毛泽东的话保了她。^①接着,她又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发言,表示“尽管我灌注了血泪在那篇文章中,安置了我多年

^① 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北京)1982年第2期。

的苦痛和寄予了热切的希望,但那篇文章本身仍旧表示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她进而承认,“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文章中虽然“并没有责备男子的语句,但的确有一种‘不要靠男子,自己争气吧’的味道。我想这是不对的”^①。这样,她就令人啼笑皆非地公开表态,只有依靠男人才能求得妇女的翻身解放。

五

经过系列运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们都像丁玲那样,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一切交给组织,一切相信组织,一切为了组织。肉体上的疼痛自己忍受着,精神上的疼痛自己吞咽着,无怨无悔,勇往直前。陈学昭用一双会弹钢琴的手学会了摇纺车纺纱线,进而感悟到“工作着是美丽的”。并且,只有在不断革命、永远革命的昂扬奋发中,才可能忘掉过去,钝化感知,磨炼出一副铁石心肠,流血不流泪,动手不动心,动嘴不动情。

危拱之,河南人,毕业于开封中学,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去巴黎、莫斯科学习戏剧,1930年回到江西中央苏区参与创办高尔基戏剧学校,长征途中负责一方面军司令部总务工作。1937年初,尼姆·威尔斯在西安采访她的时候,“她的身体非常强壮健康,有细小洁白的牙齿”,“言谈举止可称是苏区妇女的好典型。”^②1942年她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运动,一次全体大会上,作报告者说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是“红旗党”,所有党员都是“红皮白心”的假党员。曾经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她,“感到党组织对她的共产党员身份都怀疑了,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幸好窑洞外有人站岗,听到异响后发现了,才抬到医院抢救了过来,但已七窍流血,满脸污秽,枕头床单也红了一大片。危拱之从此有些自暴自弃,精神也有些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着要脱党。

^① 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1942年6月),《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6月16日。

^②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180、330页。

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和她的男朋友睡在一起,弄得同窑洞的男同志很尴尬。对批评她也满不在乎,说什么:我命不要了,党籍不要了,还怕什么?我愿怎样就怎样!”两年后,她的问题甄别了,认定她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刘少奇亲自找她谈话,当面向她赔礼道歉。1949年后,她还是真的疯了。“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爱。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的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里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①

同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运动的曾志,与其他70多个重点审查对象被编入党校临时支部,离开原住地,迁往新住地。“此处三面是山,打了一排窑洞,缺口处筑着一道高约三四米、厚约一米的坚固土墙,墙上插着许多破瓷片、碎玻璃,墙外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战士。这里名为临时支部,实为监狱。”“有一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反而用脚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溷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连续几个昼夜的车轮战,是对每个收审者的生死考验。“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在这种情况下,七十几个受审查的同志中没有屈打成招的只有4人,其中之一就是曾志。她能幸存下来的秘诀就是:“我时时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励自己,敦促自己多吃、多睡,努力排除干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②这个生存秘诀的要领,其实就是肉体上通过顽强的新陈代谢保持健康,精神上排除其他一切私心杂念。

1939年12岁进入延安的灰娃,在儿童艺术学园长大。她晚年回忆:“我从幼年就过的是组织紧密,纪律严明的集体生活,坚定的[地]认为作家、写作、发表、出版以及一切一切工作,都只能是组织领导者才有权指派安排,个人应当服从,个人应当遵守纪律,不经组织指定,

^①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下册,同前引第333—334页。

^② 同上,第340—341页。

自己写,把文字公之于众,那简直是大逆不道。”^①

经历过整风抢救运动的革命女同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组织,相信组织了。“1938年入党后,孙铮就养成了一个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的习惯。尤其是在延安和在华北的战争岁月,哪怕芝麻绿豆也得找组织谈一谈,有什么想法从不闷在心里。”^②在一切物质生活资源和精神思想资源都由政党统一支配,按计划供给的社会体制里,她们不仅极力消除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异,而且一旦家庭生活出现波折裂痕,更向组织主动奉献出自己的全部隐私。

石澜在与舒同共同生活的40年中,始终坚信“我们婚姻的政治基础是牢不可破的”,“我常常把在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和原则性带到家庭中,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感觉到,“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可是,作为妻子的石澜越是发现家庭生活中有矛盾,越是要将矛盾上交给组织。“对这些矛盾,我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法,向有关的组织写信控告了他。这些信又被转到了舒同手中,舒同震怒了,向法院提出离婚。”等到她晚年清醒过来时,事情已经不可救药。她在法院给她的离婚判决书上写了八个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③

范元甄曾经是武汉、重庆抗战宣传界的风云人物,颇得王明、周恩来的赏识。1939年,18岁的她与李锐在重庆结婚后同赴延安,先后在



1942年9月1日,石澜与舒同在延安结为夫妻

^① 见王伟明、灰娃:《记忆敲响那命运底铜环》,《诗网络》双月刊(香港)2002年第2期。

^②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66页。

^③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同前引第252页。

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学习或工作。她与江青、孙维世、苏菲并称“延安四大美人”。1943年审干抢救运动中，李锐被当作特务嫌疑送到保安处隔离审查，范元甄受到牵连也被抢救。×××受中央政治研究室组织指派去抢救她，却与她同居了。1944年6月李锐甄别释放，与范元甄离婚，大病一场。组织上出面干涉，将范元甄下放到桥儿沟乡当文书，×××不顾自己已有家室，竟然冒充范元甄丈夫，继续与她同居。组织再次干涉，劝慰安排她与李锐复婚，并将她调到《解放日报》社和李锐一起工作。^①这件事情上，受到家庭和社会指责的都是范元甄。那么，作为一个革命女性，她今后还有什么脸面去工作呢？她心理的委屈还能向谁倾诉呢？只有一切相信组织，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把家庭里的一切大小事体都及时准确地向组织上汇报，以此表示自己无私无畏；再用意识形态话语把自己装点起来，对外是一张金字招牌，光灿灿的面孔，对内聊以安慰曾经受伤而不能袒露的心肠。

六

“个人幸存不是妇女运动的主题，民族的出路才是结论所在。”^②在整个抗日战争环境中，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妇女运动，以1942年为界，此前阶段对于农村妇女是号召她们解除旧婚姻，冲破旧家庭，加入妇女组织，走进革命队伍，对于奔向延安的青年女知识分子，是组织学习，分配工作，参加各类文娱活动，正确对待革命婚姻；此后阶段对于队伍里的所有妇女就是生产劳动，与男同志一样，生活自给，多劳多得，只不过对于知识分子出身者更多了一层政治审查。1943年三八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通知指示：“目前边区妇女工作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使一切可以从事劳动的妇女都要走上生产战线，特别是纺织、养蚕尤为重要，其他家庭手工业、农业也都要尽可能参加，务使妇女与男子一同努力增加生产，建设边区，达到增强抗战力量，改善人民生活。今年‘三八’纪念节，即应本此任务，

^①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书屋》（长沙）1999年第5期。

^② Patricia Stranahan, “Yan'an Wome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p. 112. California: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3.

进行对妇女宣传与组织的工作,造成广大妇女参加生产的热潮。”^①

人类性别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两性之间从身体到精神心理上的有差异是常态;相反,漠视差异的存在,简单追求男女的绝对平等,势必造成对女性肉体和精神的伤害。“给予不同发展需要的人,以同等发展的机会。”^②这是20世纪中国女性,包括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前赴后继,浴血奋斗,付出惨重代价后能够到达的新见识,也是我们用以考察革命队伍里女同志命运的一个坐标底线。

^① 《西北局关于纪念“三八”妇女节的通知》(1943年2月15日),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第3册,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印,1994年11月,第14页。

^② 见姜云飞:《失笼的囚徒——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6月。

延安交际舞始末

延安十年的业余时间里,其中1937—1942年前后六年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下,延水河边,穿军装,着草鞋,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这是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另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

1942年夏秋之际,整风运动全面开展以后,这种革命队伍里的交际舞渐次稀落。经过短暂的沉寂,1943年元旦开始,革命队伍里再次时兴的是军民同乐的红色秧歌舞。

259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外宾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7个多月的采访。此前半年,同样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以记者身份,到保安对中国革命队伍作第一次采访,然后写成《西行漫记》一书,向世界和中国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产生良好的效果。史沫特莱是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她的到来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经过领导讨论决定,抽调丁玲赶赴当时国共两党辖地分界处的三原古城杜里镇迎接。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分别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

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来的都是客,何况是外宾贵客。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是不仅给客人特别的欢迎,而且还为客人提供特别的宽容与理解。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尝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灭她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没有消损她的正义感。当她初见朱德时,“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然后,她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直爽地说:“让我好好瞧瞧你!”^①在延安,甚至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握手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当众拥抱亲吻怎么敢看呀?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但是,此时此地,对待这样的客人,不是客随主便,而是主随客便。

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二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



1937年初,史沫特莱作为第一个女记者访问延安

^①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见《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154页。



任史沫特莱翻译兼秘书的吴光伟,曾经接受过教会学校教育,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师从余上沅、曹禺等学习戏剧。矫健的身材,高雅的气质,在延安革命队伍里卓尔不凡,殊为少见。

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

据稍后到访延安并与史沫特莱暂作邻居的斯诺夫人介绍:“在共产党人之中,你很难区分谁男谁女,只是妇女的头发稍长一些。延安本地人总是张口结舌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些陌生的怪人。当地妇女,全是小脚,有些女孩子仍然裹足。”在当时的延安,身边带有口红并使用口红的似乎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出身高贵,气质高雅的斯诺夫人,“我不肯放弃打口红,我尽量想打得淡一些,不至于过分引人注目。”另外一个就是吴光伟,“方圆数百英里内,打口红的中国女性只有一个,她就是吴光伟……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演员。”^①



在早期延安革命队伍里,丁玲给人的印象是热情,热烈,矜持又奔放

^① [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302页。

斯诺夫人总是拒绝在公开场合唱歌、跳舞,甚至讲话,除了采访,很少串门。而史沫特莱拉着吴光伟,有时还有丁玲,却特别爱交际,喜欢串门。“在一个军事营地里,史沫特莱、丁玲、吴光伟成了独一无二的三人小组: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力。”^①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芳龄都在25—45岁之间,“像旋风一样出入在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②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并且,在革命队伍里一直盛行着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的回忆录中说: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者。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要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③

这是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

① [美]简·麦金农、斯·麦金农:《史沫特莱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50页。

② 姬乃军:《情系热土——国际友人在延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5页。

③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见《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同前引第159—160页。

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顾客人们的住处。

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①

在这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里,我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教了。^②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的原来一家地主的院落,现在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稍后,她们就迁住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今凤凰村居委8号)。这是一排5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她们住中间两孔相通窑洞的后窑,前窑住着为她们专门配备的警卫员。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①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见《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同前引第168页。

^②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4—5页。

三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

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后方社会的各种工作,包括文化、教育、宣传,几乎都是妇女和孩子们承担的。当时的红色工会女会员有1万多人。红军开始长征时,动员妇女参加赤卫队来保卫苏区。“白军侵占苏区后,数十名苏区妇女领导人遇害,幸存者只有随红军长征的50人,其中有30名党的女领导人,20名护士和女工作人员。”^①她们在革命队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因为“以她们自身的资历论,都是老革命家,而作为苏维埃上层领导人的亲密伴侣和多年的老战友,她们又在宝座后面,更确切地说是在政治局幕后,执掌着传统的大权”^②。这个“传统”不是一般封建的东西,而是指经过对封建的历史的道德人伦与交往规则进行过革命化变革的“革命传统”。

群众运动、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竞赛,“这几种行动形式在苏区的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和群众的热情之高,都颇为惊人”。1930年代以后,群众运动越来越成为苏区经常性的社会活动方式,举凡攻占胜利、分田地、斗地主、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庆祝新年、欢度节日、欢迎红军、慰劳红军、追悼死难者、成立各军(团)、出征、反帝,等等,每个月至少有四五次至十余次大型群众集会或示威游行。“苏区的社会工作乃至生产建设(例如春耕运动、积肥运动、秋收运动、合作社运动等),基本上是通过运动的形式进行的。”^③而在每次群众运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是文艺宣传,女同志又是文艺宣传的主力军。

^① [美]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续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第162—163页。海伦·斯诺即尼姆·威尔斯,她与埃德加·斯诺结婚后,名为海伦·斯诺,但冒险到延安采访时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意志,仍以结婚前的名字尼姆·威尔斯署名。后来,他们离婚了,她没有再婚,为了表示自己对埃德加·斯诺的怀念,又用海伦·斯诺署名。

^② [美]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续西行漫记》,同前引第155页。

^③ 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58、160页。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刚刚组成不久的中央苏区第一个红军剧团——“八一剧团”,为大会组织了几场盛大的演出。李伯钊与赵品三、危拱之、沙可夫等同志一起,最早将大城市和苏联的戏剧艺术形式带进苏区,立即受到全体军民的欢迎和喜爱。当李伯钊亲自登台,把自己在苏联学习期间学会的“红色革命舞蹈”《红军舞》、《海军舞》、《乌克兰舞》等节目表演一番的时候,全场为之轰动。只听过山歌小调,只看过旧戏活报剧的苏区军民们,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国际艺术”。随后,八一剧团扩建为规模更大的工农剧社。瞿秋白到苏区就任中华苏维埃教育部长后,更加重视文化戏剧工作,创办了专门培训革命戏剧人才的高尔基戏剧学校。长征途中,主要做宣传鼓动工作的中央工作团,一边行军,一边不断用歌声、口号和话语等文艺形式鼓舞战士们前进。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恢复了革命歌咏和红色革命舞蹈。在革命队伍里,凡是有集体聚会就会有嘹亮的歌声,会前唱,会后唱,你们唱,我们唱,你们拉我们唱,我们拉你们唱,饭前唱,劳动唱,行军唱……革命队伍几乎成了歌唱的队伍,保安、延安先后成了歌声的海洋。1936年8月的一个周末的晚上,斯诺在保安观看了一场“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内容有短剧、舞蹈、歌咏和哑剧杂耍。“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但是优点是从锣鼓铙钹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来,采用活的题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国京剧那种没有意义的历史故事。”^①其中的红色革命舞蹈《丰收舞》、《统一战线舞》、《红色机器舞》等,是在苏区引进苏联革命舞蹈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所有这些文艺节目,无论是采用中国旧有的形式,还是外来的苏联形式,都表现了现实的中国革命内容,所以,演出效果却是非常的好,往往是在演出结束时,观众与演员打成一片,一人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大声喊叫,全场观众随即齐声高呼,台上台下为一种政治热情所鼓舞。

这种革命歌咏和红色舞蹈,是集体情绪的相互协调与感染,其艺术指向是对美好社会生活的集体幻想。而交际舞通常却是男女成对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同前引第94—95页。

相伴而舞,其效果指向是个人生命空间的情绪调适。

所以,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了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50位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的生活和工作,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据说,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她们把新式婚姻作为一种严肃的社会制度来捍卫。……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早已被视为毒草,从革命阵营中铲除了。”^①交际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②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对这批强悍的女英雄们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现在,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她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着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

266



1937年初,美国记者厄尔·利夫(左二)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左一)、朱德(左三)时,吴光伟(左四)出任翻译

① [美]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续西行漫记》,同前引第157页。

②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13页。

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①

四

“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毛泽东对交际舞也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虽然他也经常光顾舞场,但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交际舞,只是与史沫特莱、吴光伟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据史沫特莱回忆: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②

另据埃德加·斯诺根据史沫特莱介绍所作的记录说:

红军正在享用战争与战争之间的几个月的和平间歇期。时令是春季,禾苗给红土染上绿色,苹果树繁花盛开。终于从持续多年的战斗中脱出身来的毛泽东读着许多书,写着有关政治和哲学的论文。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

^① 转引自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78页。

^②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见《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同前引第159页。

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引者注)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人们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①

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贺子珍自己晚年对来访者说,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面对面地正在谈话。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

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窑洞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②

事后,吴光伟向有关部门反应贺子珍打人,小范围内称之为“吴光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与贺子珍合影

^① 转引自[美]简·麦金农、斯·麦金农:《史沫特莱传》,同前引第255—256页。

^② 参见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同前引第177—178页。

伟事件”，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什么处理意见。

贺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恶人先告状”后，气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莱枪毙了！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跳交际舞，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吴光伟大约在1937年7月底“被礼送”悄然离开延安；稍后，贺子珍于8月间离开延安，经西安转道赴苏联。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道，素然寡味地告别了延安。^①

五

贺子珍出走，江青进入毛泽东的生活，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延安交际舞时潮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自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至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期间，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据西安办事处的统计，仅1938年3月至5月，就有2288人经该处介绍到延安；全年总计约有1万余人从这里获准去延安。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扩办抗日军政大学的同时，陆续创办了陕北公学（1937年9月）、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延安马列学院（1938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学院（1939年5月）、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等一系列面向广大青年学生的免费学校。

为此，作为中共中央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1939年12月1日公开

^① 后期，史沫特莱在延安的朋友似乎只有丁玲和朱德。而此时丁、朱都不在延安，所以她临行前只有向斯诺夫人借钱。她对斯诺夫人说：“你在这儿能借到钱，我借不到。”见[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同前引第310页。

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其中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

这些青年学生的到来，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而且使延安这座本来灰色狭小的古城，顿然间焕发出年轻的光彩，成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从延安北门外搬迁到桥儿沟天主教堂的鲁艺，有了气派的大礼堂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计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

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转赠到鲁艺。

只有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好在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自苏联或重庆穿来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住窑洞、穿草鞋,是当时参加革命的标志。“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①男同志的草鞋没有什么花哨,女同志的草鞋或凉鞋上缀上一对跳跃的绒线红球,就成了舞场上的时髦。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就更加别致了。冬季里将制服袖口、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在舞场里也是很出众的时装。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还有萧军夫人王德芬当垆的窑洞酒吧供应饮料。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1940年中秋节时值9月16日,星期一。女大学员孟子、白凌、严昭、葛瑜、莉莎五人,晚饭后换上她们最好的时装——缝有白布假领子的列宁服,勒紧腰带,没忘记把茶缸子挂在腰带上,悄悄地溜出了校门。她们像飞出了笼子的小鸟,又蹦又跳,踏着暮辉,沿着延河往东走。出了城东,是一片空旷的河谷。晚霞刚刚散尽,月亮已经爬上了东山,天地间一片高阔幽蓝。五位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被这奇妙的美景感染了,情不自禁地一边走,一边高唱起来。从学校到桥儿沟有将

^① 韦君宜:《延安的时装》,见《我对年轻人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79页。



当年延安黄土地上,每逢周末夜幕降临,一对对革命男女踏着交际舞的节拍,翩翩起舞

近十公里的路程,她们走出了汗,但一点也不觉得累。

272

来到鲁艺,她们先进音乐系住的一排窑洞,那里有时乐濛、刘炽、陈紫等人在等着呢。听到音乐声远远地响起,他们匆匆地喝上几口水,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大操场上正在举行的月光舞会。此时,皓月当空,彩云追随。^①热情的音乐系小伙子们轮流吹奏起美丽的乐曲,露天舞场上一对对青年男女翩翩起舞,沉浸在融融的月色里。《小放牛》、《酸枣刺》、《春之声圆舞曲》、《友谊地久天长》……一支乐曲,又一支乐曲,欢声笑语伴着动听的旋律,回荡在金秋岁月黄土高原上的山水之间。

“时间不早了,最后再跳三个舞!”领头的白凌趁乐曲间隙,赶紧提醒大家。抬头望天,她们才发现月已西斜,而舞场上气氛却依然热烈。

“怕什么?反正不耽误明天早晨上课就是了!”舞曲又起,不知道是谁抢了一句。

^① 据《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9月版)记载,1940年9月16日,时在绥德,天气为雨,但15日“晴”,17日“阴”。绥德距延安约为150公里,估计延安此间也是阴雨或多云天气。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9月19日载《边区党委边区政府紧急通知开秋荒廿万亩》,“时值秋令,天雨连绵,正是开荒翻地的最好良机。”但中秋节这一天至少不是雨天,因为鲁艺开月光舞会确有其事。孟于等人从女大赶到鲁艺去跳舞,出自她们的回忆。

说的也是,难得今晚这么好景致,干脆坚持到最后。跳完集体大秧歌舞,舞会宣告结束,想到还要往回赶路,她们才感觉到有些乏力了。沿着原路走回到女大门口,天色已经放亮,她们索性来到延河边,掬起清凉的延河水,漱口洗脸。不多时,学校的起床号吹响了,她们悄悄地融入了新一天的生活……

同样是在鲁艺舞场上,还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1939年7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实习学生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便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流辉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

三年后的7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晚会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当时的中央党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训从前线回延安的高级将

领。这里的舞会有邓发从苏联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张唱片,场地冬天有俱乐部,夏天就是露天的篮球场,大家学着跳着,不亦乐乎。“看不惯,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①这个顺口溜生动地描述了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将领们接受交际舞的心理过程。“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而深入交际舞场的男女乱阵之中,既为将领们提供了宽裕的条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誉。所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②

六

274

延安交际舞时潮持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1943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偶尔还有的交际舞会,都是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枣园中央小礼堂等最高权力机关,很小范围内的高层娱乐活动。^③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将本来在政治局高级干部之间开展的整风运动,转向到全党开展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同时选择西北局、中央研究院、《解放日报》社和文艺界作为整风主要试点单位。普遍性整风运动之初,文艺界都以为这次运动是针对“大头头”的,是帮助党改进完善工作的。所以,继红军女英雄们反对交际舞后,延安文人又在文章中提出对跳

① 姚铁:《欢快的宝塔山——延安党校的文化生活》,《党史纵横》(沈阳)2001年第11期。

② 梅剑主编:《延安秘事》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445、446页。

③ 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间,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共联络员兼塔斯社驻华特派员的彼得·佛拉第米洛夫,中文名孙平,在其日记中论述了当时的情况。1945年边区干旱,备荒节约成了当务之急。毛泽东说:杨家岭的伙食减三分之二,停止跳舞。过去跳舞对的,现在不跳也可以。见《林伯渠在边府备荒节约会上的讲话》,1945年6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43页。但实际上交际舞仍然在小范围内有人跳着。

交际舞的批评。

丁玲不反对跳交际舞,但对于出现在延安舞场上的不平等现象却颇有微词的。“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①后来,她自己承认这篇曾经给她带来半生磨难的文章是确有所指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②

比丁玲态度更加激烈的是王实味。在延安,他自己从来不跳舞,也看不惯别人跳舞。想到革命并未成功,烈士们浴血牺牲的情景,他就“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因此也就对于眼前的文艺晚会和交际舞深恶痛绝,斥之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③。这篇文章触犯了众怒,整风运动转入审干抢救运动后,他被开除出革命队伍,并蒙冤遇难。

遗憾的是,文人们对于交际舞的批评,不但没有引起更多的同情和支持,相反却招致整风运动中的激烈反对。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6月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11月康生在陕北公学制造出“张克勤案件”,整风运动转为审干运动。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审干运动再转为抢救运动。各单位和部门为了完成“特务”指标,抢救失足的同志,停止一切正常的学习和工作,进行背靠背、拉网式的排比审查。抗战后到延安的新知识分子80%被抢救成“特务”。^④人与人之间,哪怕是夫妻之间都为之一时生疏。“审干一开始,各个单位都关了门,连亲族朋友也不相往来。”^⑤延河边消失了夕阳下散步的身影,延安时期的革命队伍里从此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跳交际舞了。

审干抢救运动后,在中央机关偶尔还有交际舞会,尤其是招待驻

① 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② 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北京)1982年第2期。

③ 王实味:《野百合花》,《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13、23日。

④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79页。

⑤ 陈学昭:《天涯归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72页。

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

其实,交际舞最初也是欧美民间社会舞蹈。经过革命队伍的勇敢接受,交际舞登上了中国黄土地,很快又被中国民间社会舞蹈取而代之。

1943年元旦,鲁艺组织宣传队学习改编并试演陕北秧歌剧获得好评,中宣部及时推广其经验。春节期间不仅鲁艺秧歌轮流到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演出,而且其他单位也都相继组织成立秧歌队,开展演出活动。这样,延安城里军与民、上级与下级、演员与观众,不分老幼与男女,全部都可以随着悠扬的鼓点和高亢的唢呐声,扭到秧歌的舞阵里来,成为感受集体情绪,体验革命力量的民间狂欢。



恋爱中的枪声

1937年10月,延河边,一位红军干部与一位青年女学生的恋爱凶杀案,惊动了整个延安城。

一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恋爱婚姻中的人更容易见出其社会性。

277

1937年10月5日傍晚,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一身戎装,佩带勃郎宁手枪,偕同抗大训练部干部黄志勇,走出凤凰山下延安城里的队部,跨过北门外的延河,来到对岸清凉山下的陕北公学。在校门口,正好遇到刘茜和她的同学们,黄克功邀请刘茜到延河边散步,打算最终解决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问题。

17岁的刘茜梳着一头时髦的短发,飒爽英姿,朝气蓬勃。她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离开自己的同学,陪两位曾经给自己上过课的老师们走了。晚风习习,暮辉彤彤。他们三人沿着河岸向东边走边聊,到了枯水的河滩,黄志勇知道他们是谈恋爱,就知趣地先回了。走出很远,他又回头羡慕地看了一眼,只见他们一前一后走得并不整齐的身影,漫漫地溶入了河滩旷野成双成对散步恋爱的人群。

黄昏夜幕,没有人看清他们二位的面容,也没有人听到他们夹在沉默中的零碎言语。只见他们沿着河滩走得很远,夜色越来越暗,人群越来越少,然后停在那里,僵持了很久。最后,黑暗的夜色里,枪声响起,刘茜躺倒在一片血泊之中。枯水季节的延河,默默地流淌在她的身边。

久经沙场的黄克功,枪声似乎带给他更多的冷静。他从容不迫地

沿着延河走回来,在宿舍里先脱下外衣,解下鞋子,洗罢脸、脚后,再把衣服和鞋子浸泡在水里,将溅在上面的血迹清洗干净。然后,他亲自来到校部,向当夜值班人员汇报他刚才与一名女学员发生摩擦冲突了。值班人员并没有当作什么一回事,他反而感觉很轻松地回到宿舍里。临睡觉前,出于职业习惯似的,他还将身上佩带的勃郎宁手枪取下来,认真仔细地擦拭干净。又从口袋里掏出刘茜曾经写给他的信,从头到尾温习过一遍,想想,拿起笔将信末的日期改写成:1937年10月4日,即,希望是枪杀案发生的前一天。

二

至今仍然保存在档案卷宗里的这封信,可以让我们约略窥见半个多世纪前,这场不幸爱情故事的情感原委——

278

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

我希望你站在朋友或爱人底[的]地位来指导你的小妹妹,能吧!?!——告你,一个人,不!就直接说我,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把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地]来了,你无形中做了侮辱朋友的行为,不管你是如何的用心。

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互相的经济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你认清点!!

我们都有恋爱的自由,谁都不能干涉对方的交友!你或者在惊奇吧!朋友!这话是从正确的理论书上得来的。

这钱吗?假如你爱我,就不应给我,请你给前方战士用好了!



刘茜(1920—1937),这是她到延安前的照片

我们还是讲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多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说是吗？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这是我的点许希望。^①

刘茜，是山西省定襄县人，曾经在太原市友仁中学读书。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出于一腔抗日救亡热情，她放弃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奔赴延安，同年8月被录取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十五队学员。

抗大的前身是红军大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最初在瓦窑堡恢复，稍后更名为“中国红军抗日大学”，迁址保安。1937年1月，随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城里，再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校以培养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政治领导干部为目的，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所培养军政人才的军事化学校。时年26岁的黄克功，江西南康人，少年时代就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在二渡赤水和娄山关战斗中表现突出，曾先后任红军某团团支部书记、宣传科长、政治委员，中共党员。他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在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曾担任第十五队队长，也就是刘茜的顶头上司。

他们的交往和恋爱，正发生在这个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更加提高。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青年学生，纷纷奔向延安，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伟大运动中。在革命队伍里，在革命的圣地延安，曾经是红军，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而经历过长征后的红军，年龄都相对比较大，来到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下，面对来自城市里的热血青年或青年学生，便开始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长征的幸存者是红军队伍的精神核心。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如同法家的革新一样，为解放区的每一个人树立了行为准则。在过去他们也许曾为讨父母的欢心而结婚，但现在在延安这一进步的生活圈子里，父母的权威和儒家的圣贤们都被摈弃一旁，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结婚，

^① 刘茜致黄克功信，陕西省档案馆存，全宗号015-0543。

只要这个婚姻与党的利益一致,并且当然不能是同剥削阶级联婚。”而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他们都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大都“蔑视一切婚姻的成规,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①。所以自由恋爱和婚姻,在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发起之前,不仅是革命队伍里的美好愿望,同时也是一种人性的必然和客观现实。

只是在恋爱婚姻的过程中,知识青年们才发现自己与这些崇敬的红军战士或工农干部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精神心理距离。这时延安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虽然有国民政府提供部分军饷,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使得物质供给一直到“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前,都是比较紧张。黄克功能拿出一点钱送给刘茜,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对方却坚定地信奉着爱情的基础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应当有共同的意志和认识。从信件的字里行间,甚至过多的感叹号和破折号中,可以感觉到刘茜的热情、天真和开朗。她始料不及的是,原以为可以用话语化解的情感矛盾,怎么被枪声和鲜血过早地为自己年轻的生命画上了句号呢?

280

三

随着青年学生的不断涌入,1937年9月,中共中央筹建另外一所学校——陕北公学,旨在短时期内给大批进入延安的爱国青年以抗战的必要知识,培养抗日先锋队力量和未来国家建设人才。原抗大第三期第十五队学员,全部转入陕北公学,刘茜也到了清凉山下的新学校。但黄克功仍然留在了抗大,被重新调任第六队队长。

10月5日晚,刘茜一夜未归,第二天被发现已经僵卧在延河岸边。陕北公学的学生们顿时惊呆了,往日激昂的学习生活被焦躁激愤的情绪所代替。人们在等待着事件的结果。

经医生验伤检查,留在档案里的验伤单写着:

^① 黎漓编:《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57、158页。

左耳后有枪伤一处,弹穿脑门;
 左肋背后有枪伤一处,弹未出。
 右膝盖及下腿有伤痕,呈暗黑色,稍带紫,皮未破;
 左手腕上有伤一处,皮未破,暗紫色;
 左手指有伤一处,皮未破,暗紫色。①

枪伤之外的多处伤痕,是她自己跌撞的,还是遭到殴打?无人知晓。黄克功被边区保安司令部关押后,接受以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为组长,由抗大、陕公和保安司令部等单位部门联合组成的审讯组的多次审讯。在陕公,他对枪杀事件供认不讳,递交的第一份陈述报告(书记员笔录)中甚至颇为慷慨激昂地写道:

与刘氏相识于抗大,在抗大不多日之短期过程中,余观刘氏天真活泼,幼年颇有智慧,因此乃与刘结成朋友之交,相互通信,未数日,即发生爱的关系,(当时至今约五星期半。)在最初的两、三星期,贰者情深至极,继则与刘氏口头订婚。刘则满口允诺,谓学习半期或一期后,实现正式登记。此一事件,外界人士大都皆知,尤其与我同事诸人更为详细。孰料刘氏狼心毒恶,玩弄革命军人,随处滥找爱者,故意破坏订婚之口头协议,损功[指黄克功——引者注]名誉。功闻讯后,即采取通信方法予以说服教育,孰料刘氏固执不变,反而将我所给予之信件交诸友人宣扬,更进一步破坏余之威名,此乃刘氏深切给余痛苦一也。其次,刘氏给余之痛苦,乃为余已去信数次,未复一函,竟然拒绝。最后虽曾复一函,也不过口是心非而已。因此余乃不得不亲临该处,邀刘做最后之口头谈判。在谈话时余对刘态度和藹,而刘却眨眼无情,恶言出口。因此,余受痛苦与刺激过大,则拔手枪而恫赫[吓]之,谁知事出意外,竟失火而毙命耶。②

① 刘茜验伤证明,陕西省档案馆存,全宗号 015-0543。

② 黄克功陈述报告(一),陕西省档案馆存,全宗号 015-0543。

他没有提到刘茜遗体上的伤痕问题,似乎也没有被问起此事。问题关注的焦点是枪伤、人命。很快,他就枪杀问题又被责令递交了第二份陈述报告。其中交代:

余观刘眨眼无情,乃故意损功名誉,当时则气愤填胸,乃拔手枪与[予]击之,一枪未击毙,故加一枪,以免对方作对。^①

后来,经过多次审讯和查证,判决书上认定的枪杀经过是:

10月5日晚带勃郎宁手枪,威胁恫赫[吓],竟以打敌人的枪弹对准青年革命分子的刘茜肋下开枪,刘倒地未死,尚呼求救,黄复对刘头部再加一枪,刘即毙命。^②

282

不管当时的真实动机是什么,黄克功写在纸上和接受审讯时,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军人的荣誉感和尊严感。他杀死了人,还自以为是维护着一个革命军人的荣誉和尊严,认为应当属于正义的革命举动。就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审讯组收到一封署名“特区队”的意见信,认为“现在正是抗战,刘茜死,革命已受损失,黄克功若被处死刑,革命更受损失”。这给事件处理带来了难处。

四

在审讯过程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问:你知道她今年多大年纪吗?

答:知道,十六岁。

问:既知道她多大年纪,为什么还要求与她结婚呢?

^① 黄克功陈述报告(二),同上。

^② 黄克功判决书,同上。

答：她的身体已发育完全了，不像是十六岁的人。……我并非汉奸卖国贼，只有[?]我一息尚存，还恨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她公开或不公开的[地]破坏我的名誉，故我恨她才打死她。^①

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沿用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这份条例最初由王明从苏联引入并加改进，1931年11月28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1934年加以修订。其中规定结婚年龄，男子须满20岁，女子须满18岁。由于战争环境影响，这个婚姻条例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确不是非常严格的。延安时期主要从事妇女工作的红军女战士刘群先曾对到访的外国记者说：“在新苏维埃各项法律最初实施的时候，这个新结婚离婚法常常被人滥用。”^②

当时的婚姻现实是，中央主力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9万余人，只剩下将近2万人，再经张国焘分裂后，真正到达陕北的幸存者只有近4000人，其中女红军50人。到1937年底至1938年初，男女比例上升为30:1。到1941年，为18:1。到1944年5月，达到8:1。平时大家“在公开谈论中是不赞成搞两性关系的，但在漫长冬夜温暖的窑洞里却是人们经常谈及的话题”^③。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以组织的形式处理婚姻的问题。

马加的一篇小说，写从外地来到延安，经过学校学习培训后，担任县妇救会的女干事杨芬，行军中掉队落入另外一个支队。“支队长露出不整齐的黄牙齿微笑了，他的两只小眼睛频频的[地]闪着光，表示着无限的愉快，似乎他在打扫战场时意外的发现了稀罕的胜利品。”到了宿营地，支队长更显示出露骨的亲昵，亲手把她从马背上抱下来，拍去她身上的尘土，尔后又赠之以物，介绍她进星火剧团。此后一有机会，支队长就找她谈心，很快就提醒她应当考虑婚姻大事了。杨芬说现在还没考虑的必要。

——“没有考虑的必要，那么就请组织批准吧！”

① 黄克功案公审记录，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号015-0543。

② [美]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下册，同前引第317页。

③ [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页。

——“请组织批准我们结婚？”

——“第一点，你和我结婚你会进步；第二点，……”

她没有答应。没想到，支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都相继来做工作：

——“你不和支队长结婚，那么你想和谁结婚呢？”

——“找一个老干部结婚，是顶吃得开的。”^①

这篇小说当时受到严厉的批评，那些红军干部们说：“我们打天下，找个老婆你们也有意见？”^②“所以，在延安的相当长时间里，婚姻问题便成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最敏感的问题。

五

刘茜的人命案一时得不到妥善处理，各种谣传就像夏日里的野草日夜疯长着。有一种传说，他们恋爱中，刘茜写给黄克功的信上，最后一句话是：“请原谅我的走开。感谢你过去对我的爱，送你一个吻！”信是托人送去的，黄克功不在宿舍里，信就放在桌子上。等到他回来，拆开信，看完后，火急火燎地在宿舍里到处寻找。有人问他找什么，他说女孩子信上讲了送他一个什么东西，你们有没有藏起来？大家直纳闷，都说没有。他不相信，以为大家跟他开玩笑，更加找得尘土飞扬。后来有人说，你把信给我们看看吧，到底送个啥我们真是不知道。一看信，大家哄然大笑，说：“人家女孩子跟你拉倒了，最后纸上送你一个吻，这是礼貌。”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从第三次反“围剿”前后，就非常突出强调“扩红”问题，即不断扩大红军队伍。长征达到陕北后，这一问题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并随形势发展变成吸收准备各类建设人才。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大量地吸引卷入反日浪潮的白军士兵与青年学生到游击战争中去”^③。抗战全面

^① 马加：《间隔》，《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12月15—17日。

^② 艾青：《漫忆延安诗歌运动》，见艾克思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43页。

^③ 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8页。

爆发,大量知识青年奔向延安,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热诚欢迎。1939年12月1日,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随后,《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当务之急,是要在延安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把知识分子能够留得下来。

迫于这样的形势压力,杀人偿命,黄克功初审被判处死刑。他不满意对自己的审判,上书毛泽东,一定要求毛泽东处理这件事。

案件卷宗和个人陈书,很快都送到毛泽东手中。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兼黄克功案审判长雷经天,其中说道: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①

10月11日^②,延安北门外陕北公学大操场,举行群众公审大会。抗大政治部胡耀邦、边区保安处黄佐超、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官徐时奎出任公诉人;由边区法院审判长雷经天和抗大、陕公选出的代表李陪南、周一明、王惠之、沈新发等4位陪审员,以及书记员任扶中,共同组成审判庭,经过提起公诉、审讯被告,询问证人、群众代表发言和辩论。在当庭公开审判中,黄克功大声向群众呼喊:“是我杀了刘茜。我知道我犯了怎样的罪。但是,请你们念着我十年来在红军中奋斗的战绩,

^① 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信》,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40页。

^② 关于黄克功公审宣判大会召开的时间,另有一说是1938年3月至5月之间,显然是误记。此处依据时任陕北公学筹备组负责人,1937年11月1日学校正式成立后任党组书记兼校长的成仿吾的生前回忆。见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64页。

给我一条自新的路罢！我并不畏死，可是我却情愿死在战场上。让我的血流在敌人面前吧！把这颗结束我的生命的子弹，用来射击我们民族的敌人吧！”^①据现场目击者介绍：“黄克功借法官询问他的经历的机会，便指着他的左背上的伤疤，还想脱下衣服来让人看看。”^②当时很多人都被感动了。

审判员中场退席集议后，又鱼贯而出。会场上一阵骚动议论，逐渐恢复平静，大家都在翘首等待着审判结果。审判长雷经天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当着黄克功的面公开宣读毛泽东为此案写来的复信，并庄严宣读边区最高法院刑事判决：“本庭判决凶犯黄克功，因恋爱问题而枪杀革命同志刘茜，经公审，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黄克功听完宣读毛泽东的信和公审宣判，表示诚恳认罪，甘心伏法，毫无怨言。但是，群众中有许多人发言，要求免除他死刑，让他戴罪立功，将功赎过。“不少老红军干部甚至痛哭流涕。”^③场面极其悲壮，令观者不堪熟睹。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洛甫（张闻天）亲自到会，在审判结束后，发表讲话，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阐释怎样正确对待和处理恋爱婚姻与革命关系。

各位同志：黄克功的死，在我们党是损失了一位英勇的斗士，而且是一位过去十年来曾经为主义奋斗的好青年。然而，他现在竟犯了一件不可赦免的罪行，他杀了他的同志，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已经不再是过去英勇的黄克功同志了。他忘了党的主义，他背弃了群众。杀了一个优秀的党员，便是减少自己阵营中的实力，也就是替敌人帮凶杀害同志。如果，他今天所杀害的是敌寇，汉奸，托派……当然，我们无判他罪刑的理由。但是，现在我们又不得不忍痛地用一粒子弹结果他的生命了！

恋爱是基于双方同意的自由行为。强迫，威胁，甚至用

^① 舒湮：《战斗中的陕北》附录《延安行》，上海：文缘出版社1939年3月初版，第39页。

^② 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10页。

^③ 参见《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101页。

残忍的手段去杀害对方的生命,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动意识的作祟。这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行径。

在这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希望我们的青年们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恋爱的纠葛上面。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否则,如果恋爱的事情不能避免,就应该循着正确的观念去发展。^①

接着,他又说:

革命队伍里的终身伴侣,首先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才是夫妻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找对象也不能要求对方十全十美,无论在恋爱过程中和结婚后,男女双方都应该互相尊重,互敬互爱,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前进。黄克功与刘茜,都缺乏正确的恋爱观,以至酿成悲剧,这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大不幸,要引以为戒,吸取教训。^②

287

这个讲话从正面表明革命组织对于同志们之间处理恋爱婚姻问题的态度立场,也是借着出现了黄克功这么一个极端的反面典型,开展正确恋爱观教育。

延河边又是一声枪响,黄克功当场毙命。

新成立的边区政府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中说:

黄克功由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认女子为私有财产的观念出发,不顾革命利益之损害到如何程度都不能克服它的情欲所求。……枪杀自己革命的青年同志,破坏革命纪律,破坏革命的团结,无异帮助了敌人。无论他的主观是否汉奸,但

^① 转引自舒湮:《战斗中的陕北》附录《延安行》,同前引第40—41页。张闻天的这个讲话稿正式文本至今未见,此处转引是该书作者舒湮1938年底以《抗战》三日刊通讯员身份到延安采访时所得,其中说刘茜是共产党员,疑有误。

^② 转引自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85页。

客观事实上确是汉奸的行为。^①

同日,边区高等法院还张贴布告,公布黄克功罪状及其处理决定:

黄克功,男性,年26岁,江西省南康县人。案查该凶犯于10月5日黄昏在延安城外东关河边地方,因逼婚不遂逞凶枪杀陕北公学女生刘茜一命,经检察机关侦查,证据确凿,提起公诉。本院举行公审,该凶犯在法庭上已直供不讳。此种罪恶行为,本院认为该凶犯黄克功为着个人的恋爱不达目的,竟忘却自己过去为革命艰苦奋斗的光荣历史,不顾目前抗日救国的重大任务,破坏红军铁的纪律,违犯革命政府的法令,自私自利,以最残忍的手段杀害革命青年同志。当前暴日侵凌,国家危急,民族的革命战争正在紧张的时候,对于此种在革命营垒中的败类,应给以严厉的制裁,以维护革命的纲纪,[。]本院根据该凶犯黄克功犯罪的事实,特判处死刑,当即验明正身,执行枪决。^②

288

几个月后,在抗大的一次宴会上,人们还在谈论着这件事。毛泽东说:这叫做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我们了。^③

六

黄克功最终被枪决了。

当时延安所有的报纸杂志对这样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都保持了沉默,没有留下一点文字的痕迹。但这个事件所掩藏着的恋爱婚姻矛

^① 对黄克功提起公诉书,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号015-0543。

^②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布告》,[1937年]刑字第二号。见《延安市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819页。

^③ 见《徐懋庸回忆录》,同前引第101—102页。

盾,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或得到根本解决。

几年过后,到延安的知识女性大都经历过一番革命的恋爱婚姻。1942年3月9日,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就日常生活中的恋爱婚姻问题,“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大胆地道出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所特有的感受。“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在稍后掀起的整风运动中,这篇文章受到严厉的批评,丁玲为此一而再地受到政治打击。

实际上,在延安当时发出同样感叹的并不只丁玲这一篇文章。日复一日的生活琐屑,有时比悲壮一时的牺牲,往往更能消磨一个人的精神、意志。另外一位被缠上“挣不断的红丝线”的年轻妈妈撰文说:“你想想看,有了孩子,在延安,人们却总是这样的繁忙:开会、办公、学习,有时还要兼教一点课,出去检查工作……因此,抚育孩子的重责常常放到母亲的肩上。做慈母的,既要工作,又要领养孩子,请不到奶妈,送不上保育院,你说能够不烦恼吗?又加上一些不了解的人,对母亲们有着不应有的轻视;做母亲的自己又担忧着跟不上同走的同志们,恐惧着落后……”^①

令人欣慰的是,作者相信她们是在走着一条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艰难、崎岖,并且漫长的道路,坚信对于以革命为终身职业的女性来说,并不是如何了不起的困难呀!

1944年8月,中央军委卫生部、中央医院等单位抽调人员,帮助边区政府筹办助产学校。学校安排在延河上游距离中央医院还有十几里远的枣园后沟的山沟里。学校亦名助产训练班,9月开学时有两个班,甲班学员20余人,乙班学员30余人。校舍是新近开掘的两排窑洞,荒山秃岭,秋风瑟瑟,夜晚常闻狼嚎,很是让人害怕。“这里除管理

^① 林风:《时代所给予我们的》,《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9月3日。

员等3个男同志外,其余全都是女的,而且多数又是未婚姑娘,有时便有不三不四的男人上山来找朋友,都被高大姐婉言挡驾了。”殊料这就招致祸害,冬季的一天夜里,她被害死在自己的窑洞里。据当时的法院同志向有关方面来人介绍说:“从检查来看,死者生前是与敌人作了顽强的搏斗,全身多处伤痕,最后对她进行强暴,并用绳子将她勒死。凶手是撬开窑窗进来的,惨无人道,我们一定要捉拿凶手!”^①

这位高大姐,名叫高志珍,来此之前是边区妇联的一位干部,具体负责这个助产训练班工作。她早年就参加革命,死时年仅40岁。此事未见处理结果,助产学校也就仅此一期,草草完结。

^① 薛沁冰:《回忆在延安助产学校任教的七十天》,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05页。

附录：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事判决书》

[1937年]刑字第二号

被告：黄克功，男性，二十六岁，江西南康人，前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

右被告因逼婚不遂杀害人命案件，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本院公审，特判决如左：

主文：黄克功实行逼婚不遂杀害人命一罪立判处死刑。

事实：黄克功所枪杀的刘茜，女性，十六岁，山西定襄人，陕北公学的学员。初在太原求学，自卢沟桥抗战后，愤暴日侵略，感国难严重，于去年八月间，决然舍弃家庭、学业，冒险间道来到延安城，即进抗日军政大学，在第十五队为学员，学习、工作均极努力。当时黄克功适任抗大第十五队长，遂得与刘茜认识，通信来往渐涉恋爱，感情尚好。九月间，陕北公学成立，所有抗大第十五队全体人员，拨归公学。但不几日，黄克功仍复被调回抗大转任第六队队长，刘茜留在公学学习，二人关系开始疏离，后黄克功向刘茜追求不已，送钱赠物，要求结婚，而刘茜感觉黄克功过于纠缠，发生反感，曾经表示拒绝，并给以劝诫与批评。黄克功失望，更听信谗言，以刘茜在公学已另有爱人，去信责备，同时更迫切地要求结婚，但刘茜绝不愿意，亦不给以答复。黄克功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忘却自己是革命队伍中的干部，放弃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不顾当前国家民族的危难，陷于恋爱第一的泥坑中，不能自拔，遂萌杀害刘茜之动机，借以泄愤。于十月五日晚饭后，带备勃郎宁手枪，偕同抗大训练部干部黄志勇到公学去访寻刘。在公学前适与刘茜相遇，并有她的同学数人董铁凤等。黄即招刘茜走向河边散步，刘不能拒，离开她的同学同黄克功偕行。适天已入黑，黄志勇先行分手回校，尚见黄克功与刘茜仍留在河边谈话。黄即向刘谈判，要求

公开宣布结婚；刘予以严厉拒抗。当时黄克功即拔出手枪对刘威胁恫赫[吓]，刘亦不屈服。黄克功感情冲动，失却理智，不顾一切，遂下最后的毒手，竟以打敌人的枪弹对准青年革命分子刘茜胁下开枪，刘倒地未死，尚呼救命，黄复对刘头部再加一枪，刘即毙命。黄克功于谋杀事毕后，即回校，取水洗足企图湮没血迹证据，即自行解下外衣及鞋子清洗，才去校部会[汇]报。回来复将手枪擦拭，并在刘茜过去谈恋爱的信上加填十月四日的日期，借作反证掩饰。陕北公学董铁凤等，因刘茜一夜未归[，]翌日(十月六日)即到黄克功处询问。黄神色仓忙，假作不知。乃后，群众在河边发现刘茜的尸体，特向陕北公学当局报告，并在当地检获勃郎宁手枪弹壳两颗，弹头一颗，转报法院检验。在刘茜身上，右肋下有枪伤，入口污黑色，无出口；左耳背有一枪伤，弹穿脑门，血浆模糊；左腿有伤痕两处，紫黑色：实属枪杀毙命。此项杀人行为黄克功实为凶犯，证据确凿，当经抗日军政大学当局，将凶犯黄克功拘押，捆送法院。该犯黄克功自己承认杀人不眨，复经检查机关侦查起诉。

理由：(一)蓄意杀害刘茜的犯罪行为，该凶犯黄克功即已直供不讳，更加以检察机关所提出各种确凿证据证明，罪案成立，已无疑义。(二)值兹国难当头，凡属中国人民，均要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才是自己国家民族的死敌，我们用血肉换来的枪弹，应用来杀敌人，用来争取自己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解放，但该凶犯黄克功竟致丧心病狂，枪杀自己革命的青年同志，破坏革命纪律，破坏革命团结，无异帮助了敌人，无论他主观是否汉奸，但客观事实，确是汉奸的行为。(三)刘茜今年才十六岁，根据特区的婚姻法律，未达结婚年龄；黄克功是革命干部，要求与未到婚龄的幼女刘茜结婚，已属违法，更以逼婚不遂以致实行枪杀泄愤，这完全是兽性不如的行为，罪无可赦。无论刘茜对黄克功过去发生如何极好的感情，甚至口头允许将来结婚，在后因不同意而拒绝，亦属正当，绝不能以此借口加以杀害。(四)男女婚姻，应完全是出于自愿结合，条件或不适宜，亦可正式分离，绝不许任何的强迫。黄克功与刘茜的关系，最高限度只不过是朋友相恋，即使结婚，各人仍有其个人的自由，黄克功绝不能强制干涉刘茜的行动，更不能借口刘茜滥找爱人成为枪杀原因。(五)凶犯黄克功对刘

茜实行杀害以后,清洗衣鞋,擦拭手枪,湮没罪证,复在刘茜信上,假造时日,捏造反证,更对学校法庭询问的时候,初尚狡赖,推卸责任,这足以证明黄克功预谋杀人的计划及对于革命的不忠实,这些表现实为革命队伍中之败类。本院根据以上种种理由,特为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检察机关代表□□□莅庭执行职务。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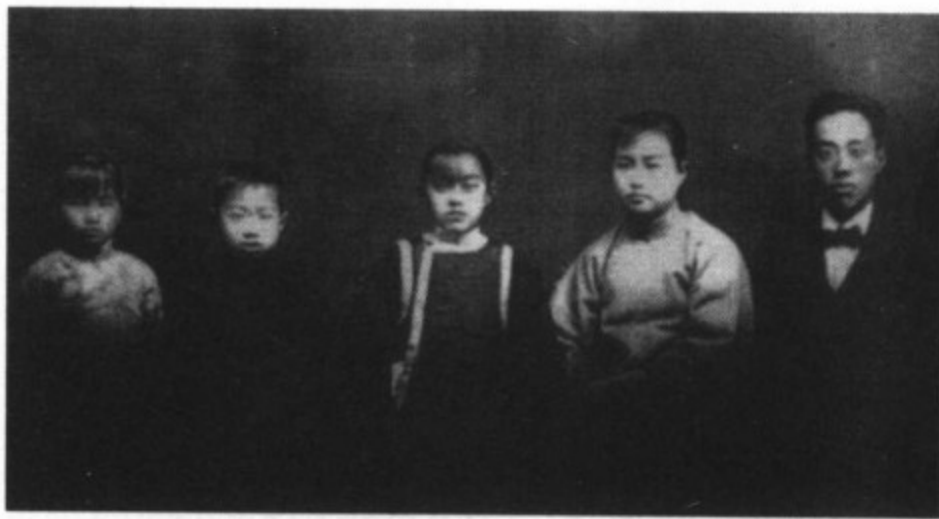


补记：

刘茜的家庭与出身

拙文在《上海文学》2000年第5期发表后，先后被多家报刊转载。不久，刘茜的嫂子华宜珍女士清赏后，著文《刘茜及其家人的故事》，配图片刊于《老照片》杂志，并被遴选入老照片精选本《尘埃拂尽识名人》^①一书。该文详细介绍了刘茜的身世及其家庭故事。现据此文，略作补记。

294



1928年，刘茜（左一）与哥哥、姐姐、母亲、父亲合影

刘茜，原名董秋月，祖籍山西定襄，1920年出生于一个官绅人家。祖父董子安，民国初年曾任晋南镇守使，掌管半个山西的军政大权，并荫承祖上财产，晚年隐居乡下。父亲董晋魁，字康侯，一生小职员。刘茜兄弟姐妹五人，长姐董如月为父亲与白氏所生。白氏得产褥热不治身亡，如月从小由外祖母收养。刘茜和长兄董家宝、小妹董淑平、小弟

^①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9月版。

董家伦皆高荷清所出。

童年的刘茜随父母在北平、天津度过。一家人住在祖上购置留存在北平的房子，父亲另有一份安定的薪俸，生活堪称小康。但刘茜自小性格倔强，性情忧郁。偶尔与哥哥口角纠纷，父母责备打骂的总是她。受了委屈的幼小心灵，她绝不忍声吞气，而是用号啕大哭来发泄自己的悲愤。家人哄劝不止，索性由她哭个够，以至于哭到后来泪珠里都带着泡沫流下来，哭得筋疲力尽靠着桌子腿睡去。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让儿子读书，却把刘茜关在家里做女红，幸亏有个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表姨妈刘映荷（字小湘）做工作，她才有机会上学，在太原插班小学三年级。在学校里，她聪明、要强、能干，插班不久就当选为班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后，她在太原友仁中学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并在宣传材料上为自己取名“刘茜”。刘是为了感念表姨妈刘映荷，茜草是一种红色的染料，表达的是对革命的向往追求。1937年8月到延安后，她就以此为自己的正式姓名。

295



1935年夏，刘茜（左四）与家人和亲戚在太原合影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平津失守，太原危急。父母准备全家逃亡，先要回乡下祖籍一次，她执意自己留在太原看房子，等父母从乡下回来后再一起走。其实，她已经报名参加民族救亡组织，留下一张字条给父母，早已乘火车经潼关、西安、三原，奔赴延安了。

刘茜父母从乡下回来后，只得带上其他孩子一起逃难，先到西安，再到天水。一路上，他们都不断打听离家出走的儿女的消息。在水西安顿之后，一天夜里母亲辗转反侧，“总睡不踏实，总感觉门后站着一个人。天快亮时，朦胧中她向门后望去，真切地看到一个身影，不由得

风物篇

考察延安生活的环境地理，审视这些被改造、
被重新塑造的人生记忆法则，探讨改造人、重
新塑造人的主题延伸。



蘇
氏
知
名

关于宝塔山延河水的万千说法

宝塔山、延河水、延安城，作为空间地理存在，与作为中国现代革命象征符号，其间相距甚远，甚至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它们都是一种真实历史存在，前者属于客观真实，后者属于主观真实。从客观真实到主观真实，其衍变升华轨迹镌刻着此后历史震荡对于当事人的精神烙印。

301

宝塔山、延河水都是因为延安城而走进中国现代革命历史进程的，姑且先说延安城。

延安，原名肤施。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原先驻防的东北军受命撤离肤施，向西安一带结集，按照东北军与红军达成的协议，由工农红军接管肤施。12月17日，黄春圃（江华）率领红一团进驻肤施。

据江华回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为了防备蒋军向他们进攻，东北军、西北军要向西安周围收缩兵力，他们来电要求我们去延安接防。”12月15日，在保安的周恩来通知安排他带人立即赶赴肤施。当时红军主力部队西征后部署在环县、定边、盐池一带休整待命，江华将保安城能够拉出来的兵力陕北红一团和原张国焘的手枪连都带上，当天奔往肤施，夜宿肤施城北门外。这时，东北军撤离后，肤施城里还有国民党绥德专员、肤施县长及其部下百余人把守。16日，“我们决定，如果明天国民党地方部队仍不撤退，即武力强占。当晚，

我派一部分部队占领东门外(应当是北门外——引者注)的清凉山,一部分部队占领南门外(应当是东门外——引者注)的宝塔山。天亮后,发现城内军队已全部撤走,绥德专员也连夜逃往绥德了,我们即从北门入城。”^①

对于红军接防肤施城,当时有一位刚从上海经西安到肤施任教的青年教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留下自己的记录。他于1936年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发生的前一天抵达肤施。“驻在此地的军队,12日夜里,向南撤退了。”17日中午,“红军的代表进城来”。“进城来的红军,衣服褴褛,实在不成样子。他们把住的地方安置好了……到处乱跑。看到可以走的人家,他就走进去。我们学校里也来了一些,一进门来,他就笑嘻嘻的[地]说:‘你们还怕吗?现在不要怕了!’”^②

江华率领红军进城后,随即报告中央。“根据军委命令,成立了延安城防司令部,白志文任司令员,我(江华——引者注)任政治委员,在白志文未到职前,由我代理司令员之职。不久,杨虎城由省里派来一位新县长,名马豫章。城里工商各界还组织了维持会,为我军筹粮筹款。”^③和平接管,当事各方都堪称客气礼让,古城面貌得以完整保存。鉴于肤施古城各方面条件较之保安都优越,中共中央又派出以王观澜为首的接管工作团到延安,具体落实各项接管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以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央决定进驻延安。1937年元旦过后,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的黄霖带领警卫部队到延安,为党中央进驻延安做进一步准备。

1937年1月10日,洛甫(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住了六个月的保安,启程前往延安。经过4天的跋涉,于1月13日傍晚,中央一行经安塞,沿延河支流杏河川,从延安西北川、蓝家坪、杨家岭的小路走过来。先期到达延安的红军指战员、城里市民,还有从附近甘泉、富县等地赶来的群众代表,在接管工作团、中央警卫团和延安

^① 江华:《红军接收延安城防的回忆》,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588页。

^② 角麟:《速写陕北九十九》(又名:《从上海到肤施》),上海:少年知识出版社1937年5月初版,第90、96、98页。

^③ 江华:《红军接收延安城防的回忆》,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同前引第588页。

抗日救国会领导下,组成欢迎队伍自城北门一直排到大砭沟口。

当晚,毛泽东借宿在抗日救国会住地罗廷桢院(今延安地区药材公司),一周后移住凤凰山下李建堂的石窑里,直到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来轰炸,再迁至杨家岭。



曾经热闹的延安古城北大街,是延安早期的主要商业地带,远处是鼓楼

在日本飞机轰炸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住延安城内北大街,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稍后更名为“陕甘宁苏区政府”、“陕甘宁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住南街沿山处,中央组织部住凤凰山麓南山下,红军大学(稍后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住东门城内府衙门,中央党校住城外桥儿沟天主教堂。

次日,延安抗日救国会在城东门内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欢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会后,还在“仙园饭馆”(今延安影剧院对面)设宴,为中央领导同志接风洗尘。

东北军主动撤出肤施,向红军拱手让城。1935年9月,由鄂豫皖根据地突围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永坪镇,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后,成立红十五军团。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与十五军团会师。与此同时,国民党调集东北军,加强配合原西北军,共同对付共产党红军。9月15日,国民党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军部及一一〇师、一二九师(欠一个团)驻守肤施。但在随后的崂山战役、榆林桥战役中,红军重创东北军,使得甘泉、洛川、肤施的东北军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孤立状态。为了争取东北军,红军采取围困、贸

易、交往的策略,肤施城就这样曾被围困过。

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张学良派人通过在上海的宋庆龄结识刘鼎(阚尊民),商讨“联共抗日”方略。1936年4月9日,经由杜重远、董健吾、刘鼎联络安排,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城内基督教教堂^①秘密会晤,商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问题。

同年6月,途经肤施到保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现,“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像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公路以及与公路直接毗连的地方,那时仍然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断联系的。蒋介石总司令对红军进行了封锁,红军利用封锁来对敌人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数以百计的人活活地饿死。”东北军驻守延安不久,就遭到红军的围城反封锁。“红军对延安的长期包围,是在我到达那里以前几个星期才解除的,但是从居民的面有菜色,从店铺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门紧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围城的迹象。食品极少,价格高昂。可以买到的那一点东西,都是因为同红军游击队达成暂时的休战而得到的。当时曾达成协议,东北军不在这条战线上向苏区发动攻势,作为交换条件,苏区的农民开始出售粮食和蔬菜给那饥饿的剿共军队。”^②不仅延安城如此,东北军在西北地区“剿共”的其他地方情况也基本上是这样。经过多次磋商,红军与东北军达成停战协议,并促使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

张学良把他的东北军集结在西安周围,并请求红军总司令部将红军主力同样调向南面,以便共同抵抗南京军队将要发起的攻势。在军队的转移途中,张学良放弃了一些到目前为止由东北军占据的城镇,其中有通往西安的公路两侧的城市延安、甘泉、富县和洛川。红军部队随即开进这些地区

^① 该教堂毁于日本飞机轰炸中,一说是天主教堂,疑有误,应当是基督教堂,详见下文“反基督教运动”。也有可能是1925年底的“非基运动周”后,基督教退出肤施,该基督教堂由天主教会接受,改为天主教堂。待考。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27—28页。

……这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所控制的地区,没放一枪一弹就一下子扩大了几万平方公里,居民几乎增加了一百万人口。^①

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用政治斗争取得军事胜利的一个典范。

二

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总部进驻肤施后,将“肤施”改名“延安”。

其实,“延安”、“肤施”都是该城古已有之的名称。但现在共产党接管后更改名称,沿袭中共地下党组织对其称谓,以划然区别于此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称谓。

秦一统天下后分全国为36郡,郡下设县。此地为高奴县,隶属上郡。南北朝时期北魏延昌二年(公元513年),设东夏州。西魏废帝三年(554年),改东夏州为延州。隋开皇三年(583年),废郡制,以州统县;大业三年(607年),复改州为郡,废延州,设延安郡,郡治肤施,下属肤施、丰林、临真、延安等11个县。其中延安县,原为广安县,因避太子杨广名讳而改为延安,但其辖地在今延长境内。尔后几经变故,至清实行省、道、府、县四级行政体制,肤施县仍为延安府治,归属于陕西省延榆绥道,道治所驻榆林。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废延安府,肤施县隶属陕西省榆林道。民国十七年(1928年),废道,肤施县直属陕西省。

大约在1923年前后,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先后来到当时陕北23县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任教,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列主义。1925年春,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在肤施正式成立,教员中秘密建立中国共产党小组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并于同年12月25日组织“非基运动周”,开展大规模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主要由省立四中学生和部分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从四中出发,经过大街,高

^①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253页。

呼口号：“收回教育权！”“反对文化侵略！”“打倒基督教！”“呼声震地，两旁观者鼓掌欢迎。嗣[后]大队到县署，要求县长三大条件：（一）废除从前延安和外人所订的不平等条约（杀了外国教士[后]所割让地方）；（二）收回教育权（教会所办的小学校）；（三）出告示禁止人民入教。县长都一一允诺，大队认为满意。退出后即将基督教会包围，强逼会里的教徒搬出教堂，随即会同县署人员将教堂所有物件——除私人的外——全行检查，同时把门窗也一一封锁，移交县署负责管理。”^①

另有传说，游行队伍涌向城内的基督教堂，“撕毁了耶稣像，砸了教堂的大钟。随后，游行队伍来到凤凰山下的城隍庙，捣毁了一部分塑像，并将在凤凰山下居住的耶稣教徒曲前，痛打一顿。”城隍庙墙壁上被写上标语口号：“打倒基督教，捎了城隍庙，西山放大炮，曲前该倒灶。”^②过激行动受到地方军警的镇压，参加游行示威的10余名党员群众被逮捕。但运动很快得到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的声援和支持，1926年1月该联合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援助延安非基大同盟宣言》，迫使军警释放逮捕的运动组织者和积极分子。

经过这次斗争后，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1926年夏，中共延安特别支部成立，未几又相继成立中共延安区委、中共延安县县委。1935年5月，陕北红军在肤施县境内北部地区设延安县，7月在南部设肤甘县、东南部设红泉县，9月撤分肤甘县，改设肤施县。这样，时至1936年底红军接管该城，中共中央进驻后，将城区设为延安市，直属陕甘宁边区政府，撤并肤施县为延安县，隶属延安分区。

延者，长也。延安，寓意长治久安。

肤施，肤肉恩施，典出佛教故事。相传尸毗王传教来延安，住清凉山上，偶遇苍鹰追捕鸽子，鸽子求救于他。经过一番食物链的两难辩论后，他割舍肤肉喂食苍鹰，以此解救被追捕的鸽子，化解纷争，息事宁人。割舍肤肉后，他到延河洗涤筋骨，故尔延河曾经名为“濯筋川”。

^① 《团绥德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第八号）——关于各地非基运动》（1926年1月7日），见《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卷，第299—230页。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印，1991年11月。

^② 姬乃军：《延安史话》，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40—141页。

又见山下有一眼清泉,他取水可以使伤口愈合,故名“定痲泉”。尸毗王的慷慨付出,得到更高法力者如来的补偿,以水洗之,肌肤复生如初。



1937年的肤施城南门楼,依然保存着作为古代军事要塞的巍峨庄严气象

肤施、延安,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虽然有区域的差异,但它们在历史上的交替出现,标明当时当事者分别汲取不同的历史资源,打造各自的现实理想。

三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古城城墙完整,依山傍水而筑,气势堪称巍峨。该城始建于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历来都是边塞要镇,代有增修,设置三门,东胜门临延河支流南川河,正对嘉岭山(宝塔山),另有小东门曰津阳门;北安定门临延河,正对清凉山;南顺阳门沿南川河而立,视野开阔。城西凤凰山,天然屏障,未设正式西门,只在北门西角留一巷式拱洞,称小西门,与西沟相通。城墙全部为巨块面石垒砌而成,内部填土夯实,城墙截面呈梯形。据方志记载,延安市区曾先后建有府城(西城)、肤施城(东城)、围城(府城北门外)、高奴

古城等五城,素有“宝塔钟声三川闻,肤施鸡鸣五城应”之美誉。^①“清末民国初,延安老城共有6条大街30多个小巷。”^②经历过东北军驻守、红军围城、东北军撤退、红军接管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到中共中央进驻之初,古城街市未变,但惊惶未定的本地居民只有3000人左右。“包括士、农、工、商各界,大都在城内居住,东关、北关很少住人,只有南关热闹点。……当时社会风气极为腐败。明妓、暗娼就有几十人,烟片烟枪亦有五百余支。”“城内大量的是农民,城周围二十多里路外很少有村庄,漫山遍野,荒草丛生,有人居住处,才有小块耕地。”^③虽然城里早有共产党活动,但对于这新来乍到的红军部队,居民们仍然心存戒备,更何况国民党早有宣传诬告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呢。

红军进驻延安后,为了团结抗日的目标,没有像以往那样打土豪分田地,斗劣绅分财产。“但是,许多豪绅心里还是怀疑,而且还是很恐怖。”他们担心“先甜后辣”,现在给你一点甜的东西吃,将来辣的时候,要给你下不了台。对于一般没有多少家产的居民来说,最担忧的是自己家里的女人们。因为“说到‘共产’,就会连[联]想到‘共妻’”。街头上——时之间几乎见不到本地的女子。随红军长征到延安的女战士只有50人,她们穿着仪表与男同志完全一样。她们要在这“没有女人的城市”里做妇女工作,开始是很困难的。她们走到人家里,去拍婆姨的房门,里面就要问:“是男的还是女的?”这种场面对于有过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她们来说,也许并不稀奇。直接做妇女工作有困难,她们就从男子方面去攻关。文化界、各机关、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以及红军士兵,都被动员起来去说服他们家里亲戚朋友的妇女。经过一个多月以后,开民众大会时,就有了当地婆姨们参加,许多妇女组织也相应成立起来,街头上刷满了诸如“反对童养媳制度”、“反对缠足”、“妇女要参加社会工作”等标语口号。“另一方面,在这一段时间,‘办喜事’的人家特别多。这也就是怕自己的妇女被别人来‘共’去了,就率

^① 《延安市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1页。又见清嘉庆本:《延安府志》,卷四十九《工略》。

^② 《延安地区志》,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489页。

^③ 张汉武:《延安回忆》,见《延安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委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6年11月,第46、47页。

性给她早一点结婚。结了婚,就可以保险了。”^①

受谣言和恐慌影响,最初一个多月里,延安城很是冷清。中央警卫团生活供给颇为困难,“我们就靠从保安搬迁时带来的黑豆、高粱、荞麦为主食,而且定量一减再减,以应付长期战斗的需要。”最困难时,“每人每天只有四分钱的伙食标准。四分钱里还有两分钱是苏区票子,而当地只流通国民党的那种票子,苏区票子老百姓和商人不要。这样,我们每天的油、盐、米、柴、菜五大项,都得靠这二分钱来开销。”^②冷清了一个多月后,街市逐渐变得热闹起来。“街上,挤满了行人,卖杂货的小摊子,出现了三百多个。饭馆,也有了五、六家。这是从来没有的现象。”本地商人们的脸上也都绽露出了谨慎的笑容。革命队伍里的供给制生活,在居民们看来是非常有趣的。“他们的办法,没有薪俸,任何人都没有薪俸。除非是在外面请来的专门技术人员,如医生、无线电教师等,才有点薪俸,但数目也很少。”“吃饭,到粮食部去领粮食。小菜,每天每人发三分钱。什么人都一样,就是有些受特别优待的人,每天也只五分钱。”这里两处引文数字的出入,也许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差异。但在当时,红军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都表现出安然的喜悦。“三分钱在此地值十二个铜板,连油盐在内,究竟买得到些什么?”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解的贫困清苦,可是对于曾经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战士们,这已经是近乎“天堂”了。“现在,有房子住,有小米,有萝卜白菜,差不多等于到天堂了。”^③

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对延安的最高礼赞。但出于旁观者的记录,更多的可能是偶然的口头赞叹,没有更深的理性内涵。对延安作更热烈更崇高礼赞,要等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大批热血青年知识分子奔向延安,成为革命队伍里的“新知识分子”。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经历过长征的“老同志”,他们只在刚进延安时称颂“天堂”,以后,尤其是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反而倾向于突出强调当年延安生活如何清苦的一面。相反,那些抗战后奔赴延安的新知识分子,则是刚开始带着挑剔,甚至是批判的眼光看延安,尔

① 角麟:《速写陕北九十九》(又名:《从上海到肤施》),同前引第107—108页。

② 黄霖:《延安轶事》,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38、111页。

③ 角麟:《速写陕北九十九》(又名:《从上海到肤施》),同前引第108、105页。

后,尤其是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后,却越来越推崇延安,神圣自己曾经在延安生活的情感经验。

曾经跟随中共中央一起长征,再一起进驻延安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在其晚年回忆中说:

延安位于一块平原上,有三个河谷在这里相接,四周黄土丘陵起伏,与保安真有天壤之别。城的周围有坚固的城墙环抱,城墙在北端蜿蜒向上,越过一道道山梁。延安城内有几百座相当漂亮的房屋和院落,近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许多房屋,主要是那些最宽敞和最漂亮的,都空无一人,因为这些房屋的住户是大地主、国民党官员、高利贷者和商人,他们早已偕同家属搬走了。因此住房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也分到了一座房子,房前有一个精致的花园,哈特姆博士和我住在一起,在此期间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马海德。……

根据粗略估计,这座城市的居民还足有三千人。在露天集市上,农民和商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还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几座有名气的饭馆,仍旧照常营业。总之,延安呈现着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我们看到这种已经不习惯的热闹的民间生活,感到趣味盎然,但或多或少总有局外人之感,因为我们身无分文,衣食住行一向由地方苏维埃的主管部门以及军队后勤部门负责,这种情况以后几年也没有改变。^①

这与前有拦截,后有追兵,雪山草地,戎马倥偬,不遑起居的长征途中生活相比,确实有近乎“天堂”之感。可是,当时这份真实的喜悦情感,后来却被掩藏起来,用突出苦难来增加革命成本的阐释力量。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外联络处秘书、延安交际处主任的金城,晚年回忆自己随中共中央初进延安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①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同前引第259—260页。

那时延安城只有十字交叉的两条街：从南门到北门，南北向一条；从东门到凤凰山麓，东西向一条。街上的房子，除了居民的住房外，大都是我党政机关所在地，房屋结构和里面的设备比较简陋。唯一的一所好房子，就是坐落在十字街口东北面的外国人所造的天主[基督]教堂。^①

这与李德的记忆是距离甚远的。

四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双方再一次携手合作。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八路军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划定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下辖陆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等三个师，共计4.2万余人，并接受国民政府提供的军备薪饷。^②同时，大批热血知识青年在抗日救国的旗帜招引下，历经艰险，奔向延安。先后有将近两年时间，古城一度日渐繁荣起来。

1937年5月至9月，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以斯诺夫人的身份，来延安采访，继续斯诺从保安开始对中国革命队伍的观察报道。在她当时写下的文字中，“延安是个古城，在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流动的临时中央政府之前，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四周是逝去的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片荒芜残寂，但是意料不到，延安却是一个十分引人入胜的风景如画的小城。群山似冠，它是冠顶的一粒明珠，各处山头则布满了射击工事和瞭望塔。古城四周有一条浑浊的小河，缓缓而流，起着天然壕沟的作用。”因为有了薪饷和外援，革命队伍里供给制生活较从

^①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9页。

^② 此间，就陕甘宁边区行政归属问题和边区政府主席人选，国共双方展开激烈争论。蒋介石最初打算在宋子文、于右任、张继三人中选派一人出任边区政府主席，后接受康泽意见，推举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丁惟芬（丁惟汾），都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最后，国民政府接受中共意见，由林伯渠出任边区政府主席。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驻延安观察员，国民党肤施县党部亦恢复设立。1940年初，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所属部队，“护送”边区境内的国民党肤施县党部人员出境。

前有了很大的改观。大生产运动还没有出现,人们暂且享受着相对宽松自由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所有这些在西方人眼中也是非常值得惊奇的,她惊叹:“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欧文—傅立叶时期的原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社生活,只是以英雄气概代替了田园风味。这里的生活则简单到无法再简单。个人的私产几乎不存在,物质需要缩减到了最低限度。粮食、衣服和棉被一律由国家发给,住处由当地人民提供——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不受干扰的私生活就是在最有条理的中国家庭也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是从放在桌子中间公用的碗里夹菜吃。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分之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人们整年都在亲密友好的精神下吃着家常饭。”^①有饭吃,有衣穿,分配平均就算公平,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社会理想,转眼之间就变成了身边的社会现实,确是令人兴奋激动的。

以后,她又到访延安。她一生都关注着中国,关注着延安。“在我1937年访问延安之后的十年期间,一篇全新的民间传说和民族神话,在延安窑洞里、在延安的山沟里诞生了。一种新的宗教,在毛泽东的周围形成了。”直到晚年,她仍然记忆犹新。“延安,就像一颗镶嵌在城墙里面的明珠,成为群众山之冠。城内大理石牌楼雕刻绚丽,横跨在窄狭的街道上。在一座座有围墙的院落里,盖着砖窑瓦房,然而里面却住着头等重要的人物。”初来乍到的青年学生多穿长袍,参加革命队伍成为公家人,无论男女都穿统一的制服,“极端的、清教徒式的节制和严格的道德观念,是争取民众的纲领计划的组成部分。……清教主义、禁欲主义以及斯巴达主义的哲学,主宰着延安的一切。”^②她试图在整体上能够把按延安的心跳脉搏,将毛泽东放置在中国历史传统的大背景下去解读。她笔下的延安没有被拔高,但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即将被神圣化的浓烈气氛。

1938年8月,以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身份到延安的陈学昭,

^①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56、57、60—61页。

^② [美]海伦·斯诺(即尼姆·威尔斯):《我在中国的岁月》,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53、303页。

她在当时陆续发出的长篇通讯中,真实记录了延安城里的繁华、热闹和诱人魅力:

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蓝布军装,有的还打起绑腿。

走在延安街上,自南至北,一条短短的大街,挤着无数的人,有着无数不同的面貌,不同的口音。延安是这样的挤满了人,简直是水泄不通。在星期日,每一个街角,每一间屋子里,都挤满了人——连在乡下的人也进城来了。冲在这样一个人潮里,我有点着急,不曾习惯,而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有点害怕被它展[卷]了去。

陈学昭出生江南书香门第,来此之前,她曾经留学法国近十年,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后回到祖国,没有参加社会工作,始终保持着国外生活习惯。到延安生活采访过一段时间,她逐渐习惯了这里的热闹和拥挤。

走在延安街上,现在我的胆子大了,也不再感到不自然了。在汗气熏蒸的人群里,我也挤来挤去地挤往我所要去的地方。天气非常热,我的毛衬衫一天湿几次,也只好随它去,那间房间里是不能措身的,不过还好,晚上,天凉下来,我的毛衬衫也就自然而然的[地]干了。我开始张大眼睛,望着街上,贪心地看,好像要把一切吞下去。哦!真快乐,延安的街;真激动,延安的街!人们三三两两挽着手走,虽然有点妨碍交通,但延安是一个青年的城市,她微笑着,好似说:“一切请原谅罢!”人们的嘴巴几乎只只都在动,不是吃,就是说,通常是兼吃兼说;花生摊,香烟摊、与小吃摊,小馆子……接连不断。红头大苍蝇从这个摊头飞到那个摊头,像行人一样,总是不断不停。几块红烧猪头肉,发出诱人的香味。

我想我所欢喜于延安街上的,是民主与自由的空气罢。在延安的街上,你尽讲,尽笑,从国家大事,以及你私人的感

情事情,你尽讲,大声地讲,是可以的,没有人在你旁边、背后偷听,没有人钉[盯]你梢,你放心,不用怕,也不用东张张,西望望。延安的街上,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一个乞丐。^①

这是一块属于叛逆者的黄土地,这里正在努力创办民主模范的抗日特区,这个时期国共两党抗日联合统一战线局面刚刚形成,这个时期中共党内实行集体领导制,延安的政治空气对于一般人来说确是民主的、自由的、进步的、抗日的,充满着蓬勃的朝气。

住在山上,消息可不大灵通。特别延安,这个城市,它是天天在变,天天在进步,天天在改良,几天不进城,你就会起一种跟不上了或隔膜了的感觉。它虽依然满挤着行人,堆积着牛粪、马粪……还有那些诱人的小食摊,可是墙头有了新的壁报,前方传来胜利的消息,俘虏多少……标语、街头诗,还有边中附小的宣传队的唱歌……偶然有人聚在街头,有的说:“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有人会回答你:“哦!一年前还糟,你没有见过一年前的延安,现在好多了!”又有人回答你:“三个月前的延安也不是这样,现在比三个月前好多了!”总之,它是天天在改进的,还有希望!!如果你要批评,旅客、参观者,那么请你留心一点,慢一点,请你别性急,慢慢的,你看,什么地方是可以批评的。也有许多事情他们已经努力在做,或者正在开始努力做,还没有发生期待的效果,可是,他们并没有把需要做的事情漏过。^②

陈学昭曾经先后三次到延安,其中这第一次是以做客的记者身份,基本上保持着一个自由言说的叙述立场。她在字里行间所表露出来的这一份被真实感动的情感,在当时几乎所有到过延安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心里,是具有广泛的普遍性的。

1938年11月16日夜,距离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前四天,何其芳写

^①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7、14、15页。

^② 同上,第25—26页。

下了饱蘸浓情的报告散文《我歌唱延安》，盛赞两个月来对于延安的感受：“我充满了印象。我充满了感动。然而我首先要大声说出来的是延安的空气。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因为我走进这个城后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满意着这种空气。”过于热烈激动的心情，是很容易忽略生活细节的，而更倾向于情感的概括、提炼、升华。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像里，回忆里，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洪]亮的动人的音调。

这简短到只有两个字音的名字究竟包括着什么呢？

包括着三个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

包括着两条河：延水，南河。

包括着三个山的中间，在两条河的岸上，一个古老的城和它的人民。^①

几年后，作者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介绍自己来延安时的情况说：“我那时是那样的狂妄，当我坐着川陕公路上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城进发，我竟想到了倍纳德·萧（即萧伯纳——引者注）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但到了这里，我却充满了感动，充满了印象。我想到应该接受批评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这个进行着艰苦的伟大的改革的地方。我举起我的手致敬。我写了《我歌唱延安》。”^②

有饭大家吃，有吃大家饱；没有娼妓，没有乞丐；可以自由言论，可以自由进出……面对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现实，奔向延安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们都主动放弃了自己原先所持有的批评权利，甚至为自己曾

^① 何其芳：《我歌唱延安》（1938年11月），《文艺战线》（延安）创刊号（1939年2月）。

^② 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1940年5月8日），见《何其芳文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83页。

经所抱持的批评态度而感到愧疚。这是在当时一种非常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心理。

形成这种精神心理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构成这些奔向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主要成分,是一个社会的叛逆者、逃亡者和追求者。1937年9月,在延安和抗日前线采访过半年多时间,因为受到政治怀疑而被迫从延安退回到西安,并因为受伤暂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三个星期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注意到,“办事处院子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常,反映出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变。每次火车载来一批批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政治犯,他们面无血色,苍白消瘦,坐牢苦状表现无遗。很多人有肺病、肠胃病、精神分裂症,他们希望能坐上一趟大车到延安去恢复健康,能上抗大或陕北公学去学习。”^①

1937年春,以天津联合通讯社社长的身份到访过延安的另一位美国记者里夫(Earl H. Leaf)观察到中国革命队伍里的这种现象。“当我在中国赤都——延安府——的时候,我曾经跟许多知识分子、教育家和学生分子谈过话,他们告诉我:他们都是当政府或地方当局所指使的清共工作,把他们的亲友们,在革命运动或救国运动中被捕或受刑以后,才使他们坚定了对于急进主义的信仰,更进而献身于社会主义运动。”“如果说1919年青年运动爆发以来的中国革命史有过什么教训的话,那么,这种对于‘危险思想’或急进运动的残酷而异乎寻常的毒刑,结果反而是在这种高压手段之下的残剩者的心灵中灌溉了社会主义的种子。”^②我这里关注的不是种子应当不应当萌生,而是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身世里,奔向延安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具有什么样的普遍精神心理,以及这种普遍精神心理对于延安历史记忆将作什么样的更改与变形。

五

延安最值得称道的,显然不是物质生活的粗略温饱与安定,而是

^① [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见《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171页。

^② [美]里夫:《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11月初版。

革命真理,是担当天下,重拯乾坤,砸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理想、豪情和愿望。

从保安到延安,很少写诗的丁玲,1937年7月赋诗称颂延安,“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 但/街衢清洁 植满槐桑/没有乞丐 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 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七月的延安 太好了/但青春的心/却燃烧着/要把全中国化成像一个延安。”^①叛逆逃亡者曾经仇恨交集的心灵在到达延安后,都被革命燃烧起来。

延安,“你是真理的标志,你是光明的象征!”“延安的空间,每日振荡起各地的方言土语,各种的声调腔音,还不时有异国人在欢笑,呼叫,畅谈。不同国度的人到这里来了!不同省县的人到这里来了!不同地方的人到这里来了!……容纳全世界最进步的人们,创造着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力量,铸成了人类最完整的思想,给日本帝国主义敲着丧钟,给世界法西斯掘着坟墓;为新中国而歌唱,为新中国而呼喊,为新中国而战斗;是个最灵敏而威严的大脑,延安,在铁样的山流之中,被铁的人流滋润着。”^②

“革命的圣地——延安。”^③

这是新知识分子对于延安的一个共同心声,1939年7月被如此完整地表达出来。当这个核心意象出现后,迅速传播,不断重复,并被扩展延伸。

从七月的圣地
——延安出发
通向理想的彼岸
因为你是历史最
鲜明的路碑
因为你的进程

^① 丁玲:《七月的延安》(1937年7月10日),见《一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之九),生活书店1939年5月再版,第162、165页。

^② 师田手:《延安》(1939年),见《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158页。

^③ 竹君:《山中一夜》,《新中华报》(延安)1939年7月21日。

就是人类永恒的进程^①

我要歌唱着，
我找到了好的生活，
而且我找到了理想和工作，
像一个寂寞的多思索的孩子，
在他的童年的甜蜜的睡眠里，
找到了那黄金的王国。^②

从“乐园”、“真理的标志”、“光明的象征”，到“革命圣地”、“全国青年们心上的圣城麦迦”、“人间极乐世界”^③、“黄金的王国”，几乎所有表示崇高神圣的词汇都被派上了用场，借以表达他们对延安的礼赞。

318

六

可是，现实中的延安城，自从1938年11月20日遭到日本飞机连续轰炸后，就逐渐变成一座废城。

在日本飞机轰炸的前几天，就有日本侦察机掠过延安的上空，还散发传单。当初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以为是苏联飞机，有人还拍手欢呼：“我们自家飞机！蒋委员长送钱来！”^④以前延安见识过张学良的私人飞机，以及苏联飞机，都是非常友好的。只有经过长征的同志们才知道飞机轰炸的残酷，他们告诫城里的居民和青年学生，介绍一些简单的防空常识。居民们看到中央机关还在造房子，也就没有怎么当作一回事。

11月20日是个晴朗的星期天，机关学校普遍放假，学生和一般工

^① 朱子奇：《我歌颂伟大的七月》（1941年6月），见《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163—164页。

^② 冯牧：《当我走进了人群》（1941年），见《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第115页。

^③ 舒湮：《战斗中的陕北》附录《延安行》，同前引第9、38页。

^④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75页。

作人员都照例涌进城里,逛书店,会朋友,买零食,下馆子……将近晌午时刻,忽然有7架(一说9架)日军飞机扑向延安上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掷重磅炸弹,并用机枪进行扫射,致使弹丸之地的延安古城顿时成为一片火海。爆炸声、枪击声、飞机的轰鸣声、民众的哭喊呼叫声,扰乱了古城往日的安详、热闹和秩序。“这天上午,许多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和机关干部到位于城内凤凰山的光华书店购书,一些炸弹集中落在这所书屋附近。刹那间,书屋成为一片瓦砾,周围死伤学员、干部七八十人,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李德的翻译也在此次轰炸中遇难身亡。”^①据当时在抗大学习,这一天恰好也在光华书店买书的张沛晚年回忆遭遇轰炸的情景:

那是礼拜天,延安有个旧城,我们从城外抗大窑洞到城里,一是去买书,那时候书店在城里;二是去下馆子,有人到延安时身上还有些钱,抗大当时吃得很差,所以礼拜天到城里下馆子吃一顿,平常也不放假。去的时候一切很正常,到上午11点、12点,日本人来了9架飞机,我的印象非常深刻,9架日本飞机来这里扫射,轰炸延安城。我那时候正好在光华书店买书。书店设在山坡上,我就赶紧跑到窑洞里躲起来,所以我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后来我出来,回到抗大时才发现,同我一起进城的那个江苏同乡也被炸死了。那时抗大每个队都有一个相当于现在的俱乐部那样的“救亡室”,每一个救亡室里面都停着几具尸首。^②

第二天,日军飞机继续轰炸,主要炸弹都集中倾泻在凤凰山麓附近。毛泽东借住的李家院子几孔石窑遭到轰炸,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被炸,躲藏其中的30多位八路军干部战士全部牺牲。在几乎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的情况下,轰炸使延安古城蒙受了惨重的损

^① 王光荣:《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纪实》,《党史博览》(郑州)2003年第2期。[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同前引第299页。关于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情况,在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1938年11月30日有简短消息:“本月20日清晨,敌机7架轰炸延安市,死伤30余人。”

^② 张沛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记录,2002年4月24日,北京和平里。

失。据林伯渠致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紧急电函报告,11月20、21日连续两天,日本飞机在延安共投弹159枚,死伤军民152人,毁房屋380间。^①



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连续轰炸延安古城后,南门外兴建的“延安新市场”成为商业繁荣所在

飞窜延安执行轰炸任务的日本飞机,来自日军在山西运城修建的军用机场。^②第一次轰炸得逞,日军飞机便持续轰炸。当时延安几乎没有任何反击能力,原先住在城里的中央机关、学校和办事单位,都陆续搬迁到城外依山挖掘的窑洞里。城里住居的市民也都基本搬出去,在南门外形成一个新的集贸市场。

1939年元旦、春节,日军都出动飞机轰炸延安。因为有了防备,所以损失很小。时在延安的陈学昭写道:“1939年的第一天,早上9时左右,日本鬼子来了七架轰炸机,投了几十个无结果的炸弹,走了。给我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急电——为敌机轰炸延安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电》(1938年11月25日),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辑》第1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99页。

^② 参见《日本飞机轰炸中国大后方城市示意图》,见《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51页。

们拜年。在炸弹声中我们过了新年。阴历年夜的上午他们又来掷了几十个炸弹,敌人以为最懂得中国人民的心理,他们以为那天老百姓为预备过年,拥挤在街上,一定是没有什么戒备的,而且又新年一号来,旧历年三十来,以为这是最好也没有了。谁知警报放得早,大家都跑走了,他们依然没有达到目的。”^①等飞机逃逸后,大家都纷纷从窑洞里赶出来,寻找飞机投弹爆炸后的弹坑,拣拾弹片,作为上等的好钢材,卖给铁匠铺或边区农具厂(即兵工厂)。这也许是日军怎么也想像不到的事情。

此后,日军飞机骚扰不断,持续至1941年10月,共计轰炸17次,投弹1690枚,炸伤184人,炸死214人,炸毁公共房产1176间、过街戏楼10座、牌楼10座、石洞5座、民房14452间、基督教礼拜堂1座、基督教房屋94间、天主教房屋75间。另外,还炸死牲畜197头,毁坏粮食34.5万余斤。此外尚有其他损失,以可计价格的物品计算,共计经济损失折合边币28.2126亿元。^②其中:

1939年3月10日,日军出动14架飞机数次轰炸延安;

同年8月15日,日军出动10架飞机,投弹50枚,炸伤5人;

同年9月8日,日军出动飞机64架次,投弹200余枚,炸死炸伤30余人;^③

1940年、1941年日军各出动飞机轰炸两次,“投弹百多枚,炸毙马和驴子五六匹”。^④

遭遇轰炸后的延安古城,毁坏严重,城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华热闹。人们都以集体为单位四散到郊野山坡上开凿的窑洞里工作或学习,延安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窑洞城。

1938年12月,结束了在看花宫赵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的秦兆阳,获准到延安鲁艺美术系继续深造,与其他同志一起,十几个人在黄土高原上走了10天左右。“记得是中午进的延安古城。许多房屋被敌人的飞机炸烂了,极少店铺,也极少行人,一片战时景象。负责带队的

①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同前引第165—166页。

② 《日寇轰炸延安损失》,《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3月10日。

③ 《延安地区志》,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29页。

④ 李述:《愉快的心情》(1941年12月),见《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同前引第293页。

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农民出身的小青年,突然抖擞精神大喊起来:‘大家他娘的唱个歌,唱《壮丁歌》。一二,唱!’”于是,十几个人扯开干涸的嗓子,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好铁要打钉,/好男好当兵,/保家乡,杀敌人,/发动游击战——争!”^①是抒发激动的心情,也是表达对于日军轰炸延安的愤慨。

1939年2月12日,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行五人抵达延安。在古城南门外,他们受到有组织的一千多人的夹道欢迎后,穿过延安城时,天色已晚。“我们走在绵延一英里长的队伍里,穿过被炸弹摧毁了的城区。几乎所有的房屋都被日本人炸毁了,居民们都以城市周围黄土山坡上挖掘的窑洞作掩体。夜幕降临,山坡上窑洞居所里的灯光渐次闪亮,层层叠叠,让我们觉得这是浓缩了的香港。”^②



日军飞机轰炸后的延安古城,只剩下一片废墟

时至1944年春夏之际,作为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的美国记者福尔曼(Harrison Forman)记录下的延安城,“日本结束了轰炸之后,昔日的延安便成了一片瓦砾堆的废墟了”。同时,他又发现已成废墟了的延安旧城周围的无限活力:

^① 秦兆阳:《回首当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7—88页。

^② B. K. Basu:“Call of Yanan: Story of the Indian Medical Mission to China 1938—43”, p. 115. New Delhi: All India Kotnis Memorial Publication Committee (ALKMC), 1986.

延安的毁灭既未驱走共产党政府,也没赶散延安民众。他们只逃到延安城外,在延安峡谷侧面的数千尺的峭壁上凿深深的洞以安居。所以今天的延安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不怕轰炸的洞穴城市。洞穴一层层地排在悬崖上,每个洞穴都有一个弓形门,每个弓形门又皆以一道扶壁互相隔开。由洞穴前的雄壮的层道,人马可以来回通行。险阻的小路从一条层道通到另一条层道,把上下的层道联结起来。每个洞口前都有一小块平地,用以养鸡养猪种菜或作儿童们底[的]游戏场,间或那里更有一条晒衣服绳子。从上面向下望,可以看到在悬崖下的峡谷里有很多妇女在延水岸旁洗衣服。^①

这种别具特色的城市景观,对于一个初次到访者来说是颇为诱人的。参加这次记者参观团的另一位国内记者赵超构(林放),在为重庆《新民报》所写的连续报道中记载:

323

小小的肤施县城,廿九年受过敌机的轰炸,现在只剩下一些墙脚屋基,满长着青草。延安人彻底放弃了县城,把市面移到南门来,就是如今所称的新市区。……所有的建筑,都是匆匆忙忙中完工的,简单合用,却是粗糙。就是最繁荣的新市区,也处处出现一个未成熟的都市的面目来。

商店的货物似乎很丰盛,但只限于日用品的若干种,窗框的装饰,纯粹是摇鼓担式的老手法。

市面上最可注意的,是打铁铺之多,在300家门面中,打铁铺至少要占50家。即在深夜,我们还可以看见熊熊的炉火映着赤膊的铁匠紧张工作。这一点可以充分表现延安还是十足的农业城市。

惯于享受城市趣味的人,到延安来一定要感到悲惨的失望。因为这里不仅没有好山好水,也竟没有一个可以散步的草坪,没有一个可以驻足的树阴。一眼望去,灰尘满目,没有

^① [美]福尔曼:《中国解放区见闻》,重庆:学术社1946年2月初版,第19—20页。

一点鲜艳的色彩。^①

记者的眼光是挑剔的,也是比较客观的。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后的延安古城荒废着,却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延安城,在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后,在被称为新知识分子的一代人笔下,却是另一番令人惊奇的景象。

七

冼星海是延安群众歌咏运动的一面旗帜。1938年11月3日,他与钱韵玲结伴从武汉经西安到延安,旅途上结为秦晋之好。冼星海到延安后出任鲁艺音乐系主任,与塞克合作创作《生产大合唱》,与光未然合作谱写《黄河大合唱》,1940年5月接受任务远赴苏联为电影《延安与八路军》配乐,不料归国途中受战事影响,客死他乡。钱韵玲带着女儿冼妮娜,一直在鲁艺过着集体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她到北京,到杭州,虽然另有新的生活,但始终牵念着冼星海的命运浮沉。1975年文化大革命后期恢复演出《黄河大合唱》,她满怀激动的心情写下回忆延安的文字:

延安! 多么庄严美丽的古城,我们朝盼夜想的革命的母亲啊! 毛主席在这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这里的天是碧蓝蓝的,地是金灿灿的,红光满面的青年,吃着香喷喷的小米,伴着清粼粼的延河,学习革命的真理,研讨解放的道路。到处是歌声,到处是笑声,自己动手,开荒种地,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②

^①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版,第57—58页。铁匠铺之多,是因为大生产运动方兴未艾,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后,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人人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尤其是开荒种地的农业生产劳动,而所有劳动工具都依仗铁匠们的手工敲打。在南泥湾垦荒的三五九旅战士们,干脆自己动手打铁,制作生产工具。

^② 钱韵玲:《忆星海》,见《黄河大合唱》(修订本),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3月版,第75页。



鲁艺音乐系部分教员(前排右为冼星海)

这是客观真实的延安,还是主观想像的延安,很难区分。曾经跟随民众剧团工作,又在鲁艺学习的诗人侯唯动,1993年出现在他笔下的延安,竟然还有“流着牛奶与蜂蜜的延河圣水”^①。

1940年由党组织安排进入延安,曾在鲁艺文学系任教,并接替丁玲出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舒群,1955年与罗烽、白朗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历经磨难。延安成为他磨难中百般回忆、紧紧攥牢的精神皈依。一种喧闹亢奋的文体,理想与现实不分,过去与现在不分,描写与抒情混杂,叙述与歌唱混杂,整体虚拟,局部真实,人物用化名,故事是写真,吃语式地出现了。

延安,有玉液琼浆之水,翡翠宝石之山,革命辉煌的灯塔之乡;凭它,仅仅凭它照耀全国人民希望。^②

水,是仅有的这条延河水。两岸结着细薄的冰溜儿和冰碴儿。中流浮动着一层隐约的寒气——圣洁的气息、革命的

^① 侯唯动:《我所认识的高长虹同志》,见言行:《一生落寞,一生辉煌——高长虹传》序言,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6页。

^② 舒群:《在天安门前》(1984年6月),见《毛泽东故事》,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69页。

气氛,顺流而去,流到黄河、渤海、太平洋去,散发到全国、全世界去。

山,却是重重的山,望不尽的山。山,山,凤凰山、清凉山、宝塔山、吕梁山、太行山、五台山、泰山、大别山、桐柏山、茅山、五指山、长白山……山,山,山,凤凰山、清凉山、宝塔山、六盘山、岷山、大雪山、娄山、闽山、白云山、武夷山、井冈山、岳麓山、韶山。韶山,地灵之峦,人杰之巔。^①

在舒群的系列文章中,作为回忆主体,作者的姓名,《杨家岭夜话》是“任正真”,《枣园夜宴》是“大舒”,《在天安门前》是“疏麋”,《胜似春光》是“受窘”,并特自加注汉语拼音“shu qun”,暗示人们这其中活动着的背影就是他自己,而介绍其他历史人物如凯丰、何克全、朱光等,都用真实身份和姓名。这种不能公开光荣历史面容的写作背景环境,改变了书写的文本,也改变了书写的对象。

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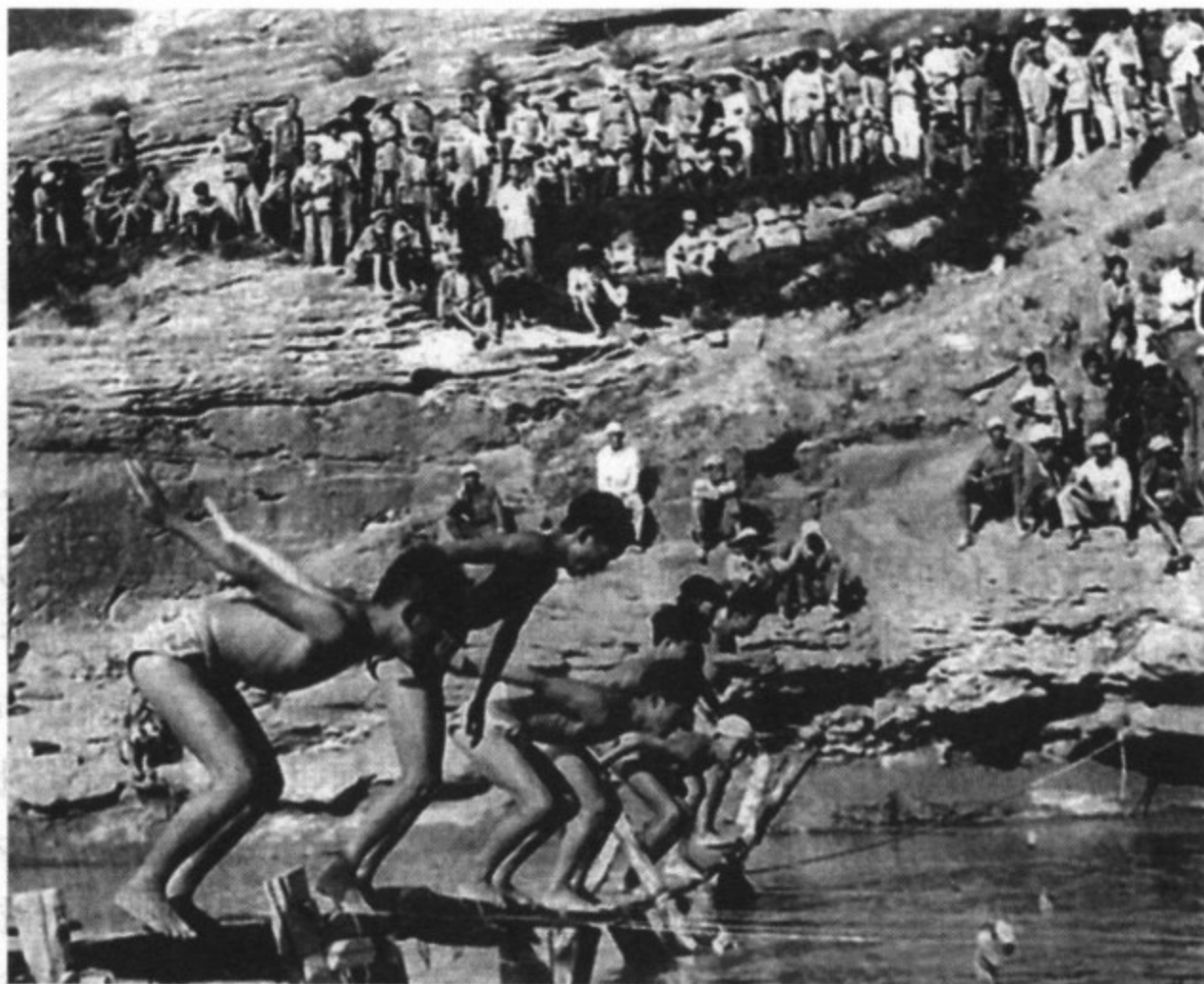
八

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长河里,从来没有哪一段河床可以像延安这样,人们对其记忆的色彩光辉、形态大小,与现实生活中享受的政治待遇、物质利益的机会成本隐约地画上了等号。

延河水在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前,基本上清澈的,枯水季节行人可以跋涉过河,但河湾低洼处有较大面积的积水,夏季涨水季节较平时水位高,水质泛黄,但都不影响延安古城居民的生活日用。1939年的机关生产运动,1941年底开始的全延安、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劳动竞赛,延安周围山地几乎被全部垦翻一遍,本来就不甚丰厚的植物受到毁灭性破坏。延河水变得浑浊起来,流量减小,枯水季节部分河段干涸,洪水季节泥沙俱下,凶猛肆虐,狰狞狂暴。

整风运动中从前线回到延安,在蓝家坪“文抗”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刘白羽,第一次见识延河洪水,他几乎被惊呆了。后来他将那种惊心

^① 舒群:《延安童话》(1955年初稿,1978年改定),见《毛主席故事》,同前引第36页。



延安自然科学院体育运动会上特设游泳项目，竞赛地点就选在延河湾道里，河岸山坡上围满了热情的观众

动魄的场面写进自己的小说里。那是一个炎炎夏季里的星期天中午，担任抗大学生小队长的陈文洪赤裸着上身，灰布军裤挽到膝盖头上，站在河中心的一块大青石上洗衣服。

忽然，一股闷人的热气从河面上升起，使他呼吸有点困难。便直起腰，用带泡沫的手臂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放眼望时，大吃一惊。原来靛蓝的天空突然黑得像锅底，只见一只苍鹰在飞腾旋卷的乌云里急急打了一个斜歪就无踪无影了，河边的石块发白，马兰花在颤抖，一阵狂飙突然从天而落。

大西北高原有时是温情的，有时也是狂暴的。现在，在你还来不及思考的时候，这险象环生的一幕已经降临眼前。

陈文洪抱起湿衣服，立刻就往岸上跑，刚上岸，就隐隐听到一阵可怕的声音，回身一看，河的上游，山洪像千万垛山崖

陡壁直压下来,墨黑的旋流带着无穷的吓人的威力。与此同时,整个天空和地面都变得昏暗沉沉,好像整个天穹突然奥变,从地上地下,四面八方发出一种说不清的可怖的轰响。延河原来只是一条曲曲小河,而转眼间,大水已经淹没两山之间整个广阔的平川,沿着整个广阔平川,遮天盖地,狂泻而下,两面光秃秃的山夹着一片汪洋汹涌的黑流。^①

山洪裹挟着泥沙石块,急剧地怒吼、旋转、奔流,冲击着成群的牛羊、巨大的树木和桥梁、屋顶,横扫而下,势不可挡,毁墙破屋,伤害人畜,在所难免。直到晚年,他还记忆犹新道:“这是多么无情的浩劫呀!它摇天撼地,一扫而光。待到山洪过去之后,你到河边去看看!河流中,河滩上,兀立着多少断崖裂石呀!难怪延河里到处是奇形怪状的石块、石峰,这不是人的力量所能移动的,只有大自然狂暴的力量才能留下这些石的密谷、石的森林。清清的河水就从这森林中曲曲折折向前流进。”审干抢救运动中,他本人差一点就跳山崖自杀。运动过后,痛定思痛,他觉得“这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正是延安的心灵”^②。

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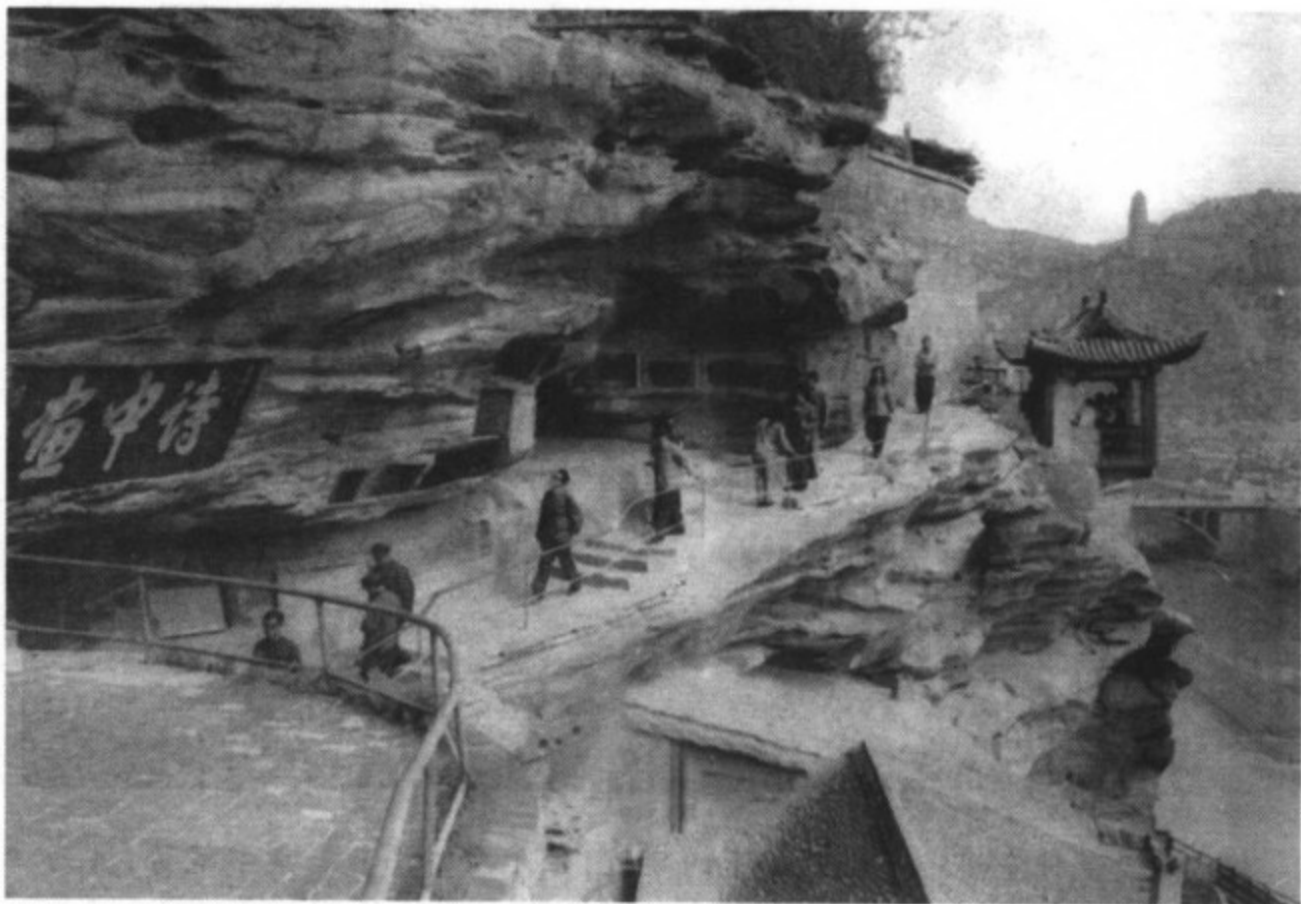
延河,早在战国时期叫区水,西汉时称洧水,南北朝西魏时名清水,尔后曾一度被称为濯筋川、筋水,只到近代才被称为延河。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被称清水的时间最长。可是,因为流域内大范围的植被遭到破坏,裸露的黄土地不能涵养夏季骤降的雨水,就造成泥沙俱下,瞬间狂潮的可怕景象。这在1944年春夏之际来到延安的孙犁笔下也留下记录。此后,清清的河水对于延河已经成为一种奢侈的想像。

与延河水相关的还有宝塔山上宝塔的位置问题。

由于观察者的角度、立场和心态的不同,延安宝塔在不同时期的图片中,处于不同的位置,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姿态和风格。该塔又称岭山寺塔,高9层,始建于唐代,最初是佛教精神的产物,为锁骨菩萨舍利塔。金大定九年(1169年),嘉岭山上建岭山寺,以此塔为寺院标志塔,并予修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又对该塔进行维修。

^① 刘白羽:《第二个太阳》,见《刘白羽文集》第2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210—211页。

^② 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中),见《刘白羽文集》第9卷,同前引第350、349页。



从清凉山的历史遗踪,透视延河对岸的宝塔山,独特的视角让人格外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神奇与旷远

按照中国古代建筑学理论,其所处的是一片风水宝地。延河及其支流南川构成一个“丁”字形水系,穿行在几座不高的山岭之间。宝塔就矗立在两条河流交汇点之东侧的嘉岭山眉额之间,隔延河与其北面的清山相对,隔南川与其西面的凤凰山相望。居东镇西,襟山带水,温暖地怀抱着曾经坚固的延安古城。这里的山脉都是黄土高原经过流水、河流长期切割后形成的,嘉岭山与清凉山其实都是一系列山脉的总称。无论是从风水学,还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宝塔都不可能建筑在一个制高点上,而是坐落在嘉岭山脉其中的一个并非最高的小山坡上,这样才有遮掩,有呼应,从而获得几分安闲和从容,几度沧桑,几番风雨,千百年来默默地守望着延安、陕北这片黄土地。

1937年初,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刚进延安,物资供应非常紧张,生活相当困难。“只要一看到野生没主的动物,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爬的,大家便打起主意来。”中央警卫团二连战士奉命在宝塔上修筑防御工事,中间休息时大家结伴看宝塔,发现颓废的塔内楼梯板已经被拆走,只剩下几根横梁,从塔底可以一眼看到顶,塔顶上是野鸽子



相传这是范仲淹镇守延州时留下的字迹，位于宝塔山麓。隶书笔势，道劲强悍。民族英雄气息在这片黄土地上亘古不衰

的世界。“当时正是阴历二月，山上的蒿草又干又枯，战士们割了一大堆蒿草，堆到塔底，等天黑了，野鸽全进了塔，就突然点起火来。不一会，烟和火直冲塔顶。栖在塔内的野鸽，遇到这突然的袭击，都惊飞起来，扑棱棱、乱哄哄地乱飞乱撞，有的熏死，有的撞死，有的吓昏了头，顷刻，野鸽像下冰雹似的往下降。战士们乐得手舞足蹈，又喊又叫，纷纷到火堆边去抓鸽子，有的战士一只手就抓了五六个。不一会儿就装满了13条布袋。有的战士还脱下罩裤来装。最后用7匹马驮回了这些战利品。”^①同年1月至9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和国内记者范长江等先后到延安采访，带有照相机，也都没有拍下凸显宝塔的照片。

1938年秋天，为防空安全起见，宝塔曾一度被计划拆除。

早在红军和中共中央进驻之前，延安北门外延河边就建有一个简易的机场，但没有完备的导航设施。张学良的私人飞机，苏联的飞机，从重庆来的国民党飞机，都是靠山上的这座宝塔作航行标志。在由中央军委副参谋长腾代远主持的防空安全研讨会上，有识之士提出，“如

^① 黄霖：《延安轶事》，同前引第47页。

果没有这座高高挺立的宝塔,敌机就有可能找不到延安,延安就会免遭敌机的骚扰和轰炸”。沿着这个思路,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很多方案。有的说用爆破法,既省时又省事。可惜宝塔巍然,塔高44米,塔基周长37米,没有那么多的炸药。有的说组织人力,挖掉塔基,让塔身倒塌。几次开会,议而未决,殊料日本飞机就扑过来了。“之所以能使这座始建于唐、重修于明的宝塔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并非因为它作为文物和历史的见证,也并非因为没有找到拆除宝塔的最佳办法,坦率地说,是因为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延安来得太快了。”^①先有日本飞机轰炸,后有国民党飞机轰炸,宝塔都奇迹般地存留下来。延安革命队伍自从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后,再没有讨论对宝塔的处理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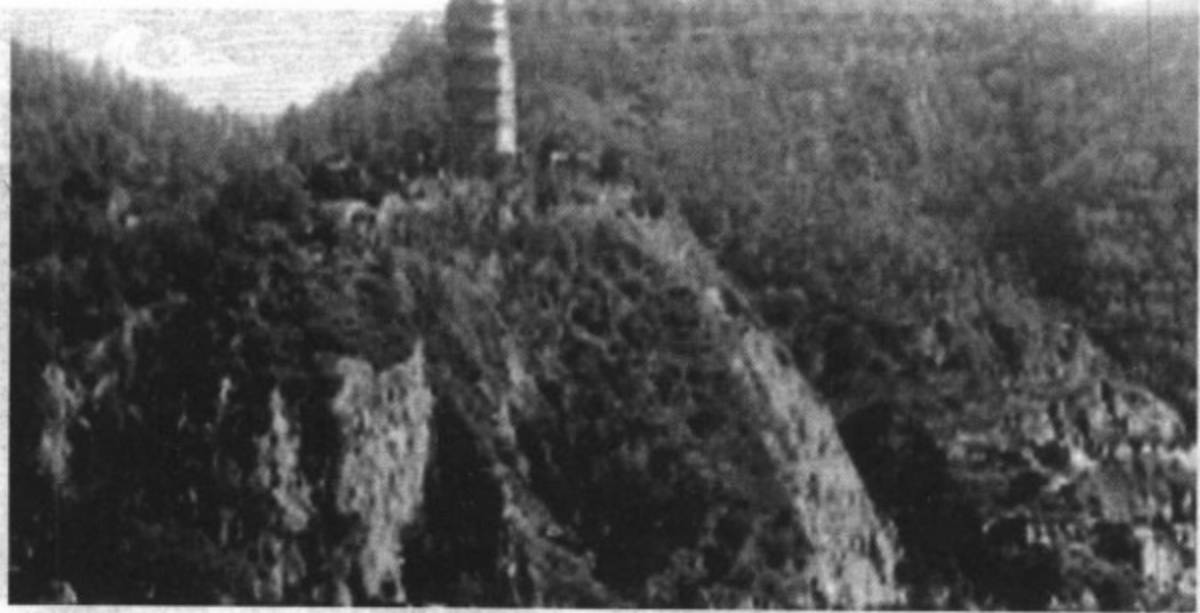
多才多艺的王大化,1940年代就用木刻极力夸张的手法,凸显延安宝塔山在经历整风运动后的几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

宝塔的位置被凸显出来,同样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出现的事情。他们视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延安为净土,为圣地,跪拜黄土地,亲吻延河水。“像梦一样,我们跨进了一个新世界,感到一

^① 参见苏北编著:《毛泽东遇险实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56、257页。

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义的。晚上睡不着觉,又是唱歌,又是写诗。第二天天一亮,就跑到延河边,去喝一口香甜的延河水,用清爽的延河水洗脸。一位四川来的教师,激动地伏到地上亲吻泥土,兴奋地喊着:‘啊,自由的土地,我来了!我属于你了!’”^①

此情此景,圣地净土,本来就具有点染山水作用的宝塔,也就招徕了更多崇敬的眼光。而尤其是经过整风审干抢救运动,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们都要放弃一切个人思想杂念,革命圣地延安的历史地位基本已经确定。



以海拔高度计算,有比宝塔山更高的山毗邻其东侧

但古城早已被炸毁,延河水也变得浑浊干涸起来,唯一可以作为延安标志性建筑的宝塔,其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理所当然地在逐渐提高,提高,再提高。陕北传统的剪纸艺术,就具备了随心所欲地重新安排山河的审美匠心,摄影技术和素描技巧更满足了人们对于宝塔崇敬心理的需要。于是,在随后的图片中,原来位于宝塔东面和北面明显高出于宝塔的山影被隐去,宝塔成了一个时代图片构图的中心。

^① 朱子奇:《在诗的圣地》,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52页。



这是延安革命圣地的标准照,过去历史的宝塔被重新赋予了现代意义的光彩,威严,神圣,又慈祥

这种图片上的延安宝塔,已经上升为革命时代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图腾,复归于并超出于其当初设计建造时的宗教情感寄托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再起纷争。延安不断受到国民党飞机的骚扰轰炸。1946年8月2日,国民党派出7架飞机轰炸延安;同年11月11日,国民党飞机2次盘旋骚扰;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飞机1架轰炸延安;同年3月13日,国民党出动飞机50架次对延安实施狂轰滥炸。

3月19日,胡宗南部队终于侵占觊觎已久的延安城。未几,时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职的沈醉,从西安飞往延安去巡视。据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说:“一下飞



鼓楼是延安古城标志性建筑之一，毁于日军飞机的连续轰炸

机，那座象征着延安的宝塔就呈现在我的眼前，她是那样雄伟，那样挺拔，仿佛是一个威武不屈的巨人。不知为什么，我突然预感到，延安并不真正属于我们，胡宗南目前虽占驻了延安，但也不过跟我一样，是个匆匆过客。”^①这是他后来接受的思想，还是当时的思想？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他笔下的延安城，似乎也多了许多明显的溢美之词：

我们爬上宝塔山，延安城的景物尽收眼底。这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古城，一半蜿蜒在山上，一半坐落在平川。城边，那花岗岩筑成的城墙，从东边的平川一直爬上西边的山峦，如巨蟒，似蛟龙，又像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城墙内，是一片星星点点、错落有致是窑洞和灰黑色波纹般的瓦房，还有那独立在城中心的城隍庙和钟鼓楼；城墙外，则是起伏的山峦和清凌凌的延河水。此时，太阳已经落在了西山之巅，它慷慨地把那金色的余晖洒向人间，把城墙内外的房屋、河水、山峦都涂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整个延安城就像一帧金碧辉煌

^① 沈醉口述，沈美娟整理：《沈醉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28页。

的巨幅油画。^①

这与其说是历史回忆,不如说更是现实政治表态。延安古城自受日军飞机长时间轰炸后,就成了被放弃的废墟,始终没有进行修建。加之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更是雪上加霜,破毁不堪。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后,恢复肤施称谓,再度设置国民党肤施县党部,同时大事修筑工事。“除了边府礼堂和军委礼堂,其他礼堂全被拆毁,还拆了不少窑房,把材料都用去修工事。……所有门窗全部破坏,一部分门窗用于烧火,一部分用于修工事。我们辛勤修建了几年的机关、学校、礼堂等建筑物,都被敌人破坏了,真是满目荒凉,令人愤慨。”^②其中,坐落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是为召开中共七大而专门修建的,历时两年,1943年竣工。国民党军队就将其全部拆毁,“现在只有礼堂后面的一堵墙是原来的,礼堂却是我西北野战军1948年4月收复延安以后,照原来规模和里面的内装修形式,重新修建的。”^③延安古城修建工作要到1950年才开始,1953年修建速度加快,重新有人住居热闹起来。

倒是胡宗南攻打延安时,似曾一度踌躇满志,让自己的夫人叶霞娣在西安鼓动陕西省主席熊斌,酝酿将延安改名为“宗南县”,不料具体经办部门省民政厅方面将定夺大权推诿给中央政府内政部。他们夫妻又托毛人凤、唐纵出面,活动到南京有关方面,终究未能如愿。

^① 沈醉口述,沈美娟整理:《沈醉自述》,同前引,第228页。1938年10月24日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八大队第五队学习的于蓝,次日就从招待所搬到学校女生临时宿舍。“我们搬到城里,谁知这个城里的新宿舍更为奇特,就是城边的旧鼓楼,由于历史的变迁,鼓楼早已没有了,只有四根柱架还保留着而已。我们一班同学登上鼓楼,上边原来的框架中间用席子在四周钉上,就是墙壁了,这样睡在里边可以有个遮挡。”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37—38页。这是日军飞机轰炸前的鼓楼状况,经过日军和国民党飞机轰炸后,该鼓楼始终没有修建过。沈醉到延安,是在此之后的1947年3月。距离这个时间最靠近的是1946年7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延安采访,她所见到情景是这样的:“我们在一条浅河旁的崎岖小路上颠簸行驶,从远处可望见一座城市的废墟。延安曾经有过城墙。……当日本人在这里施行狂轰滥炸时,除了那座宝塔以外,什么建筑物也没有留下来。延安人放弃了那堆堆瓦砾,在山崖的黄土中自己挖窑洞住,就像世代代居住在那里的当地农民一样。”[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6页。

^② 张汉武:《延安回忆》,见《延安文史资料》第3辑,同前引第78页。

^③ 陈其:《重回延安》,见杨复沛、吴一虹主编:《从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机要人员的回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95页。



① 延安新日的

1948年4月22日,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收复延安

1948年4月22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



狼与虱子的生死浮沉

延安时期,与革命队伍关系最密切的两种自然动物是狼和虱子。狼,被描述为“侵略者”,像敌人一样受到舆论与暴力的追杀。而虱子却被推崇为“抗战虫”,像奴才那样豢养着,借以考验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的意志信念。这样,在延安特定的历史时空和革命语境里,狼与虱子就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浮沉。

3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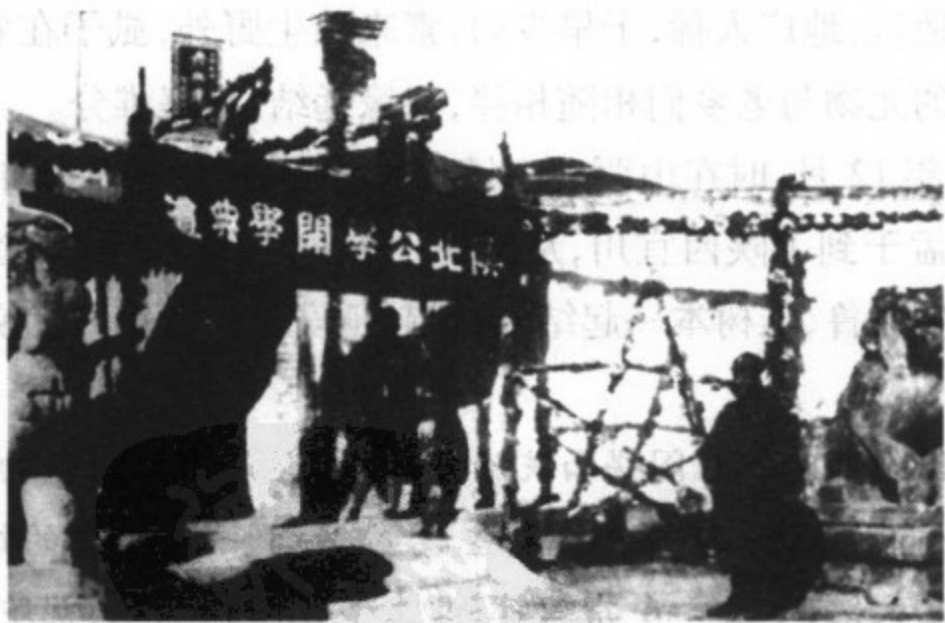
陕北地区,地广人稀,干旱少雨,素来狼生野外,虱子在农家,这两种大自然的尤物与老乡们相随相伴,怨缘远结,难解难分。

1939年12月,时在山西观亭镇的民族革命大学所属前方剧团学习演出的孟子到了陕西宜川,从地图上看这里距离延安不远,就和另外两名男生石鲁、陆树本一起结伴,奔赴延安。她晚年回忆说:

因为那时候在阎锡山统治的地方,还是偷偷地走的。我们三个人,带着一个脸盆、一些咸菜,买了一个很大的饼,还有一盒火柴,拿着一个指南针,身上多穿两件衣服,就跑。走到路上,碰见一个打柴的老乡,问他这条路好走吗?老乡说好走,翻过这座山,那边就是红区了,你们就去吧,但是路上有狼,不过你们不要理它,它也不管你们的。这狼还不吃人呢?他说不要紧,你们不惊动它,它也不会吃你们的。然后就走,走出去十来里地的时候,果然看见狼。三只狼就从那

边走过来了,我们心里很紧张。男同志一人拿一根长棍子,我把棉袄里的棉花都撕出来拿在手上,这个手拿着火柴,因为说狼是怕火的,等到狼一过来的时候,他们两个打狼,我就点火。就这么说着,很有信心地走,果然那狼没有光顾我们。心里刚舒口气,回过头一看,怎么又有狼来了!这次是六只狼,其中还有两只小狼。这次惨了,这么多狼,可怎么办呀?转念一想,不要紧,刚才有经验了,咱们为革命死都不怕,还怕狼吗?走!大家鼓着劲走,走出去好远,赶快回过头一看,果然狼没有跟着。哎呀,狼没有跟着我们!可是,等我再看看我的手,那棉花都捏得湿透了,全是出的冷汗,火柴也点不着了。^①

当时孟于17岁,1939年7月她从四川成都报名考取原在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希望由此转折到延安。他们这次翻越的山脉,是从东南方向到延安的秋林、劳山林区。到延安后,她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石鲁、陈树本分别进入陕北公学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开学典礼。延安时期的高等学校办学条件都十分简陋,战争环境磨炼了人们的意志,更磨炼了一个时代的精神

^① 孟于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记录,2002年4月26日,北京梅地亚中心。

在陕北老乡们的生活经验里,狼有小害无大伤,人不犯它,它不犯人,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地方。所以它既遭恨又传奇,遭恨是因为它经常偷食禽畜,偶或伤人性命;传奇则是因为它的生存智慧,聪明诡计。但中国革命队伍的旗帜是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承认有什么鬼神。所以,狼的民间传奇一下子就被戳穿了,没有人信那个邪。剩下的,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将经常昼伏夜出,跑到窑洞边偷猪叼羊,伤害人畜的狼当作侵略者,当作来自自然界的凶恶敌人,声讨之、枪杀之。

此前1937年8月,陈学昭以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身份在延安采访,在发出的报道中写道:“延安的城外山里,狼很多,大早与黑夜,一群一群的出来,不过都是小狼,见了人多,它们就跑了。如果一个人,那它会来咬的。山里是小猪小驴常被它们咬死,拖去吃掉。”^①她这时虽然还没有完全参加革命队伍,但关于狼的见识却是颇为革命化的。延安旧城原有城墙,东、南、北三座城门与外界交通。1938年11月日本飞机来轰炸,延安旧城全部遭毁坏。此后,延安就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窑洞城,各单位都散布四野,依山挖窑,无所谓城郊之分。在日本飞机轰炸的这段时间里,延安不见了狼群,但在通往延安的道路上却是可以遇见成群结队的野狼。

一支从晋察冀边区北部山区沿长城旧址到延安的小队伍,经过河北昌平、宛平、怀来县境时,夜晚就听到狼凄惨的嚎叫。对此,革命队伍里的同志认为:“狼像日本鬼子一样也是吃人的野兽。在战争期间,狼惯于寻找被我们打死的敌伪尸体吃。在寒冬腊月的夜里,它常是这样的嚎叫。所以我们夜里行动必须身带武器,不然就有被狼吃掉的危险。有一次我们在战斗中抓了些日本俘虏,其中有一个夜里逃跑了。第二天我们在山沟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已被狼吃掉了大半。当然狼也是怕人的,只要手里拿一根棍子,狼就不敢进犯。”这样的狼扮演着打扫战场的清道夫角色,可是革命队伍却一概将其视为敌人。“所以我们要防备两个敌人,一个是鬼子,还有一个是狼。”^②既然是敌人,那么

^①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1940年7月初版,第72页。

^② 方文:《奔向延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91—92页。



在当地农民师傅指导下,自己动手挖窑洞,是青年知识分子到延安后,参加革命的第一课

当然就要追赶之、斗争之、消灭之。

194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毛泽东领着七八个同志乘坐由宋庆龄捐赠的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福特牌救护式卧车,从枣园到延河边其他单位参加晚会。车行在半路上,忽然嘎的一声停下了。“这一急刹车,使车里的人被颠得前仰后合。坐定之后,大家定睛一看,二、三米远的地方站着一条恶狼,瞪着两只射出绿光的眼睛,凶恶地张着大嘴,像要把车子吞掉。”显然,叙述语言中的定性定语和精神意向补语,都是由叙述者赋予的。遇到这种情况,车里坐着几位小姐出身的革命女青年,当时就惊恐地喊了起来,“哎哟!”司机不敢往前开,想后退也不大可能,正在犹豫之间,毛泽东沉着地说:“你把车子的大灯打开!”司机连忙按电钮,刹那间,左右两个大灯一齐射出白色的强光,把狼映照得清清楚楚。但是,狼并没有马上走开,因为只要它们当时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就依然故我,我行我素。众人无奈,毛泽东又对司机说:“再按一下喇叭!”司机使劲地按喇叭,宏大的声响在沉寂的夜空中轰鸣,那条大狼才夹着尾巴远遁了。

车子继续前进,毛泽东责备说:“你们这些人,连一条狼也对付不

了！如果敌人来了，你们这样怕，只有投降了。”说得大家很不好意思。接着，他又开导说：“制敌要有智慧，要有策略。用枪很容易把狼打死，但今天不是打枪的场所，也不需要开枪。狼怕火光，又怕狮虎吼叫，车上的灯光和喇叭，就可以代替火光和吼声。抓住敌人的弱点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①车上的同志们都觉得很受启发。

中央医院坐落在距离延安城西北方向大约十公里处的李家圪，十多个窑洞一排，等于建在山野里，深夜经常能听到狼声和猫头鹰叫声，偶尔还有豹子出现。没有电灯，手术用的是汽灯，平时护士夜里值班查房，只有手提一盏小马灯。这样的环境条件锻炼了护士们的胆量，大城市的小姐气被一扫而光。医院饲养员梁寿其，50多岁，河北人，一个人喂养二三十头猪，细心照料，不怕脏和累。冬天，母猪生了崽，他怕猪崽受冻，抱在自己睡觉的炕上保暖。经他精心照料，小猪喂得活泼可爱，很少生病，大猪屁股滚圆，为伤病员的肉食供应和全院的生活改善出了大力。

一天夜里，猪的嚎叫声惊醒了他。他不顾天寒地冻，光着屁股便爬起来大喊“撵狼！”不少同志也闻声出来赶狼，见他一丝不挂，都觉得好笑。第二天，生产办公室的陈岷便编了一套顺口溜表扬他：“老梁，老梁，半夜起床，光着屁股，跑去撵狼！”一时间被传为佳话。^②

同样远在延安城西北郊外蓝家坪山上的马列学院，有一位工友老齐，平时他负责该学院水房里的烧水事宜，却有一手善于夹狼的本事。据当时在该院学习的陈明晚年回忆：

陕北山沟狼多，每当深夜，在睡梦中也能听到远远传来狼的嚎叫，真像有人在黑夜中哭泣。学院炊事班为了改善伙食，喂了几只猪，这些猪便成了招引野狼的猎物。炊事员在猪圈的土墙上用石灰画上大圆圈，但是狼群并不害怕土墙上这白色的大眼睛，深更半夜，圈里的肥猪常常被狼咬着耳朵，

^① 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25—126页。

^② 赵炎：《五老祝寿》，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94页。

用尾巴敲打着拖走。老齐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铁夹子,埋在猪圈附近狼群必经的路旁,在土层上面丢一些骨头烂肉。狼来觅食,踩着铁夹子便被夹住,铁夹子连着一块大石头,狼力气再大也拖不动,逃不脱。这样,夹着过几次大狼小狼,圈里的肥猪安全了。老齐剥狼皮卖钱,炖狼肉给大家吃。大家都称赞他。可是,久而久之,伙食[科]里养的两只大狗老远见着他,白天也冲他吠叫。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老齐身上带有狼味!①

猪是革命队伍里的集体财产,受到狼的骚扰侵害,当然要想方设法将狼赶尽杀绝,食肉寝皮。可惜的是,狼肉并不鲜美。

比马列学院、中央医院更偏远的边区中学,位于安塞县的一个叫吊儿沟的地方,距离延安四五十公里地。“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去打猎。那时候陕北还有狼,有一次我们打了一只很大的狼,大家都高兴坏了,扒了狼的皮,把狼肉放在锅里炖,一会儿肉香就飘满了整个学校。我们总可以解解馋了,可是谁也没想到等我们真去吃的时候,狼肉却是苦的。你说奇怪不奇怪,闻着那么香,一吃却苦得把舌头都吐出来,白费了我们那么多功夫,还把我们的胃口都给吊起来了,却让我们空喜一场。”②其实当地老乡们都知道,狼不仅叫声凄苦,而且其肉酸苦,除了一张毛皮之外,实在是属于无用之物。革命队伍将狼视为仇敌,根本原因并非是狼伤害了公共财产如猪,而更是一种有害即仇敌、无即便消灭的集体精神心理。

这已经是1943年全面整风审干运动兴起之后,同样坐落在蓝家坪山上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被解散,划归中央党校三部,仍在蓝家坪山上。据刘白羽介绍:

一到冬天,可能因为野外的小动物都藏匿起来,深更半

① 陈明:《回忆与怀念》,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18—319页。

② 侯波、徐肖冰:《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冰口述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53—54页。

夜你可以听到野狼饥饿的嘶嚎,随着呼啸的北风忽远忽近、忽高忽低,那样悲伤、那样凄冽。还是在兰[蓝]家坪时,有个白天,我站在山头上,看见两只狼在荒凉的平地上飞跑……到了党校三部,冬天,狼就偷偷窜到猪圈里来偷吃我们的小猪。那些猪真是又可怜又可怕,每一次听到狼的嚎叫,它们就像大难临头,在猪圈里乱蹿乱跳,拼命挣扎。于是我们就发动了猎狼的活动,把一个活的铁夹子安放在猪圈口上,狼一踩上,就给铁环箍紧,这样便捉到一只活狼。可是有一次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一只狼竟然扭断锁着的那一条后腿,一面狂呼哀叫一面向远处逃去。于是,我们一群人便跟踪着滴在雪地上的血迹,紧紧追赶。终于在一个山坳丛莽中把那只狼捉住,抬了回来。我看那狼还活着,两只眼睛闪射着兰[蓝]色凶光,十分怕人。后来我们把这只狼杀死了,把一块块狼肉风干了,煮熟吃。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吃了狼肉,狼肉又酸又涩,十分难吃。大概由于是自己捕获的猎物吧,就着黄喷喷热腾腾的小米饭,大口咀嚼狼肉,觉得十分可口。^①

这狼肉的味道肯定不好,但当时人们普遍缺少油脂和蛋白质,加之是他们自己花大力气捕获而来,故而不忍委弃,勉强食之。

只有在个别延安文人的笔下,才发现狼也很有母爱之心,并且非常讲信义。

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伐木烧炭,森林面积日渐减少,下雪天,狼们的野外食物也越来越少。为生存所逼,它们就不得不图谋革命单位里的猪圈,这样也就招致更广大更猛烈的打击。

狼十分狡诈,它有时一声不响地接近猪圈,捕捉食物。

有一日天明的时候,我们就顺着雪地上的足迹,追踪十余里地,在一个山谷里找寻到狼窝,但老狼不知何处去了,狼

^① 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中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437—438页。

窝里只寻到了两只小狼崽，我们就把两只小狼崽装在口袋里背了回来。为了捉这两只小狼崽，我们一个个都给大雪笼罩，我们的眉毛上、眼睫毛上，我们的肩膀上、头顶上，都积满了毛茸茸的雪花，我们口中喷出热气，我们的护耳帽的绳结都冻成了一个冰疙瘩，但是我们捕获了猎物，心中充满喜悦。谁知这却引起我的辛酸、我的悲痛——狼是多么机敏啊！不知它是凭着嗅觉还是凭着感觉、还是凭着母亲对儿女的一片痴情，它寻了来。那一天夜晚，它一直徘徊在我们的墙外，它哀号、它咆哮、它哭泣，不肯离去……那是多么寒冷而凄凉的一个夜晚啊！北风呼呼，雪花纷飞，我忽然为一个母性的悲哀所打动了，它不惜生命的代价，冒着死亡的危险，一连在我们这儿哀哀号泣了三个夜晚……它没有去骚扰那个猪圈，它只是专心为了乞求。母狼的爱心也能打动人心啊！我们在第四天晚上终于把那两只小狼崽释放了，于是凄厉的哀号从此顿然消失。也许是为了报答我们，从此再没有狼来肆虐，猪圈也平静无声了。^①

呵，人心一软，狼竟然这样富有人性！延安洛杉矶托儿所慑于狼叼孩子的恐惧，采取一道又一道防范措施。传说该所所长丑子冈，曾经“一个人举着大木棒子，追狼追出几里地，直追得野狼气喘吁吁，跑不动时，她才站住脚。不过她也累得几乎趴下，好在狼知趣地走开了”^②。这像是幼儿园阿姨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因为只有童话故事里才有如此被一个女同志就追赶得气喘吁吁的狼。但是，从另一方面倒可以见出狼的知趣、识大体与通人性。

现代动物学研究发现，狼是群居动物，并且仍然处于母系社会。“雌性在任何土狼家族里都是主心骨，不管是姐妹、姨姑、母亲和女儿，都生活在一起，只有数量非常有限的一些雄性成员才被允许徘徊在四周，以尽到做父亲的职责。”它们以捕食野生小动物为主要食物来源，偷食人类豢养的禽畜那都是偶尔为之。夏季丰茂，是狼群里的青春时

^① 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中册，同前引第438—439页。

^② 王颖：《红摇篮》，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70页。

节。雌狼情动于衷,发为远声,招引夜幕下的郎君们竞争上岗,与之恋爱交配。“这种野兽遵守着相当严格的等级制度,居于统治地位的母土狼及其幼崽声威显赫,当一群土狼开始撕扯某种食草动物时,一头身材健壮的成年雄土狼会在这头母土狼最矮小的一些幼崽面前投降。”并且,“这种等级制度是世袭的:原来处于女家长位置的土狼的曾孙[女]在部落中仍处于控制地位,而那些原来处于底层的现在仍然在底层,几十年后仍然如此。”^①这种情况虽然主要是对非洲土狼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但其他狼群的生活状况应该基本与此相类似。所以,狼群按照自己的社会秩序生存繁衍着,用自己的声音表达着生命的喜怒哀乐,与人类相戒相随,相游相戏,共有一方蓝天,共享有一方水土。狼群,它们也是大地上的一道风景!

洒满了月光的院子里,一团一团的人围坐着,不倦地谈着闹着,他们忘记了一天的辛苦,也忘记了又将来到的第二个辛苦的一天。直到吹过了熄灯号才不得已地互相道别,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学校又回复到原始的寂静,孤零零的圆月挂在高空,远远的山上不时有几声狼叫,或是狐狸的叫声。宇宙在等着,等着太阳出来,等着太阳出来后的明丽的山川,和山川中一切生命的骚动啊!^②

这是1939年秋收时节,处于热烈亢奋中的知识青年参加集体生产运动后,表现出对生活的无比热情。狼群退让了,远远地点缀着延安的夜空、陕北的月色。

在这里,冬天的深夜,当雪地映着黑天,当北风吹过山岭,一阵尖厉的叫声,以颤动的但并不孱弱的旋律,随着夜风的节奏传到你的耳朵。

这声音给人以一种这样的感觉:想小心地听完它,同时

^① [美]纳塔莉·安吉尔:《野兽之美》,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1、169页。

^② 丁玲:《秋收的一天》,见《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135页。

又觉得从耳朵一直钻到心脏,像一股寒森森的利剑,它所要求的乃是弱小者的生命。有房子,有灯光,听了这声音虽不至于实际的害怕,但有时也可以引起人的一些本能的恐惧。

如果当时恰巧送一个朋友出去,你一定会叮嘱他:当心狼吃了你呢!如果房子里正有三四个人在谈着话,一定会有人把所谈的话停了下来,说:“你听,狼又在叫了。”于是谈话就会立即转到狼的身上去。

……再有人就谈到,说二年三年以前,我们住的这带地方还是很荒凉,冬天夜半走路,常常会遇见狼的。而现在,连狼的叫声也渐渐远了。

我常常想起这些事情,当一个人听完了那拖长的、凄厉的狼的叫声,我体味那位朋友当时危急的窘态。我想像着在暴风卷着狂雪的山野里,狼眼(大概总是发阴沉的绿色的吧)闪出那荧荧的光焰。那光焰带着残酷的、凶狠的闪烁,穿过搅卷着雪片的旋风……

那,那正是饿狼的神气呀!

但是,我也能作这样的最后而肯定的想法:狼是有狼的世界的;人的世界在扩大,在狼是要悲哀的。^①

这是延安时期绝无仅有的一篇对狼没有多少成见,直接以个人的心理感受描写狼的文章。它出现在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开展之前,社会舆论环境还允许人们对狼表现出个人的观感与态度。经过整风审干运动之后,革命队伍里就绝对不允许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合拍的个人观感出现,哪怕是关于狼这类野生动物。

1946年5月,在第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参议员李国芬、刘建章、郝显德等八人提案《积极提倡奖励打狼,以免伤害人畜案》。提案认为:“边区各地多山广林,一年四季狼豹三五成群伤害牲畜很多,甚至吞噬小孩亦屡见不鲜,尤以延长、固临、志丹、甘泉等县为甚,如不积极打杀实属有碍人财两旺。”因此,他们提议:

^① 陈企霞:《狼叫》,《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2月2日。

一、积极发动军民打杀，并请神枪手协助清除。

二、由边府明令规定打狼奖励办法，并布告军民周知，应以打狼一只奖米伍斗为宜，应责成各级政府认真奖励。

三、奖励所需之粮应由边区政府指定粮食局支付之。^①

此项提案在参加会议的 170 名议员中，以 101 票通过。^② 随后，边区政府颁布命令，号召各级政府积极打狼，“希各县根据各地具体情形接令之后，拟定奖励办法，并督促各乡切实提倡执行，以免对人畜之损害。”^③

一年未到，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此项命令曾一度中断执行。但 1949 年后又恢复执行，陕西各地都涌现出一批打狼英雄。到 1990 年代初，整个商州地区只剩下 15 只狼。“狼是吃黄羊的，可狼在吃黄羊的过程中黄羊在健壮地生存着……老一辈的人在狼的恐惧中长大，如果没有了狼，人类就没有了恐惧嘛，若以后的孩子对大人们说：‘妈妈，我害怕，’大人们就会为孩子的害怕而更加害怕了。”^④这正如恐惧是一剂苦药的话，那么，维持人类健康成长却必需这剂苦药。遗憾的是，我们过于向往甜蜜的生活，我们不习惯与对手，与强大的对手和平共处地生活，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能容忍那种有强大对手存在的世道。

于是，狼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革命队伍这样不信邪、不怕鬼的强大对手。

二

与狼的命运截然不同，虱子却被革命队伍所容忍、接受，并获得美名。因为虱子不是以革命队伍的对手状态存在着的，最多是讨厌

① 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10 辑，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58、59 页。

② 参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8 年 10 月版，第 273、362 页。

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令各级政府积极打狼以免伤害人畜》（1946 年 5 月 17 日），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10 辑，同前引第 58 页。

④ 贾平凹：《怀念狼》，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0 年 6 月版，第 22 页。

的小人,可以豢养,用以考验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的人生程度。

虱子是陕北老乡们的家中常人,身上尤物。高建群的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中的主人公杨作新,陕北人,中共早期党员,小的时候经常蹲在父亲身边,看着父亲捉虱子。

父亲杨干大一个人盘腿坐在油灯跟前,脱下身上的老羊袄,正在逮虱子。这是他除了劳动外,唯一的一件嗜好。他身上的虱子真多,一窝一窝的,有些虱子简直成了精,会长上翅膀飞,像小妖似的。杨干大的眼睛已经不行了,尽管就着油灯,尽管他的眼睛快要碰到皮袄了,可是眼睛只是象征性地看着,他不是用眼睛在瞅,而是用指头在摸。好在这皮袄就是一个生产虱子的宝库,所以两个指头一捏,总是擒来。抓住一个了,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一挤,“啪”的一声,虱子的肚子破了,指甲盖上留下两滴鲜血。还有些虱子吃得过饱,挤时声音清脆,如果脸凑得太近,会有血星溅到脸上来的。杨干大挤虱子,挤到高兴的时候,会捉住一个,填到自己嘴里,“嘎嘣”一声,咬出响;他说这虱子是一味中药,大补,本来就是自己身上的血水子嘛。^①

这虽然是小说家言,但完全可以视作生活纪实。如此有滋有味的捉虱子情景,比鲁迅笔下《阿Q正传》中阿Q与王胡,蹲在江南水乡绍兴城里冬天的矮墙根下,晒着太阳,半天才捉出一只虱子来的捉虱子比赛要精彩多啦。

陕北农家虱子多多,是由于缺少水源,冬季难得沐浴。习以为常,相习成风,老乡们对虱子也就根本没有当作一回事。经过长征的革命队伍进驻陕北延安,在这里建立了“三三制”工农民主政权,“扞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是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虱子本是那边农家的‘好朋友’,生虱子的问题决不像我们这边看的那样羞

^① 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70—71页。

辱。没有虱子的参议员,那可怪呢!”^①革命队伍从江西苏区到陕北,长征路上食不甘味,寝不暖席,虱子也就相生相伴了。对此,革命队伍里的中国同志们,无论男女,无论知识分子或工农干部,都不屑谈此。只有来到革命队伍里的外国人才大为惊诧,留为文字。

受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担任红军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李德,晚年回忆,长征路上毛泽东为了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创造出各种名言警句在队伍里传布,在江西时,“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参加战斗。”“在西康,革命者的标志是虱子,在那里我们几乎让虱子给吞吃了。”^②这在革命队伍里,一直被理解为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次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保安采访。“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③此“寄生物”非它,虱子或跳蚤是也。斯两小虫,都是人或其他哺乳类动物的体外寄生物,生有刺吸式口器,吸食血液,传播疾病。它们都没有翅膀,头小肚大,跳蚤身体扁平,善于跳跃,其跳跃距离为身长的一百倍,是昆虫世界的跳跃冠军。

一年后,当时的斯诺夫人,出身高贵的尼姆·威尔斯女士到延安采访,被安排住在没有被日本飞机炸毁前的延安古城里由原来的基督教堂改设的中央交际处招待所。她对革命队伍里的这些寄生物们特别敏感,想方设法,又无可奈何,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就表示出自己的十分惊叹。陕北的“跳蚤却似乎有着某种撑杆跳的器官,因为它们跳的尺寸是没有限度的”。她辗转难眠,不禁感叹:“啊,大自然的芸芸生界,岁月不能使之枯萎,习俗不能使之陈腐!”^④直到晚年,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她把随身带来的帆布床和睡袋放在土炕上,“帆布床的四条腿下面,垫着四只装满煤油的香烟筒”。以此希望能防止寄生物们的侵扰,

①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版,第187页。

②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66—67页。

③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9页。

④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第81—82页。

可是跳蚤竟然有能耐跳上去。“我用石灰粉填塞了所有的缝隙,但是,砖铺的地板上,仍然栖居着各种昆虫,有相互争斗的,也有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每天晚上,我把凉皮鞋‘束之高阁’,每天早晨把它们抖了又抖,看看有没有蝎子和蜈蚣,有没有虱子和跳蚤。”在延安革命队伍里,她不能避免被跳蚤和虱子袭击。作为一个贵族身份的知识女性,清洁卫生是她的生活习惯,并且她有关于西方中世纪鼠疫灾难的常识。

传播鼠疫的是跳蚤,而不是老鼠。这种致命的疾病,在地球上仍然流行的地方已为数不多了,而陕北便是其中之一。我的地板上尽是跳蚤,并且群聚在一起,对外国人颇为多情。中国人没免疫,然而,祖祖辈辈任凭虱叮蚤咬,在他们的血液里产生了一支坚强的抗体大军,保护他们免遭疾病的侵害。我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经毁灭了基督教人口的一半,于是,注意讲究清洁卫生,便在欧洲风行起来。而这一点,似乎在几个世纪之后,还没有传到中国。那年夏天,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住的那个院子里没发生鼠疫。不过,有一人得了伤寒,一人患了严重的痢疾,还有许多常见的小病。^①

350

做客的日子毕竟是短暂的,再怎么难熬,这些革命队伍里的外国朋友迟早都离开了延安。随后,对革命队伍里的寄生物们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原来生活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

1937年8月,从上海到西安,经徐明清(徐一冰)介绍奔赴延安的江青(蓝苹),开始被安排住在延安城里的招待所,接受政治审查,处于苦苦等待中,9月遇到受组织调动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徐明清。她们曾经在上海就相识,彼此之间非常亲近。这次见面时,江青对徐明清谈自己对延安生活的感受是:“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蚊子虱子

^① [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85、286页。

成了王。”^①

1938年10月,时年23岁的华君武从上海来到延安。他生在杭州,曾在上海银行供职,到延安后一直在鲁艺工作。他记忆中已经改制为鲁艺的桥儿沟天主教堂,西侧有两排石窑洞,中间一块空地既是篮球场,又是露天会场。“大家自带小板凳在那里开了许多内容的会议,也可说是一种户外课堂,印象很深的是地上的跳蚤太多,开会时‘千军万马’都钻到裤腿里去了。”^②

虱子肆虐,实在是当时的革命队伍没有什么很好的对付办法。据傅连璋的女儿傅维芳回忆,“当时我爸我妈管托儿所,所里的很多事情都来找我爸。我爸当时任中央办公厅卫生处长。我是最早到洛杉矶托儿所的,当时只有七个孩子。在洛杉矶托儿所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上小学,就是保小。”“我记得小时候捉虱子,多极了,每个人身上都爬满了虱子,那时刚从老乡家中接回,又脏又瘦。上保小后,虱子也挺多,经常是太阳晒,开水煮的。”^③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虱子横行始终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当年的延安中学学生回忆:“冬天没条件洗澡,夏天只能在延河里泡泡,加上窑洞里潮湿,身上长虱子、生疥疮的很多。在延安,有人把虱子戏称为‘革命虫’,干革命的人身上有虱子是常事。最麻烦的是年纪小的女孩子,那些‘小动物’最喜欢把家安在她们的头发里,所以她们干脆推光头,让虱子无处藏身。”^④灭之不绝,只有承认之、容忍之,并冠以佳名,是为对革命意志的考验,对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精神的挑战。

1939年春,延安大生产运动掀起后,在马列学院学习的学员们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当时的农业生产劳动,特别是菜地的劳动,正是促使你从思想上解决‘脏’的问题的一个物质力量。要种菜非同粪水打交道不可,掏粪、担粪、泼粪,随时都有可能,或者简直不可能避免地会

^① 见徐明清:《我的青年时代》,收入《史林撷英》,上海: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8辑,1998年1月编印,第81页。

^② 华君武:《“鲁艺”漫忆》,见《补丁集》,同前引第12页。

^③ 王颖:《红摇篮》,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402页。

^④ 李伦:《情系黄土地》,见贾芝主编:《延河儿女——当年延安的中学生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77页。



1938年11月前的延河晨洗,不远处是掩映在晨雾中曾经巍峨的延安古城

352

在你身上、脚上、手上溅上粪便,半天下来,任凭你怎么洗,端饭碗的手都是臭烘烘的。马列学院这次种菜,在这方面给我们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第一次打开了解决‘脏’的问题的大门。刚开始还不很习惯,硬着头皮干下去,几次以后就无所谓了。”“在生产上有这个问题,在生活上也有这个问题。窝窝头上叮满苍蝇,炕上满是跳蚤,被子缝里挤着虱子,在这种环境,你就需要吃得下,躺得下的勇气和毅力。”^①用农业生产体力劳动,从肉体上到精神上改造知识分子,重新塑造合乎规范的人生,这是20世纪中国革命队伍在延安的一大发明创造。

1940年底开始,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班的同学被抽调参加陕甘宁边区乡、县、边区三级政府选举工作。丁雪松被派遣到绥德市参加此项工作,晚年她回忆说:“陕北农民习惯睡大火炕,全家男女老少睡在一个炕上,女学员也只能客随主便,挨着他们家的女孩子睡在一起。当地人又不讲卫生,难得洗一次澡,和他们同睡一铺炕,自然很快传上虱子。你的毛巾和牙刷,他也随手拿起即用。但是想起临走时,领导

^① 王惠德:《忆昔日》,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同前引第71—72页。

的谆谆告诫：要深入群众，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嫌脏，不要怕长虱子，又都强忍下来，慢慢发现了农民勤劳、朴实的那一面，从而端正了态度。”^①

三

其实，虱子或跳蚤本身都是讨厌的，但被派上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用场，人们在本来就“无奈小虫何”的基础上，心理上再一个转弯，就崇而敬之了，美其名曰“抗战虫”、“革命虫”。这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反对洗澡，称颂污垢，认为“凡是能使身体变美的事物，都会导致犯罪”，所以，“虱子被称为上帝的珍珠，而虱子满身则是圣洁之人不可或缺的标志”^②，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至今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说基督教会所统治的中世纪衰亡于这些被誉为“上帝的珍珠”的虱子们。但虱子横行，鼠疫蔓延，却曾导致欧洲大陆许多城市人死城空。延安革命队伍里对于虱子的礼拜加封，是自然环境上的陕北缺水，难得沐浴；社会条件上的戎马倥偬，不遑洗涤，“能把抗战的精神动员到每一只虱子的身上”^③，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是，更往前一步，把虱子当作对知识分子人生改造的精神考验，却是荒唐的。

1941年2月，延安中央医院陆续收到一些高烧不退、病情严重的病人。经检查，“有的患伤寒，有的患副伤寒甲、乙，还有斑疹伤寒和回归热”。到6月底这类病人就有27人，内科应接不暇，7月临时成立传染科。“8月份，传染病人便突然增加，统计8月入院各类传染病人达15人，9月17人，10月更猛增至57人。小儿科收治的传染病患儿，还不在此数。”当时该院病床总数仅有100余张，伤寒流行使得传染科、内科，甚至办公室都住上了病人。住院病人以延安大学和中央党校最多，分别为37人和12人。“由于预防措施没有跟上，中央医院工作人

^① 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300页。

^② [英]伯特兰·罗素：《婚姻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33页。

^③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84页。

员染病率甚高,虽然还作过预防注射,护士患伤寒者竟达19人,占全院护士的四分之一还强,这就使得我们的工作一时无法进行。”^①在这种情况下,经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医院从延大和党校抽调徐洲等18人紧急充任护理工作。病情大约到年底得到控制,但此后仍时有发生。

经过这次伤寒流行,中央医院成立“防疫委员会”,开展卫生防疫教育,延安革命队伍里逐渐注意消灭虱子。《解放日报》附设“卫生”专版,介绍虱子的种类、特性、消灭的办法。“团体灭虱就非用灭虱器不成,同时要设立澡堂子。灭虱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大蒸笼,或是用四块木板连成四方箱形,下用一铁锅烧水,将此箱形物套座[坐]在锅上,箱上盖一毡,把衣服挂在箱内壁上,即可用蒸气[汽]灭虱了。”“不过灭虱、防虱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常洗澡,常换衣服,总之,讲个人卫生是最好的办法了。”^②可惜的是,这最好的办法,恰恰是当时最难办到的事。

1942年,“今年据我们从延安的各医院中调查,回归热、斑疹伤寒的病例仍是不少,虽然没有到流行的程度……”^③

1943年3月,《解放日报》记者张沛受命到安塞县陈家洼采访,“和杨朝臣一家睡在一铺土炕上,被‘革命虫’(虱子)咬了几口。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回到延安以后,我赶写完《劳动英雄们的节日——杨朝臣、张万库给奖大会特写》那篇文章,突然发起40度的高烧来,住进了中央医院。连续14天,高烧不退,昏迷了过去,危在旦夕。”经何穆博士诊断,“确诊这是死亡率很高的流行性斑疹伤寒。病危通知书送到了《解放日报》社。”^④后经几位同志轮番献血抢救,才得以脱离危险,保住性命。

延安是革命大本营,和平环境,医疗水平相对先进,前方阵线的情况就严重得多了。1946年冬,在延川县拓家川新组建的第一野战医院(后称第五后方医院)收容了数百名从吕梁战役撤下的伤病员,中央医院派出外科主任周泽昭率领的手术队前往援助。据医生们回忆,他们

^① 杨先彬:《我在传染病科工作》,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166、168页。

^② 克雄:《谈虱子》,《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0月15日。

^③ 《扑灭虱子》,《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0月15日。

^④ 张沛:《望八抒怀》,见《新闻生涯六十年》,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1页。

在医护中最难对付的就是虱子。

那时条件艰苦,没有衬衫更换,一身棉衣,白天穿在身上,夜晚还要靠它取暖。我们进到病房,一接触病人,鞋上、身上就爬了无数的虱子。怎么办?大家都觉得束手。后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用火烤。我们把伤员身上已藏了虱子臭虫的铺草换下来,燃起篝火,两人一组,拉住四个被角,把被子展开在火上烤。这法子还灵,虱子一受热,便往火里掉,劈里啪啦,像爆米花一样。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情况已大为好转。

上石膏的伤员,石膏里面也生了虱子。我们就把棉花塞到石膏口上,虱子便钻到棉花里面,然后拿去烧掉。^①

这么多、这么难以对付的虱子,这么艰苦的野外环境,疾病传染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物质上消灭不了的敌人,革命队伍依然用精神的力量对付之。

1948年春,由中央医院部分改编的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一所三连在宜川秋林,接受数百名瓦子街撤下来的伤病员。其中大多表现为发高烧、畏寒、全身疼痛、恶心、呕吐、腹泻、肝脾肿大,身上有出血状皮疹,个别的还出现便血、黄疸。这是明显的回归热特征。而回归热是通过虱子传染的。“要制止回归热的蔓延,首要的是断绝传染源——灭虱。”“范医生出了个点子:砌一个大锅台,装一口大锅,四周砌上1.5米高的围墙,锅里注满水,上面装上木架,把伤病员衣被装进去,顶上盖严,用大火烧水,蒸两个小时,取出晾干,把死虱甩打掉。与此相配合,更换铺草,给病人洗澡、洗衣,单衣服直接用水烫,把换下来的铺草烧掉。工作人员也照此法灭虱。”^②这样才基本上控制了病情的局部蔓延,也考验了这些读书人出身的白衣战士们。

^① 范洒水等:《奋战拓家川》,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280页。

^② 方一:《同回归热作斗争》,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375页。

后记：缘于南京路上的思考

我生长在中国，这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

作为一个读书人，忝为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感是一种澎湃的激情，激励着我在延安日常生活的历史间穿行。我现在供职的单位毗邻南京路，几乎每天都要从这条被称为中华第一商业街走过。这里永远不缺乏流行时尚，但流行时尚的背后却是一种过于喧嚣的单调与乏味。

356

在琳琅满目的商场货架上，你很难找到有我们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商品，除了仅有的土特产——邵万生糟货和蔡同德堂中药。又何止是这条商业街上的商场货架呢？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里，你的衣食住行、你的耳闻目睹，同样也很难找到有我们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用品、物品和产品。如果说这只是形而下的物质生活层面的现象，那么，属于形而上的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每个月出版数以千计的杂志，数以万计的图书，有层出不穷的温情时尚，有翻来覆去的风花雪月，却难得见到真知灼见的思想、别开生面的智慧；我们每年上演播出数以千万计的影视戏剧作品，不缺乏歌舞升平的热闹场景，却难以见识属于我们自己的堪称伟大的艺术才情和独具匠心的创造精神。还有居于这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的知识文化传递层面的中小学教育，孩子们写作的作文也没有想像，没有幻想，在最应该做梦的年龄放弃了做梦的权利、丧失了做梦的能力。而幻想、想像力，正是创造能力的标志与象征，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社会，也是这样！

没有想像力，就没有创造力，在世界日渐一体化的地球村里就不能开拓和拥有属于自己的心灵天地，甚至就难以呵护属于自己的精神

文化家园。

我本来学习的专业是文学，致力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但面对如此现实，我从文学转向对社会历史文化的人文关注。

从“五四”经延安到现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河流，流量渐变。我们在进化论、历史决定论观念指引下，倡导“少年中国”说、“新青年”主张，发动大革命风暴、新启蒙运动，形成政党政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将本来就断裂得没有连续300年的历史迫不及待地用炮火和推土机摧毁碾碎，然后贴上光洁靓丽的瓷砖或马赛克。这样，我们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全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城到乡镇，所有广场上的地砖和厕所里的瓷砖，都是那么惊人地相似，一样的花头。

我因此而关注延安，思考延安，重新发掘整理延安。

延安虽然距离我们现在只有半个多世纪，但是我的工作已经持续了近十年，这部书稿也先后写作了近五年，我仍然感觉到最困难的是史料。对史料的发掘考辨，绝不是什么学究冬烘，而是因为这十年延安的历史经验，规范制约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以至于今天，几代中国人的生死浮沉和精神生命历程。我是将自己在现实生活工作中遇到的所有困惑与思考，都寄托在了对延安十年历史的梳理审问研究。

图书馆里可以公开查阅的资料，似乎都在描述着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延安。掩藏在一些未公开的档案材料和个人记忆角落里的，似乎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延安。我无意于用一个来否定另一个，我相信如果确实存在两个延安，那么值得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延安到底是什么？

记得那是1998年底的一天，在巨鹿路那座曾经是某某资本家的小洋楼改制的《上海文学》编辑部，蔡翔先生问我，能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写延安？对，用知识考古的方式，还原延安生活面貌，描述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真实，揭示那些已经进入历史与未能进入历史的延安日常生活记忆的加减乘除法。

透过这个窗口，我忽然发现了一片奇异的风景。

从那时到现在的几年时间里，这部书的部分篇章承蒙蔡翔、杨斌华，以及编辑部其他先生的器重，陆续在《上海文学》杂志刊载，并不断

被其他报刊转载。其中《秧歌是这样开发的》还荣获第八届(1998 - 2003)《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这增添了我继续研究,不断探究的兴致和勇气。

延安,浓缩了现代中国革命的集体记忆法则。它不但决定了我们对过去延安时期日常生活的取舍缩放和抑扬褒贬,而且规范了我们对现在生活的价值判断和认知程度。

日常生活本身是充满情趣、惊喜和荒诞的,但我的写作绝对不属于文学创作,从来不敢妄置一词、乱断一语。为了查证核实1943年5月17日高岗在陕甘宁边区党群系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我从上海打电话到北京,几经周折,又转到西安,一个月后获悉在陕西省档案馆可以买到包含这份史料在内的图书,可惜该馆不办理邮购业务。我只有拜托西安的朋友代劳,从档案馆买到30本一套的资料,再花半个月时间零担托运到上海。书价300元,零担托运费加来回提货运输费,总共400余元,得到的是一条注释的安顿。

358

北京的档案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套14辑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由于分辑出版,前后拖延时间长,我在上海、北京的几家图书馆都没有看到全套图书。一个偶然机会,我和吴晓梅君说起此事,希望她通过朋友帮我到该出版社仓库去查找。当她电话告诉我,已经找到其中的11辑,并负责挂号邮寄赠送给我时,我觉得此时此刻她是天下最可爱的人!还缺3辑怎么办呢?一个月未到的时间里,上海市福州路上的图书城举行过期图书特价展。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和我的同事在提前做完工作后,抽空去逛书店。真是苍天有眼,我一次就淘得我所缺少的这套书中的2辑。怀着几分侥幸的心理,随后几天我又去图书城,终于在第三天下午,竟然就有了我唯一缺少的那1辑书。而该书展能够拿出来展售的本身就是不成套的丛书。

天高云淡,气朗风清,我自认为是那个下午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呵,回到单位办公室,正好发给我工作上的什么奖励100元,赶快请实习生拿去买糖,大伙儿见者有份!

还在我读博的时候,远在青海的王世朝兄得知我以延安为博士论文选题,便将自己曾在西宁街头一家小书店里购得的半套6卷“延安文艺丛书”,亲自带到上海馈赠于我。这是丁玲生前主持编辑,交由湖

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了补齐另外 10 卷,我多次写信到湖南人民出版社,托长沙的朋友去打听,时日长久,茫然无所求。去年 4 月,我应邀参与中央电视台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 60 周年特别节目制作,没想到在北京的延安精神研究会办公室里堆放着成批的全部精装本的后 10 卷图书。原来这后半部丛书改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怪不得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一问三不知了。承蒙厚意,延安精神研究会秘书处慷慨捐赠此书一套给中央电视台节目摄制组,摄制组的朋友们“宝剑配英雄”,将其归属于我。我背着满满一旅行袋的书,登飞机时严重超重,不得不按邮政包裹的收费标准支付超额部分的运载费。但充实我心的是幸福与感激,虽然我称不上什么英雄。

写作过程中,为了核实一个数字或一个名称,我经常就近到上海图书馆或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去查询。这样,几个字的代价,就是至少半天时间加 50 元车旅费。

天气晴好的星期天,上海文庙旧书市场人涌如潮,摩肩接踵。侧身其间,两手乌黑,两眼发亮,鼻腔呼吸不畅。因缘时会,可以碰到极其罕见的解放区出版物或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物。从书上的印签、题记或旁注中看出,应当是当年的南下干部夹在背包里带来上海,或因战乱迁移重庆再回归上海的高校图书馆藏书与私人收藏,人世沧桑,流落坊间,现在浮出市场,往往都是天价。我无意于做图书版本的交易买卖,完全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当场翻阅磨蹭的时候多,借以在枯黄的原始文本上寻求历史的质感,万不得已才付出相当一笔钱款,购买那些一定是迫切要用的图书。

吴光伟是一个具有谜一般经历的人。为着考辨她的身份和照片,我先将其存疑的照片翻拍,邮寄给有关人士辨认,得到的回答竟然都是“记不清了”。偶然间从曹禺的追忆文章中获悉,吴光伟到延安之前曾经是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学员。曲曲折折,打听到设在广州某中学的该校在粤校友会,承蒙其主持人陈学璇先生厚意,我从该会惠赐的纪念册中查找出吴光伟所在的首届学员名录,然后逐个请教大陆还健在的朱家训、左恭、沈蔚德、叶子(叶仲寅)等几位耄年老人。遗憾的是他们对于这位当年的同学,也是大多回避。幸亏 92 岁高龄的叶子女士,在北京史家胡同寓所里接受了我的拜访。

那是个春天的黄昏,我和友情出场的吴晓梅君在一幢长满半墙常青藤的寓所里,看着老人拿着放大镜,非常肯定地确认了吴光伟这位先后在北平和南京两度同学的相片。

随后,我又找到早已归并为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攀上某生化楼顶层隐藏在一间研究生教室里厢的档案室,数次查询吴光伟和叶子的学习档案。同时,我写信给远在海外,寥若晨星的原南京国立戏校的首届学员,试图探询吴光伟晚年的情况。

特别值得感念的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叶维丽女士。我在有关材料上看到海伦·斯诺当年在延安采访过吴光伟,并留下她的英文传略。用电子邮件拜托叶维丽帮我在哈佛图书馆查找,没想到这类图书借阅的人竟然很多,需要事先预约。经过一个春节,图书馆通知预约的书已经到位,更没想到叶维丽自己却崴伤了脚踝骨。打上石膏模具,伤筋动骨一百天,她因此而度过一段痛苦的日子。我除了万分的抱歉,只有耐心地等待。

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史沫特莱被称为“三S”的作品,都有汉译本,我全部拜读过。一次,我在上海图书馆等待一位朋友的到来,等待的时间里随意翻检图书目录检索系统,并索取借阅海伦·斯诺一本早已有过汉译本的英文原版书。翻开这本装帧精美的原著,赫然出现在我面前的竟然就是我苦苦追寻多年的吴光伟访谈录和延安时期的照片。

海伦·斯诺原著中的吴光伟照片,证明叶子女士对另一张照片的确认是完全正确的。

纵然如此,我对延安时期原始材料的涉猎占有还是留下很多遗憾。本书原来写作计划中有一篇《多种经营大生产》,准备通过对延安时期的机关单位发展多种经营的详细叙述,阐明供给制生活与市场经济的最初嫁接。但这方面一些最关键的原始材料我至今未能掌握,最后只能放弃,付诸阙如,以待来日。

如果说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那么有一种理论的灰度,有如旧称“洋灰”今称“水泥”的 cement。人们在用它建构历史大厦的同时,便将不合乎其框架规范的砖头板块抛弃了,然后再将大厦周围的地面全部浇注成意识形态的水泥地,显要的位置上摆放几盆真

真假假的香草鲜花。

对此,我个人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打开日常生活这个窗口,希望能够观赏到水泥地浇注之前的生态面貌。

好在至少南京路步行街已经撬掉了水泥地,铺陈上规整华丽但有坚实质感的花岗岩地面。

2003年4月于非典肆虐中

时光又流逝了三年。

我供职的单位已经从毗邻南京路变迁到衡山路地铁站附近,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在南京路商业街上的那种强烈的文化缺失感,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不再是简单的经济GDP数据增长,还有社会、文化、政治、环境、道德、伦理,等等。这样的改革和发展,迫切需要学术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对过去历史的反思和梳理,应当是这种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有朋友告诉我,学术界对延安时期的重新研究,已经引起读书界的普遍关注。问题是现在重新发现的延安,与已有历史教科书上的延安颇多差距。所以,他们客气地希望我能够客观公正地描述出一个真正完整的延安。

我很感念这些朋友,包括很多当年在延安生活工作过的尊者长者对我的厚爱。确实,在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延安,更多的是与已有教科书和人们观念中的延安不大相同的延安生活历史的某些方面。但我绝对无意于将延安的这一方面取代另一方面,或用这个延安来否定那个延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首先努力发掘那些曾经被忽略或掩埋了的延安,然后将其与我们几代人所熟悉的另一方面的延安合成一体,构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延安。在我与黄华、凌青、李锐、张仃、华君武、罗工柳、于蓝、干学伟、陈明、曾克、黎辛、王丹一等诸多延安老人的交往中;在我翻阅延安时期的历史文献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延安时期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生命升华的天堂般的记忆,以及那残酷

的斗争、严峻的现实。

延安有过欢笑，延安也有过泪水。这是我们的前辈为生存所创造的光荣和付出的代价。作为后代，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没有拒绝的责任，最需要的是情怀和智慧。我将在下一部关于延安的书里，更多探讨关于欢笑与泪水铸成一枚历史金币之两面的缘由。

感谢始终关心本书出版的向继东先生，感谢责任编辑周伟先生，感谢本书所配图片的拍摄者和保存者。

2007年6月于沪上永福路

